

# 五千年演义

大明盛衰(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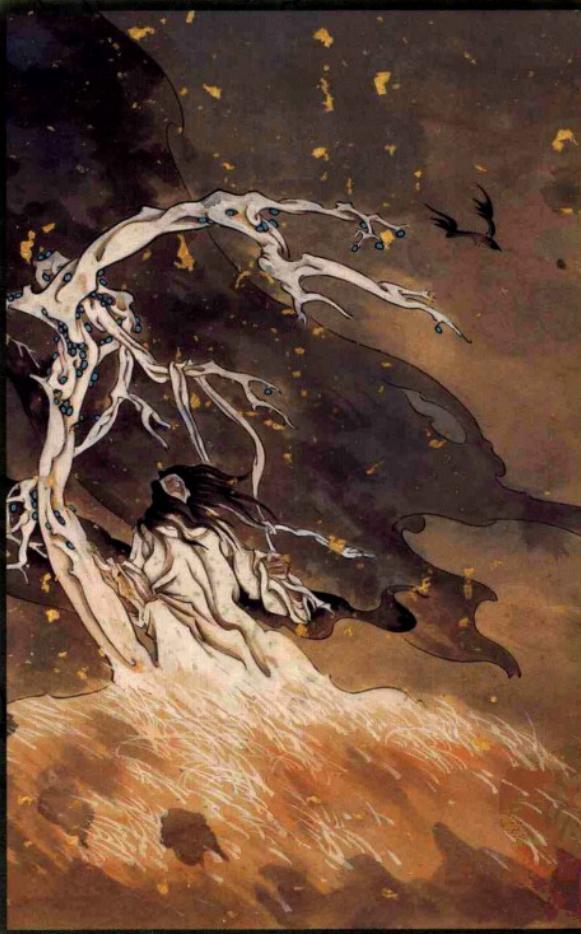
吴梦起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 五千年演义

大明盛衰(下)



ISBN 978-7-5315-5345-8

9 787531 553458 >

上、下两册定价：80.00元  
全套定价：750.00元（共18册）

# 五千年演义

大明盛衰

(下)

吴梦起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沈阳

© 吴梦起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明盛衰 / 吴梦起著. — 3 版. — 沈阳: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 1

(五千年演义)

ISBN 978-7-5315-5345-8

I. ①大… II. ①吴…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2182 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许科甲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110003

发行(销售)部电话：024 - 23284265

总编室电话：024 - 23284269

E-mail：lnse@mail.lnpgc.com.cn

<http://www.lnse.com>

承印厂：沈阳印刷厂

---

责任编辑：盖如翔 马 婷

美术编辑：刘丽菲 姚洪发 徐 鹤

美术统筹：徐 鹤

封面设计：徐 鹤

封面绘画：崔晓柏 李 智

彩色插图：张君华 胡文兴 胡昌凯

黑白插图：刘俊元

版式设计：东 科 刘 俊

责任校对：贺婷莉 那一文

责任印制：吕国刚 王守志

---

幅面尺寸：168mm×230mm

印 张：34.25 字数：445 千字

插 页：8

出版时间：2011 年 1 月第 3 版

印刷时间：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315-5345-8

本册定价：80.00 元（上、下）

全套定价：750.00 元（共 18 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言

我于 1986 年开始参加工作算起，至今已经过了 24 年的时间了，一直从事着中学历史教学工作。故而，要说到给广大的青少年们推荐历史读物，我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因此，值此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约我在工作之余，抽出一点儿时间为他们即将全新再版的“镇社之宝”——大型丛书“五千年演义”写序之机，我便欣然提笔。

大凡学过一点儿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是一门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正是因为如此，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过去性：发生了，就永远成为过去，不能重复。换句话说，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实际上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即历史学家对人类过去的回忆和思考。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历史学具有主观性的特点，历史学不可能把自己的价值定位在追求描述历史的真实性上。这就引出了下面的一句话：“历史有什么用？”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布洛赫曾遭到其幼子此般的质问。

对于一般人而言，不管你学习的是什么，都会有上述这样的想法。因为，任何学科面向的，都应该是未来，而不是过去——历史学科当然也不例外。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有的朋友就会觉得，历史一点儿用处没有，因为它不能给非常现实的我们带来任何物质财富。

但我不这么看。对我来说，历史非常有用，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借用一千多年前的宋真宗在他的《励学篇》中的

话说，就是：“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您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证据嘛，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我纪连海本人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么？您想啊，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人家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组能找到我么？即使人家一不留神发了昏，找到了我，我能够挑起这副担子么？我能够取得“百家讲坛”栏目开播九年来无人能及的 0.69% 的收视率么？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能有我今天的成就么？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您能知道我是谁么？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

依我看，差距就在于你在学习历史的时候，是否遵从了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在几十年前所说的非常精辟的“认真”二字。中国有句古话：“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说话到了这儿，很自然的就会有个问题：应该看些什么样的青少年通俗历史读物呢？“五千年演义”这套书，在它刚刚出版的时候，我就看过，当时就觉得不错。这次又经认真修改后再版，质量更加精良，是一套水平较高、值得推荐的青少年通俗历史读物。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儿浅见，您的感觉如何呢？看了，就知道我所言不虚了。

纪连海

2010 年 9 月 27 日

# 前　言

“五千年演义”是一套以讲述中国历史为内容的历史丛书。之所以编这套书，是想为青少年学习历史、丰富文化生活提供方便。要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素质，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离不开历史知识的普及。这种普及，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讲故事，是方式之一。

历史的内容，文学的方法，文史结合，是这套书的主要特点。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丰富可信的历史知识；而叙述和描写的方法像小说，这容易引起阅读的兴趣。不论是为了学习，还是为了消遣，看看这套书，都会觉得饶有兴味。

用演义的方法讲述中国历史，过去已有先例。蔡东藩先生的《中国历代演义》，是大家都知道的；其他像《二十四史演义》《二十六史通俗演义》，也有过几部。至于分散写的某朝某代的历史演义，就更多了。这些书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它们毕竟都是写于旧时代，难免有局限性和陈旧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面对新的时代和新的读者要求，有必要写一部新的历史演义。

与过去的那些历史演义比较，“五千年演义”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是观点新。全书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和对人民是否有益作为评论是非好坏的标准，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全书还吸收了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材料，提供了若干现代的史学信息。

其次，是写名人、写大事。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值得一写的人和事是很多的，一一写来，不大可能，也没有必要，只能拣重要的写。有些不太重要的人和事也不是完全不写，但有详有略，因而全书看上去也还是一系列重点突出、连续性很强的故事。

第三，选材较为全面。就是说，它不只是写帝王更替、朝代兴衰，而且是面向社会，写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宗教等各界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形象地展现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精彩画面。

第四，语言通俗，难字注了音；古地名注了今名；历代官职说明了它的职权范围。扫除了这些阅读上的障碍，会使读者感到顺当和方便。

“五千年演义”既然是一部文史结合的读物，当然不能不注意它的文学性，诸如经典桥段的选择，人物描写的形象生动，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一般长篇文学作品所具有的那种结构上的整体感，等等，本书都注意到了，完全可以把它当做通俗小说来读。

在如何处理虚与实的关系上，本书采取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即在保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真实的情况下，某些细节、环境、气氛、对话等，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史料极端缺少的地方，采用了一些传说；某人某事有两种以上说法的，取其一说，或稍加辨析。由此可见，“五千年演义”基本上是一部信史。

“五千年演义”是一套统一布局，分头执笔，多卷合成的丛书，从炎黄传说写到五四运动，差不多一个朝代一本。少异数年代短的朝代，独立成书内容单薄，就与接续的朝代放在一起了，如秦、西汉，隋、唐。清朝，习惯上把它划为两个时期，加上内容详略的考虑，因而前期、后期

分开，写了两本。整套书系统地反映了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发展概貌。各本书的内容既互相呼应，又相对独立。读者如能从头看到尾，当然可以大有收获；单读其中的一本，也会开卷有益。

以上讲的，是作者和编者的共同愿望。到底做得如何，则应由广大读者和专家去品评了。谨以这初步成果，奉献给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人们。

编 者

1989年7月

## 再版说明(一)

“五千年演义”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两次荣获全国优秀图书奖，先后被共青团中央、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书刊发行业者协会评为“青年喜爱的图书”和“优秀畅销书”。根据读者要求，现予以再版。为了使该书质量更臻完美，我们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的史学专家逐本进行了审校，对个别文字和史实方面的差错、疏漏进行了校订，使它在原有通俗性、可读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知识的准确性。

回过头来看，该书体现在初版前言中的编创原则，是合适的。对待这样一部大书，内容和形式的完美性只能是相对而言。书读的人多，议论也多。对议论中提到的关于如何对待历史与演义，如何处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如何鉴别、使用某些史料，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及内容怎么详略、取舍等学术性问题，应允许有不同看法。本次再版没有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修改，仍保持初版原貌。

编 者

1994年5月

## 再版说明(二)

弗朗西斯·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深谙此理，“修史书”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必做的“功课”，因为他们懂得要“以史为鉴”，足见“史书”在我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正因为如此，近些年社会上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读史热”，反映中国五千年历史题材的各种形式的作品通过各种媒体大量涌现出来，教育部门也加大了历史知识在高考中的比重。这是很好的现象，说明读史书已成为当今社会人们提升自身素养、完善自我的潮流之举。

目前，图书市场上专门针对青少年读者编写的、历史知识准确、语言通俗易懂、系统地讲述中国五千年历史的读物非常少，而“五千年演义”在策划、创作之初，选择了以章回体演义的方式来讲述历史知识，它的完备性、知识性和趣味性，都非常符合青少年读史的需求。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套丛书是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多位史学专家逐本审校过的，其知识的准确性是毋庸置疑的。

“五千年演义”自1989年首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及专家学者的好评，曾先后几次荣获国家级各类大奖。自出版以来曾多次再版重印。如今，距这套丛书上一次改版重印（1997年）已经过去近14年了，此次选择改版重印“五千年演义”这套丛书，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编 者

2010年10月

# 编 委 会

主 编：盖 壤 吴庆先

副 主 编：张凤禾

编 委：吴庆先 张凤禾 杨春青 杜富山 迟赵俄  
王吉祥 孙宝镛 王瑞起 尹世霖 张洪德  
阎德荣 吴梦起 佟乃林 钱世明 杨世铎  
李铁屏 盖如翔 朱仲玉 马光复 郎享伯  
崔玉平

再版策划：许科甲 方 虹 薄文才 孟 萍 冯雁明  
朱艳菊 马 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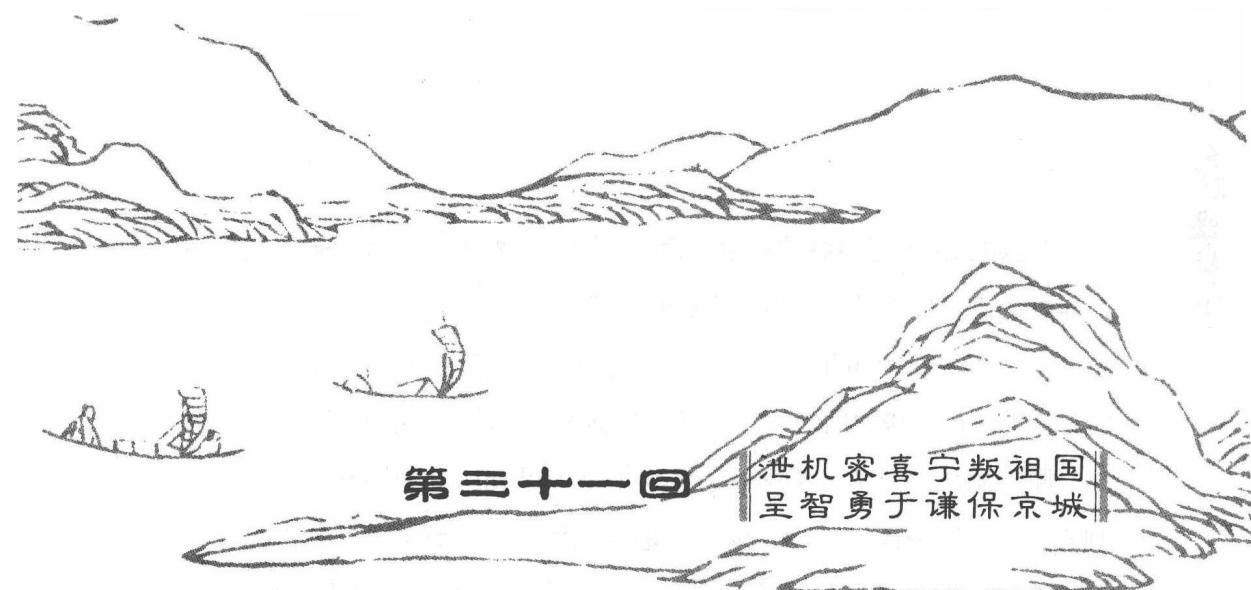


## 目 录

序　　言 .....	纪连海
前　　言	
再版说明（一）	
再版说明（二）	
第三十五回　　泄机密喜宁叛祖国 呈智勇于谦保京城	001
第三十二回　　返故国英宗遭囚禁 易太子景帝费苦心	010
第三十三回　　图侥幸众小设奸谋 贪功名群丑夺官门	018
第三十四回　　于少保英名传千古 建庶人毕生做囚徒	026
第三十五回　　朱见深偏爱老妃子 万贞儿蛮横霸后宫	036
第三十六回　　喜读书孝宗知治国 好嬉戏正德宠阉臣	045
第三十七回　　李梦阳草疏遭重讞 康对山毁誉救友人	055
第三十八回　　研学问书生悟大道 夺权位太监自相倾	064
第三十九回　　争生存农民当“响马” 救同伙壮士举义旗	073

<b>第四十回</b>	助义军赵秀才仗义 主安抚马都堂殒身	.....	082
<b>第四十一回</b>	战狼山刘七赴江水 游宣府江彬逞奸邪	.....	091
<b>第四十二回</b>	擒战俘明武宗演戏 建道场嘉靖帝求仙	.....	099
<b>第四十三回</b>	仕途坎坷宁折不曲 直斥封建离道叛经	.....	108
<b>第四十四回</b>	遭谗害李卓吾死狱 卫海防戚继光领兵	.....	116
<b>第四十五回</b>	俞总兵岑港驱倭寇 戚参将义乌练新军	.....	125
<b>第四十六回</b>	戚继光大摆鸳鸯阵 吴承恩撰写才子书	.....	134
<b>第四十七回</b>	楚王府权做奉祠正 太医院苦读古书籍	.....	142
<b>第四十八回</b>	李时珍独力修本草 海刚峰上疏谏君王	.....	150
<b>第四十九回</b>	敢抗上知县耍滑头 重调查判官断案情	.....	159
<b>第五十回</b>	惊闻噩耗海瑞哭狱 颁布条约新抚施威	.....	169
<b>第五十一回</b>	退耕田全心为赤子 逝任所廉洁终一生	.....	177

<b>第五十二回</b>	排异己冯太监反扑 上讲宴张学士授经	.....	186
<b>第五十三回</b>	清吏治首辅行新法 遭清算故相毁声名	.....	194
<b>第五十四回</b>	凭本色郑贵妃邀宠 争国本万历帝罢工	.....	202
<b>第五十五回</b>	一神父传教来中国 三巨著同时问世间	.....	211
<b>第五十六回</b>	梃击变起贵妃赔罪 红丸案发光宗捐生	.....	220
<b>第五十七回</b>	西湖边魏阉建生祠 萨尔浒明军初丧师	.....	228
<b>第五十八回</b>	诛阉党朱由检用计 害良将皇太极反间	.....	237
<b>第五十九回</b>	李自成米脂揭竿起 张献忠谷城假投降	.....	245
<b>第六十回</b>	缢煤山思宗殉故国 离北京闯王败垂成	.....	254



## 第三十一回

泄机密喜宁叛祖国  
呈智勇于谦保京城

北京城里，于谦加紧训练新招的士兵，而河南、山东等地的援兵也陆续开到，人心逐渐安定下来。接着又听说瓦剌军已经离开螺山北返，便有人来向于谦建议，已到的军队加上新兵就够了，各地调而未至的军队可以停调。于谦摇摇头，说：

“也先狡猾，其心叵测，不可不防。各地援军到来后，当然人数不需要过多，届时要加以精选。”

不久，辽东、山西、陕西等省的巡抚也都带兵来到。除新兵外，外地援军已达四十万人。于谦从中精选了十万，加上五万新兵，共计十五万人。那些土木堡逃回来的近畿卫、所的士兵，仍遣返原来的卫、所。其余三十万援军则打发回去，以免影响各地的防务。如此安排，并井有条。于谦忙坏了，又是选兵，又是遣将，又要视察京城的防御部署，又要关心新兵的训练。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一天只能睡一两个时辰的觉。眼熬红了，人也累瘦了。有人劝他休息，他说：

“不行啊！现在不抓紧，等瓦剌兵打到就来不及啦！”

“瓦剌兵刚走，还会来吗？”

“全城上百万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岂可儿戏？万一瓦剌兵来，我们还没作好防御，那将是万死不足以赎罪了。”

于谦率领部下如此紧张地准备了近两个月，防务已经大体就绪。这时，果然不出于谦之所料，也先又统瓦剌大军，扑向北京来了。

原来伺候太上皇朱祁镇的太监喜宁是个见利忘义的坏家伙。他看瓦剌势大，朱祁镇南归无期，就无耻地投靠敌人，背叛祖国。他去对也先说，北京城内外的驻军，都让王振抽调出来了，事实上等于一座空城。也先一听，后悔得直跺脚，早知如此，土木堡战后就不该贪那二十万头骡马，那时一鼓作气，拿下北京，所得岂止那骡马的百倍、千倍呢！

也先召集部下各大王商量下一步的计划。大王们都主张趁北京准备不足，再去攻打，这次机会再也不能白白失去了。也先是决定，以送还朱祁镇回朝为名，二次兴兵南侵。

十月，瓦剌军来到大同城外。喜宁又来献策。他说，此去北京有两条大路。明军重视北路，一向设防严密；南路就差了。他建议瓦剌军从南路攻紫荆关，只要把紫荆关攻下，关内各县全无重兵，便可长驱直入了。

也先采纳了喜宁的意见，也不去攻打大同，竟直朝南路开去。大同守将郭登连忙派出快骑，顺北路飞驰向北京告警。

不久，瓦剌军便一举攻下了紫荆关，守将指挥韩清和协守的都御史孙祥被害。也先更不停留，挥军直奔北京。

北京城里刚刚接到郭登的告警文书，跟着又得到紫荆关失守的战报。安定下来的民心便又浮动起来了。有个翰林院侍讲，姓徐名程（chéng程），是苏州人。他最怕蒙古军。前次土木堡兵败，他就把老婆、孩子都

打发回苏州老家。他妻子不愿意长途跋涉，他便斥责说：

“荧惑入南斗，我夜间观星看到的，北京危险啦。你不愿走，我看你是不想做中国人了，让蒙古兵把你掳去，给鞑子当老婆，你高兴吗？”

他的妻子只好带孩子回苏州了。他自己也做好了准备，一旦城防吃紧，他便弃官逃跑。这次瓦剌兵又要来了。他琢磨来琢磨去，又想出一个新主意，觉得弃官逃跑白白丢了功名，不如建议皇上迁都。假如迁回南京，他的官儿照旧做，而离家乡又近多了。这样一想，便去写了个奏疏，交给了司礼太监金英。这件事让于谦知道了，第二天上疏反对。于谦在疏文中说：“京师天下根本，宗庙、社稷、陵寝、百官、万姓、帑藏、仓储咸在，若一动则大势尽去，宋南渡之事可鉴也！”还提出来，际此国事紧急的时刻，提这种迁都主张的官员事实上是扰乱民心军心，应该斩首。

景泰皇帝朱祁钰看到这两份疏文，吩咐金英向百官传达他的口谕，表示抵抗的决心：

“在此危急之际，君臣庶民自然应该同德同心，臣死则君臣同死，民亡则君民同亡！今后有再来提迁都者，立即斩首！”

他又命令各处张贴榜文，告谕百姓，朝廷绝不放弃首都，要大家安下心来抗战。不过，倒没给徐理什么处分，只说了句“腐儒懂得什么”！派司礼太监金英斥责他一通，便算了。

那时京师的军粮仓库设在北京东郊的通州。于谦怕军粮落到敌人手中，便命令每个将士先发三个月的口粮，其余的运回京城。于谦让官员们动员百姓帮着运输，一时有车的出车，有马的出马，没有车马的便肩挑背扛，运粮进城。但警报频频传来，瓦剌军已越过房山（今北京房

山)，抵达良乡(旧县名，今划归房山)。于谦这时正在通州督运，看看粮食还多，已运不完了，便下令把剩下的粮食全部烧掉。又派人动员北京城外的居民携带粮食财物迁入城中，让地方官借用庙宇等处，妥善安置，实行坚壁清野的战略。

于谦的随员提醒说：

“烧军粮这样的大事，是不是先奏明皇上再办？”

于谦摆摆手：

“敌寇已到眼前，不得稍有迟缓。宋靖康元年，金兵攻汴梁，牟驰(tuó 驼)冈的军粮便尽为金兵得去。我们今天可不能让这种‘资敌’的旧事重演了！如果将来皇上怪罪，全都由我承担。”

随员们一听，明白过来，分头指挥众军纵火，霎时烟焰升腾，运不走的粮食全部化为灰烬了。

于谦回城，见城外居民正在扶老携幼从城外迁入城内。于谦派人到各处安抚照顾，尽量给人以方便。天黑之后，于谦才回到兵部，见几员主要将领正在等他。因为计算起来，良乡守军只能拖住敌人一昼夜，后天上午，瓦剌军便将抵达北京城下了。

主将石亨建议说：

“现在城外居民大部分已经入城了，我看应将九门尽闭，以便加强防御。”

“不，这样岂不是先向敌人示弱了吗？那样一来，敌势就该更猖狂了。我认为应该在城外驻扎一部分军队，先跟敌人接战，打打他的凶焰，必要时再上城防守。”

“好！”石亨一抚他的大胡子，大声说，“敌人从南边过来，我就到

崇文门去等他！”（当时北京只有内城，外城是嘉靖三十二年即公元1553年开始拓建的。）

“好！”于谦也应了一声，“我跟石将军一起到崇文门外扎营！”

于谦又连夜召集文武官员，分派了城防任务。武将分在城下，城上派文官指挥。因为军情紧迫，文官也得打仗了。

一天之后，瓦剌军打败了良乡的明军，过了卢沟桥，抵达北京城下。那也先一路攻来，势如破竹，骄横至极，丝毫不把明军放在眼里。他先不攻城，却派兵把明三陵——即成祖长陵、仁宗献陵、宣宗景陵的殿宇焚毁，掠走了祭品，又纵兵四散抢劫。一时之间，北京城外处处火起，居民虽然已经迁走，但不少房屋和家具却毁于战火之中了。

瓦剌军没抢到什么值钱的东西，便开始攻城。也先亲率上万名骑兵向崇文门外于谦和石亨的军营攻来。双方一场激战，互有伤亡，因天色已黑，瓦剌军退了回去。于谦趁夜间派出一支步兵埋伏在城外百姓迁走后留下的空屋里，又让石亨退回城中，转到东城的朝阳门内。一夜过去，第二天早晨也先又挥兵杀来了。于谦督兵接战。突然，明军伏兵从空屋内杀出。这些士兵左手挽着藤牌，抵挡瓦剌军的马刀；右手却用砍刀去砍瓦剌军的马腿。顷刻间，瓦剌军便有多人落马，他们那进攻的阵形也乱了。这时于谦却又率领骑兵冲杀过去。瓦剌军又要顾上，又要顾下，闹得手忙脚乱，不少人当场丧命。

也先看事不好，忙命令部下撤退。不防石亨已经率领一部骑兵从朝阳门出来，绕过东南城角，直扑也先的侧后。那石亨手执大斧，冲入敌人阵中，碰着的瓦剌军纷纷落马。瓦剌军抵挡不住，终于狼狈地败退了。

攻打宣武门的瓦剌军主将是赛刊王，他遇到了明军都督孙镗（tāng

堂) 的抵抗。两军在城下激战, 明军渐渐处于劣势。孙镗想退回城中, 便叫城上防守的给事中程信开城门放他进城。那程信虽是文官, 却有谋略。他对城下叫门的孙镗说:

“孙将军, 不要因稍有失利便即退却, 那样敌势益张而我军心更危了。请将军再战, 我在城上支援你!”

孙镗不得入城, 转身督军再战。明军知道已无退路, 只好附城死拼。程信和都御史杨善率城上守军鼓噪呐喊, 又朝瓦剌后军发射火炮, 扰乱敌军。正战斗中, 石亨和于谦杀退也先, 沿城墙经过正阳门, 向宣武门杀来, 明军在崇文门一战取胜, 军心大振。那石亨更是挥舞大斧, 勇不可当。于谦执剑在后督阵, 指挥明军踊跃冲杀。赛刊王前后受敌, 抵挡不住, 只好大败而逃。

这场大战把土木堡大败带给士兵们心头的畏惧瓦剌的阴影一扫而去。明军士气振奋, 人人愿战。于谦却又有了新的打算。他派出一些探卒化装成瓦剌军, 探听太上皇朱祁镇的下落。知道朱祁镇正被大将伯颜帖木儿押囚在瓮山(今名万寿山)上, 于谦便命令城外各军全部退回城内, 上城防守。

也先虽吃了败仗, 但气焰仍盛。他见明军退回城中, 以为明军还是怕他, 便下命令全军直薄城下, 展开进攻。

北京城墙高耸, 那正阳门竟高达九丈九尺。明军居高临下, 施放矢石, 一次次挡住瓦剌军的攻击。也先天天攻打, 后来索性贴近城边扎营, 做长期攻城的打算。

于谦退回城中, 正是诱使也先这样干。他又已侦知太上皇朱祁镇不在敌营内, 便把神机营都督范广唤来。这神机营是京军三大营之一, 全



部配备的是火器。于谦让范广把神机营所有的火炮火铳全部调上城头，对准瓦剌军的各个营垒摆好。待到午夜时分，于谦一声令下，只见数十里长的北京城头上到处是闪闪的火光，“隆隆”的炮声。那大大小小的枪弹炮弹像些火球一样溅落到瓦剌军营中。瓦剌军半夜惊醒，人不及穿甲，马不及披鞍，仓皇地四散奔逃。这时九门大开，石亨、杨洪等大将统率明军骑队，追杀过去。瓦剌军死伤枕藉，遗尸遍野，直逃出四十里外方才止住脚步。

瓦剌军连续失利，又加于谦实行坚壁清野的战略，瓦剌军到处找不到粮食，也先知道此行的目的是达不到了。但他还不死心，派出一名使者到城下约见于谦，要谈判交还太上皇朱祁镇的条件。于谦怕扰乱军心，弯弓搭箭，将那使者射死。使者的随从逃回，向也先报告。也先摇头叹气，只好下令撤兵。

瓦剌退兵仍走南路紫荆关。于谦派石亨、杨洪、孙镗、范广等随后追赶。瓦剌军已无斗志，被明军在固安（今河北固安）追上。瓦剌军不敢恋战，只好遗弃了掠来的人畜和财物，向西逃窜。

那大同总兵郭登侦知瓦剌兵退，从大同境内经过，就安排了副将守城，自己只率领八百名骑兵尾随。走了七十里，来到一个叫水头的地方。前哨报说，瓦剌后军几千人在东、西沙窝扎了十二座大营，正在休息。郭登便准备攻打。一员偏将说：

“敌人兵多，怕有我们的十倍，我们以寡攻众，不太冒险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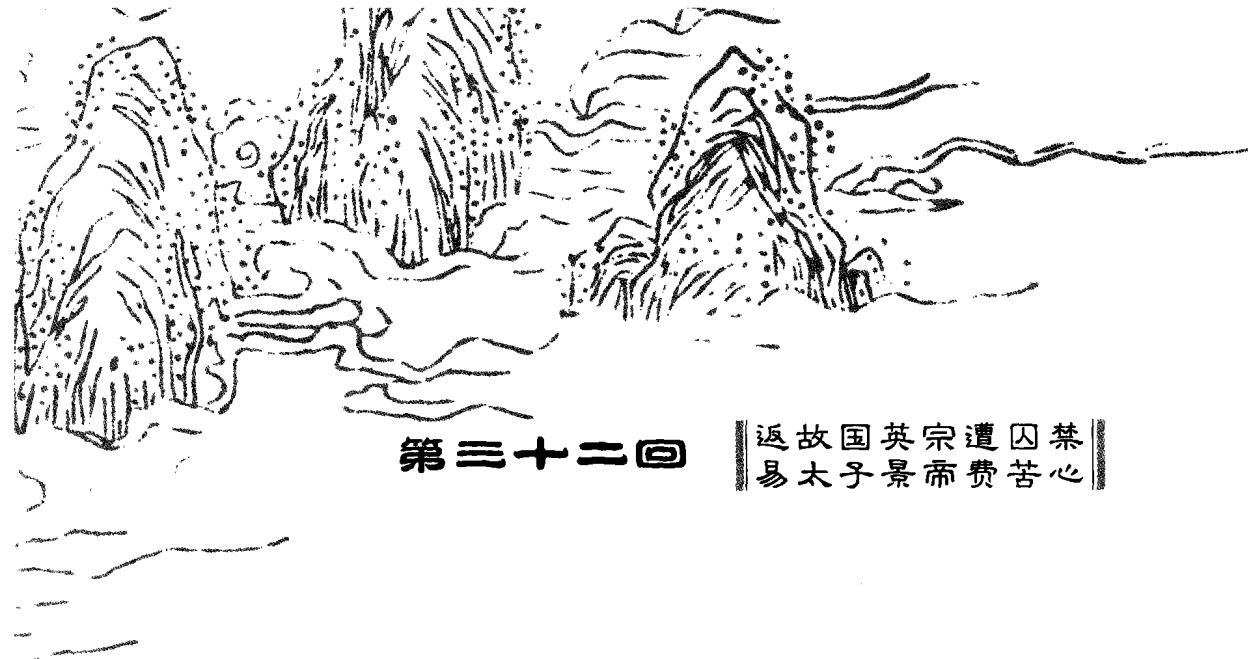
郭登回答说：

“敌人吃了败仗，铩羽而归，已是惊弓之鸟。我们猛冲过去，仓猝之间，敌人怎会知道虚实？所以我们要把声势弄得越大越好。”

将士们听了个个振奋，他们擂鼓呐喊，突然向敌营冲杀过去。瓦剌军不曾防备，又不知来袭的有多少人马，光听得战鼓声和呐喊声蔽野而来，只得仓皇迎战。郭登一马当先，发箭射死两名敌人，又冲进敌军，手刃了一员瓦剌将领。明军看了愈加奋勇冲杀。瓦剌军不敢恋战，只好弃营而逃。明军在后追杀，直追到栲栳山方才收兵。这一仗，郭登以八百骑战胜数千敌人，杀死敌人二百多名，夺回敌人掠夺的财物无数，而自己却只有很少的伤亡。

嗣后瓦剌军虽不再出动大军，却也曾多次派出小股部队袭扰宣府、甘州等地。明军在各地严加防范，入侵的瓦剌军多被打退。明朝的军势也得以复振了。

这次北京保卫战，不但明军在于谦等人领导下奋勇杀敌，个个争先；就是城里的老百姓也自动参战，许多人家做好了饭自己不吃，拿来供应坚守阵地的将士；更有人拆了自家的房屋，把砖瓦石块搬上城头，打击敌军。此期间，全城军民团结一心，共同对敌，终于打退了强悍的瓦剌军，保卫了京都的安全，为北京城的历史添上光辉的一页。



## 第三十二回

返故国英宗遭囚禁  
易太子景帝费苦心

瓦剌大军退回漠北以后，也先仍将明朝的俘虏皇帝朱祁镇交大将伯颜帖木儿看管。转眼新年到了。朱祁镇想起往年此日，皇宫中到处是银花火树，笙歌曼舞，更不消说那满桌的海味山珍、玉液琼浆了。而这里却有什么？蒙古人不过这个年，因此什么庆祝活动也没有。依然是冷清清的蒙古包，膻烘烘的牛羊肉。走出来看看，满目的白雪黄沙，盈野是朔风怒号，朱祁镇抚今追昔，忍不住潸然泪下。

前些日子，他站在北京郊外的瓮山上遥望东南方隐约可见的灰色城堞，念着城中皇宫内的后妃和儿女，也曾像今天这样暗暗落泪。如今，他被俘已经四个多月了，他预见不到将来等着他的命运是什么，他只能听天由命，任凭也先的摆布。他叹了一口气，心想，何年何日才能重归南朝呢？

这时，太监喜宁走来了，跪下给朱祁镇叩头拜年：

“皇上新年好！愿陛下龙体康泰，万寿无疆！”

“起来吧！”朱祁镇淡淡地应了一声。因为他听喜宁的那段祝词简直像是在讽刺他一样。

“陛下，”喜宁站起来，赔着笑脸说，“您在这儿吃的穿的都不习惯。奴婢跟可汗说了，想回北京去给您要点儿衣服和食物来。您看奴婢去一趟行吗？”

朱祁镇哪里知道，喜宁要回北京是另有打算的。原来这个叛徒又去向也先献策了。上次他出卖国家机密，致使也先二次出兵，直逼北京城下。幸得于谦早有防备，也先才没得逞，但也使多少生灵遭到涂炭。不过也先吃了亏倒也没怪喜宁，只让他仍然待在朱祁镇身边，不使他暴露真面目，说不定将来还会派上用场。至于对他的奖赏，也先说给他留着呢，等将来打下北京，定要封他个大大的官儿。这喜宁觉得上次没弄好，反让新主子损兵折将，心里还挺不过意，总想再干点儿什么事情来弥补。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一招来，那就是借替朱祁镇要东西的机会，到北京探听虚实，回来再向也先讨好。他去跟也先一说，也先同意了，他这才来跟朱祁镇讲。

“也好，”朱祁镇点头答应了，“你去吧！”

“那，您就写封信吧，陛下！”喜宁以为有了太上皇的亲笔信，他在北京就可以通行无阻了。

朱祁镇回蒙古包写信去了，喜宁笑嘻嘻地去告诉伯颜帖木儿。不料那校尉袁彬见喜宁常常往也先那儿跑，对他起了疑心，便悄悄监视他。袁彬跟在喜宁身后，隔着蒙古包听清了喜宁跟伯颜的谈话，急忙回来告诉朱祁镇。朱祁镇气得把笔一摔，信也不写了。袁彬对他说：

“这信陛下还是写。您再另写一封，派高磐跟喜宁做伴儿，这封信让高磐交给咱们的人，叫他们把喜宁处治了，以免留下后患。”

这高磐原是明军的一名被俘军士，是伯颜派来伺候朱祁镇的。

朱祁镇依计而行，写了两封信。袁彬把高磬叫到僻处，把真相告诉他，让他把那封信藏在腰带里。这边朱祁镇把写给弟弟朱祁钰的信交给喜宁，还当面让他看了。信中无非是向母后和弟弟问好，告诉他们自己在这里还可以，不用挂念，只是希望他们早些想法把自己赎回去。喜宁看看信里没什么问题，便向伯颜要了两匹马，喜滋滋地带着高磬动身了。

两个人走了几天，来到宣府，见到参将杨俊。喜宁把朱祁镇的信给杨俊看了。杨俊连忙吩咐摆宴，款待喜宁。这时高磬悄悄把杨俊找到一边，解开腰带，把另一封信也给杨俊看了。杨俊回到席上，见那喜宁吃喝得正欢呢，杨俊一把抓住他的后脖颈，提起来往地上一摔，两个兵士走过来，将他捆住。喜宁一边挣扎一边叫骂。高磬把另一封信朝他一扬，告诉他阴谋已经暴露了。喜宁这才耷拉下脑袋。

喜宁被押解进京，自然要遭到惩罚，这里不再细讲。却说那也先拘囚着一个作废了的皇帝，丝毫派不上用场，有人就建议说，把朱祁镇杀掉算了。但也先却冷笑说：

“不，杀他还不如宰只羊羔呢！派人去北京告诉明廷，让人来把他接回去。那时候他一国有两个皇帝，我们该有好戏看了。说不定还能趁机捞点儿好处哩！”

瓦剌使者到了北京，传达也先的话，要明廷派人去把以前那个皇帝接回来，这倒使景帝朱祁钰为难了。从去年八月“土木之变”起，大臣们拥戴他当皇帝的时候，他就犹豫过、推脱过，后来是奉了母后的懿旨才即帝位的。但现在已经做了太上皇的哥哥又要回来。那么哥哥回来了，这皇帝该谁做呢？不过，把蒙尘的皇帝迎回来，这是有关国家体面的大事，如果说干脆不要旧皇帝了，那是无论如何说不出口的。可是现在当

了好几个月皇帝的朱祁钰觉得“唯我独尊”的生活是那样惬意，再让他退下去俯首称臣，也实在是恋恋不舍。思考再三，还是以国体为重，朱祁钰决定把太上皇迎回来再说。

双方几经磋商，到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八月，也就是“土木之变”的一周年，太上皇朱祁镇终于由瓦剌大将伯颜帖木儿护送到了万里长城的居庸关。到这儿，北京城已是遥遥在望了。

朱祁镇过了一年的囚徒生活，受了多少委屈。如今他回故国来了，在他的想象中，广大臣民们一定会因他的蒙难而痛惜，也一定会欢欣鼓舞地迎接他。但等他进了关门，见代表朝廷来接他的却是一个名叫商辂（lù路）的翰林院侍读，仅仅是个教读经史的六品官儿，此外，没有一个皇亲，也没有一位文武大臣。朱祁镇的心冰凉了。

伯颜跟朱祁镇道别，又回漠北去了。这边朱祁镇郁郁不乐地上了商辂带来的轿子，“忽闪忽闪”地进了北京。闹市里熙熙攘攘，似乎老百姓并不知道轿里坐的竟是当初出来必须净街的皇帝，自然更没有他想象的那种夹道欢迎的场面。

轿子直抬进皇城的安定门，商辂揭开轿帘，朱祁镇看到百官排列成两排在这儿恭候。他默默地举举手，算是答礼。轿子在百官簇拥下又往前走，抬进了紫禁城的东安门，这才看见他的弟弟——现在的皇帝朱祁钰在这儿迎接他。商辂把朱祁镇挽出轿子。朱祁钰朝前迈了一步，跪下行礼。朱祁镇也跪下答拜。弟兄二人站起来，尴尬地问候了几句，朱祁钰便回头吩咐靖远伯王骥护送太上皇到南宫安歇。

那南宫是一所独门独院的宫院，僻处在紫禁城的南端，平时无人居住，是皇子们读书的地方，现在腾出来做了太上皇的寝宫。朱祁钰不送

他哥哥去拜见母后，也不让他会见妻、子——名义上他们还是皇后和太子呢！——却把他送到这里，那意思是最明显不过的，他被自己的弟弟软禁起来了。

十一月辛亥，是朱祁镇的生日，这是“万寿圣节”，往年是要大事庆贺的。于是礼部尚书胡濙(yíng营)上本，问皇上可否让大臣们到南宫去向太上皇朝贺？朱祁钰在本上只批了两个字：“不许”，便驳回了。不久又到了新年，胡濙再次请示。应该让百官去给太上皇贺年，答复还是那“不许”二字。

朱祁镇寂寞地住在南宫，过了一年又一年，便是景泰三年了。现在暂不讲他的事情。却说这年五月的一天，景帝朱祁钰对司礼太监金英说：

“七月初二是东宫的生日啦！”

东宫是太子居住的地方，所以“东宫”也就是太子的代称。金英没理解皇上的言外之意， he以为朱祁钰说的是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不错，朱见深是名正言顺的“太子”，那是“土木之变”时，皇太后为了应变而册立的。于是金英回答说：

“陛下记错了，太子的生日是十一月初二。”

朱祁钰听了默不作声，只是不满意地白了金英一眼。

不过朱祁钰已经下了决心，要把将来的帝位从侄子手里夺过来，传给自己的儿子。他估计一提这个问题，有些大臣是会反对的，太祖要改立朱棣，成祖要改立朱高煦，不都曾遭到一些大臣们的反对吗？他想，最好的办法是封住大臣们的嘴，而封嘴的东西莫过于金钱了。于是他先从内阁学士那儿下手，给每一位内阁大学士黄金五十两，白银加倍，学士陈循、王文、高谷等心领神会，单等时机到来，再给皇上出力。

说来也巧，广西有个士官都指挥使黄竑，因为私怨把他的弟弟思明（今广西宁明）知府黄珮杀了，还抄没了黄珮的家产。黄珮的仆人福童逃进省城向总兵衙门告发。总兵武毅便上疏报告朝廷。黄竑得到消息，吓得魂不附体。他手下有个千户袁洪，狡诈多谋，他给黄竑出主意，说现在的太子是太上皇的儿子，皇上岂能容忍？如果这时奏上一本，请求易立皇太子，皇上肯定会高兴，不但能够免死，兴许还会升官呢！黄竑大喜，重赏了袁洪，就派他急速奉表进京。袁洪来到北京，把黄竑的表文呈交上去。朱祁钰看到后，高兴地说：

“想不到万里之外，竟还有这样一个忠臣！”

那时武毅告发黄竑杀官不法的疏文也已到了。朱祁钰一面驳回武毅的控告，反将黄竑升为都督；一面便将黄竑的表章发给廷臣和阁臣，让大臣们集议，讨论一下黄竑那“易储”的建议是否可行？

易立太子可是件大事。内阁学士和九卿（六部尚书、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司使）召集百官集合在朝堂上，一时谁也不先说话。内阁学士倒是得了皇上的赏金，但他们觉得最好还是让廷臣们先开口。而兵部尚书于谦和吏部尚书王直也因为事情来得突然，还在相顾惊愕，待在一旁的太监兴安却厉声说：

“这件事皇上既然提出来了，你们总得表态嘛！谁认为可行的便署上名字；认为不可的就别签名，用不着犹犹豫豫的，首鼠两端！”

众官面面相觑。礼部尚书胡濙见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反对也没有用处。易立是礼部的事，他责无旁贷，只好在黄竑的表文后面签了字。接着魏国公徐承宗（徐达的曾孙）、安远侯柳溥（柳升的儿子）、武清侯石亨等功臣，驸马都尉薛桓等皇亲，都督孙镗、范广、杨俊等武将，尚

书王直、于谦、王文等文官，以及各部侍郎，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等属员，当然也少不了那预先领到赏金的学士们，一个一个都签了字。礼部尚书还代表百官上奏，内称：

“陛下膺天明命，中兴邦家，统绪之传，宜归圣子。黄竑奏是。”

奏上，朱祁钰批复说：

“可。礼部具仪，择日以闻。”

这表示他同意啦，让礼部准备册立新太子的仪式，并选择吉日进行吧！

五月，朱祁钰终于实现了让他儿子朱见济当皇位继承人的愿望。他下诏废去汪皇后，改封原来的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朱见济为太子，立朱见济的生母杭妃为皇后，诏书中还有个对偶的句子：

天佑下民作之君，实遗安于海内；

父有天下传之子，期本国于万年。

意思是“天下”只有“父传子”才能够万年永固。接着又颁布大赦，让全民同庆。

当然，签上字的大臣们谁也少不了一份赏金。那老臣王直领到了他的一份，回到家中往案上一扔，顿足叹息道：

“咳！这是什么钱呀，简直愧死人啦！”

可惜的是，尽管朱祁钰费尽了心机，把儿子弄到未来的宝座上，怎奈那太子名字叫“见济”，而命运却甚是“不济”，小娃娃只当了一年多的太子，却于第二年夭折了。而偏偏朱祁钰又没有第二个儿子好再来站到太子的位置上。

礼部郎中章纶和御史钟同当初就不同意更换太子，只是因为大臣们

都签了字，他们势逼无奈，只得跟着签了。如今见太子的位子空出来了，觉得这是个机会，便先后上表请皇上把已废的太子朱见深再召回来，仍然立为太子。那朱祁钰失去了儿子，心里本来就够烦的，见了他俩的本章，越发恼上加恼，立刻吩咐锦衣卫把他俩逮起来，押进狱中。锦衣卫指挥秉承皇帝的意思，把他俩拷掠得体无完肤，那御史钟同竟毙于杖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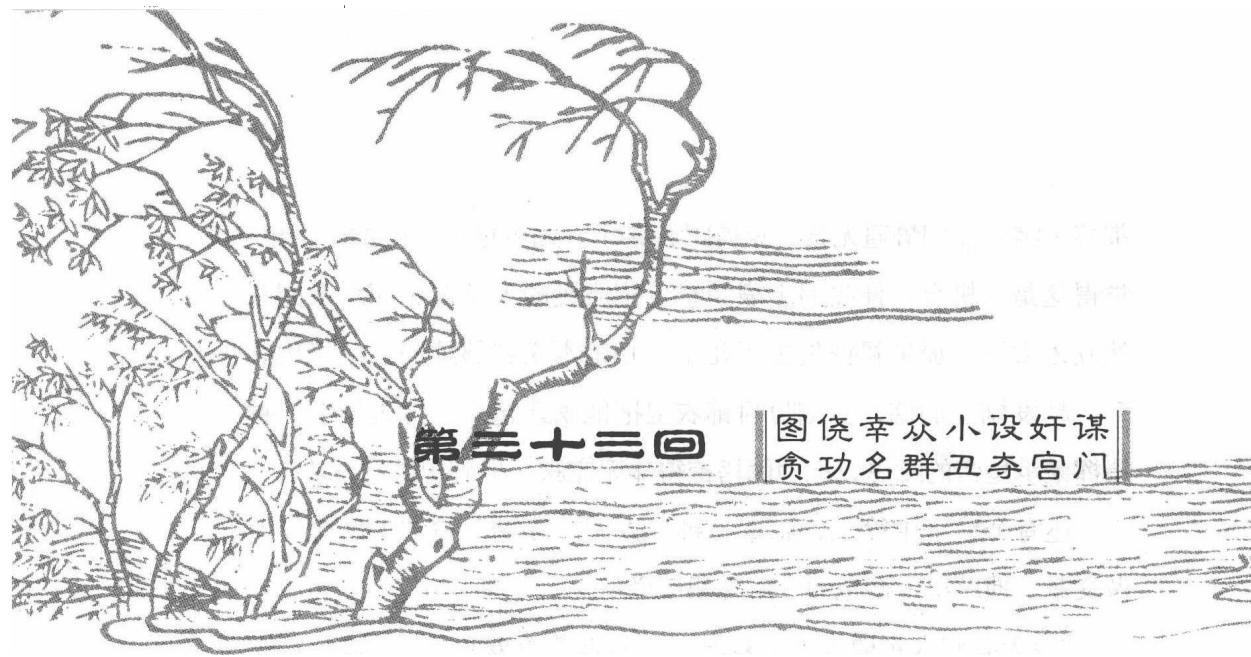
还有个给事中徐正，看章、钟二人因“复储”得罪，便想从反面做做文章。他求皇上接见他，对朱祁钰说：

“今天有些人希望太上皇复辟，有些人希望废太子沂王嗣位，陛下不可不虑。依臣愚见，应该让沂王到沂州（今山东临沂）就任。再将南宫的宫墙增高几尺，墙边的高树也要伐去，宫门上的铁锁用铁汁灌注，以备非常。”

从内心里说，这个徐正是向着朱祁钰的。可是朱祁钰却又发火了，把这位拍马屁的官儿发配到铁岭卫（今辽宁铁岭）去当军卒。

过了几天，另一个御史高平也建议伐树，这回朱祁钰却又准了，于是下令把南宫靠墙的大树统统砍光。

当时已是五月，天气一天天热起来。太上皇朱祁镇有时就坐到大树下乘凉。忽然有一天，一群锦衣卫的校尉走来，把大树都砍光了。这是为什么呢？朱祁镇好几天寝食不安。



## 第三十三回

图侥幸众小设奸谋  
贪功名群丑夺宫门

朱祁钰不再立太子自有他的想法：一是他才二十多岁，当皇帝的日子长着呢，何必早早就找继承人；二是他有好几位后妃，他就不信，难道他的这些女人中就没一个给他生儿子的？

然而就在他二十九岁那年，即景泰七年，他在还没有儿子的情况下患病了，而且还挺严重，一连好多天不能上朝。大臣们都惶惶不安，因为将来谁当皇帝牵涉着他们好多人的身家前程。但也有人正在窥测着机会，觉得应该利用这改朝换代的时候捞上一把。这个人便是武清侯石亨。

那石亨生得相貌不坏，一部虬髯，赤红面庞，在马上舞起大斧来，“呼呼”生风，确有“万夫不当之勇”。正统十四年捍卫京师那场战役，于谦举他为主将，他带领他的侄子石彪，在崇文门、宣武门外耀武扬威；以后又在追击战中屡立战功。因此被封为武清侯。易立太子的时候，他是在黄竑的疏文后面签了名的。对这种事情他不在意，因为那不过是随帮唱影，显不出他来。他觉得要立功就要来个痛痛快快，拣大个的来，功劳簿上要记头一名，那样才能得到更大的富贵。

他估计，景帝朱祁钰病是够重的，因为太医院的御医们几乎全都跑

进宫里去了。不过御医们有纪律，不准对别人谈皇上的病情。可从他们那紧皱着眉头匆匆忙忙出来进去的情况看，皇上说不定会晏驾呢！皇上没立太子，死后不用说，又得把太上皇朱祁镇从南宫请回来……想到这里他突然灵机一动，为什么不趁皇上还在的时候，就把太上皇弄出来呢？那不就是天大的一件功劳吗！

石亨又想，干这种事人少了不行，人多了也不行，搞得不好让皇上知道，脑袋就得搬家。他有两个最好的朋友，一个是都督张𫐄（yuè月），一个是监军太监曹吉祥。石亨跟他俩商议，他俩也都愿意干。石亨还嫌不够，因为他们三人都是武人，最好能找个足智多谋的文官当谋士。石亨跟太常寺卿许彬有交情，就去找他。许彬说：

“你们干成了，可是有关社稷的大功。可惜我已经老了，无能为力。我推荐一个人吧，你去找他，准成。”

“谁？”

“副都御史徐有贞。”

这徐有贞何许人也？原来就是“土木”变后倡议迁都南京的那个翰林院侍讲徐珵。这个人长得短小精悍，工于心计，尤其喜爱功名。为了做官，他把那些天文、地理、水利、阴阳等书看了不少。明军在土木堡打了败仗，他夜间观星看出了“荧惑入南斗”，连忙把妻儿老小送回了老家苏州，而且提出了个迁都南京的建议。不料建议遭到于谦的反对，差点儿拿他开刀。幸亏皇上当时顾不上，只派金英斥责了一通。可他丢了面子，真是恨不得瓦剌把北京打下来才好呢。看谁分析得正确！不过后来于谦到底把也先打跑了，还加封了“少保”衔。自己闹得灰溜溜的。当时他那“荧惑入南斗”的话，也不知怎么传出去了，熟悉的人开玩笑，

就跟他叫“徐南斗”，真把他气得要发疯。从那以后，不用说，升官也就困难了。有一次他托人谋个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国立大学校长）当当，景帝朱祁钰看到了“徐珵”这个名字，觉得挺熟，便笑笑说：

“这徐珵不就是倡议迁都的那个人吗？此人只顾自己，不念大局，这样的人阴险，心术不正，让他当祭酒会影响坏了诸生。”

徐珵升不了官，追本逐源，觉得都怨于谦。不过对于谦他可没办法报复，人家是少保衔的兵部尚书，正在走红的时候，皇上面前可说是言听计从。自己一个小小的侍讲，哪里撼得动他呢！

徐珵看大学士陈循兼着户部尚书衔，在内阁里排第一位，就想去投靠他，徐珵又拿出他的星象学来了，说他夜间观星，发现北斗七星中有一星特别明亮，主着内阁臣里有一位要升官。他送一条玉带给陈循，说这就是兆头，应在陈循的身上。明朝的制度，官员束的“带”是按品级分的，四品素花带，三品金花带，二品犀带，只有一品大员，才能束玉带。陈循当时挂着尚书衔，是二品官。他接下了徐珵送的玉带，犹在将信将疑。说来也巧，景泰二年十二月，陈循晋为少保。少保是从一品，可以束玉带了。陈循对徐珵真是又感激又佩服，自然要另眼相看了。

徐珵要陈循提拔他，陈循为难地说：

“你这个名字太臭了，皇上一见就想起你倡议迁都的事。”

“大人说怎么办才好呢？您老总得替我想想办法嘛！”

“我看你就换个名字吧，我再想法让你外放出京，你好好干，立点功劳。过几年大家忘了迁都的事，再把你调回来。”

徐珵千恩万谢，还躬着脸道：

“那就求老人给学生起个名字吧！”

陈循想了想说：

“你就叫有贞吧，字元玉。”

从此，吏部文选司的档案里，徐程的名字就没有了，新添了个右谕德徐有贞。不久，陈循又提升他为左金都御史，派他到山东治河。这徐有贞的水利书没白看，他下去后有疏有堵，竟将河工治好了。以后又治理了几处，成了个颇有点名气的水利专家，因功升为左副都御史。回京后还蒙皇帝召见，奖劳有加。朱祁钰怎么也没想到，他面前的这个徐有贞，便是当初他讨厌的那个徐程。

像徐有贞这种人，石亨来找他干这种事，自然是一拍即合。徐有贞不愧是谋士，他安排道：首先，一定要查清南宫守卫的情况，最好把守卫的将士预先收买。其次是自方要有足够的武装力量，以防有人干涉。第三是还要设法先跟“南宫”——这是朱祁镇的代名词——说好，否则万一“南宫”退缩不干，那可就糟了。

石亨等三人按照徐有贞的指示，由曹吉祥假冒皇太后的名义，给南宫送食物，混入南宫，向朱祁镇讲了。朱祁镇并不知道弟弟病重的消息。他在这儿已经住了六年，真是度日如年，生不如死。寻思让他们干一干也好。成了，自己再当皇帝；不成，反正罪责由他们承当，难道还能把太上皇杀头不成！至于锦衣卫的校尉，宫里并不多，朱祁镇说由他负责。只是紫金城门钥匙在锦衣卫指挥黄泰手里，得想法弄到手。

这时，景帝朱祁钰的病势日渐沉重。大臣们于正月十三日又联名上本，请皇上早定太子。当时风俗，正月十五元宵节，要从正月十四到十六日，连庆三天。朱祁钰考虑不要影响众臣过节，便决定让内阁通知众官于正月十七日上早朝，让百官到朝堂上来共议。徐有贞和石亨得到通

知，又听大家议论说于谦、王直、胡濙等九卿的意见，还是请废太子沂王朱见深回来当太子。徐有贞等商议，朱见深是太上皇的儿子，他当了太子再让他父亲复辟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必须在这件事决定之前，把太上皇弄上宝座，他们的“大功”才能告成。

徐有贞等四人于是决定，在正月十六日夜间动手。

元宵节这三天夜里，京城十分热闹，真个是金吾不禁，万民同欢。待到十六日午夜，节庆已是尾声，人们纷纷回家睡觉去了。那徐有贞搬梯子爬上屋顶，仰观天象。看了一阵，喜洋洋地下房来让家人摆上香烛，他跪在院子里祝告天地，又求祖宗保佑。看看约定的时辰将到，便对他妻子说：

“我已看过天象，今晚事情必成，你们放心在家等我的好消息吧！要知道这事成了，可是有关社稷的大功劳呢！”

他的妻子哭着说：

“你那个‘天象’从来不灵。那会儿你说什么‘荧惑入南斗’，逼着我们母子千里跋涉，白跑了一趟苏州。这会儿又是什么天象，如果失败了怎么得了！”

“呸！”徐有贞唾了一口，赌气地骂道，“臭女人说话真难听！好，告诉你吧，我此去如能回来还是活人，回不来便是鬼！你就做寡妇去吧！”说着，一把推开他的妻子，匆匆跑出找石亨去了。

这时石亨已和张𫐄、曹吉祥等人，趁着夜阑人散的机会，让他们的亲兵一个个溜到紫禁城外。不一会儿，他们的同伙户部侍郎陈汝言从黄泰那儿弄来天长门的钥匙，把门打开。一伙人趁着月色直奔南宫。这时已是四更，人们都已酣睡。石亨指挥亲兵拆毁宫墙，领人进入宫内。那

时朱祁镇正坐在烛前看书，原来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听到外边有响声，朱祁镇走出门来。曹吉祥上前行礼，石亨等一伙人也在后边跪下，齐声说：

“请陛下登位！”

四个兵士抬进一台乘舆，在地上放好。朱祁镇捺住心跳，在徐有贞、曹吉祥挽扶下，登上去坐好。石亨让兵士抬舆。那抬舆的四个兵士，以前不知抬这轿子是干什么用的，如今一看竟是闹起政变来啦！他们吓得浑身没了力气，竟抬不起来。后来还是徐、石、张、曹四人亲自动手助挽，这才把朱祁镇抬出了南宫。

月光下，朱祁镇只认得曹吉祥，其余三人全然不识，便问道：

“三卿是何名字？”

这一问意思很清楚，是准备事成颁奖的。徐有贞等赶忙报了自己的姓名和官职。这时已到皇宫的东华门。守门的禁卫军喝问：

“半夜里什么人行走？”

朱祁镇从乘舆上站起来，大声说；

“我是太上皇，进宫有事！”

禁卫军军官认识舆上确是太上皇，不敢拦阻，便让禁卫军闪开，放他们闯入。一伙人就是这样从东华门进入皇宫的——后来人们便把这一次事件，称为“夺门之变”。

一行人来到奉天殿，天还没亮。徐有贞让太上皇在宝座上坐好。这天是正月十七日，正是朱祁钰跟百官商定，上朝议立太子的日子。百官奉旨，一个个来到朝房，等着上朝。忽见奉天殿各门大开，接着景阳钟响。这钟声是表示皇帝登殿的信号。百官急急忙忙连跑带颠，奔上殿去。

却见殿上警卫森严，许多将士执刀握剑，遍布在各个殿角柱前。又有四名官员站在御座两旁。再抬头一看，个个大吃一惊，那高踞在御座上的，并不是景皇帝朱祁钰，却是那南宫的太上皇朱祁镇。

百官还没从惊骇中醒觉，徐有贞已高声大喝了：

“太上皇复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快拜贺！”

百官糊里糊涂地跪下了，又糊里糊涂地叩头，糊里糊涂地三呼“万岁”——可是这到底是怎么搞的呢？却人人都不清楚。

那边朱祁钰在后宫，看看天快亮了，挣扎着爬起来让太监帮着穿上衣服，准备上朝。他自知不行了，这两天考虑的就是帝位传给谁的问题。他想到了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哥哥朱祁镇，一个是他的侄子朱见深。回想起来，他觉得对不起他哥哥，自己那时把帝位看得太重了，如果哥哥回銮时便把帝位让出，那是何等体面！结果让他僻处南宫，吃了六年苦。不过把侄子再册为太子，也未尝不可，这样会更名正言顺一些。听说有些大臣也是这么主张……

突然，“嘡嘡嘡”，景阳钟敲响了。朱祁钰一愣，怎么自己还没动身，便敲钟了呢？跟着一个太监喘吁吁地跑进来，报告说：

“太上皇已经登上奉天殿啦！”

朱祁钰一听，嘴角挂上一丝苦笑，连说：

“好，好！”却在心里对哥哥说：“反正天下是交给你家父子，再也不用我操心了！”

朱祁钰又把衣服脱下，躺回床上，转面向里，再也不曾作声——直到他最后一息。

他又活了一个月，于景泰八年，也就是天顺元年二月癸丑死于西宫

了，原来他那复辟的哥哥又把他废为郕王，让他搬到西宫去住了。他就病死在那里。那年他三十岁。

朱祁钰死后，英宗朱祁镇仍然怀恨在心，便给了他个谥号叫“戾”。 “戾”是乖张、凶暴的意思，给他这样的“恶谥”，自是表示死后还要对他进行谴责。朱祁钰本来在城郊天寿山陵区为自己修了陵墓。朱祁镇下令将其毁掉，而葬朱祁钰于西山。明朝十六代皇帝，除太祖朱元璋和建文帝朱允炆葬于南京外，其余十四帝均死在北京。但天寿山上却只有陵墓十三座——即通常所说的“明十三陵”，那缺的一座便是西山朱祁钰的坟墓了。

过了十五年，即是朱祁钰的侄子朱见深当皇帝的成化十一年，朱见深曾下了一道诏书，为他的叔父更改谥号，恢复名誉。诏书里比较公正地肯定了朱祁钰的功绩，首先说他保卫了宗庙社稷。其次是说他得了恶谥的原因，是由于奸臣们的陷害。接着说英宗朱祁镇跟着就发觉朱祁钰是冤枉的，而且也把奸臣们一个一个地法办了，只是因为皇上殡天得早，才没来得及改正。末尾则是表示自己要承先帝的遗志，恢复朱祁钰皇帝的称呼，让大臣们重新讨论一个谥号。

大臣们遵旨讨论之后，给朱祁钰上的谥号是“恭仁康定景皇帝”。后来人们便以“景帝”来称呼他了。



## 第三十四回

于少保英名传千古  
建庶人毕生做囚徒

朱祁镇过了将近八年的囚禁生活，头一年羁身于瓦剌，后来则局处南宫，不得自由。如今一旦重登九五，大权在握，想起前事，感念今日，自然要恩恩、仇仇——以德报德，以怨报怨了。

不过如要追究祸首，应该把王振算头一名，不是他出那个馊主意，要皇上御驾亲征，那朱祁镇会蒙难土木堡吗？可是朱祁镇的想法跟一般人不一样，他不但不怪罪王振，反而一想起这个从幼年起就陪伴他的太监命丧在樊忠铜锤下的情景，就心里难过。于是便找来能工巧匠，用紫檀木雕了一个王振的塑像，跟真人一般大小，放在宫里，让“王先生”永远陪伴着他。他又派人打听王振还有什么亲属，准备加以抚恤。但王振的侄子王山为首的那伙人早都一个个身首异处了。朱祁镇除了惋叹之外，却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至于眼前立了大功的人员，那是可以大大酬劳的了。他晋封武清侯石亨为忠国公；封都督张𫐄为太平侯；监军太监曹吉祥为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也就是当初王振的那个职位，还让他兼着京军三大营的总督。至于那劳苦功高的副都御史徐有贞，更是恩宠有加。因为朱祁镇那天坐

在乘舆上，看到蹦蹦跳跳指挥调度的，就是这个小个子。朱祁镇便把内阁首辅的职位赏给他，让他做华盖殿大学士，掌文渊阁事，封他为武功伯，不久，又让他当上了兵部尚书。

至于原来的兵部尚书于谦，在朱祁镇的眼里，自然应该放在“仇仇”的范围之内了。朱祁镇衡量旧臣的“忠奸”，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看在拥立朱祁钰的时候站什么立场；一个是看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抱什么态度。这么一来就麻烦了，因为这两件事各有它的前因后果，许多大臣都是牵扯在内的。朱祁镇也就只好区别对待了。内阁学士中，有一个就是当初到居庸关迎接他的商辂。既然有那段交情，那就饶过他，让他回去当老百姓。首辅陈循，发往铁岭卫充军。而另一个学士王文则跟于谦一同弃市了。弃市是一种在闹市处死的刑罚，尸体还要暴露街头。这是十分严重的处分，那么王文和于谦是根据什么“罪名”而弃市的呢？

于谦是拥立朱祁钰的倡议人，自然应该算是“有罪”的了。但他和王文下狱却不因为这个，而是说他们“内外勾结，图谋迎立外藩”。这是凭空加上的罪名，当然无凭无据。但那“夺门”有功的“四丑”，人人都跟于谦有仇，非要把于谦置于死地不可。那么于谦怎么把“四丑”都得罪了呢？这儿有必要简略地作一叙述。

于谦性情刚烈，疾恶如仇，容不得任何苟且的勾当，所以常常得罪人。他有时秉公办事，反受责难，尝自己叹息说：“不知这一腔热血，洒向什么地方！”那原名徐珵的徐有贞，在倡议迁都时遭于谦谴责，弄得他里外不是人，十分狼狈，自是对于谦恨之入骨。而那石亨，当初因失律入狱，是于谦保他出来，并当上了保卫北京主将的。两人在崇文门外并肩战斗，立下很大的功绩，他得封为武清侯。那他应该感激于谦才是，



为什么又成了于谦的仇人了呢？这就因为两人的品质不同。于谦当初保荐石亨，为的是他勇猛善战，这里边丝毫不夹杂个人成分。但石亨却总觉不过意。明朝制度，一般爵位只封给那些有卓绝军功的武将，文官封侯的极少。于谦虽然也有军功，但尚书乃是文职，再加他又谦虚，因此封侯时便没有他。石亨为了报答于谦的好处，便退而求其次，给景帝朱祁钰上疏，请求给于谦的一个儿子以千户职。朱祁钰已经答应了。但于谦却坚决不受，他对皇帝说：

“臣的儿子寸功未立，有什么资格受赏呢？退一步说，就算是臣要为子求官，自己也会向陛下求恩，用不着假手石亨。”

于谦平素洁身自爱，从不与任何官员拉扯，所以才这样讲。但这话传到石亨耳中，石亨既惭又恨，自此与于谦有隙。石亨的侄子石彪，随石亨守卫北京有功，但他横行不法，兵部给他降职处分，调出北京让他去协守大同。石亨为此也怨恨兵部尚书于谦。还有那张、曹二人，张𫐄征苗时吃过败仗，为于谦所劾。而那太监曹吉祥在监军时，也与兵部发生过龃龉。试想如今“四丑”得势了，他们还能饶过于谦吗？

于谦、王文等下到狱中，由都御史萧维祯亲自审讯，这种根本没影儿的事情，当然也没有任何真凭实据。那徐有贞却有办法，他给于、王等的罪名中加上“意欲”二字，作为定刑的依据。那就是说，于谦、王文等的罪名是“意欲迎立外藩”。当初南宋时，奸臣秦桧谋害岳飞，罪名是三个字“莫须有”。而徐有贞比他的这位前辈更胜一筹，用“意欲”两个字就把人置于死地了。

王文不服，在都察院的大堂上愤怒抗辩。于谦笑着对他说：

“干之兄，你还辩什么？难道还想求真正的道理吗？不必了！他们根

本不管事情的有无，也不管什么是非曲直，只是要害我们的性命罢了！”

就这样，萧维祯呈报上去，定于谦、王文、范广等六人死罪。朱祁镇看着判状沉吟，说：

“那于谦守北京，是有过大功的。”

徐有贞正在一旁，赶忙对朱祁镇说：

“今天如果不杀于谦，我等的夺门之事岂不是无名了吗！”

朱祁镇于是批准，将于谦等弃市，妻、子等发戍边疆。

于谦就义那天，沿途经过的街巷，百姓夹道痛哭，北京全城都为之哀悼。偏赶上那天天气阴霾，乌云四合，朔风怒吼，雪花飘飘，仿佛天地也在表示愤怒。“犯人”弃市后，要在街头暴尸三天，任何人不得祭悼。但曹吉祥部下有个叫朵耳的指挥，却在于谦尸前酌酒奠祭，伏地恸哭。锦衣卫校尉把他送回京营，被曹吉祥鞭打了一顿。第二天朵耳却又去哭祭了。他是京营的勇将，曹吉祥对他也无办法。

查抄于谦家产的时候，发现这位一品大员少保兼兵部尚书却家无余资，四壁萧然，只有一摞一摞的图书。后来找到了一间严密封锁的小屋，人们以为这里一定会有珍藏了。但启开一看，屋里全是景帝朱祁钰赏赐给他的蟒衣、剑器等物，都是崭新的，没有用过。抄家的军士们不禁个个泪下。

皇太后起初不知道于谦的事，等听说于谦已死，不胜哀悼，便对皇上讲述于谦保卫北京的经过。朱祁镇听了也有些后悔。

有个都督同知陈逵，跟于谦并不熟悉，他感念于谦的忠义，便不避风险来收拾了于谦的遗体，在西山暂厝起来。第二年，于谦的女婿从南方来把于谦的灵柩运回杭州故乡，安葬在西湖边的青山上。于谦幼年最

佩服的两个人是岳飞和文天祥，他曾手书了岳飞的词《满江红》和文天祥的诗《过零丁洋》悬挂在居室的墙壁上，时时用前辈英烈的高尚道德品质来勉励自己。当初文天祥在元朝的大都街头被害，而今天于谦就义的处所恰恰又是那个街头。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但却又另有一个巧合，那就是于谦的墓地跟岳飞的岳王坟相距不远。因而明末的张煌言有这样一首诗：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慚将赤手分三席，敢向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尽鴟夷！

后来的游人，到杭州来总要去瞻仰岳飞和于谦的坟墓。清朝的诗人袁枚便有“赖有岳、于双少保，人向始觉重西湖”的诗句。

于谦自己也善诗文，有一首七言绝句，脍炙人口，题目叫“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诗，可说是作者自己一生品节的写照了。

于谦等忠直之士被害了，徐有贞等群丑得势了。他们自然要忙着争权夺利，结党营私，出卖官爵，搜刮财富。谁想当官，只要找到石亨等人，花足价钱，便会成为“夺门”有功的一员，得到官职，光石亨一家亲属当上指挥、千户、百户的便有五十九人。他卖出的官儿竟达四千名之多。仅此就可见一斑了。

但石亨等这些卑鄙小人，品质决定他们只为自己打算，日子久了，

免不了会发生利害冲突，于是便自相倾轧起来。他们在皇帝面前互相攻击，陷害造谣，偏赶上朱祁镇又耳软心活，主意不定。首先下台的便是那徐有贞。他正月升官，六月下狱，好景过了还不到半年。不过朱祁镇总算念着旧情，没有杀他，只好把他发配到金齿（今云南保山），让他到那儿看天象去了。

那石亨却越来越猖狂，终于使朱祁镇看不惯了。有一天，朱祁镇对学士李贤说：

“石亨是不是管的事太多了？”

李贤回答说：

“大权不可下移，圣上应该独断。”

“只是他有夺门功，朕不能忘。”

“说起这个‘功’来，臣的看法不同。如说当时是‘迎驾’，还勉强说得过去，要说‘夺门’，那是夺谁之门？皇府宫门，怎可让外兵轻易去夺？这又怎么能传之后世呢？”

连续三个问句，使朱祁镇发起呆来。李贤接着又来了惊人的一笔，他说：

“当时有人也曾让臣参加，被臣拒绝了。”

朱祁镇果然惊异起来，沉着脸问：

“这是为什么？”

“那时郕王已经病重，必将不起。他又没有儿子。待他去后，群臣自然会启奏皇太后，请陛下复位，那样该有多么名正言顺，又何必去冒险‘夺门’呢？”

朱祁镇听了不由点点头。李贤接着说：

“假如当时事情泄露，或是‘夺门’失败，石亨等当然不足惜，但不知陛下那时将处于何地？”李贤看朱祁镇在用心听，便揭破说：“其实石亨等人，哪里是为陛下？哪里有什么为社稷之心？说穿了，他们只是利用陛下去图谋富贵罢了。陛下复位那天，臣也在场，见参与其事的连兵卒在内也不过几百人。但陛下根据石亨等所奏，封赏的‘夺门功臣’已经有五、六千名之多了，这些人当时都在什么地方？再具体讲个例子：那时石亨的侄子石彪正在大同，他又凭什么‘夺门功臣’封为定远侯？”

朱祁镇终于明白了。天顺三年，石亨因谋反罪被杀，全家抄斩。曹吉祥则是天顺五年因同样的罪名被处死的。“恶有恶报”，这话一点不假。

还有那个太平侯张軏。他跟神机营都督范广有仇，在处理“迎外藩”案时，他有意把范广牵扯在内，结果使范广与于谦一起被害。一年以后，他突然得病，浑身疼痛，不时突然惊叫，大呼：“范都督饶命！”折腾了一个月才死掉。人们说这是范广的鬼魂向他索命。当然鬼神之说是不可信的，他不过是因患病而导致精神错乱，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把以前做的亏心事泄露出来而已。

朱祁镇过了长时间的囚禁生活，深知失去自由的痛苦，便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没有名字，更无职衔，论起辈分来朱祁镇还得叫他叔叔。这个人便是建文帝朱允炆最小的儿子。朱允炆焚宫自尽的时候，他还刚刚一周岁，连名字也没来得及起。不过当时他正由乳母抱在别的地方，这才幸免于难。朱棣进宫后见他年纪太小，就让那个乳母继续抚养他。他们住在皇宫最边上的一个小院里，无声无息地生活。由于他没有名字，宫人们提起他来，便叫他“建庶人”。乳母死后，陪伴他的换了个老太

监。如今老太监换到第三个了，他也已经到了五十六岁，但足迹还没离开过那小院一步呢！

朱祁镇叫李贤陪着他去看建庶人。由司礼监的一个太监领路，他们来到了那个小院。一看院门还是锁着的。那个太监找来内官监的负责太监，拿来钥匙开锁。不料铁锁却锈住了，怎么也打不开。朱祁镇生气地问：

“门锁得这样紧，他吃什么？”

“稟陛下，建庶人的食物规定一个月送一次。分量是足够的。”

朱祁镇“哼”了一声。太监跑去找来锤子，把锁头砸开。推门进去一看，只见一个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头，坐在台阶上，用混浊的眼睛看着来人。太监告诉他：

“建庶人，皇上来看你啦！”

“皇上？”那老人翻翻眼珠，喃喃地说，“什么是皇上？”

这时一个老太监端着一碗饭走来。看见朱祁镇，连忙把碗放到地上，趴下给皇上叩头。朱祁镇低头一看，碗里是灰乎乎的米饭。便问那太监：

“菜呢？”

“陛下，”老太监跪在地上悲声说，“新菜还没送来，陈菜吃了一些，其余的都烂光了。”

朱祁镇摇摇头，对李贤说：

“他也是我家的人，看了实在不忍，我想放他出去。”

“陛下，你有这样的想法，天地鬼神会知道的，太祖在天之灵也会知道的。尧、舜之心也不过如此。”李贤回答说。

朱祁镇派人把建庶人和那老太监送到凤阳，让他们住在祖皇陵旁边

的屋子里，吩咐看陵的官员负责他们的生活。还要人给建庶人想法娶个妻子，并准许他自由出入。可怜这个建庶人，生在皇家，也算是龙子龙孙，却过了一辈子囚禁生活，出来后连牛羊都不认识，以为那是什么怪物。

更可叹的是，建庶人到凤阳不久就死了，妻子也没娶成。因而太子朱标这一支便绝了后代。这也算是朱明王朝的一个小小的悲剧插曲吧！



## 第三十五回

朱见深偏爱老妃子  
万贞儿蛮横霸后宫

天顺八年（公元 1464 年），朱祁镇在又做了七年皇帝之后，于三十八岁的时候去世了。葬于裕陵，庙号“英宗”。

朱祁镇后期，比年轻的时候明白多了，处置“四丑”，释放建庶人，都做得不错。特别是临死时的遗诏，嘱咐了四件事：一是要东宫太子即位百日后便可成婚，不必等待三年。二是太子婚后要定下后妃的名分。三是他死后不许用宫女殉葬。四是殡殓时的器服用旧的就行了，不要浪费。

在此以前，皇帝死后往往要拿侍奉过他的宦人殉葬，朱祁镇的遗诏革除了这个陋习，致使李贤对学士陈文、彭时惊叹地说：

“皇上遗诏讲的都是有关大体的事情，尤其这第三条，不要活人殉葬，实在是盛德无量啊！”

十六岁的太子朱见深做了皇帝，定明年为成化元年。这就是明朝的第八位皇帝“宪宗”。

十四年前，“土木之变”发生的那年，朱见深还是个两岁的幼儿，自然不知道当时的详细经过。后来一天天长大了，听人们讲于谦是怎

样保卫北京的，对于谦十分敬佩。“南宫复辟”之后，他父亲又坐上皇帝的宝座，却将于谦下狱。他那年虽已十岁，且又做了太子，但他跟父亲从小没生活在一起，十分生疏，因而虽内心焦虑却不敢去求情。现在他当皇帝了，可以说了算了，便于成化元年，派行人司行人（负责传旨、册封等行政事务的官员）马璇，到杭州于谦的墓前致祭，宣读了祭文。并把于谦的儿子于冕赦回来，任为兵部员外郎，后又任应天府尹。

成化十一年，朱见深又想起叔父郕王——即景帝朱祁钰的事情，感到这位叔父虽然曾经废除过自己的太子地位，但从他在“土木之变”以后的所作所为来看，功绩还是主要的。于是乃下诏恢复了叔父的帝号，另上了尊谥。这件事前文表过，此处不再详述。

从上述二事来看，朱见深还是挺明白的。但他做的糊涂事却也不少，最突出的便是他跟万贵妃的关系了。

这还须从头说起。

万贵妃原是一名宫女，名唤贞儿。诸城（今山东诸城）人，四岁便被征入宫，在英宗的母亲孙太后的仁寿宫里当宫女。她面目姣好，机警过人，很受孙太后喜爱。那时宫女都是从民间征集的贫家女儿，不少人一辈子待在宫里，直到老死。万贞儿在孙太后宫中过了二十五年，那年她已经二十九岁了。正赶上“复辟”事起，朱见深回到东宫重当太子。朱见深那年十岁，常常到祖母孙太后宫中玩耍。万贞儿为了取得太子的欢心，每逢朱见深来时，她总是想尽办法使太子高兴。后来朱见深渐渐长大，十四岁时懂得“人事”，那万贞儿便引诱太子跟她发生了肉体关系。那年她已经三十三岁了。

天顺六年，孙太后去世。朱见深便把万氏要到东宫。也就在那年，英宗朱祁镇要为太子选妃。从征选的十二名淑女中，选出吴氏、王氏、柏氏三人，准备到太子十六岁时再最后决定谁当太子妃。这三位少女和朱见深的年纪差不多，稚气未退，哪里赶得上万氏的妖媚，于是朱见深根本不把吴、王、柏三女放在心上。

英宗朱祁镇两年后去世，遗诏让朱见深百日后成亲，并定下后妃名分。依着朱见深，直接要把万氏册为皇后。可是正宫钱太后和见深的生母周太后哪肯答应！一来万氏原是个宫女；二来年纪太大了，竟比新君大了十九岁，让她当皇后还不如叫“母后”恰切呢！两太后让司礼太监牛玉主持选后，从候补的三淑女中选一人做皇后，另二人为妃子。

吴氏出身官宦人家，父亲吴俊是都督同知。她知书达理，被牛玉选中。两太后复选后便决定下来。朱见深本不愿意，不过两太后做主，他也只得依从。但他却提了个条件，那就是要把万氏跟王、柏二女，同选为妃。两太后扭不过他，也只好答应了。

英宗的“百日”烧过之后，宫中筹备册立后妃的大典。到了册立那天，百官和命妇们也都要出席参加，表示庆贺。第二天，百官还要一个一个地奉上表笺，再次致祝贺之礼。皇后还要到太庙去，拜谒祖宗的灵位。礼节既烦琐，又隆重，忙忙碌碌好几天，才算结束。吴氏做了皇后，万、王、柏三人封为贤妃。按照制度，皇后乃是国母，地位仅次于皇帝，妃嫔们不但要服从她，而且每天早晨还要到皇后的宫中请安。

万贞儿没当上皇后，满怀不乐。那天早晨起来，磨磨蹭蹭地来到皇

后宫中。一见那吴后和王、柏二妃，谈笑正欢。这些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前年一起进宫，她们天真烂漫，感情融洽，处得十分亲密。这次虽然分别当了后、妃，地位不同，但友情仍在，所以并不拘束。现在一见万妃进来，浓妆艳抹，打扮得妖精似的，首先就看不惯。于是一个个便正襟危坐，脸儿也严肃起来了。

万氏何等乖觉，哪能瞧不出来。但她倚恃着皇上的宠爱，丝毫不把这三个小姑娘放在眼里，只是大大咧咧地朝皇后施了个半礼，鼻孔里哼了一声，什么话也没说，扭身便走了。这其实是对皇后的大不敬。不过吴氏也不计较，只是当万氏走出宫门之后，朝她的背影做了个鬼脸，引得王、柏二人“哈哈”大笑。

万氏前脚刚迈出门槛，后边便发出笑声，恨得她咬牙切齿。一天天过去，那万氏也就越发地跋扈起来，见了皇后，带答不理，有时还说上几句讽刺话。吴皇后虽然在家时读过诗书，但却不敌万氏的油嘴滑舌，有一天，吴皇后被惹急了，斥了万氏几句。万氏不服，两人争吵起来。吴皇后喝令宫女：

“给我将这泼妇重责二十杖！”

宫女们虽然把竹杖拿来了，但惧怕万氏，不敢动手。万氏扬扬得意地又着手撇嘴说：

“打呀！看谁敢打老娘！”

吴皇后出身于武将家庭，性情有些急躁。她看宫女不敢动手，便自己把竹杖夺过来，朝万氏狠狠打去。万氏也想还手。可是皇后幼年跟父亲练过武功，三杖下来，万氏就屁股青肿，躺在地上干号了。吴皇后把竹杖一扔，喝道：

“滚出去！再也不要来见我！”

万氏爬起来，双手捂着屁股，“哎哟、哎哟”叫着，一拐一拐地走了。

王、柏二妃吓得脸儿都黄了。柏妃说：

“娘娘打了她，只怕皇上怪罪。”

吴皇后冷笑一声，说：

“做这样的皇后，又有什么意思！”

那万贞儿回到自己宫中，越想越恼，饭也不吃了，一劲儿啼哭。待到皇帝朱见深走来，她越加哭得伤心。头发披散着，眼泡儿像个棉桃，脸上的脂粉被泪水冲成一道道小沟。但那年轻的皇上，对这丑态不但不厌，反觉得楚楚可怜。说不得要检查伤势。一瞧万氏的屁股上，凸起了三条青青的杠子，皇帝真火了，觉得这简直是在打他。于是气冲冲地去找两太后，要把吴皇后废去。

两太后不答应，朱见深便把龙袍脱下来，赌气地说：

“好吧，我这皇帝也不当了，我领着万贞儿到山里当和尚去！”

当和尚还要带个女人，两太后又好气又好笑。但想想皇后自己动手打人，也太嫌粗鲁。像她这种急躁脾气，说不定惹急了还能打皇上。终于同意将她废去。朱见深要立万氏为后，两太后坚决不允。最后还是把王氏立为皇后，把吴氏废了贬到西宫居住。那吴氏当上皇后，才刚刚一个月。

王皇后性情温和，对万氏从不计较，这才得以相安无事。到了成化二年正月，那万氏生下一个儿子。朱见深十八岁得子，皇位继承有人，免不了大大高兴，立即遣中使祭祀山川，感谢天地，并为皇子祝福。说

不得还要到太庙去，把这喜讯告诉祖宗。跟着又把万氏从贤妃晋封为贵妃。这“贵妃”是妃嫔中地位最高的，仅次于皇后。事实上，宫中的事情王后并不过问，大权全在万贵妃手中了。

万贞儿因为生了儿子，得以当上贵妃。可惜的是那生下不久的小娃娃，连名字还没来得及起，却夭折了。以后任凭万贵妃怎样拜神求佛，总是不得怀孕。那时皇帝年纪渐渐大了，按制度陆续设置了六宫。多娶几个妃子，目的也是为了早早生育后代。万贵妃自己不生养了，又怕别的妃子养出儿子来，“母以子贵”，她的地位便要动摇了。她想了个法子，每当皇帝要到别的妃子宫中，她预先得信，便穿上戎装，佩带宝剑，杀气腾腾地去给皇帝当前导。吓得那妃子战战兢兢，朱见深也觉无趣。不过朱见深对万贵妃不但不怪，反认为这是她爱自己太深的缘故。

不过皇宫范围太大，有时皇帝还是溜到别的妃子宫中去住了。万贵妃就又想出一个防范的措施。她派出自己的心腹宫女和太监，到各宫暗暗侦察，只要发现某个妃子有妊娠的迹象，她就拿堕胎药逼那妃子吃，把胎儿给打下来。

成化七年，柏妃生下一个儿子，起名叫朱祐极。宪宗皇帝朱见深赶忙立他为皇太子。可是万贵妃又怎能容忍呢？她终于想方设法把小太子偷偷毒死了。朱见深追谥他为“悼恭太子”，以表示“悼”念之意。

成化十一年，宪宗朱见深二十八岁了。有一天，太监张敏给他梳发。朱见深对着铜镜，发现自己生了几根白发，已不再是少年模样。想想还没儿子，将来这天下又传给谁呢？不由叹息一声，自言自语地说：

“老之将至却还膝下犹虚，真个使人苦恼呀！”

太监张敏听皇上这么说，便放下梳子跪下说：

“奴才死罪，皇上早已有子啦！”

“你说什么？”朱见深大声问，“站起来讲！”

“皇上真的已经有了皇子，奴才不敢撒谎！”

“他在哪里？”

“奴才说出来非死不可，万岁可要替我做主。”

“好！你快说吧！”

原来皇宫二十四衙门中，有一个尚宝监，是负责管理皇家的珍宝的。尚宝监有一个管珍宝库的少女，姓纪，是广西瑶族人。成化六年，瑶民起义，在大藤峡（今广西黔江下游）被官军打败，一部分瑶族儿童被掳到京中，这个纪姓的女子便是其中的一个。她到京后被送往宫里使役。皇宫有一部分需要文化知识的工作，内宫监常挑选一些年幼的太监和宫女，教他们读书后再来充役。这纪姑娘读了几年书后，分派到珍宝库。有一天朱见深到珍宝库去，见到这纪姑娘，看她少年聪慧，容貌端丽，回话时条理清晰，委婉动听，一时喜欢，就把她征为淑妃。

不久，纪妃有了身孕。万贵妃发觉了，派一个宫女去查。这宫女从前跟纪妃在一起读书，两人交情不错。她回来骗万贵妃说，纪妃得的是痞病。万贵妃还不放心，派人给纪妃送一包堕胎药去，逼着纪妃服下。幸亏那胎儿结实，才得以保全。万贵妃还不放心，就矫旨把纪妃送到安乐堂去居住，让皇帝再也看不到她。

这安乐堂地处皇宫西部，属于“冷宫”的范围，一向居住的都是些受贬谪的人。当初景帝朱祁钰就死在西宫。西宫在安乐堂隔壁，现在由废后吴氏住着。纪妃在这里倒也安静，皇上既不来，别人也很少来打扰。纪妃闲时就跟吴废后聊天儿，倒也不甚寂寞。十月期满，纪妃生下一个

男孩。她对管西宫的太监张敏说：

“你去把这孩子溺死吧！”

“圣上没有儿子，怎么能把这皇子扔弃呢？”

“可是怎么又能把他养活呀？”

张敏终是不忍，他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把婴儿藏在一个空屋里，用蜂蜜和了面粉来喂养，使小孩活了下来。万贵妃也曾派人来查，那时张敏便把小孩藏到西宫吴后那里，躲了过去。吴后也常常过来帮助照料孩子。孩子长到六岁，胎发还没剪掉，让头发披散着，再穿上女孩的衣服，远看像个小宫女，这才得以存活下来。外宫的人只有司礼监怀恩知道这件事。

现在，张敏把真相对朱见深讲出来了，怀恩在一边加以证实。朱见深高兴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马上命令张敏去把皇子接来。张敏来到安乐堂，对纪妃讲了。纪妃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皇子终于有出头之日了；难过的是她将要跟亲生的儿子分开，因为那阴险毒辣的万贵妃是绝不会放过自己的。不过她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儿子以后能否逃得出万贵妃的毒手。

纪妃给小皇子换上小红袍子，抱着儿子哭着说：

“儿呀，你这一去，娘怕也不能活了。你以后要记着娘，也不要忘了西宫的吴娘娘，还有这个张公公，他们都是你的救命恩人。”

小皇子也哭了，不肯走。纪妃给他擦干了眼泪，吻吻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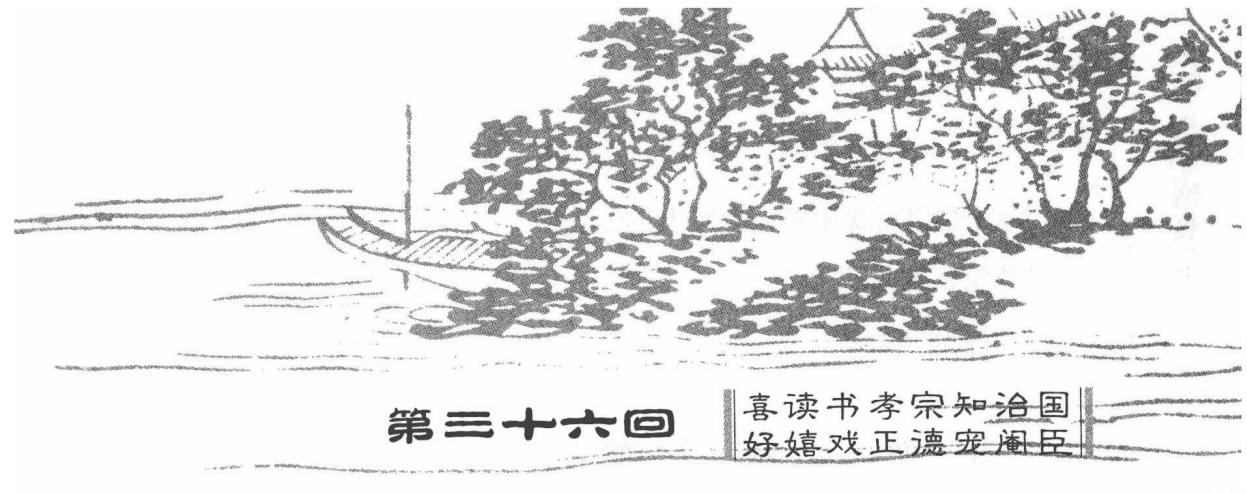
“儿呀，去吧！你看见一个穿黄袍子长胡须的人，那便是你爹爹！”

“什么叫胡须？”

是呀，宫里倒是有些男人，但他们多是太监，而太监们是不长胡须

的，那唯一长胡子的自然就是皇帝了。

小皇子进了张敏带来的小轿。纪妃强忍悲痛，倚在门旁，眼看小轿拐过墙角不见了。她又呆呆地站了一会儿，这才掩泪回宫。她知道，儿子这一去，跟她将是生离死别，后会无期。



## 第三十六回

喜读书孝宗知治国  
好嬉戏正德宠阉臣

皇帝朱见深站在乾清宫的台阶上，见太监张敏带路，两个太监抬一乘小轿走了过来。轿子远远站下，张敏掀开轿帘，从轿子里走出来一个穿红袍的披发小姑娘。朱见深不由一愣，张敏和怀恩不是说自己生的是儿子吗，怎么来的是个小姑娘呢？

张敏把小姑娘领到皇帝面前。朱见深仔细打量，见这孩子粗眉大眼，相貌跟自己十分相似。待到一说话，听听语声，才知道面前果然是自己的儿子了。

小皇子仰起头来，望着朱见深，说：

“你这个人嘴巴上有毛，妈妈说那叫胡须，有胡须的才是爹爹。你是爹爹吗？”

朱见深伸开手，做出要抱的样子说：

“不错，我就是你的爹爹。”

也许是父子天性的缘故，小皇子一点也不认生，一下就扑进朱见深的怀里了。他摸着父亲的胡子，好奇地问：

“爹爹，为什么你有胡须，妈妈却没有胡须？张公公也没有胡须？”

“这个你以后就知道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名字。”

“你妈妈叫你什么？”

“妈妈叫我妞儿。”

朱见深默然了，他知道纪妃不敢给儿子起名，是怕被人发觉，而故意用女孩的统称来叫他。朱见深把儿子放下，又上下打量了一阵，真是越看越高兴。他吩咐张敏：

“给皇子洗洗澡，把头发梳好，再去告诉尚衣监，让他们来人给皇子做衣服。”

张敏领皇子走了。朱见深抑制不住高兴，他坐不住了，不觉踱出后宫，来到前殿文渊阁，对大学士商辂等人说：

“告诉众卿一个好消息，朕已经有皇子啦！”

阁臣们一时都愣了。朱见深笑嘻嘻地讲了经过。大家也都高兴，跪下给他庆贺。阁臣立刻写好诏书，颁布天下。第二天上殿，百官一起向皇上贺喜，朱见深的嘴巴更乐得闭不上了。回宫后下令让纪妃移居到永寿宫。

大伙儿都在庆贺有了皇储，那万贵妃却在自己宫里又哭又骂，骂那些“小人”骗了她。哭骂了一阵，忽然又打扮起来，走到乾清宫去给皇上贺喜。朱见深本来还担心万贵妃不高兴，这时见她笑眯眯的模样，也把心放下了。万贵妃摸着小皇子的头顶，亲亲热热地说：

“这孩子真乖，真好看！哟，这头顶上怎么缺一圈头发呢？”

她哪里知道，就因为她曾逼着纪妃喝了堕胎药，胎儿虽没打下来，却也受了药力的影响。

万贵妃把小皇子夸奖了几句，忽然对皇上说：

“陛下把小皇子交给我带吧！我教他读书识字，伺候他，皇上看好不好？”

朱见深吓了一跳，他虽然颟顸（mān hān 滅糊），也猜出万贵妃又不怀好意了。可要是不答应，又怕万贵妃不高兴。正在为难，仁寿宫来了两名宫女。那仁寿宫是太后居住的宫室，那时钱太后已经去世，只有朱见深的生母周太后在那儿居住。宫女传达太后的旨意，叫把小皇子送去给她看。

太后是小皇子的亲祖母，要看孙儿当然是应该的。小皇子被仁寿宫的宫女领走了。不一会儿，宫女又回来传话，说小皇子就在仁寿宫里由太后抚养了。万贵妃干瞪眼没有办法。

万贵妃还不死心，过了几天，她让宫女到仁寿宫去请小皇子到她那儿玩。小皇子倒是来了。万贵妃要他吃饭，小皇子说：

“奶奶说了，我们已经吃饭了。”

“那就吃点糖羹吧！”

“奶奶说了，什么也不让我吃，怕有毒！”

说完，小皇子朝万贵妃笑一笑，就蹦蹦跳跳地走了。万贵妃又惊又怒，恨恨地说：

“这小子刚六岁就这样，将来还有我的好吗？”

万贵妃害不了小皇子，而那皇上却又到永寿宫纪妃那儿去住了几次。万贵妃于是把怨气撒到纪妃身上，终于设法把纪妃毒死了。那救了小皇子的太监张敏，在纪妃死后，怕万贵妃报复，只好吞金自尽。

不过万贵妃自己也窝囊病了。不久，皇上册立小皇子为东宫皇太子，

起名叫朱祐樘。万贵妃见大局已定，便也心灰意懒，不再去管妃嫔们生孩子的事。这样，妃嫔们才陆陆续续地给皇帝又生了九个儿子，五个女儿。

成化二十三年，五十九岁的万贵妃突然病死了，宪宗朱见深十分悲痛，为她辍朝七天。待到八月，皇帝自己也死了，年四十岁。葬于茂陵，庙号“宪宗”。

皇太子朱祐樘（táng 堂）继位，定明年为弘治元年（公元 1488 年）。

朱祐樘后来的庙号叫“孝宗”，这是有根据的，就因为他十分孝亲。他做了皇帝以后，尊祖母周太后为太皇太后，王皇后为皇太后，而把自己的生母纪淑妃追谥为“孝穆皇太后”。他离开母亲时已经六岁，理解当时的一些事情。后来，一直对生母思念不置。他听老宫人说，纪妃来京时年纪太小，只记得自己是贺县（今广西贺县）人，姓纪，别的就都不清楚了。朱祐樘派人到广西寻访，想找到母亲的亲人，但也没有结果。还有那曾抱护过他的废后吴氏，他命令对她的衣服膳食等待遇，都跟太后一样。

至于那个万贵妃，虽然已经死了，但是有的人提出来要废除她的贵妃谥号；有的人还要求逮治当初给纪淑妃诊病的医生，查一查是不是万贵妃捣的鬼。朱祐樘思虑再三，尽管他也恨那个女魔头，但想到这样做可能会使九泉下的父亲不安，便也就算了。

朱祐樘十八岁登基，做了十八年皇帝，是三十六岁死的。他好读书，性情温和，政治上比较清明。史书上认为明朝皇帝中，太祖、成祖是创业的皇帝，仁宗、宣宗是守成的皇帝，再次便是这位孝宗了。史书称他“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

阜”。这话其实不错。只是他在位的十八年中，却也没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我们这里也只好略而不谈了。

弘治十八年五月，朱祐樘患病，自知不起，便把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等召到榻前，对他们说：

“朕冲龄登基，亏得诸臣辅佐，十八年来，幸免陨越。可惜天不假年，朕只得将国事托付众卿。东宫虽然聪明，但好游嬉逸乐，诸先生务必辅之以正道，俾使他能成为令主。”

顾命大臣们在榻下垂泪叩首，齐声说：

“臣等敢不尽力！”

第二天，朱祐樘便死了。葬于泰陵，庙号“孝宗”。

太子朱厚照继承帝位，定明年为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那年他十五岁。这就是明朝的第十位皇帝“武宗”。

“知子莫若父”，朱祐樘了解儿子的缺点，“好游嬉逸乐”，可惜他没有能够在儿子小时候及时管教，只在临死前托给顾命大臣。然而现在朱厚照是皇帝了，偏又赶上十五岁这样一个又懂事又不太懂事的年龄，真个让大臣们来“辅之以正道”，实在有点儿晚了。朱厚照在东宫当太子，跟他父亲当初做太子不一样。朱祐樘摊上个好的东宫随侍内官，名叫覃吉。他温雅诚笃，熟读诗书，很识大体，是个有学问的老太监。朱祐樘暇时听他讲政事、讲历史，讲民情，也讲农桑等生产，而讲得更多的还是民间的疾苦。他常常对太子说：

“我已经老了，还希望什么富贵？只是盼望将来天下有个好皇上就知足了。”

有一天，朱祐樘找了一本佛经在看，远远见覃吉走来，朱祐樘赶忙

把佛经藏起，换了一本《孝经》。但覃吉已经发现了。他走过来跪下问朱祐樘：

“殿下看的是佛经吗？”

“喏，不是佛经，”朱祐樘把手里的书一扬，“是《孝经》呀！”

“佛经倒也不是坏书，但殿下日后要做天子，管理万民百姓，看了那些超凡入圣、清静无为的书，是没有好处的。”

“对，对，对！”朱祐樘连连点头答应。

朱祐樘平时称呼覃吉为“老伴”，有什么疑难问题不好处理，就对别的太监说：

“你去问‘老伴’去！”

朱祐樘后来做了皇帝，能够任用贤人，励精图治，特别是肯于听取臣子们的谏诤，那是跟少年时这个“老伴”对他的教养分不开的。

可是朱厚照的东宫内臣又如何呢？在他周围，有八个太监来伺候他。其中为首的一个叫刘瑾。他跟覃吉恰恰相反，只教太子玩乐，不劝太子读书。刘瑾是兴平（今陕西兴平）人，入东宫前是当地的小流氓。他哄着少年贪玩的太子玩耍，什么斗蛐蛐啦、斗鹌鹑啦、斗公鸡啦，把个东宫的后园弄得乌烟瘴气。太子渐渐大了，刘瑾等教太子玩的花样便也翻新，掷骰子、玩骨牌，呼卢喝雉，把个东宫书房竟变得跟赌场差不多。

朱厚照即位后，这八个太监得到他的宠幸，自是不在话下。但那新皇帝仅仅十五岁，每天老早便被司礼监王岳唤醒，催他上朝。他睡眼惺忪地坐在硬邦邦的御座上，前仰后合，听部、府的大臣们奏事。对他们讲的那些事情，他既不明白，也不感兴趣，只是随口应着：“好，好，准啦！”退朝以后，还有一大堆枯燥无味的奏疏本章要他看。孝宗皇帝还

有一个制度，那就是举行“经筵”，让翰林院的学士们按时给皇帝讲读经史。更有都察院的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等所谓的“谏官”，专门挑皇上的毛病，今天说这个不合祖宗的法统啦，明天说那件事违背了古训啦！这些、那些，都让他腻烦透了，哪里有玩乐有趣呢！

不过他是皇上。刘瑾等告诉他，皇上是谁也管不了的，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看谁不顺眼就杀谁的头。于是朱厚照就使出皇帝的权威了，他可以随意不上朝，他可以把奏疏等一股脑儿交给内阁大学士或是司礼监，让他们去办。至于谏官们上的谏章，他连看也不看，随意地一扔就算了。如今他喜欢的已不是户内或仅限于后园的活动，他要到外边去玩耍。骑马射箭，带着鹰犬跑出几十里地去打猎。后来又喜欢上了歌伎舞女。那时候他白天跑出去玩，晚上在宫里玩。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要换上便装，偷偷地溜到街市上逛逛，反正有锦衣卫的校尉远远保护着，而且老百姓谁也想不到那个大把花钱的清秀小伙儿，竟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刘瑾等一伙成了皇上的亲信，渐渐干预起政事来了，他们常常假借皇帝的名义行事，贪赃受贿，横行不法。人们便给他们八人起了一个总外号，叫做“八虎”。

顾命大臣们看小皇帝闹得太不像话，想起先皇临终的嘱托，便有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等在内阁集议。刘健拍案大骂刘瑾，谢迁跟他一递一声地附和。只有李东阳不做声。可是光骂解决不了问题，他们便去联络了尚书韩文等各部大臣，由户部郎中、当时著名才子李梦阳撰写疏文，列举了“八虎”的罪状。疏文说：“伏睹近岁以来，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刘瑾、邱聚、高风等，置造巧伪，浮荡上心。或击毬走马，或放鹰逐兔。或俳优杂剧，错陈于前；或导万乘之尊



与人交易。狎暱媒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圣德……先帝临崩，顾命之语，陛下听闻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为长夜之游，恣无厌之欲以异圣德乎？伏望陛下将永成等缚送法司，以消祸萌。”

司礼监太监王岳、范亨、徐智三人，平时也看不惯刘瑾的所为，便帮着把韩文等的奏疏交给了皇帝。朱厚照一看疏文讲得那么严重，还把先帝的“顾命之语”抬了出来，确也有些考虑。那晚他连饭也没吃，思考再三，决定让王岳通知各大臣，皇帝已经允奏，待明天便发旨逮治“八虎”。

大臣里有个叫焦芳的吏部尚书，跟刘瑾十分要好。他听到消息后，悄悄跑去告诉了刘瑾，让他们赶快想办法。刘瑾等于是连夜去见皇帝，围着御榻跪了一圈儿，个个痛哭流涕，泣不成声，脑门儿把青砖地磕得“唧唧”响，污血和着浊泪淌了满脸，倒使那个十六岁的小皇帝看得有趣，“哈哈”大笑起来。“八虎”争先恐后地哭诉：

“奴婢等被廷臣所谴，还不是因效忠皇上，使皇上快活吗！狗马鹰犬，所值几何？大臣们小题大做，奴婢等实在冤枉！”

“我等死不足惜，只是皇上少了奴婢等，只怕今后要天天面对那些腐儒，听他们念那些味同嚼蜡的经，日子可难过得紧哩！”

“这都是王岳等人对我等心怀嫉妒，勾结廷臣，欲置奴婢等于死地，<sup>④</sup>让皇上听他们摆布。”

刘瑾更用了个“激将法”，他说：

“陛下以九五之尊，却受制于那些老朽们，只怕他们以后更得逞头上脸呢！奴婢们就是在九泉之下，也为陛下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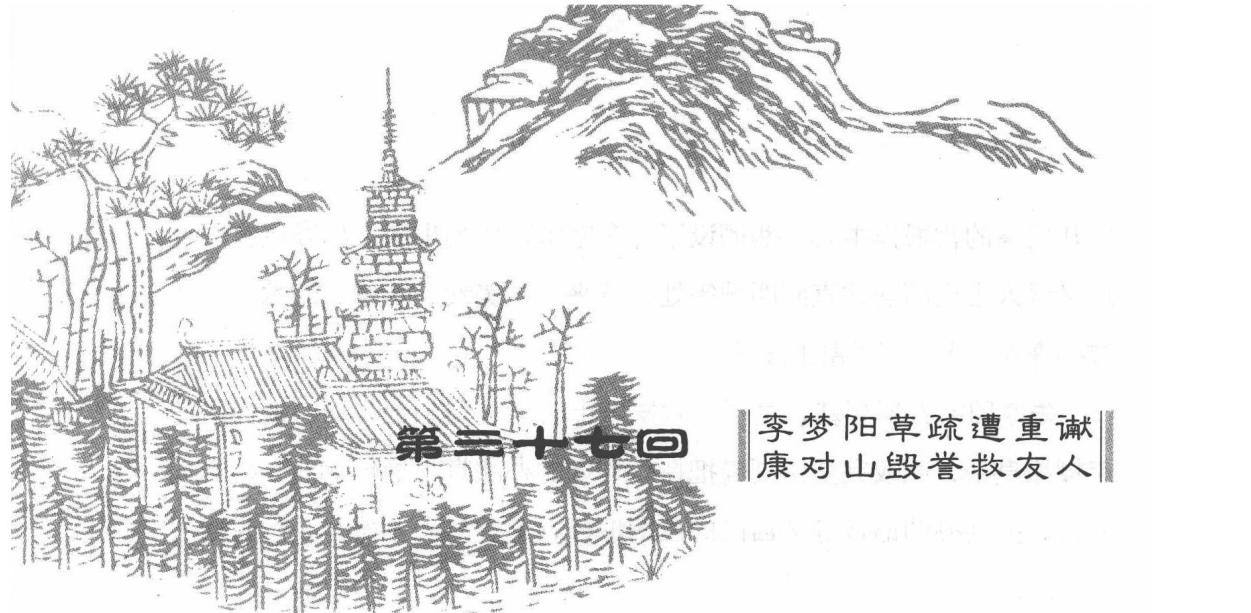
朱厚照越听越觉得“八虎”所说有理，便拂拂袖子，说：

“你们安心去吧，我不会处治你们的！”

“可是，”刘瑾趁机进谗，“陛下饶了我们，可是司礼监王岳、范亨、徐智三位公公，他们绝不会就此罢手，我等还是活不成！”

“什么？”朱厚照终于被激火了，他大声喝道：“是王岳他们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好吧，我就把王岳他们撵到南京去，让你当司礼监，看谁还敢来动你们！”

刘瑾一听赶忙谢恩，他马上去接管了司礼监。朱厚照还让其他七名太监接管了京营等处的职务。待到第二天早朝的时候，百官聚集朝堂，等着皇上颁旨拿问“八虎”。不久，圣旨下来了，但出人意料的是，“八虎”不但不曾获罪，反而个个得到擢升。



## 第三十七回

李梦阳草疏遭重讞  
康对山毁誉救友人

一夜之间，形势突变，大臣们知道事不可为，只好纷纷上疏求去了。

这回司礼监大权在刘瑾手中，他假借皇帝名义，有一些批准，像骂过他的刘健，谢迁；有的挽留，像默不作声的李东阳；有的则要下狱，像奏疏的执笔人李梦阳。先后处理了几十人。后来刘瑾觉得让某些大臣回家还没出这口恶气，便又想法进一步迫害他们，使不少反对过“八虎”的官员家破人亡。

那原司礼监太监王岳等三人，奉旨调往南京。刘瑾派出凶手在途中追上他们，王岳、范亨被杀害，那徐智被击折一臂，幸得逃脱。

大臣们死的死，下狱的下狱，斥革的斥革，朝廷中的正人君子，一下子去了大半，剩下的也只好噤若寒蝉，只图明哲保身了。现在事实上已经成了“八虎”的天下。刘瑾为了把皇帝彻底掌握住，以便长期专权，便大兴土木，给皇帝造安乐窝，让他沉醉在酒色安乐之中，无暇过问政事。他在宫内建造了奢华的太素殿，在太液池建造了天鹅房船坞，又在宫外建造了一座穷奢极侈的“豹房”。刘瑾认为，皇宫内究竟属于禁地，各色人等出入十分不便，于是就把“豹房”建在皇宫外边。豹房里有一

座几层高的宫殿作中心，两厢设了许多密室，栉列串联，如同迷宫。刘瑾又派人去全国各地直到西域等处，召来一些美女、妖僧、幻术士、摔跤手等人，天天伺候皇上淫乐。

朱厚照十五岁登基，过了十六岁、十七岁，到了十八岁。他当了三年糊涂皇帝，朝政完全由刘瑾把持。刘瑾的办法真也绝妙，他开始当司礼监，把要办的诏旨等按自己的意图拟好，但等皇上玩得开心的时候去找皇上：

“陛下，这件事请陛下批示决定。”

“什么事？”

“就是那……”还没等他说，朱厚照就不高兴了，生气地问：

“哎，我要你到司礼监去是干什么的？怎么什么事都来问我？真讨厌！”

“是，奴婢该死！”

“去，去！”皇上摆摆手，“以后，这样的事你看着办去，不要再问我！”

刘瑾盼着的就是这句话呢！以后他当然不再去麻烦皇上，真的由自己决定了。他又把这个给他通风报信的吏部尚书焦芳提拔当了内阁大学士，他们内外勾结，更是为所欲为。后来刘瑾索性在自己家里办公，大臣们禀事不用到朝廷，而改在刘公公的府上。

正德三年六月，朱厚照高兴了，要上个早朝。大臣们禀奏了几件事，其实刘瑾早已决定了，早朝上表一表不过是走个形式。天快晌午了，朱厚照也饿了，传旨退朝。三百多名部、院官员纷纷下殿。朱厚照突然发现丹墀下有一封信，显然是有人故意遗落在那里的。朱厚照让太监拾起

来，拆开一看，是揭露刘瑾不法罪状的。糊涂皇上看了几行，便递给刘瑾，说：

“这信是给你的。”说完便走了。

刘瑾看了信，肺都气炸了，他马上叫人把已退出的官员们都追回来，厉声问：

“这信是谁写的？”

官员们没人吱声。刘瑾便下令让百官都跪在奉天门前边的石路上，派太监监视。过了一会儿，先把几位大臣放了。又过了一会儿，有几个翰林院的官员们哀求说：

“内监对我们翰林一向看重，我等怎么会写这种信呢？”

刘瑾摆摆手，说：

“好，把翰林们放了吧！”

都察院的御史也学样，可是刘瑾却不放，还狠狠地说：

“你们这些专门找人别扭的官儿，一准是你们干的。不承认就晒死你们！”

那六月的天气，正是酷暑。官员们跪在晒得烫人的石板上，头顶是大太阳烤着，不时有人晒昏。刘瑾便让小太监拖到一边。他自己则坐在廊下的阴凉处，跟太监们一起吃冰瓜解暑。

一个叫黄伟的太监看得不过意，便愤愤地对众官说：

“信里说的都是为国为民的事，好男子写了就出来承认，死就死嘛！为什么又不敢说，嫁祸他人呢？”

刘瑾听这话不是味，斥责说：

“什么好男子？什么为国为民的事？如果真是好男子，为什么不敢署

名，而写匿名信呢？”

又过了一会儿，刘瑾也有些累了，便退回朝堂休息。这时负责监视众官的太监李荣，让小太监拾起廊上的冰瓜掷给跪着的众官，还对众官说：

“坐一会儿吧，舒舒腿。”

众官“哎哟、哎哟”地坐在地上，一边啃腿一边啃冰瓜。忽然刘瑾又出来了，李荣急忙招呼：

“出来啦，快跪好！”

刘瑾看见地上的瓜皮，瞪了李荣一眼，不高兴地回府了。这边众官直跪了一天，到晚上刘瑾派人来说，把众官尽下入诏狱。第二天李东阳上疏，请求释放他们。这时刘瑾的一个亲信告诉他，匿名信可能是太监内部的人写的。刘瑾这才把众官释放。但同情众官的太监黄伟和李荣却被斥革了。

还有那起草弹劾刘瑾疏文的户部郎中李梦阳，他是当时有名的才子，在文学史上，人们把他列为“前七子”之一。他下狱后，刘瑾因他有名，又把他放了，谪为山西布政使司经历。

到正德三年，刘瑾又想起他来，派锦衣卫缇骑把李梦阳逮回北京，下入锦衣卫狱中，准备害死他。李梦阳有个姓左的朋友，到狱中探望。见李梦阳蓬头垢面，遍身伤痕，十分同情，便叫着他的字，说：

“献吉，我看你可能没有生路了。”

“唉！”李梦阳叹息一声道，“我看也是这样，完啦！”

“可是有一个人能够救你。”

“谁？”

“武功（今陕西武功）康海。”

“他？……”

原来这康海也是位才子，跟李梦阳齐名，也是“前七子”之一，这时任修撰。武功和刘瑾的老家兴平是邻县，同属西安府。刘瑾想收罗一些文人为他所用，慕康海的才名，便以同乡的关系派人去请他。但康海自视清高，不愿和刘瑾交往，不肯去见。刘瑾便自己坐了轿子去拜访康海。康海事先得信，从后门溜了出去，始终不肯和刘瑾见面。因为他跟刘瑾有这种关系，所以左某才提起康海，要李梦阳求康海到刘瑾那儿去说情，救他出狱。

李梦阳过去跟康海虽然认识，但交情不深，特别是两个人都挺自负，互相不服气。因此，李梦阳有些犹豫，对左某说：

“我和康海素不相干，现在生死关头，却去求托，实在是问心有愧。”

“现在到了什么时候，还要意气用事！康海这人急公好义，定会救你！”

李梦阳犹豫再三，最后还是觉得性命比面子更要紧，便在一张纸头上写了四个字：“对山救我”（“对山”是康海的别号）。左某拿了李梦阳的纸头去见康海，并说明了李梦阳的危急情况。康海慨然地说：

“朋友有难，我怎么能顾惜自己的声名，坐视不理呢！”于是便到刘瑾府上求见。门官通报进去。刘瑾大喜，急忙跑出来迎接。到堂上后让到上座，笑嘻嘻地说：

“前次到尊府拜访，先生拒不相见，今天怎么又惠顾了呢？”

“前次枉驾，实在是学生不在舍下，还望刘公公莫怪。今日此来，便是来道歉请罪的。”

“这却不敢。”

两人谈了些京师的风情，又谈到故乡的山水，人物。康海笑着说：

“唐朝玄宗皇帝时有位高力士公公，也是我们西安府的人士。”

“他有什么？”刘瑾撇着嘴说，“不过是围着杨贵妃裙子转的一个庸人罢了！”

“但此人颇有雅量，肯于给那诗仙李太白脱靴，传为文坛佳话呢！”

“哈哈哈！这倒是不假！”

康海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假如眼下有个李白，不知刘公公能做到这一点吗？”

刘瑾也开玩笑，弯腰作势地答道：

“喏喏喏，这个容易，让我来给先生脱靴！”

康海急忙站起来，正色说：

“这可折杀学生了，我只是说句玩笑话。不过现在倒有一人，才学不比李白差。他现在押在狱中。公公如肯加以援手，那可比给李白脱靴更能为人称道了。”

“你说的这个人是谁？”

“李梦阳。”

刘瑾用手抚摸着光光的下巴，想了想，说：

“这是朝廷的事情，我不该管。不过先生既然说了，我便替先生办一办试试看吧！”

康海朝刘瑾深深地作了一揖，表示感谢。刘瑾回头吩咐摆宴，款待康海。康海也为李梦阳能够得救而高兴，便开怀畅饮起来，两人直饮到半夜才散。

第二天，李梦阳便被释放回家了。但儒林中人不知这当中的情由，以为康海投靠了刘瑾，大家瞧不起他。康海无法辩白，只好默默地承受。

正德五年，刘瑾事败被逮治处死，以前受过刘瑾迫害的人得到昭雪起用，李梦阳被提升为江西提学副使。但那毁誉救友的康海，倒落了一个“附逆”的丑名，解职还乡了。

康海无法辩白他跟刘瑾交往的原因。按理说，那被康海从死亡中救出来的李梦阳，总该有所表示吧。就算他不到朝堂上说明真相，那么去康海那里探望一次，也属人之常情。但李梦阳光顾从开封老家到江西南昌赴任去了，好像忘了康海救他的那回事儿。

后来儒林中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了这件事，那还是李梦阳的姓左的朋友看着不愤，说出来的。有个右都御史马中锡听说后，鄙薄李梦阳的为人，便写了一篇寓言，讽刺他，那便是后来流传甚广的、写东郭先生救狼的故事的《中山狼传》。

康海以后再也没出来求官。他在故乡武功，跟同乡王九思（也是“前七子”之一）每日里诗酒唱和，过着田园生活。他二人都爱好音乐，常常谱写一些新曲，让优伶们演唱。有时还自己粉墨登场，以俳优自居。那时优伶艺人是被列入“下九流”而被人瞧不起的。他们却故意那样做，也是为了自甘暴弃，以发泄他们心中的抑郁。康海尤善于弹奏琵琶。遇到月白风清的夜晚，他常常坐在自家门前的石阶上，自弹自唱。路人这时就会忘了行路，慢慢地聚拢来倾听。

刘瑾对待文人持两种相反的态度，像康海这样不反对他的，他不但不加迫害，还要给以尊崇；而反对他的，便定要置之于死地。除了前述的李梦阳和康海外，他对李东阳和王守仁的态度更能说明这个问题。

李东阳成名比李梦阳和康海要早些，他四岁的时候就能写直径一尺的大字。景帝朱祁钰听说后有些不信，便把他召进宫中，让他当面写来看看。结果这个四岁的小娃娃工工整整地写了“万寿无疆”四个大字，笔画遒劲有力，哪里像出自一个幼童笔下呢！皇帝十分喜欢他，抱他坐在自己的膝上，叫太监拿果子给他吃，又赏赐他钞币等作奖励。于是人们便叫他“神童”。

天顺八年，李东阳考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以后屡次升迁。到孝宗朱祐樘时，他是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跟刘健、谢迁等同受顾命。刘瑾专权后，刘、谢二人慷慨激昂，在内阁拍案怒斥，要联络九卿大臣们共同上疏弹劾刘瑾。唯独李东阳默不作声。刘瑾的党羽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刘瑾。大臣们上疏失败，刘、谢二人致仕后，刘瑾单单把李东阳留下。李东阳上疏乞退，说：“臣等三人，责任一同，而独留臣，将何辞以谢天下！”复诏不许。刘、谢二人离京那天，李东阳去郊外送行，歔欷叹息，悲不自胜。刘健正色说：

“还哭什么呢？假使当日你在内阁说一句谴责刘贼的话，今天我们不就一起走了吗？”李东阳面红耳赤，无话回答。

刘瑾派吏部尚书焦芳进了内阁，把持大权，李东阳唯有虚与委蛇，只图保身罢了。但他凭着内阁首辅的身份，常常替一些受刘瑾迫害的官员求情，使他们得以活命。总制三边都御史杨一清因得罪刘瑾而下狱，是李东阳力救才得脱的。正德四年，刘瑾又想借一件案子把刘健、谢迁牵连进去，准备逮捕他们，抄没他们的家产，也是由于李东阳的力求，才得免祸。

但李东阳虽然不是刘瑾一党，却也从不得罪他。刘瑾在朝阳门外建

了座玄真观，李东阳给他撰写碑文，说了不少称颂的话，读过这碑文的人无不摇头。还有那“八虎”太监，他们的父亲都已死了，却还要追封为都督，那所有的祭文也都由李东阳执笔。许多人背后谴责他，说他文人无行。他的学生罗玘写信给他，声明跟他脱离师生关系。他也只能俯首长叹。

李东阳就是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生活着，他救了一些人，却也说了些违心的话，写了些违心的文章。然而他是清廉的，从不贪不义之财，也从没害过人。所以刘瑾事败之后，他还得以留任，于正德七年告老退休，和夫人乘一辆轻车回到茶陵（今湖南茶陵）家乡。

李东阳善诗文，当时不少名家受过他的指导。但他的诗文中有不少是应酬题赠之作，没有什么价值，只是形式上典雅工丽而已。但因他位居首辅，影响面大，便形成了以他为首的“茶陵诗派”。

李东阳没有积蓄，回乡后以卖字为生。他擅长篆书和隶书。有一天，将近七十高龄的李东阳正在休息，有人来求他写字。他躺在床上不想起来。夫人笑着说：

“今天有客人来吃饭，桌上的鱼菜还没下落呢！”

“是吗？”李东阳急忙爬起来，为挣几个钱来招待客人而欣然命笔。



## 第三十八回

研学向书生榜太道  
夺权位太监自相倾

王守仁跟李东阳相反，他不但不去阿附刘瑾，反而上疏去为那些遭受刘瑾迫害的官员们鸣冤，其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王守仁字伯安，是浙江余姚人，生于官宦家庭。父亲王华是成化年间的进士，历任翰林院修撰、学士等职，还担任过礼部侍郎、南京吏部尚书。王守仁少年时便有大志，不但读书，还要练武。十五岁时曾到居庸关游览，又沿长城东行直抵山海关，纵览了这一带的山川形势，弘治十二年考中进士。正德时任兵部主事。

王守仁的疏文自然是首先到了刘瑾手里。刘瑾一见就火了，矫诏把王守仁下到狱中，打了五十大板，王守仁死而复苏。刘瑾又把王守仁贬谪到贵州龙场驿（在今贵州修文），担任驿丞。

王守仁带着杖伤上路。过了大江，他的一个友人骑着快马追上他，告诉他刘瑾觉得将他谪为驿丞还不解恨，又派锦衣卫缇骑校尉来捉他回去，准备将他处死。这友人听到消息，抢在前边，顺着大路追了几天才把王守仁追上，要他赶快想办法逃走。

王守仁来到钱塘江。那是个月夜。他面对着滔滔江水，心中也像江

水那样翻腾。想到战国时的伍子胥，一片忠心却为奸臣所害，人们说这钱塘怒潮便是子胥的英魂所驱使。现在“八虎”等奸臣当道，难道说自己也要成为另一个伍子胥不成。于是便掏出纸笔来，就着月光写了一首“遗诗”，其中有“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涛泣子胥”的句子。他把“遗诗”用石块压下，然后脱下衣冠和鞋子，扔在江边，自己却沿着芦苇丛偷偷地溜走了。

第二天，这些东西被渔人发现。因为诗作上有王守仁的署名，渔人便到杭州府去报告。杭州知府杨孟瑛久慕王守仁的文名，听说后大吃一惊，连忙到钱塘江边去查看。恰好这时京中追来的锦衣卫校尉们也赶到了。大家在现场进行分析，断定王守仁是投江自杀。校尉们自回北京去向刘瑾复命。知府杨孟瑛却去向藩台（即布政使）和臬台（即按察使）报告。藩台和臬台也叹息不已，就让杨孟瑛代表他们在江边设祭，追悼王守仁。还把王守仁的衣冠和“遗诗”殓葬起来，做成一个“衣冠冢”。于是人们都传说开来：那有名的才子王守仁死了！

而这时王守仁却隐藏在武夷山中。过了一段时间，他怕连累在南京任尚书的父亲，又偷偷地跑到贵州龙场驿去上任。

贵州是个僻远的省份，龙场又在万山丛中，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小小驿马站的驿丞，是谁也不会注意的。这儿的居民又多是苗、瑶等少数民族，他们不懂得汉文化，也没人知道王守仁的大名，因此，他得以无事，反而有充裕的时间使他能够专心治学了。

王守仁少年时，学术界正流行着“格物致知”的学说，这“格物致知”原出于《礼记》，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格”就是“推究”的意思，宋儒朱熹加以提倡，说格尽天下之物，便可豁然贯通。

王守仁坐在自家的庭院里，想到竹子也是“物”，如果去“格”竹子，会不会悟到真“知”呢？于是他便对着竹子冥思苦想，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就苦守在竹丛的跟前。那时父亲在京做官，家里别人劝他也劝不动。他就那么一连“格”了七天，“知”没悟到，却累出了一场大病。从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尽信书不如无书，真知还应该自己去创造。

为了博取知识，少年王守仁还去听道士谈养生，向佛教僧侣问禅机，到处求教。现在做了龙场驿丞，使他有机会认真思索“物”与“知”的关系了。那龙场驿僻寂荒凉，生活艰苦，王守仁反以为乐。他天天瞑目静坐，苦苦思索，终于在一个月夜，大叫一声，悟出了“格物致知”的道理，原来就在自己心中，不需外求。这一段故事，被后人称之为“龙场悟道”。

刘瑾事败后，王守仁被邀出山，到贵阳书院讲学。以后又回浙江，在绍兴的阳明洞筑室读书，研究他的学说。因此，人们便称他为“阳明先生”。

王守仁的学说其实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中心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他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而“行”则是“知”在行为上的表现。在他看来，“知”、“行”都在我心中，心外什么也没有。

他进一步又提出了“良知”说，要人们扫除私欲，遵守封建道德规范，以达到“致良知”的目的。后来他这一套哲学体系为他的学生们所整理，汇编成《大学问》和《传习录》两本书，使他的学说广为流传。

以后王守仁又出来做官，他做过两件比较重要的事情：一是平息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二是血腥镇压赣南、福建的农民起义和广西的少数民族反抗明廷压迫的斗争。只广西一役，据他自称就杀死了四千多人。事实上他又是一个刽子手——不过这些是以后的事情，现在让我们来看

看刘瑾是怎么垮台的。

刘瑾把持朝政，为所欲为，贪婪地搜刮财物，弄得民怨沸腾。正德五年，封国在宁夏（今银川，当时属陕西省）的安化王朱寘𫔍认为这是一个夺取皇位的机会，便以清除刘瑾为名，兴兵叛乱。朱寘𫔍发布檄文，列举了刘瑾的罪状，声称“特举义兵，清除君侧”。

叛乱发生后，陕西官员把朱寘𫔍发布的檄文封奏朝廷，请派兵剿除。奏章到了刘瑾手里，刘瑾见檄文上揭露自己的罪恶件件都是事实，对朱寘𫔍恨之入骨。他将檄文藏起，只奏请皇帝派兵讨逆。正德皇帝朱厚照便起用前都御史杨一清为总督，派太监张永监军，率兵讨伐。他们赶到陕西时，当地镇兵游击将军仇铖等已将朱寘𫔍擒获，叛乱仅十八天便告结束。杨一清和张永便带着朱寘𫔍父子，班师回京。

行军途中的一天夜里，杨一清跟张永一同饮酒，杨一清有意地叹口气，说：

“外藩作乱容易平定，但朝廷的乱臣却难以诛灭啊！”

“杨大人这话是什么意思？”

“张公，难道你忘记了两月前的那件事吗？”

原来两个月前，刘瑾为了跟张永争权，竟矫诏把张永贬往南京，还想沿用旧例，再派人于途中刺杀他。张永连夜跑进宫去，向皇帝哭诉。朱厚照便摆宴给刘、张二人讲和。这件事让杨一清听到了，就趁机挑起张永对刘瑾的仇恨，以便除掉刘瑾。

“哼！”张永果然中计了，他愤愤地说，“刘瑾阴险毒辣，六亲不认，所以安化王才以除他为借口，兴兵作乱呢！”

“是呀，那家伙真是阴险毒辣，六亲不认，张公如果不先下手，早晚

还会吃他的大亏。”

“可是他日夜在皇帝身边，骗取了皇上欢心，而且羽翼已经养成，耳目众多，又怎么下手呢？”

“张公也是天子信任的近臣，就拿今天带兵讨贼来说吧，他不派别人，单单派张公来做监军，不足以证明吗？”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张朱宸濠声讨刘瑾的檄文来，接着说：“我们班师回来，你在向皇上报告平息宁夏叛乱时，便可将这份檄文呈给皇上。我听说刘瑾不但贪赃枉法，还图谋不轨……”

“什么？”张永打断杨一清的话，“有根据吗？”

“我听说兵仗局太监孙和给刘瑾送过甲仗，两广镇监潘牛、蔡昭给刘瑾送过弓弩。张公只要能说服皇上去抄刘瑾的家，便会找到证据。张公还要力陈由于刘瑾乱政，海内愁怨，安化王的叛乱不过是个先声，刘瑾不除，天下叛乱将接踵而起！皇上英武，必然大悟。刘瑾一除，张公即可能入掌司礼监，那时你一反刘瑾之所为，改革积弊，天下人谁能不称颂呢？”

“如果不济，又当如何？”

“别人对皇上讲，济不济未可知；但张公的话，皇上一准会信的。万一不信，你可以顿首哀泣，请死于皇上面前，愿剖心以自明。而且，”杨一清嘱咐说，“只要皇上一答应，便要立即动手，以防事缓有变。”

胜利的捷报由急使先传到北京。刘瑾见了沾沾自喜，还认为自己调遣有功，矫旨给自己增加了禄米。八月十五日，征宁夏的大军回京，献捷于东华门。文武百官向皇上祝贺。朱厚照大喜，在光禄寺赐宴。宴罢以后，百官散去，朱厚照又在后宫单召“八虎”饮酒。刘瑾见皇上一再地夸奖张永，心中不快，找个借口提前离席了。过了一些时候，其余

“六虎”也纷纷辞去，宴上只剩下张永一人陪着皇帝。这时已到夜半。张永看看已无别人，便把檄文掏出，呈给皇帝，并把杨一清教给他的一套话说了。朱厚照醉眼蒙眬，迷迷糊糊地说：

“这事明天再说，现在且喝酒！”

张永跪下，说：

“今天陛下不理这事，奴婢明天就再也见不到陛下了。”

“那么你说，刘瑾到底想干什么？”

“想取天下！”

朱厚照喝口酒，笑嘻嘻地说：

“那就让他取去吧。”

“陛下，”张永叩头哭泣，“如果让刘瑾取了天下，做了皇帝，那么陛下又如何自处呢？”

“啊！”朱厚照这才清醒过来。终于下令，让张永带人去捉刘瑾。

这时正是三更午夜，街道上寂无一人，张永带领禁兵直扑刘瑾府邸。刘瑾已经入睡，禁兵排闼而入，将刘瑾捉住，下到狱中。朱厚照念着旧情，起初不想重办，降旨贬刘瑾到南京看守孝陵。刘瑾在狱中听到消息，自我安慰地说：

“行啊！还不失当一个富太监呢！”

这时，久被刘瑾压抑的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御史听说刘瑾入狱，联合起来一同上疏，列举了刘瑾三十多条罪状，报给皇帝。那张永听信了杨一清的话，怕刘瑾将来反扑，便一劲儿撺掇皇上抄刘瑾的家。朱厚照的好玩劲头又上来了，亲自带领校尉们赶到刘瑾家中，看看到底有什么。结果抄出黄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元宝五百万锭又一

百五十八万七千八百两！宝石二斗；黄金甲胄两副；金帐钩三千对；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条。朱厚照看着这一库一库白花花的银元宝，黄灿灿的金锭，这个皇帝也不禁惊讶得舌头翘了起来，好半天放不下。

朱厚照跟在校尉后头，继续查找着。这次查出的东西越发让他惊疑了，计有绣龙袞袍八件，蟒袍四百七十件，盔甲三千套，弓弩满满地塞了两大库。还有一件东西，朱厚照瞧着挺眼熟，原来是刘瑾常常拿在手里的一把扇子。但校尉一按扇柄，“刷”的一声从扇骨里探出两把匕首。

朱厚照觉得这扇子挺有趣，接过来一边把玩一边问张永：

“你说刘瑾在扇子里藏刀干吗用？”

“陛下，他是想随时不利于您啊！”

“啊！”朱厚照惊叫一声，把手里的扇子扔了。

这次证据确凿，朱厚照也终于相信那个每天笑嘻嘻伺候他的刘瑾确实想取他的帝位而代之，于是传旨在午门外对刘瑾公开审讯。

这天，朱厚照坐在午门城楼上看着。午门下面，正中放一张公案，刑部尚书刘璟坐在案后主审，文武百官站在两旁观审。锦衣卫的禁卒把刘瑾押了上来。但那刘璟，平素让刘瑾吓怕了，如今虽然见刘瑾披枷戴锁，也还是嘴唇一劲儿哆嗦，竟问不出话来。那刘瑾见自己的余威竟这么厉害，得意地大声说：

“满朝公卿都出在我的门下，谁有资格来问我！”

刑部和大理寺的官员，职务本是审案的，但却都面面相觑，谁也不肯向前。这时驸马都尉蔡震走过来，他一把推开刘璟，坐到案后正中的位子上，大声说：

“我是国戚（英宗的三女淳安公主，下嫁蔡震），不出在你的门下，



我可以问你。你先给我跪下！”

刘瑾不肯跪，蔡震吩咐禁卒：

“打他二十个嘴巴，看他跪不跪！”

一个粗壮的禁卒走过来，抡起胳膊，“啪啪”地朝刘瑾脸上打去。

眼看刘瑾的嘴巴红了，肿了，“扑通”一声，双膝跪到地上。

“刘瑾，我来问你，你家里藏那么多兵甲，干什么用？”

“那是为了保卫皇上。”

“既是保卫皇上的，为什么藏在你的家中？”

刘瑾的嘴巴张了两张，无话可答。朱厚照在门楼上看得清楚，下旨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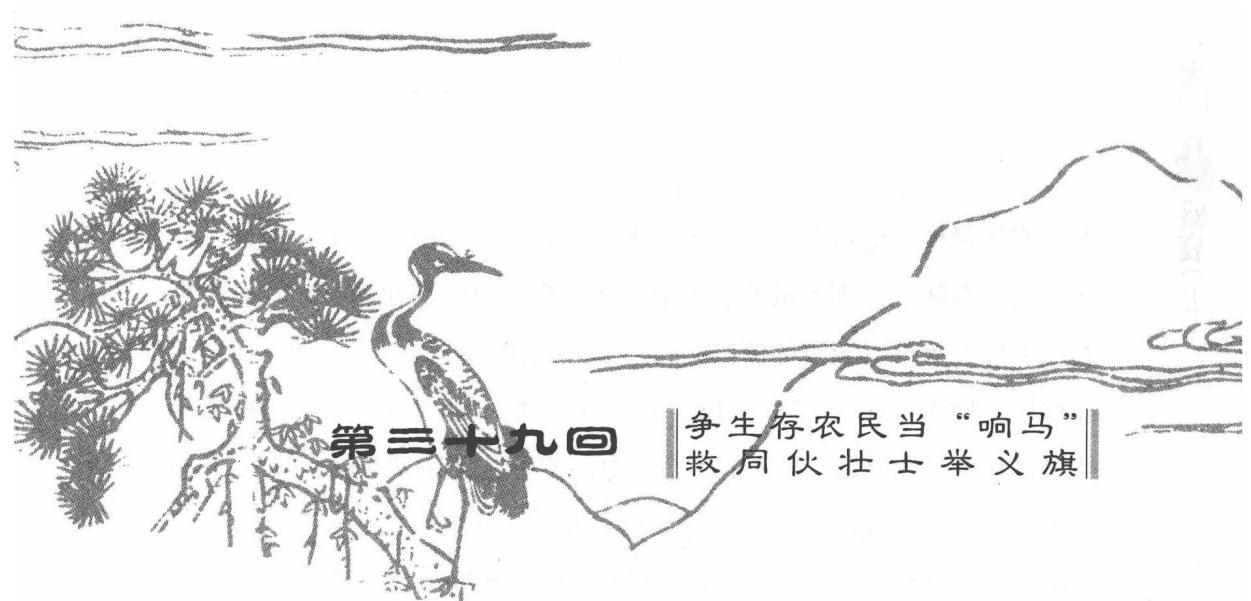
“别问了，把他凌迟处死！”

刘瑾横行了五年，终于被刀斧手绑到大街上，一刀一刀地零碎剐了。聚在旁边观看的老百姓，人心大快，争着买刘瑾的肉，刀斧手就一条卖一枚钱，发了一笔小财。

刘瑾的亲属十五人，还有他的死党都被斩首。他挟私提拔的大臣，有的降，有的革。跟他有过来往的人也都受到牵连，包括前文提到过的康海。

至于揭讨刘瑾一案中的“功臣”，当然首推太监张永了。张永果然接替刘瑾，当上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他的哥哥张富封为泰安伯，弟弟张容封为安定伯。别的几“虎”看着眼红，也说自己有“功”，向皇帝讨封，于是魏彬的弟弟魏英做了镇安伯，马永成的弟弟马山做了平凉伯，谷大用的弟弟谷大玘做了永清伯。“七虎”皆大欢喜。

不过真“八虎”虽然变成“七虎”，但朝政仍由他们把持，那一系列迫害民众的政策并没有变。百姓们忍无可忍，各地陆续燃起起义的烽火。



### 第三十九回

争生存农民当“响马”  
救同伙壮士举义旗

说起明代的农民起义，最早的便是永乐十八年的唐赛儿白莲军了。仁、宣二朝，因政治比较清明，社会也相应安定。等英宗朱祁镇当了皇帝，他宠信宦官，任王振专权纳贿，迫害百姓，地方上也滋生了许多贪官污吏，致使农民无法生存，只好铤而走险，举起义旗来反抗朝廷。正统一朝，先后便有大藤峡地区瑶、壮族人民起义，福建的叶宗留矿工起义和邓茂七农民起义。宪宗成化年间，荆襄地区更爆发了大规模的流民起义，从成化元年到七年，这场起义前仆后继，竟延续了六年多的时间。

这些起义都因被官军残酷镇压而失败了，有多少农民惨遭杀害，但反抗的火种却在人民群众中保留着。正德四年，两广、江西、湖广、四川等地，都先后爆发了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就在这时，在京师脚下的畿南地区，也出现了农民起义的队伍，那便是有名的“河北响马盗”。

这里所说的“河北”，是泛指黄河以北的山东、山西及京师直辖地区（今河北省一带，当时称“北直隶”）。那时京畿附近的田地多为皇帝和贵族、勋戚、宦官等霸占，正德四年时，皇帝便在北京郊区拥有皇庄二十

处。连同贵族、宦官等所占庄田，大略统计有三百三十二处，占地三百多万亩。军队也占据大量的屯田地，光在霸州（今河北霸县）几县占据农民土地改为草场放牧的便有七百万亩。农民不但失去了土地，还要代养官马。朝廷专有一个管马的衙门叫“太仆寺”，听命于兵部。战时提供战马，和平时期则负责马匹的繁殖，办法便是在民间“寄牧、孳牧”。当时太仆寺派官分驻在山东、京师各地，发给民间养马户一部分种马，规定按期上交马驹。种马病了、死了都要赔偿，繁殖达不到定额则要罚款。正德年间，只顺天府（相当于今北京市及河北北部的部分地区）一地，便有养马户四五万户。农民被夺走了土地，无处耕种，连吃的也没有，又用什么来养马呢？官府却又趁机敲诈勒索，百般榨取。农民无法生存，只好把代养的官马骑上，当了绿林好汉。这就是“响马盗”的由来。

顺天府霸州文安县（今河北文安）有姓刘的弟兄二人，哥哥刘宠，弟弟刘宸。古代风俗，大多以堂兄弟来排列长幼，刘宠排在第六，所以又称刘六，刘宸便是刘七。二刘家中是养马户。就在正德四年，他家该上交两匹马驹。但马驹却因病死了。秋天交不上驹子，文安县的差役来抄二刘的家。刘七性情暴躁，惹急了，拔出钢刀，把差役劈了一个，其余的打不过刘家弟兄，跑回县里去搬兵。

事情闹大，刘六只好把母亲、妻子送到山里的姐姐家去，回来和弟弟当上了“响马”。他们还有个好朋友，名叫杨虎，三人一起去投奔当地的盗首张茂。张茂家里有重楼复壁，许多深窖，是个坐地分赃的绿林大盗。听说二刘和杨虎来投，十分高兴，因为这二刘一杨武艺高强，在霸州一带十分有名。张茂手下还有齐彦名、李隆等人。这些人聚在一起，劫富济贫，患难与共，慢慢地便有更多的破产农民，特别是养马户跑来

投奔，声势越来越大。

这些养马农民，从小就习于骑马驰骤，个个骑术精通。而河北一带民俗尚武，差不多人人都会点儿武艺。他们几十人为一小队，打听到有什么巨官豪绅从某处经过，便在路上拦截。他们的马颈上都拴着响铃，跑起来“哗啦啦”响成一片，所以称为“响马”。抢劫时往往先派出两骑，追上对方，放出一支响箭示警，后边大队接着便跟了上来。那时几十匹奔马急驰而至，铁蹄践起黄云似的尘土，马蹄声夹着响铃声，交织着似隆隆而过的惊雷，霎时便扑到跟前。即便巨官豪绅带着保镖卫土，也抵不住这些亡命的农民。巨官豪绅只好乖乖地献出金银财宝。如是有民愤的贪官恶霸，说不定颈上还要挨上一刀。响马们把财物带好，头目一声呼哨，马铃响处，好汉们转瞬间便跑得无影无踪了。

“响马”们劫来的财物就藏在张茂家里，谁用钱时自可来取，有时还要救济穷人。他们这样劫富济贫，横行无忌，致使有一段时间，畿南一带巨官豪绅们竟不敢外出了。这自然要引起朝廷的注意，刘瑾便派金都御史宁果到畿南征剿。

宁果住在真定，派驻守河间的参将袁彪带兵到了霸州。现在正规军来了，散骑游勇式的“响马”打不过他们，连吃了几次亏。

张茂坐地分赃，但外表却像个大富商。他的邻居有一个叫张忠的太监，外号叫“北坟张”，是刘瑾手下的红人。张茂去和他认了同宗，结为兄弟。有时张忠回北京上班，张茂还要跟了去，就住在张忠家里，由张忠家里的人陪他逛大街。他锦衣华服，谁也看不出是个江洋大盗。他还要带上些抢来的珠宝，让张忠介绍结识了“八虎”中的马永成、谷大用等有势力的太监。他甚至还敢跟张忠家的人混进“豹房”去，看正德皇

帝朱厚照和宫女们蹴鞠(cù jū 醋居) (一种古老的足球)。

现在，袁彪带兵来了，张茂因部下几次失手，便向张忠求救。张忠派人把袁彪请了来，摆上酒宴，自己正中坐了，叫张茂和袁彪坐在东西两侧。他先不给二人介绍，等酒过三巡，张忠举起杯来，对袁彪说：

“袁将军，这是我的兄弟张茂，希望今后好好相看。”

袁彪拱手，说：

“不敢！”

张忠又对张茂说：

“袁将军是哥哥的好朋友，今后也就是你的好朋友。既然相好，以后你就不要再去打扰河间了。”

袁彪一听，这才知道同席的便是“响马”头子。但他畏惧张忠的势力，只好默认下来，不久，便带兵回河间去了。

宁果听到点儿风声，自己来到霸州。正赶上张茂庆贺五十寿辰，大宴宾客。宁果部下的巡捕李主簿化装成弹琵琶的艺人，混进张家，侦察了张家的前后院落和地理位置，当天晚上，宾客们散去之后，张茂正在熟睡，宁果带领一百名健卒突然袭进张家。张茂从睡梦中惊醒，仓皇迎敌，被斧子砍伤左腿，终于被擒。宁果又把张茂家的复壁和深窖找到，将藏的赃物一起解走。

宁果知道张茂是有名的大盗，想解到北京去请功，又怕别的“响马”来把张茂劫回，便想出一个主意，他让十名亲信押着张茂送往北京，自己却带着同张茂一起捕获的十几名盗伙返回文安县。第二天，刘六、刘七、齐彦名等听到张茂失手的消息，又听说大队官军押人回到文安，他们急忙往文安县的方向追趕。等到了县城再细一打听，张茂不在这里，

被送往北京去了。

刘六把齐彦名留在县城，搭救那十几个弟兄，他跟刘七、杨虎却去往北京，想办法救张茂。他们来到京城，把带的人安排在城外住下，三个人找到张忠的家，把张茂被宁果擒获的经过向张忠讲了，请张忠想办法把张茂救出来。张忠答应了。刘六等三人便暂时住在张忠家里。

太监张忠以前和张茂交好，是因为张茂常常把抢劫来的珍玩送给他。如今听说张茂的家已被宁果抄了，便对救张茂的事不热心，只是敷敷衍衍。但他也不愿意得罪刘六等人，因为他的家就在文安县，怕惹了这伙人会去他家报复。于是救张茂的事情便拖下来。张忠也不撵他们，只等他们最后没办法时自己离开。

日子一天天过去。刘六果然等得焦急了，他去找张忠，问他说：

“张公公，我家张大哥的事情到底怎样了？”

张忠一面抹着鼻烟一面说：

“老六，你不要焦急，我已经打听到了彦实（张茂的字）的下落，是在锦衣卫狱里，锦衣卫是诏狱，那就是说，这件事连皇上也知道了，不好办啊！”

“张公公，我知道现在朝廷是刘瑾主事。您去跟他说，只要他肯放了张茂大哥，我们全体向官家投降！”

“你说话算数？”

“那是当然！我虽是粗人，但是江湖上也稍有名气，我说话从不反悔！”

“那好，我明天去找马永成，跟他一起去见刘公公。”

第二天晚上，张忠回来了，对刘六说：

“刘公公倒是答应了，可是他要两万两银子。”

“什么，两万两？”

“对！他的家人贾桂还要一万两呢！”

“三万两银子，”刘六摇摇头，说：“我上哪儿去弄三万两银子？”

是呀，刘六等人是被逼得没办法才落草的，如果他能有三万两银子，又何必去当强盗呢？他回来对弟弟和杨虎说了，他们愁得饭也吃不下。杨虎这人比较粗鲁，他寻思一般大户人家不会有这么多的银子，只有官府的金库里可能有。他也不跟刘六商量，自己跑到城外去，会合了留在城外的十几个弟兄，夜间带着他们去抢一家官署。什么衙门也没弄清楚，结果闯进了太医院。一看到处都是药材，哪里有什么金银！杨虎一生气，点把火将太医院烧了。结果锦衣卫校尉和顺天府的捕快到处搜捕。刘六看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不但救人无望，弄得不好，说不定他们几个还会落进网里，只好离开北京，回文安县去了。

他们走了几天，刚刚进入文安县境，就见路口挂着他哥俩和杨虎的画像，原来是官府悬赏捉拿。又听说他刘、杨两家的家也被抄了，刘六和杨虎的妻儿老小都被押入文安狱中。接着又得噩耗，同伙齐彦名劫狱不成，逃回安肃（今河北徐水）老家，被县里的捕快擒获入狱，这接二连三的打击逼得刘六、刘七和杨虎走投无路。

那天晚上，苦风凄雨，他们十几个从北京回来的“响马”聚在一座古庙里，个个垂头丧气，不知怎么办才好。其中一个年岁大一点儿的说：

“要不，咱散伙吧，回家抱孩子去。”

“那官府捉你呢？”刘七瞪起眼来问。

“那也没法子，听天由命呗！”



“糙！像你这种熊包，咋啦？关进大狱去还会让你囫囵喽？你趁早死了这份心！依我说，咱给他来个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反正七尺高这么一块，不能白白扔给他！”

刘七慷慨地这么一嚷，大伙揪紧的心都急剧地跃动起来，杨虎头一个跳起来赞成。他说：

“咱就这么干啦！只是咱张大哥不在，蛇无头不行，咱得选个打头的。叫我说，就叫咱六哥打头行不行？”

大伙同声赞同。刘七也提出来，让杨虎当副头领。就这样，这伙濒于绝境的农民又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子，他们的马铃铛又在畿南地区的大道上响起来了。

那时卫、所空虚，卫、所军战斗力不强，能够跟“响马”周旋的主要是宁果率领的军队。不久，刘瑾事败。那宁果是刘瑾提拔的，也被劾罢职，他手下不少养马户出身的健卒反投了“响马”。刘、杨的队伍壮大起来，终于决定正式举起义旗，大张旗鼓地造反。

正德六年（1511年）春正月，刘六率起义军攻安肃县城，准备搭救同伙齐彦名。起义军七百人全是马队，他们行动飘忽，地方官无法侦知起义军的踪迹，他们在给上级衙门的报告里说，“响马一昼夜驰数百里”，“倏忽来去，势如风雨。”安肃县就是这样被攻占的。那天夜里，起义军在夜色掩护下，悄悄来到离城三十里的一处洼地，隐蔽下来。黎明时分，县城的城门刚刚打开，就见城外大道上和野地里一片尘土飞扬，黑压压的马队一拥而来。当先一骑正是刘七。这年方二十岁的小伙子喊声如雷，一边驱马一边弯弓，“吱溜溜”一支响箭带着哨音飞上城楼。城楼上的把总吓得屁滚尿流，只顾逃命，也不下令去关城门。守门军卒

便也四散奔逃。霎时间，城里大街的石板路上就响起雷鸣般的马蹄声了。

义军奇袭成功，首先打开监狱，放出同伙齐彦名和所有犯人。又打开县库，把所有的金银掠走，将粮食分给穷苦百姓。居民们听说是刘家弟兄来了，纷纷到大街上迎接。只有那些大户人家吓得关门闭户，东藏西躲。义军并不去骚扰寻常富户，只去寻那些做官的和为富不仁的劣绅们的晦气，抢了财产不说，还根据他们的民愤大小给以惩罚。一时人心大快，欢声载道。不少贫家子弟要求参加义军。刘六对大家讲明白，义军里只有骑兵，因此，有马的便予收留，没马的则婉言劝退了。

这样一来，安肃城里的马匹几乎一扫而空，全被青年们骑去参加了义军。还有四乡的养马户，不少人骑上官府逼他们饲养的军马，跑来当上了“响马军”。两天时间竟聚集起了两千多人。刘六把大队分成几个小队，分派了大小头目。下一步的计划，便是攻打文安县城，救出他们的同伙和亲属了。



## 第四十回

助义军赵秀才仗义  
主安抚马都堂殒身

安肃通向文安的大道上，有个赵庄。庄上住着个秀才，姓赵名燧（suì 碎）。他有勇力，好任侠，自负是文武全才，常常在众人面前说大话，人们便叫他“赵疯子”。他不以为忤（wǔ 午），欣然接受，只是把“疯”字改成“风”，以“赵风子”自称。在文安一带也有点儿名气。

有一天，赵燧听到消息，打下安肃的“响马”要从这儿经过。他不知道“响马”的来历，决定带着家人出去躲一躲。

他们一家人迤逦行来，遇到了一条河。赵风子走到前边，刚刚渡到中流，“响马”军的前哨五骑已经赶到了，把赵妻截在岸上。赵风子一见便大吼一声，从河中奔回岸上，与一名“响马”打了起来。赵风子不是空说大话，还确实有点儿本领，他赤手空拳，一把攥住那名“响马”的枪杆，顺手就把马上的骑士拽了下来。这时，另一名“响马”举刀砍他的后颈。他手里夺得的长枪朝后一磕，将刀磕飞，又把这名“响马”也打下马来。

现在，三个人都在地下了。两个“响马”没了兵器，便摆出摔跤的架势，一左一右晃着胳膊向赵风子进攻。赵风子把枪一扔，也绕着圈儿

跟这两人摔扑，两人不是他的对手，被他接连地摔进河里。另外三个“响马”呐喊着举着兵器准备一拥而上。这时一匹高大的白马“泼辣辣”跑来，马上的骑士乃是刘七。刘七最爱摔跤，看到赵风子摆的架子，便跳下马来喊道：

“别打，别打，让我来摔一跤！”

那三个“响马”去搭救被赵风子扔进河里的同伴去了。这边刘七跟赵风子使出摔跤的功夫，在河边摔打跌扑起来。赵风子虽然能够勉强抵住，但他年纪大了些，怎敌得刘七正在年轻力壮，不一会儿，终于被刘七摔倒了。

赵风子爬起来，往手心吐口唾沫，一边往前扑一边骂道：

“你们这伙蠢贼，敢把风子爷爷怎样？”

这时刘六带着大队赶到，听赵风子这么说，连忙下马问道：

“尊驾自称‘风子’，莫不是赵秀才吗？”

“是又怎样？”

“失敬，失敬！”刘六连连拱手，对刘七说，“小七，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赵燧先生。”

刘七也笑着拱手，赔礼说：

“方才不认识赵先生，失礼了。”

“哈哈哈！”赵风子是个爽快人，他乐了，“你小伙子也就仗着年轻吧，咱要是你那个岁数，你准不是咱的对手！”

“是嘛！”刘七笑着说，“方才是您让着我哪！”

“哈哈哈！”赵风子忽然一怔，问道，“这一位叫你‘小七’，莫非你就是刘七吧？”

“正是在下。”

“嗬，怨不得的。那么这位想必是刘六了。败在你兄弟手下，我不丢人，不丢人！”

刘六让战士们休息，他跟赵风子坐在河边，讲起了他们养马户的苦处。赵风子虽然算个富户，但很有正义感，平时也对官府不满，便答应参加义军。不久，他便带着兄弟赵鐸(fán 凡)、赵镐和五百名同乡青年，在河间跟义军会合，同举起义旗。

义军声势越来越大，攻下文安后，转着弯儿杀去，回旋在“河北”广大地区。所至之处，势如破竹。地方官不是开城纳款便是望风而逃。明廷震惊，派指挥同知李瑾率一千名驻防北京的京军去讨伐。那李瑾在义军屁股后头，远远跟着。有句成语叫“望风捕影”，他却连义军的影子也不敢看到。

从正德六年的正月到三月，三个月的时间，义军便像一阵旋风那样，在博野、饶阳、南宫、无极、东明、滨州、临朐、临淄、昌乐、日照、蒲台、武城、阳信、泰安等州县畅行无阻，还攻下了孔子的老家曲阜。义军在孔庙的大成宝殿里养马，把孔夫子的牌位扔到一边。

可惜义军起初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他们只是为反抗而反抗，提出的也仅仅是“替天行道”、“劫富济贫”这样的绿林口号。攻下城池后开仓分粮，没收县库，然后就又离开。因而，始终也没建立起一个巩固的根据地。

明廷看义军声势日渐壮大，感到威胁，前都御史、现任吏部尚书的杨一清便建议派惠安伯张伟任总兵官，让那《中山狼传》的作者都御史马中锡提督军务，拨给他们京营军两万人，南下征剿。

刘六、刘七跟杨虎、赵风子商议，为了分散敌人的兵力，决定分成两队，一队由刘氏弟兄带领，一队由杨虎和赵风子带领，一东一西，既分兵又呼应，牵制官军。刘六、刘七和齐彦名一队，首先攻掠山东，接着又进入河南，更南下抵达湖广、江西两省地区，然后仍由原路杀回，回到霸州。几个月的时间，转战数千里。他们依然保持“响马”本色，全队都是骑兵，占了城郭也不居住，夜间仍然回到野外扎营。一闻警报，上马就走，倏忽之间便不知去向。

刘六、刘七回到文安故乡，想稍作休整，便让齐彦名带大队隐匿起来，弟兄三人和几名亲随弟兄回了村子。那时他们的亲人早已被官府杀害了。二人去祭扫了祖坟，看看故居虽然残破，但还可以住宿，便打算住一夜再走。不想行踪不密，被村里的一个地主看到了。他连夜跑进县里，向官府报告。知县派指挥桑玉率兵来捉。拂晓时，官军包围了刘家。刘六、刘七和弟兄们翻越房顶逃跑，官兵在下边尾追堵截。一时箭如飞蝗似的向房上射来。刘六等无法抵抗，只好躲进一家地主的小楼里。这时天已大亮，刘六朝楼窗外一望，只见外面是一层层的官兵，虽看不出究竟有多少，但那要他们投降的喊声却也震耳欲聋。在这样的包围圈里，凭他们十来个人硬闯是闯不出来了。刘六对刘七说：

“小七，咱们宁死不辱，横刀自刎吧！”

“不？”刘七一挥大刀，“临死也要杀他几个来垫背！”说着便要从楼窗里往外跳。这时忽然听得村外像刮大风一样，传来“呼——呼——”的喊声。于是刘七也扯着嗓子大喊：

“呼——”

原来这是义军的联络信号。果然，那齐彦名一马当先，大刀飞舞，

从村外冲杀过来。后边是密麻麻的马队。官兵的包围圈动摇了。刘六等人又从楼窗里朝外射箭，接着跳下楼去，跟官兵拼杀。官军阻挡不住，纷纷逃避，眼看着刘六、刘七在齐彦名的接应下，扬长而去了。

桑玉功败垂成，只好整顿队伍，耷拉着脑袋收兵回城。不想半路上刘六等又追了上来。马队冲入官军行列中，一阵大杀大砍，官军损折了不少，好不容易才退回城去。

这时，另一股义军在杨虎和赵风子率领下，从河南转入山西。杨虎作战勇猛，赵风子颇有智谋，两个人合作，相得益彰，纵横几千里，所向披靡。义军打起仗来，骑兵散漫开像潮水一般，直陷敌阵，个个骁勇。他们一边跟官军打仗，一边还相顾笑乐，根本不把官军放在眼里。有时官军太多，他们便迅速转移，忽东忽西，官军多次扑空，只能望着义军马队扬起的征尘兴叹。

东西两路义军，在河南武安（当时属河南省，今属河北）会师，稍事休整。刘七忽然异想天开，提议说：

“咱们索性去攻北京吧，怎样？”

“北京是皇帝小儿的老窝，他的防备能不紧吗？”杨虎提出了疑问。

“不，”赵风子赞同刘七的意见，说，“就是攻不下，也让那小皇帝把尿撒到裤裆里，叫他做梦也不安稳。”

“对，”刘六点点头，“吓唬他一下也好，让他知道老百姓不会拱手受他的欺负。”

计议已定，义军合师北上，直逼京城。正德皇帝朱厚照果然吓得要死，连想打猎也不敢出城了。兵部尚书何鉴上个月就檄调边兵，这时宣府副总兵许泰、游击郤永，大同总兵张俊、游击江彬，延顺副总兵冯顺

等，率边兵来援，先后抵达京师。此时官军已集聚了三部军力，一是各地卫、所的驻军，二是北京派出的京军，三是各边镇调来的边兵。论起战斗力来，三军中边兵最强，因为他们镇守边关，时时跟来扰的鞑靼、瓦剌和兀良哈部作战，有一定的作战经验，而且骑兵也多。三部官军组成一个防御网，捍卫着北京。即使这样，北京也宣布戒严，居民夜间不准外出。

义军打到信安镇（在天津以西），看看再向北京进攻已不可能，便折向东边的天津卫，继而又分兵南下，一去山东，一去河南。

东路刘六、刘七，在德州与都御史马中锡的官军遭遇。马中锡是个文官，他的家乡故城（今河北故城）农村也有养马户，他深知穷苦农民所受的盘剥，所以极力主张招抚。而张伟则是个纨绔子弟，是继承父亲的爵位当了惠安伯的，他害怕打仗。所以马中锡曾传檄各路驻军：“刘六等经过，所在官司不许拘捕，与供饮食。若听抚，待以不死。”刘六听说后，将信将疑。所以此次两军在德州桑儿园相遇，并没马上交战，只是相隔五里，各据营垒，遥遥对峙。

过了一天，马中锡只带几名亲兵，骑马来到义军大营。刘六、刘七听说后，急忙出营迎接，把马中锡请到中军大帐。稍事寒暄后，马中锡开门见山地说：

“以前奸阉刘瑾乱政，民不聊生，这些情形本都堂俱都知道。现在刘瑾业已授首，朝廷抚恤生民，力革弊政，壮士等是不是也该为自己的前途想一想呢？”

刘六回答说：

“小民等原是农夫，只为养马而横遭迫害，势逼无奈才只得走上这条

道路。如今已成骑虎，恐怕难下了。”

“不然，迷途知返，犹未晚也！本都堂体上天好生之德，只要壮士们肯于就抚，我愿奏明皇上，力保壮士们的身家性命。”

“哼哼！”刘七在一旁冷笑说，“大人的好心咱是知道的，可是别看您老人是都察院二品都御史，您讲话顶用吗？”

刘六见刘七说话粗鲁，便呵止他：

“小七，大人面前，不要乱讲！”

“本来嘛！”刘七小声嘟哝。

“马大人，”刘六向马中锡拱手道歉，“七弟从小野性难驯，冲撞大人，请莫见怪。”

“不妨，不妨！”马中锡摇摇手，说：“我苦口婆心，只为是怜惜无辜生灵，横遭战乱，心中不忍罢了。壮士试想，你等如此东流西窜，终日不得安生，长此下去，又如何是个了局呢？”

“是呀，”刘六叹息说，“前途茫茫，也只能过一天算一天了。”

“不过，”刘七又扬臂说，“只要活一天，也不能叫那些贪官污吏们安生！”

马中锡诚恳地说：

“本都堂回营后，立刻修本奏明圣上，招安壮士，让壮士们回到原籍，并请朝廷减轻负担，使你等得以各安生业。”

“多谢大人！”刘六又拱拱手。

“马大人，”刘七再次提出，“如今朝廷里虽然没了刘瑾，但那‘七虎’还在呀！只要坏蛋在位，到头来就怕马大人您白费心啦！”

“小七不要多讲，不管将来如何，马大人的一片好心我们是要领情

的。”

“那是自然！”刘七笑笑说，“咱刘七是个浑小子，说话不知道个分寸，马大人别生我的气，我这儿给您作揖啦！”

马中锡回营后，果然上疏，请朝廷对刘六、刘七等准予招抚。这边刘六也暗中派人，到京城打探消息。过了几天，探子回来报说，马中锡的疏文已经驳回了，还责令他即日攻击义军，不得违误。同时更派大同游击将军江彬带边兵来协助他。刘六不愿跟马中锡对阵，便连夜拔寨而起，悄悄离开了。

刘六率义军离开德州，攻占了故城。故城是马中锡的老家。刘六命令义军，任何人不得进入马府，有拿马家一草一木的军法严惩。这也是刘六感激马中锡的一番心意，才有意保护他家，作为报答。

刘六是一片好心，但却把马中锡害了。兵部尚书何鑒因马中锡不肯积极进剿，便上疏弹劾他，说他“拥兵自重，纵贼不战”，以致“玩寇殃民”，并把义军攻下故城后不肯焚掠他家作为证明。于是马中锡和张伟都被逮捕回京。结果，马中锡被下到锦衣卫狱中，不久便被处死。那张伟也被革去爵位，回家闲居了。

义军继续南下，远离北京。皇帝朱厚照又可以出城打猎了。他看城外驻屯的边兵，军威甚盛，便对身边陪着的太监谷大用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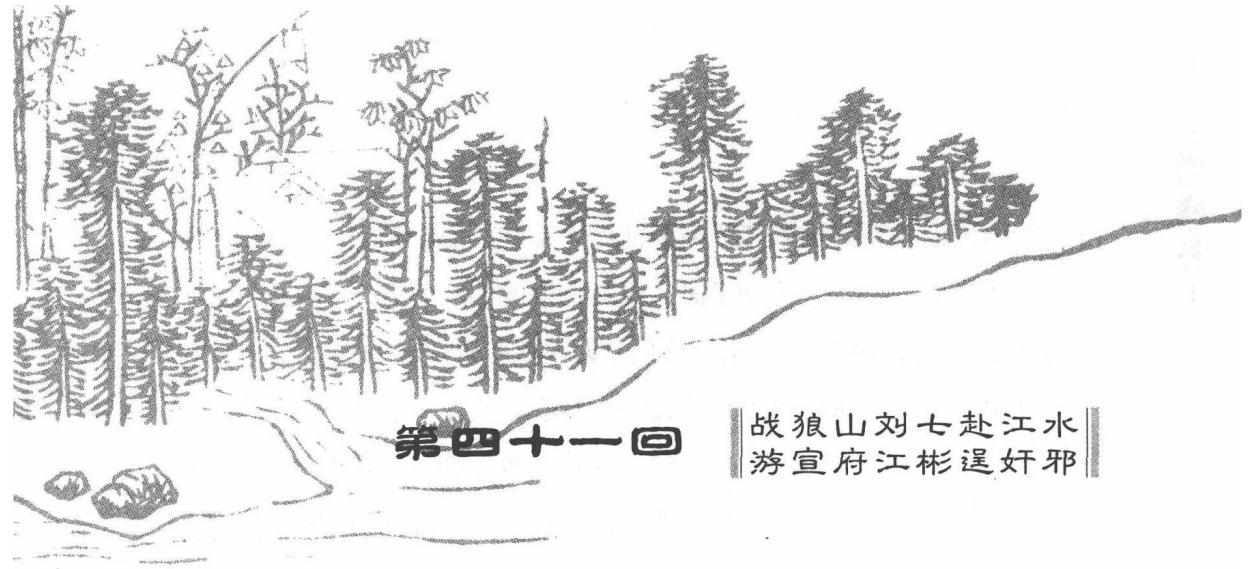
“看起来边兵是比京营里那些兵油子强多了。刘六、刘七有消息吗？”

“听说正在鲁、豫一带骚扰。”

“这些坏东西，前几天闹得朕猎都打不成，我恨死了他们。这样吧，朕把边兵统统交给你，听你调派，非把那伙马贼全消灭了不可！”

“奴婢遵旨。”

于是，太监谷大用总督军务，任兵部侍郎陆定为监军，率领各地来京的边兵南下追剿义军。这时地方、京营、边兵三军合流，撒开一张大网，向义军围了过来。官军的人数超过义军几十倍。形势对义军越来越不利了。



## 第四十一回

|| 战狼山刘七赴江水  
游宣府江彬逞奸邪 ||

进入八月，官军和义军频繁交战。官军人数太多，义军只好继续往南退却。十月，刘六等抵达济宁。这时正好有漕船向北京运粮，停泊在济宁城外的运河上。义军便去攻打漕船。督运参将战败逃走了，漕兵也溃散了，只捉住运粮官户部主事王宠。刘六听船工们讲这个王宠是个清官，从不克扣贪污，便又把他放了。义军把漕粮运到岸上，让济宁城中的百姓出来搬取。但守将不许百姓出城。刘七火气上来，放把火将一千一百一十八船粮食统统烧掉。

西路义军连续攻下淮安、灵璧、虹县、永城、虞城、夏邑等地，俘获了淮安知府、灵璧和虞城两县的知县，后来又都放掉。十一月，杨虎在河南夏邑县白龙王庙驻扎。在他带领九骑渡过小黄河时，遭到武平卫百户夏时的伏击。船只沉没，杨虎因不会游泳，牺牲在水中。

义军在赵风子主持下，共推杨虎的结义弟兄刘惠（又名刘三）为这股义军的领袖。这时的赵秀才，经过战争的实践锻炼，又研究了历史上农民起义军的成败经验，终于明白了起义军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才能争取更多的民众。于是一改过去“响马”式的军事结构，而组成二

十八个营的正规军。推刘三为奉天征讨大元帅，自任副元帅。重新严申军纪，不许妄杀，不许抢劫平民，更不许侮辱妇女。有一个义军头目攻占县衙后抢去县令的小妾，被发现后立即在军前斩首。

义军还在队列前树起两面大旗，上写着：“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这是继承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时的口号，证明起义军已从单纯的反抗压迫，进而决心推翻明朝的腐朽统治了。

有个叫孙磐的都督佥事写信给赵风子，说他出身斯文，不应跟盗贼为伍，劝他改邪归正，归降朝廷。赵风子回信说：“群奸在朝，浊乱海内，诛杀谏臣，屏斥元老。如皇上独断，枭群奸之首以谢天下，那时可再斩臣之首以谢群奸！”他竟愿意拿自己的脑袋去和“群奸”交换，又是何等的激昂慷慨，大义凛然！

正德七年二月，赵风子部已有步卒十三万人，骑兵五千了。义军攻破河南泌阳。泌阳是刘瑾死党大学士焦芳的老家。刘瑾事败后，焦芳被革职回家。他听说义军杀来，吓得老早就躲藏起来了。义军破城后，没有捉到焦芳，便将他家的祖坟掘开，把骨殖扔掉。又将焦芳做官时穿的官服挂在庭院的树上，召大众来看。赵风子历数了焦芳的罪恶后，拔出剑来将焦芳的衣服斩碎，说：

“我手诛焦贼，以谢天下受他害的百姓！”

他还下令将焦芳的家产分给穷人，然后把焦芳的房子烧掉。

义军围住了钧州（今河南禹县）。赵风子听说已故的忠直大臣、吏部尚书马文升是钧州人，家住城里，便撤围而去。可见，义军对忠、奸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

正德七年，朝廷又把辽东、榆林两镇的边兵也调进关来，参与对义军的镇压。闰五月，赵风子率领的义军与官军在河南南召大战。义军寡不敌众，全军溃败。刘三被流矢射中左目，无法作战，只好纵火自焚。义军其他将领，或阵亡或被擒。那赵风子杀出重围，自己削去头发，化装成和尚，准备去找刘六、刘七。途中被官军识破，将其拿住。

赵风子和被俘义军将领三十七人，槛送北京。赵风子等六员主将被皇帝朱厚照判处剥皮之刑。朱厚照还将人皮披在他的马鞍上，经常骑乘着，以发泄他的仇恨。其余将领则都处磔刑。

杨虎、赵风子这一股义军被官军消灭了，官军全部集中到东线上来，围攻刘六率领的义军。在一处名叫嵩浅坡的地方，义军和宣府、大同的铁骑遭遇。大同游击江彬一马当先，直向义军扑来。刘七弯弓搭箭，瞄准了一箭射去，射中了江彬的右腮。箭头撞碎了江彬的四颗大牙，在他脑后露出箭簇。那江彬实在凶狠，他拔出箭来，扔掉后挥刀复战。这时各处的官军纷纷赶来，义军陷入重围。那刘六挥舞长刀，大声呼喝，目眦俱裂。官军挡着的非死即伤。刘七和齐彦名在后边掩护，终于冲出了官军的重重包围。但刘六回头看时，跟着他突围而出的义军却仅剩下三百余骑。

刘六等想北去塞外，但北边各关口都被严密封锁，只好又折回头来南行，辗转地来到湖广。明时的“湖广”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两省。这里多是江河湖泊，骑马很不方便，义军只得弃马登舟。但北方的义军长于骑战，却多不识水性。在一次战斗中，刘六不慎中箭，他不愿做官军俘虏，投江自杀。

刘七和齐彦名继续战斗，沿大江又聚集起当地的农民七百余人，声

势稍稍恢复。他们从湖广乘船沿大江（即长江）东下，船过芜湖的时候，官军水师都弃舟上岸，不敢迎战。义军在江上纵横往来，劫掠官船。曾三次从水上经过南京，竟无人敢挡。

当年七月，义军来到大江下游。刘七和齐彦名商议，准备弃舟登陆，经扬州、淮安等地，再返山东。但这时官军已在江北云集，无法通过，义军只好再回船中。

官军把大江的入海口也封锁了。但义军临危不惧，首先攻入常州，杀了常州知府李嵩。回头又陷江阴，将县丞余凌云处死。李、余二人都是民愤甚大的贪官，所以义军才将他们处决，来给当地百姓报仇申冤。

八月，义军屯在通州（又称南通州，以与北京郊区的通州区别，即今南通市）城南的狼山脚下。这时义军仅有众六百，船三十艘。不料一天夜里突然刮起台风，船只半数被毁。而北方人也不习惯船只的颠簸，义军个个呕吐得筋疲力尽。官军水师又派出水鬼，在水下把剩余的船只凿沉。义军只好上岸，登上狼山。

狼山紧靠大江，险峻高耸。义军刚到山顶，辽东、大同、宣府三镇的边兵便把狼山围住了。天明以后，官军从三面向山上进攻。义军在山顶凭着古堡旧壕，坚决抵抗。官军在半山放起火来，然后随着火势朝山上攻打。辽东副总兵刘晖带来一个火铳营，这营的官兵左手执着盾牌，抵挡义军从山上射下的弩箭和扔下的石块；右手则执着火铳，频频施放。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古堡已被火焰包围。义军冲出火网，在山巅峰麓与官军死战。官军越上越多，有时竟是几十名官军攒击一名义军，许多义军英勇战死了。齐彦名在山坡上被火铳击中，掉下悬崖。最后义军只剩下刘七一人。这年轻的战士且战且退，顺小路奔上绝顶。这儿到处是

巉岩巨石，只有一条窄路可通；背后凌空几十丈的下面，便是奔腾的大江。

刘七站在山路尽头，满身血迹，横刀微笑。他明白地知道，死亡的时刻已经到了，但他毫不畏惧，他要战斗到最后一息。官军蜂拥而来，但山路仅容一人通过，他们只好麇集在下面的坡上。一员将官舞着长枪冲了上来。刘七等他来到跟前，突然一声大喝，就在那将官一怔的工夫，刘七的长刀已“刷”地砍下，眼看那将官溅着鲜血，“咕噜噜”顺山道又滚回去了。

刘晖冲他部下的火器军大叫：

“把火力集中起来，给我打！”

刘七知道如果官军一齐放铳，那是无法抗拒的。他又一次抬头，对晴朗的天空、洁白的浮云和青青的山峦，看了最后一眼，突然把手中的长刀朝下边呼喊指挥的一员将官飞去，眼见长刀插进那将官的前胸，他这才“哈哈哈”一阵狂笑。就在四山的回声当中，他转身一跃，宛如一只黑色的燕子，直朝下面的大江坠去。

刘七落在江水中了。官军从山上往下望，只能看见一个小小的黑点在江水中时沉时浮，渐渐地顺流远去，却也不知他到底是死是活。

官军打扫战场，看那山石旁、草丛中，到处是官军和义军的尸体，但却没有一名义军投降。

“响马”起义军被镇压下去了。但他们在两年的时间里，转战河北、江南七个省，袭破几十座州县，杀了上千名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也把反抗的种子撒播在人们心中。明廷为了对付他们，不得不调集各地卫、所、京营和边兵几十万人，耗军费数百万两。

正德七年九月，皇帝论功行赏，功劳榜上名列首位的是监军太监谷大用。而这位“八虎”太监的弟弟谷大亮，屁股没离北京，却凭空戴上了高平伯的勋冠。

朱厚照还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他所说的，京军多是“兵油子”，平时耍嘴皮子有点儿能耐，打起仗来就任嘛不是了。于是他决定留下一部分边兵保卫首都，免得他不敢出城打猎。

消息传出，边关的将领们许多人心动。原因是边塞生活艰苦，军情频繁，不如内地安乐。那时朱厚照少了个刘瑾，却又宠了个锦衣卫都督钱宁，对他言听计从。于是边镇众将竞相奔走于钱宁的门下，结果留下四镇之将，他们是宣府副总兵许泰，延绥副总兵冯顺，辽东副总兵刘晖，还有那被刘七射伤的大同游击将军江彬。当时人们称之为“外四家”。

有一天，皇帝在豹房设宴，“外四家”和钱宁等武将在座。朱厚照听钱宁说起江彬被箭穿颊而犹力战的经过，便把江彬叫到面前，看他面颊上和颈项后的箭疮，不禁连连叹赏：

“好小子，好小子！”

又有一天，皇帝带众将出城射猎。军士们赶起一只老虎。那老虎咆哮扬威，直朝皇帝扑来。朱厚照大惊失色，连忙招呼身边的钱宁：

“快，快，把老虎逮住！”

那钱宁原是太监钱能的干儿子，是凭吹牛拍马爬上去的，并没真正本事。看见老虎，已然吓得哆里哆嗦，哪里还敢上前！这时就见江彬一个箭步窜出，挡在朱厚照身前，横刀大喝。旁边的禁军也晃动兵器助威。那老虎一看人多，扭头跑向别处去了。朱厚照惊定之后，假作镇静，埋怨江彬：

“瞧，好容易跑来个老虎，又被你吓唬走了！”但他内心里对江彬是感激的。

从此以后，江彬得宠，权势逐渐压过钱宁。后来四镇便由江彬统一指挥，称为“奋武营”。钱宁当然不服，有时就在皇帝面前诋毁江彬，江彬也就反诋钱宁，正所谓“狗咬狗，一嘴毛”。江彬想出一个让皇帝疏远钱宁的法子。有一天，他陪着皇帝在豹房看歌舞，故意问皇帝：

“陛下天天看这种软绵绵的歌舞，不感腻烦吗？”

朱厚照颇为惊奇，便反问道：

“难道还有什么歌舞能超过皇家的教坊司吗？”

“超过皇家教坊司也许不可能，但却别有一种风味，陛下何不一试？”

“你说的是哪里的歌舞？”

“据臣所知，宣府的乐工中有许多美女擅长演奏边塞乐曲，弹奏起来雄壮铿锵，确实动听。”

“那就下诏传她们进京来吧！”

“那又不然，像这种曲子，只能在边庭上欣赏，曲与景合，才倍显美妙，拿到宫廷中却又没意思了。”

“晤，此话有理。”朱厚照点点头说。

“何况，边庭上旷野平沙，驰起马来瞬息千里，更与宫苑内这狭小的马场有天壤之别。”江彬又悄声对朱厚照说，“再说离开大臣们远一点儿，也省得他们老在陛下耳边絮聒。”

一席话说得朱厚照心痒难挠，他换上一套军装，自称“镇国公”，跟江彬一起，带几百名奋武营的健卒当随从，悄悄出京，跑到宣府。而那江彬更是早有准备，半年前便在宣府为皇帝建了一座府第，供皇帝居住。

江彬又传皇帝旨意，把豹房里的美女、珍玩运到这里，在府门上悬了“镇国公府”的匾额，人们都以为这里住着一位高官，却不知便是皇帝。

朱厚照意犹未尽，时常让江彬领着，夜间闯入百姓家中，看到美貌的妇女便抢回“镇国公府”供他蹂躏，连地方官的妻女也不例外。有一天，朱厚照打扮成一个军官模样，一个人跑到郊区的梅龙镇上，见一家酒店当垆的小姑娘生得美貌，便走进店去假做饮酒，加以调戏。小姑娘反抗他，小姑娘的哥哥是个猎人，把虎叉从墙上取下要在朱厚照的脑袋上穿两个窟窿。这时江彬带人跑来，拿出官家的威势把小姑娘抢进镇国公府，终被朱厚照凌辱。后来朱厚照回京，还要把这小姑娘带回去。小姑娘不稀罕他给的那妃子的称号，还没到居庸关便抑郁地死于途中了。

这件事后来被编成戏剧，剧名《游龙戏凤》，又名《梅龙镇》。不过那编剧美化了荒淫的皇帝，丑化了民女，是一出充满糟粕的戏。



从正德十二年到十四年，朱厚照玩乐的瘾头越来越大。他觉得以皇帝的身份出幸，大臣们谏阻，地方官奉迎，十分拘束不便，于是就取了个假名叫朱寿，又自封为“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命江彬为“威武副将军”。他们频繁往来于京师和宣府、大同之间，又从大同渡黄河，经榆林，到绥德，然后抵达太原。一路上大征女乐。所到之处，居民只得将家中的妇女隐藏起来，以免被强征去。

北方玩够了，江彬又怂恿皇帝，说江南风光何等旖旎，美女又是多么娇媚。朱厚照听了不禁神往，马上作了一个南巡的计划，准备登泰山、到南京、临苏浙、浮江汉、祠武当，“遍观中原，以尽皇帝职责。”旨意传下之后，群情汹汹，百官有的独自上疏，有的联名奏本，连太医院的医生也从健康的角度提出反对意见。兵部郎中黄巩在疏文中说：

“陛下临御以来，祖宗纪纲法度，一坏于逆瑾，再坏于佞幸，又再坏于边帅之手，至是荡然无余矣！天下知有权臣而不知有陛下；宁忤陛下但不敢忤权臣，陛下勿知也。乱本已生，祸变将起，窃恐陛下知之晚矣！”

翰林院修撰舒芬上疏说：

“陛下大婚十有五年而圣嗣未育，故凡一切危亡之迹，大臣知之而不言，小臣言之而不尽，其志非恭顺，盖听陛下之自坏也。”

朱厚照一下子接了许多反对他南巡的疏文，心里有气，对舒芬说他结婚十五年没生孩子，尤为恼火，便下令将所有上疏的一百四十六名官员全部廷杖。

廷杖就是在朝廷上用木棍答挞官员。这种刑法创自太祖朱元璋，他的亲侄子大都督朱文正、永嘉侯朱亮祖等人就是在廷杖时被活活打死的。这一次朱厚照是继承他祖宗的老办法来施淫威了。

这天早晨，朱厚照坐在午门楼上，江彬侍立在他的身旁。午门前御路西侧，站着观刑的官员，“犯官”们站在东侧。行刑的锦衣卫校尉和监杖的司礼监太监，则排列在御路边上，朱厚照看看几案上的“犯官”名单，拿起朱笔，在舒芬的名字上点了一下。旁边的太监便高喝：

“翰林院修撰舒芬领刑！”

底下的校尉同声答应，声音震得殿瓦“嗡嗡”响。只见两名校尉从“犯官”丛里把舒芬架了出来，将他按伏在地，褪去裤子，露出大腿和臀部。又走来两个校尉，拿绳子把舒芬的两腿绑住，然后按住他的手脚，使舒芬动也不能动。这时手执木棍的行刑校尉走来站在舒芬身边，单等监杖的太监下令。太监首先大喝一声：“搁棍！”校尉便把木棍搁在舒芬腿上。太监又再喝一声：“打！”行刑校尉把木棍高高举起，首先呐喊一声，然后杖往下落，“叭！”木棍便打在舒芬的大腿上了。

行刑校尉连连呼喊，手里的棍子举起、落下，那舒芬的大腿红了、肿了，接着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出来。舒芬咬着牙一声不吭，只是拼命

扭动着身躯。行刑校尉打五棍一换人，打到三十棍，太监叫声“停”！按四肢的校尉一齐松手。太监又喝一声：“踩下去！”便有四名校尉拿一块大布来，把舒芬抬起放在布上，扯着布的四只角拖到一边去了。

石板上染着这位忠直官员的血迹。

御路西侧的观刑官员和东侧的“犯官”们默默看着，等着听午门楼上又喊谁的名字。

“兵部郎中黄巩领刑！”

“礼部郎中万潮领刑！”

“太常博士陈九川领刑！”

“兵部员外郎陆震领刑！”

因为“犯官”太多，一个一个行刑来不及，只好几个一拨来进行。一时间，午门下面校尉的呐喊声、受刑者的呻叫声交织在一起，如同鼎沸；御路上到处血肉淋漓，恐怕传说中十八层地狱的残酷景象也不过如此吧！

“犯官”们有的杖三十，有的杖四十、五十，那是在监杖太监手里拿的驾帖上预先注明了的。中午过后，这场空前大规模的廷杖结束了。但“犯官”们被打之后事情并没了结，等待着他们的将是降级、夺秩、外调、革职或戍边的处分。至于兵部员外陆震等十一人，则当场毙于杖下。

朱厚照一下子打了这么多官员，颇觉扫兴，南巡一事也便中止了。

这是正德十四年三月的事情。到了六月，宁王朱宸濠叛乱。宁王的封国在南昌，朱厚照这下子又找到了到江南游览的机会了。他下诏要御驾亲征。群臣让他打怕了，这次没人拦他。大家忙忙活活好多天，终于出发了。大军出了北京，刚走到城南的良乡，江西的捷报传来，朱宸濠

已被巡抚南赣的副都御史王守仁（即阳明先生）擒获了。

按理说，叛乱已经平定，“御驾”也就不必“亲征”了。可是朱厚照此行“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真的想去打仗，只是找一个游江南的借口罢了。他把王守仁的捷报压下，不向外边宣布，大军继续向南京行进。

朱厚照九月到了南京，见这江南景色自是与宣、大等地不同，不禁流连忘返，少不了还要广征佳丽，骚扰民间，这些丑行不必细表。十二月，朱宸濠解到南京。这回朱厚照又来了精神，他和近侍们都穿上了戎装，率领大军出城几十里，列成阵式等候。待到押解朱宸濠的囚车来到，江彬便去把囚车打开，将朱宸濠放出，然后由皇帝策马过去，用槊朝朱宸濠一刺，这便算是天子亲征擒俘了，真像是舞台上演戏一般。接着再把朱宸濠装进囚车，大军“凯旋”。一路上军号悠扬，战鼓频敲，旗幡招展，戈甲耀日。朱厚照骑在马上，缓缓进入南京城。遥想他的老祖宗朱元璋当年占领南京入城时，那风光大概也不过是这般模样吧！

过了年是正德十五年，朱厚照还在南京玩着，不肯回北京去。直到八月，觉得玩得有些够了，这才下令班师。

大军一路慢腾腾地走着，遇到好玩的处所，朱厚照就叫停下来，他要玩一玩。九月，走到一个叫积水池的湖泊，朱厚照见有许多渔人在湖里打鱼，他又来了兴致，让人弄来一条小船，他也要当一会儿渔父。大臣们劝谏不听，朱厚照径自下到小船上。船夫把船摇到湖心，朱厚照看那湖水清清，水里的鱼儿悠然地游来游去，便高高兴兴地站在船头上，举起网来，甩开胳膊撒了出去，可惜他的身子被酒色淘空了，一时站立不稳，竟随着那网儿一起落进水中。等捞上来时，连淹带吓，话也说不出了。

朱厚照从此得病，辗转床褥半年，于正德十五年三月死于豹房，年仅三十岁。葬于康陵，庙号“武宗”。

朱厚照当了十五年皇帝，以玩乐始，以玩乐终。只有躺在病床上那半年，有时间思前想后，才稍稍明白过来。他临死对司礼太监说：“以前的事情都是朕错了，不是你等所能干预的。”他把这十五年他干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的责任统由自己承揽，还在遗诏中命令停罢团营，把留在京师的边兵遣回原镇，放出豹房里的乐工和所掳妇女，把拿到宣府“镇国公府”的珍宝归还内库，并大赦天下，释放禁囚。

朱厚照没生儿子，也没有兄弟。遗诏让他的堂弟——他叔父兴献王朱祐杗（yuán元）的长子朱厚熜（cōng聰）即位，这就是明代的第十一位皇帝，年号“嘉靖”，死后的庙号是“世宗”。

至于武宗朱厚照宠爱的两个奸佞，那钱宁因与宁王朱宸濠勾结，早被下狱，江彬也在朱厚照死后被大臣们拿获。朱厚熜即位后，将他二人凌迟处死，家产抄没入官。

朱厚熜和他的皇兄朱厚照一样，也是十五岁登基。不过朱厚照喜欢酒色玩乐，朱厚熜却另好一宗，想当个长生不老的神仙。两个人性格恰恰相反，一个喜动，一个爱静。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借一个老词儿来形容吧，他们统统是“昏君”。

按理说，崇信道教的人主张清静无为，与世无争。可这位想成神仙的少年皇帝，却在即位之初便跟大臣们展开一场关于名分的争执。他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杗是孝宗朱祐樘的弟弟，兴献王本人并没做过皇帝，这时也已死了。可现在他的儿子当上皇帝了，这朱厚熜觉得自己有“孝”心，想想父亲兴献王一生没尝过当皇上的滋味，就要在他死后来个“追

尊”。“追尊”未尝不可，但帝位有个统系，那就是要以“立嫡立长”的原则继承下来。朱厚熜其实是拣了个“漏儿”，如果武宗朱厚照有儿子或亲兄弟的话，根本就摊不上他。不过他既要做皇帝，就得归入“正系”，算是孝宗的儿子才行。这是封建宗法制度规定的。

现在，朱厚熜偏要让他父亲挤进来，追尊为皇帝不说，还要进太庙，还要称为“皇考”，而把孝宗称为“皇伯考”，这等于不承认“正系”一样。于是那些封建礼教维护士的大臣们纷纷上疏反对，据“理”力争；却又有些拍皇帝马屁的官儿向着皇帝说话，又从反面找出些理由来。君与臣之间、臣与臣之间，吵吵嚷嚷，争个不休。到了嘉靖三年，朱厚熜十八岁了。他想起皇兄武宗朱厚照为了南巡的事廷杖群臣一百四十六人，心想，难道我就不能给你们一点儿厉害看吗？偏赶上群臣为了改孝宗为“伯考”的事聚集在午门号哭，朱厚熜便借机发作起来，一下子逮捕了二百二十人，四品以上的夺俸，五品以下的受杖。结果一百八十余人在午门前挨了棍子，因创重先后死去的有十七人——后来人们便把这一事件称之为“大礼仪之争”。

朱厚熜这边打人，那边却又祈求神仙的佑护。从嘉靖二年起，他便在乾清宫建醮(jiào 叫)。醮又叫道场，仪式是十分隆重的。届时乾清宫的前院里，摆着香案，案上放满了各种祭品。红烛高烧，香烟缭绕。主持道场的老道士手执法剑，嘴里念念有词。旁边另有小道士敲钟击鼓，“咚咚”有声，显得十分庄严。老道士念了一气，便用毛笔蘸着朱砂在黄表纸上弯弯曲曲地画道儿，这就叫“符”。画好后将符用剑尖挑起，放到蜡烛的火焰上烧掉。烧符是给神仙递帖子，正式的祷祝文字是写在青藤纸上的，叫做“绿章”，又叫“青词”。青词一般要用骈体文来写，读起



来抑扬有致，神仙才会喜欢。

后来朱厚熜嫌乾清宫一处道场不热闹，便在坤宁宫建起醮来。乾清、坤宁两宫是皇帝和皇后的住所，弄些道士来往出进，也不成个体统。便有大臣来谏诤，朱厚熜并不理会，依然我行我素，又在五花宫、西暖阁、东次阁等处建起道场来。把个皇宫弄得跟一些大庙差不多。

嘉靖三年，朱厚熜听人说龙虎山上清宫有个叫邵元节的道士，法术无边，就派人去把他请了来。见面一谈，邵元节讲的都是些很玄妙的话，十句里朱厚熜倒有八句听不懂，这越发证明邵老道的道行高深，于是封他为“清微妙济宁静修真凝元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让他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又在北京城西给邵元节建“真人府”，派四十个校尉负责洒扫。邵元节的老家是江西贵溪。朱厚熜派人在那儿给他建了个道院，赐名“仙源宫”。最后，竟把这个老道拜为礼部尚书。

后来又有个道士陶仲文更受皇帝的崇拜，见面时不称呼他的名字，而尊之为“师”。他的“官衔”更大，连续被封为少保、少傅、少师。一个人竟把“三孤”尊号占全了。有明一朝，一人身兼三孤的，只有道士陶仲文一人而已。

大量的祷祀活动使朝廷在经济上增加负担，每年宫中烧掉的香烛就要用去黄蜡二十多万斤，白蜡十多万斤，香料数十万斤。仅此一项便有这么多，其他费用所耗便可想而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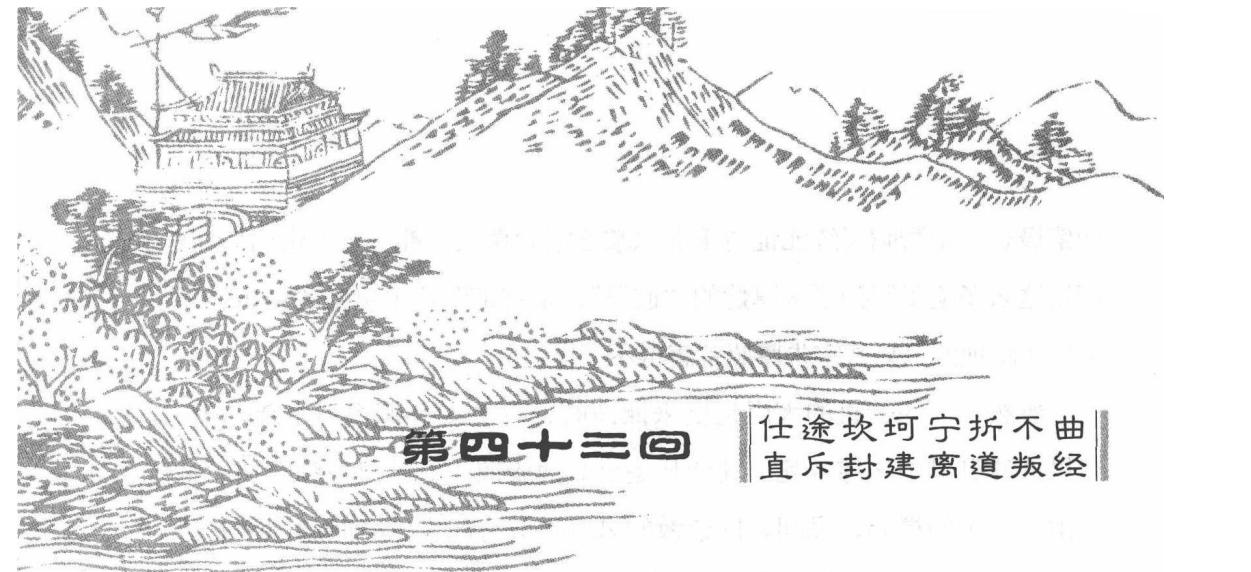
到了嘉靖十八年，朱厚熜专心修道，竟让四岁的太子来监国，自己好去修炼。他给自己起了个道号叫“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来又嫌这个道号太短，加号为“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恩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元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加号“太上大罗天

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我们用这么多笔墨照抄了朱厚熜的“道号”，是想证明这个皇帝的荒唐，但又确实跟他的皇兄武宗朱厚照荒唐得不一样。

当然，一些正直的大臣是要来谏诤的，有个太仆卿杨最上疏劝他，结果被逮到狱中拷掠致死。其余凡是反对他崇道的，一律受到惩罚。结果由于皇帝的提倡，民间崇信道教的风气也流行起来，一时名山古刹香火茂盛，出现了一个道教的繁荣时期。

不过有识之士对这种现象是不以为然的，有一个士人便提出：“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

这个人便是被人们称为“卓吾先生”的李贽（zhì 致）。



## 第四十三回

仕途坎坷宁折不曲  
直斥封建离道叛经

李贽号卓吾，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生于福建泉州。幼年家道清寒，七岁丧母，跟随教书的父亲读书识字。嘉靖三十一年考中举人。因生活困难，无力再考，只好以举人的身份求职，当了河南共城县教谕。后改任礼部司务。不久父亲去世，停职丁忧。守孝三年服满，回到北京等待重新安排职务。但他一无门路，二没钱打通关节，一等就等了一年零八个月。这期间只好以教书糊口。有时一天只吃一餐，饿得头昏眼花，竟连“稻”与“黍”都分辨不出来了。

但这种艰苦的生活，也使他认识了人生，得到了磨炼。后来他终于分配到国子监当博士了。博士又叫五经博士，是向学生讲授“五经”的教官，可是李贽从小就“三不信”——不信学，不信道，不信释（佛教，因佛祖是释迦牟尼而简称为释）。这里的“学”指的就是儒学。李贽既不信“学”，却又让他讲“学”，这个教官还能当好吗？

他去给监生们上课了，他幽默地说：

“有人讲：‘天不生仲尼（孔子），万古长如夜。’怪不得羲皇时候的人，白天还要点着灯笼走路呢！”

监生们忍不住“哈哈”大笑。

“有人宣称孔子是‘圣人当中的圣人’，是‘至圣至贤’。不管什么都得照着孔子的话去作，凡事‘不可不依仿，不能不依仿，不容不依仿’。这话对不对呀？”

“对！”有个监生回答。

“那我就来问你，孔子以前的人又去依仿谁？比如说孔夫子的父亲叔梁纥吧，他是根据什么来做人的呢？”

下面又是一片笑声。李贽严肃地讲：

“天生一人，便有一人的人格。全靠依仿别人而生活，你个人的人格何在？前人之是非是一是非，然而今日不是前日，前日之是非又怎能作今日衡量是非的标准呢？”

李贽是五经博士，是要他向学生讲授“五经”的，他倒跟“五经”唱起反调来了。国子监祭酒赶忙请吏部把他调走。因此，李贽在国子监只教了三个月的书，便被调到南京任刑部员外郎了。

博士的官阶是从八品，员外郎是从五品，李贽高升了，这跟他逐渐有了名气不无关系。不过那时的官员俸禄是很微薄的，李东阳当了多年内阁大学士，回家还得靠卖字维生。所以这时的李贽尽管做了五品官，生活仍然艰难。至于贪官污吏，他们贪赃枉法，剥削压榨百姓，腰缠万贯却也不难，那自然另当别论。

南京虽也是“京”，也有一套中央衙门，但皇帝不在那儿，因此差不多等于虚设。不过有时南方发生的一些重大的案件，也要由南京刑部初步审理，再转往北京。

李贽是在穷困中长大的，又几经仕途的坎坷，深知民间的疾苦。特

别是对那些盗匪，他认为大多数是被官府压迫得无法生存，才铤而走险的。他曾说，正是由于政治腐败，“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为盗也！”

他还写了一首诗：

未曾相见心相识，敢道相逢不识君？  
一切肖何今不用，有赃抬到后堂分。  
肯怜我等夜行苦，坐者十三行十五。  
若谓私行不是公，我道无私公奚取？  
君倚奉公戴虎冠，谁得似君来路宽？  
月有俸钱日有廉，我等夜食何盘桓！  
君若十三十五俱不许，我得恃强分廉去，  
驱我为盗宁非汝？

作为一个刑部官员，他竟站在被审判的盗匪的立场上，向官府公然提出质问：“驱使我做强盗的不就是你们这些官老爷吗？”

南京刑部的职务清闲，使李贽有时间读书，也使他有时间写书。他的名声渐渐传开了，有的人赞同他，有的人反对他。但他毫不在乎，仍然我行我素，发扬他根据自己的独立思考而得出的学术见解。

到了万历（神宗朱翊钧的年号）五年（公元1577年），李贽五十岁了，才正经八百地当了个“官”儿，被任命为云南姚安知府。知府是几县地方的父母官，如果想捞钱的话，那是很方便的，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清”知府还如此，那“赃”知府所得就可想而知了。李贽当然不能去贪赃而“驱民为盗”，不过政府默许的一些“常例”，他还是照收不误的。“常例”又叫“规礼”，是地方上和下级向上级馈赠

的例金，名义上非法实际上又“合法”，这是因为政府明知官员薪俸微薄而不得不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李贽收受常例并没感到不安，他觉得这可以使他比较充裕一些，比如说，多一些钱去买书。

但他的一个朋友海瑞却跟他不一样，海瑞认为一切薪俸以外的一丝一毫的收入都属于贪污。

李贽当知府的时间并不长，不过两年多他就不干了。因为他受不了上官的勒索和送往迎来的繁文缛节。他把头发剃光了，僧不僧，俗不俗，就那样往大堂上一坐，问起案子来，一时舆论哗然。

巡抚把他叫去了，问他，

“你这种打扮，成何体统？”

“不知下官错在何处？请大人明示。”

“你为什么要把头发剃去，难道想当和尚吗？”

“非也。天底下并不是只有和尚才准许剃头的，而且朝廷只对各级官阶的朝冠、绶带和官服的服色、绣纹作了规定，却没规定各级官员头发的长短。因此下官此举只是个人的癖好，似乎与官箴无关。”

巡抚气得嘴唇也哆嗦了。

李贽回到任所，知道巡抚不会放过他，便主动离职，并从此不再做官。他觉得做官太不自由，束缚了他的个性发展。

李贽在南京时认识湖广黄安（今湖北红安）的耿定理，二人结为好友。李贽离任后便携全家到了黄安，住在耿家，并在耿家开设的“天窝书院”教书。耿定向曾任过刑部侍郎等职，当时丁忧在家。他是个道学官僚，跟李贽合不到一起，常常发生争论。李贽富有辩才，每当他跟耿定向辩论的时候，两只眼睛在瘦削的脸上闪闪发光，有时还

要指手画脚，以显示他的激动。他对耿定向的那些孔孟大道理并不直接反驳，却提出一个一个的设问，往往问得耿定向张口结舌，因此二人的关系很紧张。万历十二年，耿定理去世。而耿定向丁忧期满，被召回北京任左金都御史。他从北京给李贽写信，说李贽“迷误耿家子弟”。对他的这种指责，李贽认为是一种侮辱，便辞馆离开了耿家。

李贽把妻子儿女送回老家泉州，自己想找一个地方著书立说。他来到湖广麻城（在今湖北省）朋友周思敬、周思久家，看到这儿有一处美丽的湖泊，名叫龙湖，便准备在这儿定居。他那时已有许多朋友，其中不乏高官。他便给朋友们写信，要求得到“半俸”的帮助，或者是“三品之禄，助我一年”。援助的款项来了，他便在龙湖畔的青山上建了一座寺院，称为“芝佛院”。

李贽的头发早在姚安当知府的时候便剃去了。但他并没出家当和尚，更不吃斋念佛，仍是俗家打扮。按明朝的习俗，已经退职的官员回到地方以后被称为“乡官”，也就是说他仍然具有官员的身份，少不了还要参与官场的活动和应酬，有时地方官还要请他出来协助办事。李贽原是四品黄堂，在“乡官”中也算是头面人物，常常被地方官府请去。李贽嫌麻烦，便索性真的当起和尚来了，把他建的新居也修成寺院，他自己穿上僧衣。“乡官”里当然不好有和尚，从此，地方官也便不来找他了。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说：“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去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当了和尚之后，便摆脱了这些烦恼。

芝佛院并不是正式的寺庙，因为他没在县里的宗教衙门“僧会司”或州的“僧正司”以及府里的“僧纲司”任何一处登过记，因此只能说

是私人的佛堂。芝佛院中有一座正殿，供奉着佛祖，左右有偏殿；还有一列专为招待来访客人的房舍。因为李贽那时的朋友上至尚书侍郎、总督巡抚，下至进士举人、县学生员，这些人常常跑来向他求教。他自己则住在山顶的一间精舍里，从这个地方四望，湖光山色尽收眼底，确实是个著书立说的安静处所。李贽在这里一住近二十年。他自称“流寓客子”。他的《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和《史纲评要》等著作，大部分是此期间在这个地方写成的。

他把他的书起名叫《焚书》，意思是他这书中的观点一定会有人反对，说不定那些人气急了便把书付之一炬，因此叫“焚”书。《藏书》的意思是说，这些书人们既不接受，那就将它“藏”之名山，以待后人去理解吧！

芝佛院里有几名和尚，住持是李贽的朋友，但李贽本人从不诵经礼拜，连个法号也没有，人们照常以“卓吾先生”来称呼他。他在院里唯一的工作是扫地。每天早晨起床，便从山顶下来，拿起竹帚，“刷拉、刷拉”，从后院扫到前院，一边扫一边构思。想好了就放下竹帚跑回屋里振笔直书。等到又要思索的时候，便再跑下来扫地。结果佛院里整年一尘不染。而专门派出一名小和尚给他扎扫帚，有时还供不上他使用。

芝佛院建成的第三年，即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李贽的朋友海瑞病故了。李贽十分悲痛。海瑞比李贽大了十三岁，二人并无深交。但李贽佩服海瑞的绝对正直、绝对严格、绝对的一丝不苟。而李贽自己则恰恰相反，他放荡不羁，任凭个性的自由发展，不拘小节，不恤人言。所以李贽对海瑞是十分尊重的，因为他自己做不到海瑞那样。不过他对海瑞的过分拘泥于传统道德也提出过异议，因此，他认为海瑞只能是一

株“万年青”，“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

同时代的人他佩服的除海瑞外，还有俞大猷和戚继光。这两人是抗倭名将，是保卫海疆的英雄。李贽赞扬他们说：“此二老者，固嘉（嘉靖）、隆（隆庆）间赫赫著闻，而为千百世之人物者也。”

还有大学士张居正，李贽夸他“宰相之杰”，“胆如天大”。——这几个人后文都将提到。

但对那个道学家耿定向，李贽却不肯放松跟他的争论，他给耿定向写信，在寄给对方本人之外还公之于众，耿定向的回信也仿此办理，事实上他们的论辩等于是公开进行。李贽指责耿定向是假道学，说的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李贽给耿定向的一封信的大意是这样：

“看公之行事，好像和一般人没什么两样。因为自从有了知识直到今日，人们都是以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卜风水而求福荫子孙。这些都是为自己身家考虑，并没给别人打算。但等到公等讲‘学’时，却说‘你为自己，我为他人；你是自私的，我是利他人的’。还说什么，我怜惜东家饥了，西家寒了。我等肯教人，是继承孔孟之志，你等不肯诲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不过看公等的实际作为，公所讲的未必是公之所行，而公所行的公却又不肯讲。这不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吗？这难道就是孔圣之训？反不如市井小民，说的是什么，干的便是什么！”

耿定向不直接给李贽写回信应战，却把他给另一个朋友写的信公开，而在信里对李贽大肆攻击。这是一种旁敲侧击的战术。

耿定向在致友人的信里先讲了别人的一件事，他说：“以前颜山农在讲学时忽然就地打滚，说‘试看我良知’！直至今日士林传为笑柄（颜

山农是颜钧的字，他是王守仁的再传弟子，主张“平日率性而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作者注)。”接着就列举了李贽的种种古怪行动，还说李贽曾经强迫他的幼弟狎妓，说李贽曾带着一帮芝寺院的和尚到一个寡妇的卧室里化缘。耿定向认为李贽的这些荒唐、放荡的行为，是“以良知为主宰，寻求‘顿悟’的方法”，事实上跟颜山农的“就地打滚”没有什么区别。

李贽对耿定向的攻击作出答辩，他指出耿定向说他带着和尚到寡妇卧室化缘纯属诬蔑，而对其余的指责却并不否认。关于“就地打滚”，他说他还从来没听说颜山农有这样一个故事，如果真有其事的话，只能证明颜山农确实参透了“良知真趣”。他借题发挥，说世上“打滚”的人太多了，“日夜无休时”。“大庭广众之中，谄事权贵人以保一日之荣，暗室屋漏之内，为奴颜婢膝事以幸一时之宠。无人不滚，无时不滚，无一刻不滚。”他说：“当打滚时，内不见己，外不见人，无美于中，无丑于外，不背而身不获，行庭而人不见，内外两忘，身心如一。难矣，难矣！”可以说，他把假道学讽刺得真够淋漓尽致了。



## 第四十四回

遭谗害李卓吾死狱  
卫海防戚继光领兵



李贽在麻城的朋友，除了周氏兄弟外，还有一个梅国祯。梅国祯做过侍郎，也是麻城的大户。他本人还曾为李贽的《焚书》写过序言。梅国祯有一个居孀的女儿梅澹（dàn 淡）然，拜李贽为师，梅家的其他女眷也和李贽有所接触。李贽在他的著作里记下了他和这些女性之间往来探讨学问的通信，他把梅澹然称为“澹然大师”，说“梅澹然是出世丈夫，虽是女身，男子未易及之”。如果这是一般的通信，却也罢了，但他偏要把通信放在著作里，而且公开印行。尽管他通信的时候已经是年近七十的老翁，但那些“卫道士”们还是认为这是李贽对整个上层社会的公开挑战。有一个姓史的道台想驱逐李贽，但又顾虑李贽有许多朋友是高官，未敢造次。便找个理由说芝佛院的建立没经过宗教衙门的批准，理应拆毁。李贽答辩说：芝佛院不是公开庙宇，只是私人佛堂，“是十方尊贵大人布施俸金，盖以供佛，为国祈福者。”再加上有朋友撑腰，史道台只好知难而退。但“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公元 1601 年），反对李贽的人买通地方上的无赖，晚上来放把火将芝佛院烧毁了。



李贽失去了居所。他的好友马经纶御史从北京跑来，将他接到通州家中。还给他盖了一所“假年别馆”，希望能“天假以年”，让这七十岁的老学者能够写出更多的著作。但这儿是天子脚下，岂能容得这位离经叛道的人存在。于是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出来问罪了，他给万历皇帝朱翊（yì异）钧上疏，参劾李贽多条罪状，而且许多是望风捕影，无中生有，比如说有这样一段：“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人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致使“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足恤”。他还吓唬皇帝，说李贽现已“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

朝廷在张问达的奏疏上批示：“李贽由锦衣卫拿问，著作销毁。”

李贽在狱中不愿无端遭受屈辱，在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自杀了。但他的著作却未能“销毁”，而是一印再印，一直在人间流传。因为传世巨著不是一纸禁令便能消灭的。

李贽在给耿定向的信中说“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这是“人尽如此”的读书人的正常出路，是符合“学而优则仕”的古训的。他本人也曾“求科举”，考中过举人，以至“居官”到四品知府。但他后来终于走上了另一条著书立说的道路，成为名传千古的学者。然而却也有另一个读书人，他也“居官尊显”了，但凭的却是善于写一种极特殊的文章——青词。

此人姓严名嵩，是江西分宜人，弘治十八年进士，在翰林院做侍讲。由于他在“大礼仪之争”中竭力为嘉靖皇帝朱厚熜辩护，得到皇帝欢心，升任礼部侍郎，转南京礼部尚书。他听说朱厚熜好道，便从南京巴巴地

写了许多“青词”呈给皇上。青词虽然内容空洞，但极讲究辞藻，一般道士是写不好的。而严嵩是进士出身，文学底子不薄，再加上精心钻研，写的青词秀美华丽，朱厚熜看了大为高兴，降旨把他从南京调回来，任命为北京中央朝廷的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以后又让他兼了武英殿大学士，成为内阁首辅，事实上的宰相。

朱厚熜一方面天天在醮坛上烧青词，祈求神仙佑护；一方面又让道士烧炼“金丹”服用。所谓金丹大多是些化学物质，夹有水银、雄黄以至于砒霜等物。烧炼以后搏成丸状，供人服用，因雄黄的颜色是黄的，所以才称为“金丹”。金丹具有强烈的刺激作用，服下以后使人精神亢奋。道士们又给朱厚熜炼一种“先天丹钻”，这种丹药要加上小女孩的月经来配制。于是在全国大征少女，一次就是上千人。当时被称为“后七子”之一的文士王世贞，曾写了一首《西城宫词》来记叙这些少女的悲惨遭遇：

两角鴟青双结红，灵犀一点未曾通。

只延身作延年药，憔悴春风雨露中。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终于爆发了一起以杨金英为首的宫女反抗事件。

这天早晨，朱厚熜正在乾清宫熟睡，杨金英等十几名宫女走来。一个人先用抹布蒙住朱厚熜的脑袋，捂住他的嘴巴，然后有人掐住他的脖子，有人按住他的手脚。朱厚熜挣扎着，嘴里“呜噜呜噜”响，但却喊不出声。宫女们虽然都是些少女，体弱力微，但几个人压住他，却也挣不脱。这时杨金英拿来一根丝绳，套在朱厚熜脖子上，打了一个结，要将他勒死。可惜杨金英忙中出错，把结打成了死扣，两个宫女拉了半天

也没拉紧。这时旁边一个宫女，眼看杀皇帝不成，为了保命，竟出卖伙伴跑去告诉了方皇后。方皇后带宫监赶来将杨金英等拿获。朱厚熜死里逃生，下令将杨金英等凌迟处死，她们的亲属也被处斩。由于这些宫女是端妃曹氏和宁嫔王氏宫中的，把她二人也算同谋，加以杀害了。这年岁次壬寅，史书上便把这起事件称之为“壬寅宫变”。

朱厚熜逃了性命，自认为是靠神仙的保佑，自然要更加崇信神道了。但他却也不敢住在乾清宫，而跑到西苑万寿山的万寿宫去住，宣称自己是世外之人，要专心奉玄修道，把一切政事都交给内阁大学士处理。此后二十几年，他一直住在这里，既不上朝，也不回宫，更不接见大臣。

大学士严嵩趁机专权，只有他一人可以随时拜谒皇帝。他入阁时已年过六十，精力不济，但他有一个奸猾诡诈的儿子，名叫严世蕃，是兵部侍郎。严嵩的票拟、批答等政务便由他代理，父子狼狈为奸，贪赃枉法，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致使朝政一天天腐败，人民更加痛苦。这个时期是明代最黑暗的时期之一。

由于内政不修，外族和外国便觑机入侵。嘉靖二十七年和二十九年，鞑靼可汗俺答两次进攻宣府。这后一次鞑靼骑兵竟长驱直入，攻到北京城下。他们在京郊抢劫够了，才满载而去。这年是庚戌年，便被称作“庚戌之变”。

另一起入侵则要严重得多，时间也长，那便是骚扰沿海一带的倭寇了。

在第二十四回里，我们曾介绍了倭寇的来历。说明倭寇之患从明朝初叶便有，是由来已久的。不过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重视海防，在沿海修筑城堡，设立卫、所，组成了严密的备倭防御系统，倭寇只能偶尔

侵扰，为害不大。待到正德、嘉靖年间，明廷政治腐败，军事力量削弱，防范海寇的力量大减，倭寇也便乘虚而入了。

由于日本离山东省较近，有个时期倭寇常到山东沿海登陆。后来朝廷派一员年轻的将领担任都指挥佥事的职务，管辖登州、文登、即墨沿海三营，共二十五个卫、所，专门防御倭寇。这个青年将领便是戚继光。

戚继光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生于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父亲戚景通是登州指挥佥事。戚继光少年时便随父亲在任所读书习武，进步很快。戚景通为人正直清廉，从不克扣士兵粮饷，所以家境贫寒。戚继光自小受父亲熏陶，养成了坚毅廉明的性格。他父亲逝世后，他承袭了指挥佥事军职，负责军屯事务。他暇时便读兵书，或是登上府城北边的岛子顶上，遥望海天苍茫，碧波起伏，在这年轻的战士心中，不禁涌起勇壮豪迈的感情，于是便写了一首诗来寄意。诗的题目叫《韬钤深处》：

小筑惭高枕，忧时旧有盟。

呼樽来揖客，挥尘坐谈兵。

云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袭职后不久，戚继光被派到蓟门卫（在北京东北）戍守，前后五年。这中间还参加了武科考试，中了武举。

嘉靖二十九年鞑靼可汗俺答侵扰北京，戚继光也参加了防御，被临时任命为总旗牌官，督防九门。他对严嵩等的不抵抗十分不满，曾两次上书提出“应战方略”，但不被采纳。

戚继光不久被调回山东，升任都指挥佥事，负责山东沿海的防务，

他到任后加强海防建设，在奇山所（今山东烟台）等地建立了烽火台（“烟台”的地名由此而来），修补了工事，严明军纪，加强士兵的训练，使山东海防面貌焕然一新。倭寇几次来扰，均被击退。

后来倭寇转而侵掠浙江，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以至于抢占城池，与明军对抗。浙江守将庸懦无能，坐视倭寇猖獗。新任浙江总督胡宗宪在北京时看过戚继光的“应战方略”，十分赏识，便请朝廷调戚继光到浙江来，任命为参将，镇守浙江的宁波、绍兴、台州（今临海）三府。这三府地区几乎占了浙江海岸线的一半，也是这几年倭寇几次登陆的处所。当地的地方志说：“东南濒海，浙中诸府，宁、绍尤为咽喉。”可见戚继光所承担的防务是何等重要了。

就在戚继光调来浙江的那一年——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一部倭寇窜扰慈溪的龙山所。龙山所是观海卫和临山卫之间的前哨阵地，濒临东海，地势险要，是保卫省城杭州的门户。倭寇从此处登陆，直接威胁着宁、绍二府。明军参将卢镗和游击尹秉衡率七千人，赶来迎击。

这次登陆倭寇只有八百人。他们编成三个大队，又分为二三十人的小队，“嗷嗷”叫着，朝明军扑来。倭寇戴的头盔用金银装饰成牛角的样子，披着五色长丝。个个脸上涂着油彩，凶恶狰狞，类似恶鬼。手里拿的是五尺长的双刀，挥舞起来，一片白光。明军人数虽然比倭寇多了近十倍，但却被倭寇吓住了，刚一接触，就想溃退。卢镗等将领呵止不住，眼看就要败阵，这时戚继光领兵赶来了。

戚继光从山东调来浙江，是只身来的，他在山东训练的士兵仍留在原地，所以他目前率领的也还是浙江的当地驻军。戚继光先占领了一处山头，观察下面战场上的形势，见明军退缩，畏敌如虎；再回头

看看自己的部下，也跟下面那些明军一样，面有惧色。他知道带这样的士兵下去，也会跟下面那些明军一样怯阵。因此他并没有马上上去参战，而是拿起弓箭来，瞄准一个手执扇子指挥的倭酋，一箭射去。戚继光从孩童时候便练习箭法，真可说是“百步穿杨”。只听弓弦响处，那倭酋把扇子往上一扔，“噗”的一声仰面倒下了，戚继光这一箭洞穿了他前胸。

戚继光搭上第二支箭，又瞄准了一个拿扇子的倭酋——原来倭酋指挥战斗，不用刀剑或令旗，却拿一把挺大的折扇，张开合拢，朝上朝下，左挥右挥，都表示着一定的指挥信号，所以戚继光“擒贼先擒王”，专来射倭寇的指挥官——这时戚继光身边的将士们又发出齐声的叫喊，原来戚继光第二箭又把一个倭酋射倒在地了。

戚继光的第三次箭又搭在弓上。他昂然地站在山头，弓拉开犹如满月，箭射出恰似流星，“彭”的一声，眼看第三个倭酋狗吃屎一般趴在地上了。

戚继光这才拔出剑来，在空中一挥，对部下大喊一声：“冲啊！”

戚继光先声夺人，神箭三射，把敌人的凶焰射下去了，把自家将士的士气射上来了。倭寇失去了头子，乱了阵脚，不敢恋战，一步步向海边退去，而这边的明军，亲眼看见凶神恶煞般的倭寇饮箭后照样丧命，这才精神起来，喊杀着向敌人追去，但倭寇这时却已经下到船里，扬帆驶去了。

倭寇少受挫折，并不甘心，过了一个月，又纠集了两千多人，第二次来攻打龙山所。

浙江巡抚阮鹗（è 厄）闻讯后，调总兵俞大猷（yóu 犹）、参将戚继

光赶去御敌。而台州知府潭纶也带着自己招募训练的一千名乡兵，赶来助战。俞、戚、谭这三员抗倭名将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相识的。他们三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投，在并肩作战中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俞大猷字志辅，福建晋江人。青年时应武科考试得中，被任为千户，后升为参将。嘉靖三十一年起在浙江与倭寇作战，大江泾一役，大创倭寇。他这时已是总兵官了。

谭纶字子理，江西宜黄人。嘉靖二十三年考中进士，任南京兵部主事。嘉靖三十二年，一小股倭寇从浙江窜扰到了南京附近。南京的武将们惊慌失措。谭纶虽是文官，却亲自率领乡勇出城抗击。他运用智谋，将倭寇诱陷到一处沼泽地里，动弹不得。乡勇们乱箭射去，将这股倭寇全部消灭。第二年，被任命为台州知府。这次龙山所二次告警，他便率领在台州训练的乡兵赶来了。

俞大猷、戚继光和谭纶在龙山所后面的山上会师。三个人初次见面，便如旧识一般谈得非常投缘。当下做了分工，戚继光打头阵，俞大猷接应，谭纶在后边督阵。

一场大战便在龙山所外边的海滩上展开了。



## 第四十五回

俞总兵岑港驱倭寇  
戚参将义乌练新军

戚继光深深知道，当地卫、所的士兵由于长期缺乏训练，又加以将领克扣军饷，士气受到挫伤，因此战斗力很低。但现在打仗又必须依靠这些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将领们身先士卒，用自己的勇敢去影响他们。

比较起来，倒是谭纶的乡兵训练得更好些。所以谭纶对戚继光说：

“戚将军，我这一千名乡兵你带去吧！”

“谭大人，你这是？……”

谭纶摇摇头，说：

“兵无斗志，不自今日始，其中有许多原因，非我辈所能解决。所以我虽是文官，但守土有责，只能自己练兵了。这些台州健儿，作战经验不多，但勇气却是有的。”说着，把乡兵中的千户、把总唤来，吩咐他们说：“这位戚将军，一个月前在这个地方三支神箭射退倭寇千人，勇武绝伦，你们大家跟着戚将军杀敌吧！”

“是！”将领们挺胸回答，“愿听戚将军调遣！”

“既然诸位不弃，请听末将安排！”说完，戚继光便把本部和台州乡兵召集到一起，作了部署。这次出兵时，戚继光有了上次作战的经验，



知道倭寇从海上乘船来，没有骑兵。所以，戚继光就千方百计地弄到一百匹战马，找一些年轻力壮的战士骑上，成立了一个骑兵小队。他让骑兵小队跟着他打头阵，后面本部将士和台州乡兵分成两翼，摆成一个“山”字阵形，转过山头，直向正在围攻龙山所的倭寇冲去。

龙山所处于一座丘陵顶上，两侧是平坦的沙滩。倭寇有的正在攻打所城，有的则在沙滩上憩息。这时戚继光率领一百骑冲杀过来。戚继光骑一匹枣红马，手挥青钢宝刀。身后一名健卒高擎一杆红色的军旗，当中白色“月亮”里大书一个“戚”字，迎着海风，猎猎作响。再后边是戚继光精心挑选的战士，他们跟在主将后面，似乎昨天的胆怯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人人觉得让主将落下便是耻辱。一百骑人数虽少，但声威惊人，恰如一阵旋风，着地卷将过来。

倭寇这几年来，东抢西掠，如入无人之境，很少受到抵抗和挫折，因而骄纵自恃，不把明军放在眼里，故而戒备不严。不想明军竟突然杀来，而且当头的又是骑兵，倭寇只得仓猝应战，也布不成个阵式。戚继光一马当先，青钢刀挥处，倭寇纷纷退避，晚了的便不免筋断骨折，脑袋搬家。后面的骑士跟了上来，马刀闪闪，冲入倭寇当中，左右冲杀。马上与步下作战，首先占了居高临下的便宜，同时马蹄盘旋践踏，更增加了威势。倭寇的大头目一面高喊，一面挥舞扇子指挥，逐渐将溃散的倭寇收拢来，组成圆阵，抵挡明军的进攻。这第一阵，倭寇便损折了一百多人，沙滩上横躺竖卧着都是倭寇的尸体。

这时攻打龙山所城的倭寇也退下来了，他们采取了守势。最外边是一帮弓箭手。倭寇的竹弓长八尺，把弓程（shāo 稍）立在地上发射，箭长镞宽，力量很大，倭寇频频发箭，勉强把明军挡住。

这时明军两翼的步兵也赶到了，呈半圆形站在骑兵两侧，静等主将的号令。戚继光怕将士为倭寇的长箭射伤，先不忙着进攻，却派人远远绕过去，从龙山所的后面进城，通知所里守军出城攻敌人的后路。城头上立刻擂起了战鼓，城门开处，守军呐喊着冲杀出来。后面又有许多老百姓自动地拿着铁叉、镰刀，一齐冲向敌人。

倭寇前后受敌，惊慌失措。戚继光看看时候已到，便勒马高呼：“壮士们，为家乡受难的父老乡亲们报仇的时候到啦，杀啊！”“杀啊！杀啊！”

一万多只喉咙齐声呐喊，像狂飙，像海啸，在戚继光的带领下向倭寇冲杀过去。倭寇的箭也射不出了，只好再施故伎，从海上逃走。但等他们跑到海边一看，他们停泊在岸边的船上遍插着明军的旗帜，原来俞大猷带兵过来，消灭了守船的倭寇，将船只俘获了。

倭寇的首领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以前跟明军作战，对方往往见风便逃，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呢？不过也不容他多想，还是逃命要紧。海路已经不通，他们只好沿海岸线南逃。戚继光和俞大猷率军在后追杀，又消灭了大批倭寇，只有少数的逃了性命。明军保卫龙山所的第二次战斗，又以胜利宣告结束了。

戚继光和俞大猷追敌回来，见谭纶正在打扫战场，三人见面，互相祝贺。接着又在龙山所里相聚了一天。他们志同道合，意气相投，真是相见恨晚。那天晚上竟一夜没睡，一直谈到天亮。最后依依惜别，各带所部回自己的防地去了。

嘉靖三十七年，又发生了“岑港战役”。岑港地处舟山岛的北端，港湾前临深水，后倚高山，地势十分险要。一大股入侵的倭寇占据了岑港，

以此为根据地，四出骚扰。总督胡宗宪调集大批明军前来收复，其中也有总兵俞大猷和参将戚继光。

不过岑港地势太险，倭寇倚山据守，明军攻打不下。战斗僵持了三个月，又有警报传来，另一股倭寇进犯台州。胡宗宪把戚继光撤出，让他到台州去增援。

戚继光奉令从舟山渡海，在定海上岸，经过奉化向台州急驰。还没赶到，探卒来报说台州知府谭纶已经将进犯的倭寇击退了。

原来谭纶接到探报后，一面派人向省城报警，一面布置防守。他将台州驻军和乡兵主力，埋伏到城北，城上只留少数将士。却又发动民众，用芦苇和长草扎成草人，放置在城墙上。远远看去，好像城墙上面站着成千上万的守军。倭寇来到城下，遥望守城兵多，不敢贸然进攻。这时谭纶让人在城北吹起倭寇联络时使用的螺号。倭寇听到螺号声，误以为是让他们到城北去集合，便纷纷向城北跑去。

谭纶看倭寇已进入埋伏圈，便手执火铳，向当头倭寇射去。“轰”的一声，这便是信号，一时芦苇丛里，火铳、火炮一齐发射，火光闪闪，炮声轰鸣。一阵枪炮过后，明军又手执刀枪冲杀出来，倭寇这时早已被打懵了，无力抵抗，只好向南方来路溃逃。谭纶追杀一阵，怕城池有失，便收兵回城。

探卒向戚继光报告了台州的战况，戚继光听了十分高兴。探卒又报说，残余的倭寇已朝温州方向窜去。戚继光本想到台州跟谭纶一晤，但想到温州又将遭倭寇蹂躏，便从台州城外的澄江渡过去，继续朝温州方向追击，只遣一名小卒持信去见谭纶，表示过境未入的歉意。

戚继光率军兼程前进，抵达温州北面的乐清，第二天便在盘石卫附

近将倭寇追上。倭寇反身来战。戚继光挥舞钢刀冲入敌阵，连斩几名倭酋。他所率领的将士虽然作战素质不高，但看主将这般英勇，也不由振奋起来。双方旗鼓相当，在旷野里五次接战，互有杀伤。天黑之后，双方对峙扎营，但戚继光已将倭寇拖住，使其无力去进攻温州了。

第二天，海上突然开来许多倭船，倭寇来了援军。岸上的倭寇和新倭会合后，全都乘上海船，沿瓯江向温州进攻。这时盘石卫守将李明和温州水师把总梅奎都来向戚继光报到，听戚继光指挥。戚继光审度形势，派李明回去守住盘石卫，却让梅奎率领船队悄悄绕过龙湾，去堵住江口，封死敌人的退路。这边戚继光率军沿瓯江缓缓向上游撤退，并作出仓皇逃跑的模样。敌人依仗船多人众，呼啸着溯江而上，越过盘石卫不打，直扑温州。

戚继光退到一个叫做馆头的地方，见这儿江岸陡峭，山高林密，而江面却又狭窄，水流湍急。戚继光便把将士们分布在两岸，埋伏起来。

倭寇船队逆流而上，行走缓慢，便让倭卒押着捉来的三百多名壮丁上岸拉纤前进，傍晚时分来到明军埋伏的地点。戚继光一声令下，北岸埋伏的火炮、火铳便朝倭船开起火来，弓箭手站在岩石上，居高临下，几乎箭无虚发。戚继光更是拿出神射的本领，把箭搭到弦上，双臂一分，“嗖”的一声箭便射出，而且专射敌船上的指挥或舵手。一箭刚刚脱手，旁边一个小卒便又把箭递了上来，一个递一个射，那箭一支接一支地连珠发出。

倭船有的起火了，有的失去了舵手在江心打转，更多的见南岸悄没声息，以为那边没有埋伏，便把船靠了上去，准备弃船上岸。这时戚继光抽出一支响箭，越江朝南岸射去。箭镞发出“呜呜”的哨声，直射到

岸边的岩石上。埋伏在南岸草丛里的明军一下子都跳了出来，向已登岸的倭寇杀去。倭寇遭到突袭，惊惶失措，有的被明军杀死，侥幸逃脱的又奔回船上，船只掉头向下游驶去。

这时天色已晚，倭船忙着逃跑，认不清航线，再加上江流湍急，不少船只撞上岸边的岩石，“轰隆”一声，船只撞得粉碎，那落水的倭寇也随着船只的碎板顺流而下了。岸上的明军一边沿江追赶，一边搜剿逃上岸的倭寇。有几艘倭船好不容易逃到江口，梅奎率水师已把江口堵住，迎个正着，以多胜少，这几艘倭船有的被俘，有的则被打沉。这一战，敌人来犯的船只全部被毁，倭寇被杀死、烧死、溺死的不计其数，江上漂浮着许多倭寇的尸体。后面来接应的倭寇不敢登陆，又弯回大洋里去了。

戚继光惦记着北战场的俞大猷，温州城也没进，把善后工作交给梅奎，便又率军北返了。在渡澄江时，谭纶从台州赶来，两人匆匆立谈了一阵，便又分手。戚继光仍从定海上船，抵达舟山岛，跟俞大猷会合后，夜以继日地向岑港的倭寇进攻。

倭寇不再坚守，乘夜烧了栅寨，转移到岛东侧的柯梅。那里有倭船接应。这伙倭寇见浙江有戚继光、俞大猷、谭纶三人镇守，他们几番吃亏，便离开浙江，转移到福建的浯（wǔ 吾）屿（今金门岛），继续劫掠福建沿海州县。

当倭寇窜到柯梅的时候，浙江总督胡宗宪侦知敌人不会在柯梅久居，只盼他离开自己管辖的浙江省便算了，因此对俞大猷和戚继光请求乘胜追击的建议并不采纳，致使这部分倭寇得到海上倭船的接应，窜到福建。于是便有福建籍的御史李瑚，上疏弹劾胡宗宪故意放走倭寇等三大罪。

那时严嵩专权，胡宗宪是严嵩的一党，严嵩自然不会处分他。可是胡宗宪知道后，认为俞大猷也是福建人，猜是他将这情况告诉李瑚的，便倒打一耙，反说：“倭寇残余逃到柯梅，势蹙力穷，容易成擒。而总兵俞大猷邀击不力，纵之南奔，播害闽广，宜加重治。”结果俞大猷反做了替罪羊，被拿问解京了。

俞大猷起解那天，戚继光去送他。两人握手无言。戚继光是胡宗宪从山东调来的，以前他对胡总督很有好感，但经过这件事，这位青年将领才知道仕途险恶，内奸有时较外敌更凶狠哩！

俞大猷到了北京，被押入锦衣卫狱中。那御史李瑚告的是胡宗宪，谁知他竟嫁祸于人，就觉得对不住俞大猷，便邀集好友同僚，请大家想法救出俞大猷来。当时朝政全在严嵩父子手中，朝臣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大家拿出俸银，凑了三千两，送给严世蕃，这才“买”下俞大猷一条性命。审理结果，判他发戍到大同边镇效力。那俞大猷在大同住了两年，才又回到福建。

却说岑港战后的第二年，即嘉靖三十八年，又有一股新的倭寇来到浙江，再次侵犯台、温一带。这时台州知府谭纶已升任浙江按察副使，他奉令援救台、温。谭纶便请调戚继光归他节制，胡宗宪同意了。戚、谭两个战友，又一次得以并肩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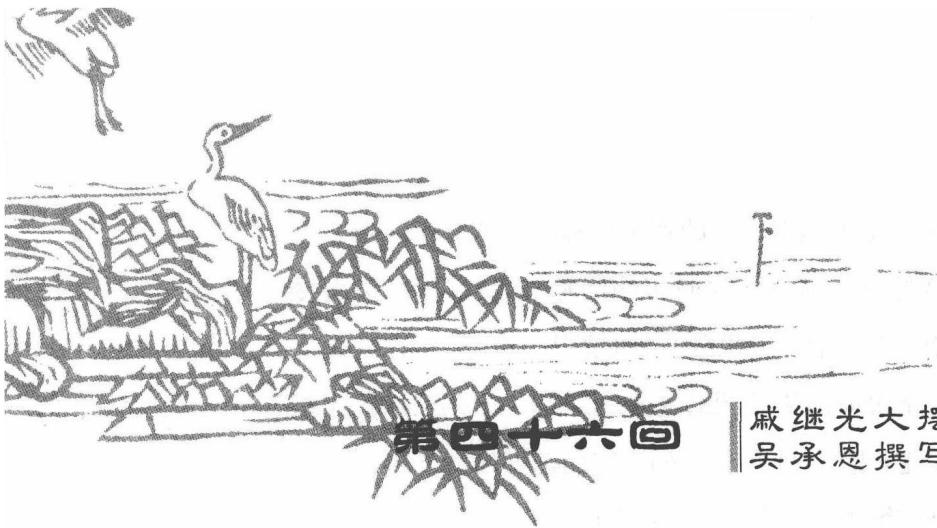
明军在戚继光、谭纶指挥下，首战桃渚所，再战海门。当时正逢雨季，将士们跋涉于泥涂之中，免不了发出怨言。戚继光只好一面加以慰勉，一面事事当先，用率身示范的办法来带领将士们前进。这时因浙兵虚弱，胡宗宪请示朝廷，从南京、河南、江西等地调来一些军队，称为“客兵”。甚至还从广西调来一些少数民族的叫做“狼兵”的战士。这些

军队战斗力虽然比当地卫、所的将士们强了一些，但纪律太差，不肯吃苦，有时还要抢劫。戚继光这时带的便是“客兵”。所以将倭寇打退之后，他就向胡宗宪请示，想要自己训练军队。

前两次申请没有结果，戚继光并不灰心，又第三次提出报告。这时谭纶已升任海道副使，他在总督胡宗宪面前替戚继光说话。胡宗宪这才答应了。于是戚继光交出军队，准备自己招兵。

戚继光听说浙中义乌的当地农民和外来矿工发生械斗，他便跑了去，约见农民领袖陈大成和矿工领袖王如龙，向他们晓喻了消除私怨、共同御寇的大义。陈、王二人听了十分感动，他们握手言和，并同时报名参军，带动了许多农民和矿工参加到新兵队伍中来。

戚继光经过严格挑选，只招了三千人，然后根据浙江的地理特点和敌人的作战特点，有针对性地对新兵加以训练，创造了“鸳鸯阵”、“两才阵”、“三才阵”等战术。同时还对新兵进行教育，严明纪律。经过一个阶段的训练，这支军队虽然只有三千人，却成了一支钢铁的队伍。嘉靖四十年，倭寇再犯浙江，戚继光的新兵该到战场上试一试锋刃了。



## 第四十六回

戚继光大摆鸳鸯阵  
吴承恩撰写才子书

胡宗宪要检阅戚继光的新军。

原先，胡宗宪是反对戚继光练兵的，倒不因为别的，他是怕戚继光离开后，浙江少了抗倭的主将。后来谭纶出来说话，答应此期间如有新倭来犯，他负责去抵挡。现在戚继光把新兵训练好带回来了，所以胡宗宪就要亲自看一看。

预定检阅那天忽然下起雨来。胡宗宪有些犹豫，但谭纶却来催促，胡宗宪只好动身了。他坐着蒙上油布的大轿，赶到校场。只见偌大的校场中央，站着一排排盔甲鲜明的将士，在瓢泼大雨之下，一个个直立着，便如塑像般动也不动。前面正中站着一员银盔银甲的将军，正是年方三十四的戚继光。

胡宗宪站在检阅台上，检阅新兵队伍。戚继光打头，后边的队伍一个分队一个分队从台前走过。雨越下越大了，雨水从将士们的头盔上、战袍上淌下来，但将士们精神抖擞，步伐是那么整齐，呼号声是那么响亮。虽然只有三千人，但校场上却像走过了千军万马。

胡宗宪回去以后，下令将所有的“客兵”退回原地，而把戚继光的

新兵作为机动作战的主力。平时各地卫、所要对倭寇严加防范，一有寇警，便由戚继光率军赶去迎击。

嘉靖四十年五月，倭寇又来侵扰浙江。倭寇施展阴谋，先派出小股部队佯攻宁海。胡宗宪派戚继光到宁海迎敌。快要走到，戚继光又接情报说，大股敌人正向台州进发。戚继光分析局势，断定侵宁海的敌人是故意来牵制他的，敌人真正的目的是要侵占台州。戚继光当机立断，派出军使赶往宁海，让宁海守将坚决守住，等待来援，自己却带领大军直朝台州奔去。

军队一昼夜行二百里，两天后赶到台州西门。守将告诉他倭寇已抵达台州东门外二十里的花街。戚继光把做饭的伙夫留在城里，其余的将士穿城而过，出了东门，直向花街扑去。

出了城外不远，便是一片田野，只见阡陌纵横，沟渠交错。军队一面跑步前进，一面遵照戚继光的命令，逐步往两下里展开，构成了一个个“鸳鸯阵”。

出城十五里，便和倭寇遭遇。在戚继光指挥下，几百个“鸳鸯阵”各自为战了。只见每一小队，领头是一名队长，右手执刀，左手拿旗指挥。两旁是两名战士，右边的持一个五角形的长藤牌；左边的持一圆形的大藤牌，把迎面敌人射来的长箭和掷来的标枪统统挡住了。盾牌兵的后边是两个各持一把“狼筅（xiǎn 险）”的战士。这“狼筅”也是戚继光发明的武器，原来是一根一丈三尺多长的大毛竹，由力气大的战士拿着，碰到敌人后左右横扫。倭寇的双刀长仅五尺，抵挡不住。毛竹虽然不硬，但连枝带叶，一扫一大片，刀砍上去却又柔软溜滑，尽管不能把敌人打死，但却把敌人扫得懵头转向。这时紧跟在“狼筅”后面的四个长枪兵

便赶上了，这才是这个小队主要的杀伤力量，他们在狼筅掩护下，挺起长枪猛刺。再后边的两人则拿着铁制的“镋 (tǎng 躺) 把”。“镋”是一种像叉一样的兵器，拿着它既可防守，做全小队的掩护，又可以协助长枪兵进攻。小队最后一个人，则是伙夫，负责全小队十二人的伙食。不过这时伙夫已被戚继光留在台州城里做饭了。

除伙夫外，作战的仅仅十一人，“鸳鸯阵”虽小，但几百个“鸳鸯阵”联结起来，却又是 大阵。浙江水田地区，正适合于这样的小队作战。现在“鸳鸯阵”铺展开来了，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各阵既能独自作战，又能互相接应。倭寇被陷入阵中，射出的箭被藤牌没收了，在“狼筅”的横扫下，他们只好左避右躲，冷不防长枪却又刺到。敌人很快地便被分割开来。战场上到处响着明军的呐喊声和倭寇的怪叫，还有就是被刺伤的倭寇的呻吟。有些倭寇被“狼筅”扫落到水田里，刚爬起来便被“镋把”当头盖下，脑浆迸裂。

倭寇狼狈逃窜了，前边是更密的水田网。戚继光让身边的传令兵吹起号角，“鸳鸯阵”一分为二，变成了“两才阵”，继续沿着田埂坝顶追击敌人，杀得一路上都是倭寇倒毙的尸体。一直追到澄江边上，残敌困兽犹斗，沿江摆成一字阵，负隅顽抗。这时明军的一个个“两才阵”又化零为整，组成一个庞大的“雁列阵”向敌人推去，前边扫，后边刺。只听江里“扑通扑通”连声响，倭寇都被推进澄江里淹死了。

明军收兵，沿途点数着倭寇的尸体，共计三百零八具。另外还擒获倭酋两名。至于掉进江里淹死的，便无法统计了。

明军还解救了被倭寇掳去的百姓五千人。大军回到台州城里，那时各“鸳鸯阵”的伙夫做好的饭菜犹有余温。这一仗仅用了一个多时辰便

将来犯的倭寇全歼，而明军阵亡的只有哨长陈文清等三人。

嗣后，“戚家军”乘花街大胜的余威，连续在健跳所、大田、上峰岭、洋坑、长昂洋、仰月沙，悬山、小藤岭，大藤岭等地作战，每战皆捷，共擒斩倭寇一千四百多人，敌人被焚、溺而死的四千多人，五郎、如郎、健如郎等重要倭酋数十人被生擒。

从此，“戚家军”威名远扬，倭寇闻风丧胆，望影而逃，不得不先后撤出浙江，移往福建。他们会同原来就侵占浯屿的倭寇，陆续攻掠了福建沿海的州县和岛屿。

福建巡抚向朝廷告急，兵部檄令浙江派兵增援，胡宗宪便把戚继光派往福建。这时戚继光边战斗边扩军，“戚家军”已增加到六千人。他们打着“戚”字大旗进入福建后，转战千里，连打胜仗。

第二年，嘉靖四十一年，严嵩父子势败，胡宗宪也被撤职，遣戍大同已经两年的名将俞大猷回到福建，仍任总兵。戚继光也升任为总兵官。朝廷为了加强福建的抗倭力量，更任命谭纶为福建巡抚。这三个战友再一次并肩作战了。他们转战福建沿海一带，扫荡入侵的倭寇，同时严厉打击与敌人勾结的汉奸、海匪。经过年复一年的战斗，倭寇有来无回，逐渐地不敢再来冒险送死了。嘉靖四十四年，戚继光和俞大猷再下广东，肃清了广东境内的残倭。至此，猖獗了二十年的沿海倭患基本得到平定。

但这二十年来，灭绝人性的倭寇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给沿海广大的居民带来严重的苦难，人们一提起那头上长着“犄角”、脸上五颜六色的“倭妖”，无不切齿痛恨。人们把这些“妖怪”编成故事，加以谴责。

有一部小说里对“妖怪”的形象有这样一段描写：

血津津的赤剥身躯，红媸媸的弯环腿足。

火焰焰的两鬓蓬松，硬搠搠的双眉直竖。

白森森的四个钢牙，光耀耀的一双金眼。

气昂昂的努力大哮，雄赳赳的厉声高喊。

这部小说便是那中外有名的《西游记》了。

不过《西游记》不是描写抗倭驱寇的纪实小说，而是一部神话故事。书里的“妖怪”也并不专指倭寇，还代表着当时残害人民的贪官污吏，作者只是借这部作品对那个时期的社会进行揭露和批判而已。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籍贯是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大约生于正德五年（公元1500年），卒于万历十年（1582），享年八十二岁。他父亲是个行商，常年在沿海一带的城乡贩卖绸缎布匹。他自小失母，少年时便跟着父亲走南闯北，通晓了许多世俗人情。却又天性好学，博览群书，加以聪慧敏捷，谈吐幽默，因此文采出众。父亲看他有出息，便请了老师来教他，想让他参加科考，将来弄个一官半职，也好显耀门庭。那时科举考的是八股文，是从“四书”中选出一句话作题目，然后再用四书五经所讲过的道理加以发挥，内容固定，形式死板，这对于才华横溢的吴承恩来说，实在是格格不入。吴承恩在父亲的逼迫下，几次应考，都由于他在答卷上天马行空，什么都写，根本不合八股文的要求，结果每次都名落孙山。父亲看他不是做官的材料，只好算了。

然而吴承恩还是被地方官看中了。在他三十八岁的时候，府学把他选为岁贡生，送到南京国子监读书。结业后分配到浙江的长兴县当县丞。

县丞是知县的助手，一个八品的小文官。那时长兴县知县是个粗鄙贪婪的家伙，成天只知道搜刮，置法纪于不顾。吴承恩在他手下工作，又不肯跟他同流合污，不免要受他的排挤打击。吴承恩本来就倜傥



(tì tǎng 替躺) 不羁，讨厌官场那些应酬周旋，更不能忍受上级的欺凌，因此几次跟县令发生口角，一气之下便辞官回家——那是嘉靖三十一年的事情。

吴承恩不做官了，仍然继承父业，做起行商来。他带一个伙友，贩运布匹，来到浙江黄岩。路上碰到一伙强盗，将他的布匹抢掠一空，伙友也被杀死了。他幸亏躲进芦苇丛中，才逃得性命。这伙强盗便是上文所说的倭寇。

吴承恩空手回家，在几亩祖业田上力耕度日。闲暇时间，想起多年来行贩各处的所见所闻，想起短短一年多的官场生活，也想起倭寇给浙江人民带来的种种苦难，便想写部小说来加以表述。为了把各类人物集中起来写，他准备采用神话小说的形式，用天宫来代表朝廷和官府，各种妖怪则是贪官污吏和倭寇海匪的化身，他还想大力塑造一个英雄人物，让他大智大勇而又忠肝义胆，用来象征那些像戚继光一样的英雄。这便是他写《西游记》的思想基础。

吴承恩看到一本名叫《大唐西域记》的书，记述初唐时的玄奘法师去天竺（今印度）求取佛经的经过。他觉得这个题材很好。但《大唐西域记》是玄奘的门徒辩机记录的玄奘的口述，十分简单，便又多方托友人寻找与玄奘取经有关的书籍。不久，友人便给他送来《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两书。前者是玄奘的门徒慧立、彦珠给玄奘写的传记；后者则是经过艺人加工的话本，已经不是历史而是创作了。特别是书中有个主要人物“猴行者”恰是他理想中的“主人公”。于是吴承恩便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反复酝酿构思，精心创作，终于写成了一本优秀的神话小说《西游记》。

《西游记》印刷发行之后，大受读者欢迎，一时竟使洛阳纸贵。人们把它和明初出版的施耐庵的《水浒传》、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相提并论，统称为“才子书”，给以相当高的评价。

《西游记》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前半部写孙悟空出世，大闹天宫，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后半部以大量的篇幅写孙悟空和师弟猪八戒、沙和尚保着师父唐三藏去西天取经的过程。书里的唐三藏取材于唐朝的玄奘法师，而孙悟空则借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的“猴行者”。

在《西游记》中，无论是天宫的玉皇大帝、西方的佛祖、地府的阎罗，还是西天路上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都代表着现实生活中的众多人物，反映着社会上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矛盾斗争，同时把希望寄托在孙悟空这样的英雄人物的身上。所以说，书中的人物是虚构的神话人物，但故事却反映着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存在。

## 第四十七回

楚王府权做奉祠正  
太医院苦读古书籍

嘉靖皇帝好道，王公贵族们也大炼金丹。在众多的大炼金丹的王公贵族中，有一个封国在武昌的楚王朱英熖。朱英熖是太祖朱元璋第六子楚王朱桢的后代，他迷信起神道来，似乎比嘉靖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把大量的金银财宝交给道士，让他们给他烧炼出可以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金丹。整个王府的前后院落、正偏各殿，到处可见一座座的丹炉，就像《西游记》中所说的太上老君兜率宫中的八卦炉一样。整日烟熏火燎，把这个好端端的王府弄得恰似一座砖窑。

有一天，朱英熖的儿子朱华奎病了，突然来了个大憋气，人事不省。朱英熖和楚王妃吓得手足失措，急忙把金丹取来，给小王子灌进肚里，结果毫无作用。过了好一阵，朱华奎才慢慢醒过来。王爷还以为是金丹生效了呢，可是第二天小王子又旧病复发了。

一个老太监对朱英熖说：

“王爷，看来小殿下的病还是找个医生来瞧瞧吧，光吃金丹怕是不行。”

“胡说，金丹百病都治，长期服用还能长生不死，岂会无效！”

“王爷，”王妃对金丹也有些怀疑了，便道：“不管怎样，请个医生来看看也不妨。”

“唔，那就找一个试试吧！”

过了两天，老太监领来一个瘦削的男子拜见王爷。老太监说：

“此人叫李时珍，他家世代行医，是蕲州的名医。”

“好吧，你领他给小殿下看病去吧！”

李时珍跟随老太监来到小王子朱华奎的住处，诊了脉之后，说：

“小殿下患的是气厥病，好治。请取纸笔来，待我开方。”

李时珍开出药方，小太监拿到武昌城里的药房去抓了药，熬好了给小王子服下。一剂见效，三剂下去，病就全好了。

楚王朱英熺很高兴，便让老太监把李时珍唤来，问他的家世。

原来李时珍字东壁，号濒湖，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生于蕲州（今湖北蕲春）东门外的瓦哨坝村。他家世代行医，父亲李言闻医术相当高明，曾著有《医学八脉法》、《四诊发明》等医学专著。不过那时社会上把医生列入“方伎”类，被人们瞧不起，所以李言闻就想让儿子改换门庭，放弃医业，于是把李时珍送到私塾馆去读书。偏偏这李时珍跟吴承恩一样，不喜欢钻研八股文。但他俩又有区别，吴承恩爱看的是神怪故事，说部传奇，而李时珍却爱读医书。仗着天赋聪明，十四岁考中了秀才，此后连续三次进省参加乡试，全都不第而归。老医生看儿子实在不愿走仕宦的道路，便让他学医了。

李时珍认为，医术重要，但药学也同样重要，仅有良医，却无良药，同样治不好病。于是在钻研医术的同时，花了大力气来研究药物。他在后园建立了一个小药圃，试种各种药材。那时的药学书，有汉代留下来

的《神农本草经》、南朝陶弘景的《本草经集》、唐朝的《新修本草》和宋代的《证类本草》。李时珍在实践中深入探究，发现前人这些“本草”书的内容，品类不全，许多药物没有记载，而且分类杂乱，“玉石水土混同，诸虫鳞介不别”；更要不得的是说明有误，这不但起不到医病的效果，反而会因为误用而将病人毒死。因此，李时珍下决心，要把古代传下来的“本草”重新修补增订，编写出一本新的、可靠的“本草”书来。

他把这个打算对父亲说了。老医生苦笑着说：

“你想得太容易了，编这样一部药学书，要把全国所有的药物重新查访过，一样一样地来鉴定，那要花多少人力和财力啊！谁有那么大的力量？”

“以前的本草又是怎么编写出来的？”

“唐朝、宋朝的《本草》，都是朝廷主持修的。就拿宋朝唐慎微主编的《证类本草》来说吧，当时朝廷派出几十人帮助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才把《证类本草》编写出来。”

“我们也可以请朝廷帮助嘛！”

“哼哼，”李言闻又一次苦笑，“当今皇上，一心迷信丹药，怎么肯拿出钱来编药书呢？”

李时珍听了很失望，但他重编“本草”的决心并未动摇。他开始自己收集资料，把遇到的一些药物的特点、功效等都记录下来，做将来修订“本草”的准备。

李时珍的名气一天天大了。嘉靖三十一年，他三十四岁的时候，楚王府的老太监要地方官请他去给小王子看病。县太爷也一改过去轻视医生的态度，郑重地派一乘小轿把李时珍护送到武昌。他三服药就把朱华

奎的气厥病治愈了。如今，楚王问李时珍的家世，李时珍想正好趁这个机会求楚王协助他编“本草”。想那楚王爷富甲云梦，派出几个人，拿出几个钱来帮他，肯定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然而楚王关心的却是丹药，问李时珍：

“李医生，你会炼丹吗？”

“回王爷，小民不会炼丹。”

“唔，”朱英熳有些失望，回头吩咐老太监，“取二十两银子赏他，再赐他三粒金丹。”

李时珍把金丹拿在手中，反复观看，又掰开来，嗅嗅，恳切地对朱英熳说：

“稟王爷，这金丹里含有水银和金屑，人吃下去消化不了，非但无益，反而有害。”

“这个你就不懂了，既称金丹，岂可没有金子！”

“其实……”

楚王不爱听，摆摆手不让李时珍说下去。李时珍把二十两银子和金丹交回老太监手中，对朱英熳说：

“小民不敢领赏，但有一事相求，请王爷恩准。”

“你说吧。”

于是李时珍提出，请楚王派人帮他修“本草”。可是朱英熳哪里肯花这笔钱？自然一口拒绝。李时珍要告辞回家，朱英熳却又不允，他怕儿子的病再犯，就强把李时珍留下了。

朱英熳委任李时珍当了楚王府奉祠所的奉祠正，这是一个正八品的官儿，专门负责王府的祭祀和各种典礼事宜，但除了节日忙活一阵外，

平时却无事可干。李时珍常常换上便服，外出游览。他有时雇一艘小船过江到汉阳去，观赏那里的名胜古迹；有时又进附近的洪山，逛一逛九峰寺。而去得最多的，还是离王府不远的黄鹤楼，他在那里可以一览大江上下的壮丽景色，也可以欣赏楼壁上古往今来的名人题咏。“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他多么想也能乘上一只黄鹤，飞进深山里，去为修“本草”而采集药材啊！

黄鹤楼旁边有一座小庙叫观音阁。庙里的老和尚跟李时珍很合得来，两个人时常沏一杯清茶，谈古论今，打发无所事事的岁月。有一天，一个蕲州来的香客发现了李时珍，传扬出去，大家知道他是蕲州世医李家的，不少人专程跑来找他看病。病人越来越多，这观音阁竟成了李时珍的义务诊所了。

匆匆过了一年，小王子朱华奎的气厥病再也没犯，李时珍三番两次要求离开王府，楚王便答应了。临走时，朱英熾和王妃召见他，赏他一串珍珠。但李时珍不领，却要求楚王代他启奏朝廷，准予派人协助他编新“本草”。

“哈哈哈！”朱英熾听他旧事重提，不由得笑起来，“你真愚蠢，皇上要的是圣药仙丹，管什么‘本草’不‘本草’。我才不去碰钉子呢！”

王妃在一旁说：

“这医生心诚，你就把他介绍到太医院去，让他自己试试吧！”

“好，好！看在你治好小殿下的份儿上，我成全你！”

李时珍拿着英熾的荐信，兴致勃勃地北上。他一路上观察山川的形势，做着将来领着人到全国考察的打算。到北京后，他拿了楚王的信去见吏部尚书万镗，终于被分派到太医院当了个正八品的御医。

李时珍上任的第一天谒见了院使和院判，刚说了三句话，就提出了修“本草”的事。院使笑了笑，没做声。院判却把脸一沉，不高兴地说：“你初来乍到，先把分派的工作做好，别的事休提！”

李时珍不死心，又上了个禀帖，详细地写明修新“本草”的重要性，请太医院主官代呈给皇上。院判把他唤去，将他写的禀帖往地下一扔，厉声说：

“你太狂妄啦！不看你是楚王推荐来的，立刻让你卷铺盖回家！”

李时珍叹息一声，俯身把禀帖捡起来，默默地退出了。

李时珍又去找院使，要求在御药房供职。院使比较好说话，答应了他的要求。御药房名叫圣济殿，天天忙着操办道士们要的炼丹材料，什么雄黄五百斤，水银一百五十斤，不但要得多，而且催得急，稍一怠慢，道士还要发脾气。可是圣济殿里却保藏着全国各地和外国进贡来的许多药品，李时珍就是为了这些药品才要求到御药房来的。在完成了分派给他的工作之后，他就钻进药库里，看呀、摸呀、嗅呀，还要用牙咬下一小块，品一品滋味，然后统统记录下来。他很高兴，很满意，朝廷虽然没答应帮他，但他还是觉得不虚此行。

圣济殿里还有一部分藏书。李时珍把全部药材考察完了，又如饥似渴地读书、抄书。这半年多的时间，他累得瘦了、黑了，但精神却格外振奋。他已下定决心：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新编一部“本草”。

在太医院工作了将近一年，李时珍把那里的藏药和藏书都考察完了，觉得再待在这里已无必要，正赶上来了家信，说他父亲病重，要他回去。他便趁机拿了信去见院使，要辞官回家。院使答应了。李时珍急急忙忙奔回家中，但他父亲却已病故了，临死时还向儿媳打听李时珍编“本草”

的情形。李时珍十分悲痛，觉得自己辜负了老父的期望，但他的决心却更坚定了。

李时珍要养家糊口，便又开设起诊所来，让儿子建方跟他学医，又招收了两个徒弟。诊病的余暇，就整理已经收集到的单方和资料。他又想，朝廷和官府不肯帮他，但民众是会帮他的。他便写了些《告白》，在四乡张贴。内容是谁有什么单方或药物，希望能送给他，大家一齐来编“本草”。

《告白》贴出后，有的人讥笑，讽刺，说他凭着个人的力量去编“本草”，这简直是蚍蜉撼大树。但大多数人还是支持他的，给他送来资料和实物。邻居一个姓杜的菜农认识许多植物，常常给李时珍当参谋。同时借去城里卖菜的机会，遇见谁家有新奇的花草，便千方百计地设法讨一棵来，带给李时珍。

有一天，李时珍拿一株开黄花的植物来找杜老头，问他：

“杜大伯，你看这是棵什么草？”

杜老头接过来反复看，惊奇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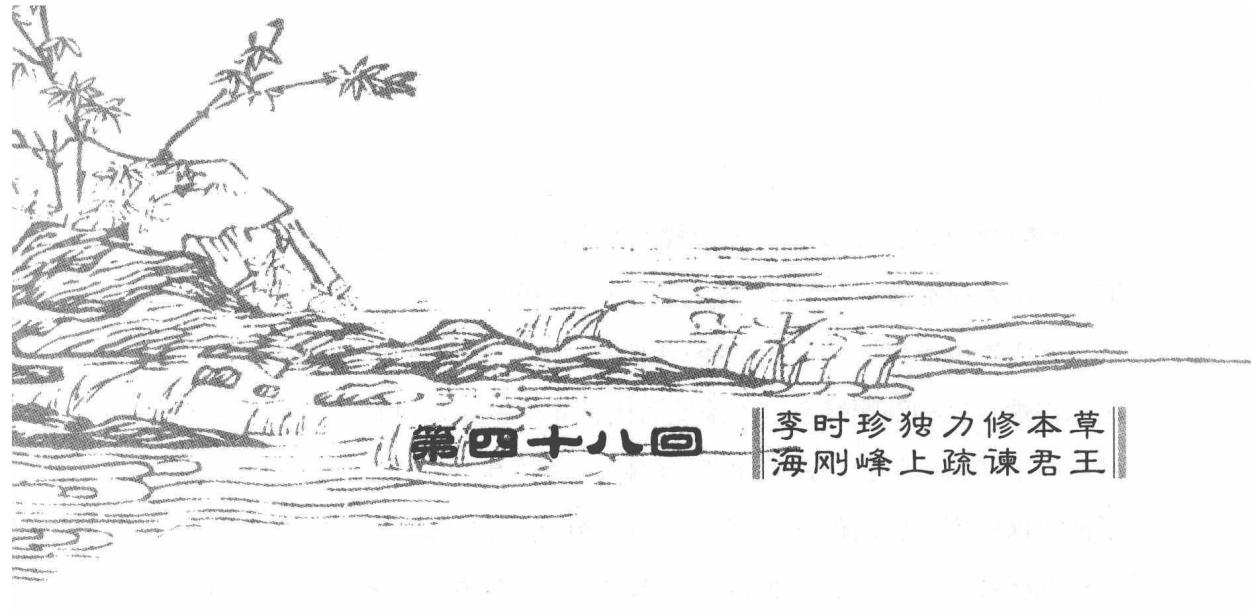
“你怎么啦？连这个也不认识，这不是油菜吗？”

李时珍也愣住了，是呀，这油菜在他家门前就有一大片呢，怎么单拿出一棵来，自己就不认识了呢？他连连笑着敲自己的脑袋，得出一个教训：不要光顾着去追求新奇的东西，而对当前司空见惯的事物却熟视无睹。

从此，他不但收集资料，还注意自己去观察，分析、研究。比如说，《证类本草》里有两种植物，一种叫白南星，一种叫虎草。李时珍仔细比较对照之后，发现是一物二名。《本草经集注》说远志的叶子很小，而

《开宝本草》却说远志是大叶的植物。谁说的对呢？后来多方考察，才知道二书说的都不错，因为远志是有大小叶之分的。

有些昆虫可以入药。《诗经·小雅》说：“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意思是蜾蠃这种细腰蜂自己不繁殖后代，而把螟蛉背回家去养着，螟蛉便变成了蜾蠃。因此，人们便把“螟蛉子”作为养子的代称。李时珍为了证实这件事，自己跑到后园里，在螟蛉虫的旁边等着。终于看到飞来一只细腰蜂，把这个青虫抱走了。李时珍跟着细腰蜂，一直跟到蜂窝，发现蜂窝里有几个僵了的螟蛉虫，而一些幼蜂正在啃食着它们。李时珍这才得出结论，蜾蠃负走螟蛉，不是拿它当养子，而蜾蠃也不是螟蛉变的。真相是：蜾蠃把螟蛉抱回家去，把蜾蠃卵排在螟蛉体内，同时给它注射蜂毒，让它麻醉。等到蜾蠃卵孵化以后，幼蜂便以螟蛉为食。李时珍就是这样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更正了两千年来错误的说法，给以科学的正确结论。



## 第四十八回

李时珍独力修本草  
海刚峰上疏谏君王

李时珍白天诊病，晚上修“本草”。手头的资料用完了。他跟妻子商量，留下儿子和一个徒弟应诊，自己带着徒弟庞宪外出采药，用实践的知识来把“本草”编完。

师徒二人风餐露宿，踏上寻药的道路。因为大多数药材都生长在深山里，这样就倍加辛苦。他俩走遍了湖广、江西、浙江、河南等地的高山峻岭，涉过大江（即长江）和湘、赣、汉、桐等河流。有时钱用完了，便回家来行医，待积攒了些路费，就又出发了。

寒来暑往，李时珍的头发渐渐白了，腰也开始佝偻，但他的决心毫不动摇。

有一天，师徒二人来到武当山。这山是天下名山之一，从山脚望去，里边层峦叠嶂，全是郁郁葱葱的树木。李时珍非常高兴，认为在这山里一定可以采到许多珍贵的药材。可是等到进了山口，却见一座高大的石碑竖在路边，碑顶上大字写着“御批”二字。李时珍走过去细看碑文，不由得大为失望。

原来碑文大意说：当初此山紫霄宫的祖师张三丰，曾协助太祖朱元

璋打天下。朱元璋做了皇帝后，封张三丰为“通微显化真人”，赐山名为“太和山”，修葺了宫观，并降旨此山的一草一木任何人不能砍伐采折，违犯的交由地方官员予以惩处。

虽然按日子说这座碑建立已经有两百年了，但看石刻的字迹上，红油的色泽依然新鲜，像是刚涂上不久，那么可以想象，这座碑文上的“御批”仍然有效。怪不得此山植物如此繁茂，想也是没人采伐的缘故。

李时珍回头想走，但走了几步又转回来，他实在舍不得入宝山空手而回呀！他终于带着徒弟进山了。他不敢走大路，从林间小路钻进去。果然采到了许多珍奇的、罕见的植物。

李时珍背的袋子装满了，他把背上的薄棉被解下来，掏出棉絮扔掉，把采集的植物装进被套里。正采得高兴，突听一声大喝，他们被两个巡山道士发现了。道士要带他们走。李时珍百般解释，道士始终不听。那庞宪会一点儿武功，便跟道士较量起来。但武当山的武功与少林寺齐名，道士人人都是高手，庞宪三下两下就被道士擒住了。

李时珍师徒被道士用绳子绑着，押到紫霄宫，见了住持。住持是个白胡子老道士。他让道士搜了李时珍师徒身上，见只搜出几块散碎银子和几件旧衣服，便吩咐说：

“衣、银还给他们，把他们送到县里去治罪。”

“为什么？”李时珍大声问。

“你来时没见山口的‘御批’吗？你分明是个药贩子，来本山盗药，还有何说？”

“你这话没有道理！天生一物，自有一物的用处。你把山里的药材据为己有，不让别人拿来治病救人，你出家修行又有何用？”

“胡说，赶快把他押走！”

两个道士推推拥拥，要把李时珍师徒带出去。庞宪急了，大声嚷：

“我师父是楚王府的奉祠正，太医院的御医，怎么会是药贩子？你休要诬赖人！”

这时住持身边一个道士对住持说：

“师父，我认出来了，这人的确做过楚王府的奉祠正。”

原来武当山的道士虽然不炼丹药，却也做道场。楚王曾请紫霄宫的道士到王府去建坛打醮，那时便是这个道士带小徒弟去的。他在王府建醮七七四十九天，虽然跟李时珍没有来往，却也知道他是王府奉祠所的奉祠正。

住持听说后叫把李时珍带回来，让道士解开绑绳。那认出李时珍的道士道号清虚，他询问李时珍为什么出来采药？李时珍便把编“本草”的事说了。老住持捻着长须频频点头，吩咐摆斋款待师徒二人，但却抱歉地说：

“先生编‘本草’，这是大好事，本来应该助先生一臂之力。但山规是皇上所订，贫道也不敢违背，只好把先生采集的东西留下了。”

庞宪争辩说：

“那里边还有我们在别处采的呢！”

“鱼目混珠，无法辨识，只好一概留下了。实在对不起！清虚，你代为师送二位下山。”

李时珍垂头丧气地离开武当山，走了二十里，来到一个村店，天色已晚，便住进店里。二更天气的时候，只见一个道士推门进来，却是武当山上的清虚道人。清虚背上背了一个大包，正是白天被扣在山上的那个。



清虚放下包袱，说：

“白天在山上，师父见人多，只好把先生的东西留下，以免别人说违了山规。现在家师让小道把东西给先生悄悄送来。白日多有冒犯，先生休怪。”

李时珍喜出望外，赶忙上前接过。清虚又从背上解下一个黄布包袱，说：

“这是武当后山产的几株药草，别处是难得见到的。家师让采几样来，奉送给先生，以助先生早日编成‘本草’。”

李时珍接过一看，确是从未见过的植物，闻一闻，异香扑鼻，便对庞宪说：

“快把你身上的银子拿出来，送给道长。”

“这是干什么？”清虚惊讶地问。

“权当给贵观的一点儿香火，只是途中盘缠所剩不多，不成敬意了。”

“哈哈哈！”清虚笑起来，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元宝放在桌上，说：“此去蕲州路远，家师见先生囊中即将空了，故命小道拿五十两银子送给先生。”

“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李时珍连连推辞，但清虚却笑着转身，飘然而去了。

李时珍望着桌上的两个包袱，一枚元宝，不禁发起呆来。庞宪问他：

“师父，我们明天就回家吗？”

“不，我们明天到城里脚行去，托人把这些药材捎回家。咱们现在既然有了盘缠，那就再往西北的方向走走。”

.....

就这样，李时珍前后用了二十七年时间，走了几千里的路程，向千

百个农民、渔人、猎户、樵夫、和尚、道士和药农求教，参阅了八百多部医学著作和古代书籍，经过三次较大的修改，并动员了他全家——儿子、孙子和徒弟们的力量，终于完成了一部辉煌的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全书共一百九十多万人字，收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载入药方一万一千零九十六个，插图一千一百一十幅。

这是一部给人类造福的书。书上的每一个字、每一幅图，都凝聚着李时珍的血汗。

在这期间，李时珍还以求实的态度，对道士炼出来的金丹加以仔细的研究，断定这种丹药人服下去有百害而无一利。想想嘉靖皇帝每天都在服用这种东西，这等于是慢性自杀。又想到由于皇帝的提倡，全国有多少人在同样地走着这种摧残自己的道路，又有多少财富被白白烧掉！他想，只有劝告皇帝停止服用，才会把这种邪风刹住。于是他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章，详细陈明了金丹的害处，请皇上务必珍惜圣躬，不再去费财伤身——这是嘉靖四十四年的事情。

李时珍的奏章送到了北京的通政使司衙门。通政使司是朝廷的收发机关，一切奏章疏文都要先送到这里，节写副本后再把原本送呈皇帝。不过二十多年来情况有些变化。严嵩当了内阁首辅后，嘉靖皇帝朱厚熜居住在西苑万寿宫，通过严嵩遥控朝政。却没想到倒被严嵩控制了他自己。那时通政使赵文华是严嵩一党，奏疏不是送给皇帝而是先送到内阁去交给严嵩。严嵩把对自己有利的交给皇帝看，而那些不利于己以及弹劾自己的疏章自然要扣下，并对上疏人进行报复。许多人早晨上疏，晚间入狱，而皇帝却不知道。嘉靖四十一年，有个御史邹应龙，了解到这个情况，便买通了一个太监，托他把弹劾严嵩的疏文直接送到皇帝手中，

而不通过通政使司。于是朱厚熜才知道他绝对信任的老严嵩，竟是一个大“奸臣”。朱厚熜派人调查，证实邹应龙所揭发的都是事实，从严府抄出了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二百零五万五千多两。朱厚熜大怒，把严世蕃充军，后来又杀了头。对年近八十的严嵩还顾着点儿情面，把他打发回了老家，让他在贫病交迫中度一个苦恼的晚年。严嵩的党羽当然也是树倒猢狲散，分别受到了惩处，包括原来的通政使赵文华在内。

后任的通政使叫刘体乾，是个比较正直的官员。他看到李时珍的奏章后，心想：多少高官为了谏诤这炼丹的事，下狱的下狱，回家的回家，有的还送了命。到后来，皇上简直形成了习惯的反应，只要看到章疏中有关“金丹”的字样，立刻批下“着即拿问”四个字。你李时珍一个老百姓，何必也来捅这个漏子，白白送了性命？

刘体乾觉得这“李时珍”三个字好眼熟。细一想终于想起来，十几年前他当兵科给事中的时候，有一次患急病，是太医院一个叫李时珍的御医给他治好的。他又一次看了奏章，断定上书人就是那个退职的御医。于是刘体乾决定不把这份奏章送给皇上，以免李时珍枉自送了性命，这也算是对李时珍的“酬答”吧。

然而过了几天，又有一份谏诤皇帝的疏文投递到通政使司来了。刘体乾摇摇头。他可以私自扣下一个老百姓的上书，而对这件户部主事的疏文却必须照转，因为虽然说主事只是个六品官，但终究是一员廷臣，是中央衙门的“京官”，他们有的还有资格上朝呢！通政使可不敢私自压下他的奏疏，尽管通政使是一位三品大员。

这位上疏的户部主事便是李贽的朋友海瑞。

海瑞为什么要上疏呢？原来这年八月，皇帝突然在几案上和被子里

发现了一粒金丹和一只桃子。问是谁放的？谁也不知道，那么当然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啰！朱厚熜服用之后，还要跑到太极殿去拜谢天帝，又跑到太庙去禀告祖先，让他们知道他得天独厚，将长生不死了。偏又有一些无耻的官员纷纷上表祝贺，一时闹得熙熙攘攘，朝廷上下忙碌不堪。但大多数有识的官员对这些愚蠢的举动只是暗中讪笑，因为他们看得很清楚，什么上天赐药赐桃，不过是皇帝身边那些好猾的内侍们玩的把戏而已。他们偷偷把药丸、桃子放在那里，目的是讨取皇上的欢心，因为皇上一高兴便会赏钱！不过官员们虽然心里明白，却谁也不肯讲，不愿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

现在海瑞出来说话了。这个海瑞字汝贤，号刚峰，广东琼山县（今海南岛海口市）人。他的性格和他的号一样，“刚”直异常，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竟敢跟总督抗衡，因而颇有点儿名气，这是个不怕死的官儿，也只有他敢来拆穿皇上和那些谄臣们玩的戏法。

海瑞的疏文，洋洋洒洒数百言，据理而谈，直斥君非，实在算得上是一篇历史文献。限于篇幅，只摘录要点大意如下：

“日前严嵩罢相，严世蕃受到极刑，也算是略快人意吧。不过严嵩罢相之后，也不过就是严嵩没当宰相以前的状况罢了，政治并不怎样清明，比起汉文帝来那是差远了。

“天下人不满意陛下已经很久了。古代君王有过，靠臣子们来匡正，今天陛下修斋建醮，群臣便相率来进香，陛下说得了仙桃、天药，群臣纷纷上表祝贺。陛下做的事是错的，群臣顺从陛下当然也是错的。群臣没有一个人肯来向陛下说真话，都是些谄谀的人。其实他们都犯了欺君之罪。”

“陛下的错误太多了，最大的错误就是斋醮炼药以求长生。陛下受长

生之术于陶仲文，称他为‘师’。可是陶仲文后来不也死了吗？他自己都长生不了，陛下又怎么能单独求到长生？至于仙桃天药，尤其怪妄。桃必采而后得，药必制而后成。现在无缘无故地就得到了，是它们有脚自己跑来的，还是天有手付给的？这都是陛下左右的奸人，伪造荒诞以欺骗陛下，而陛下却信以为真，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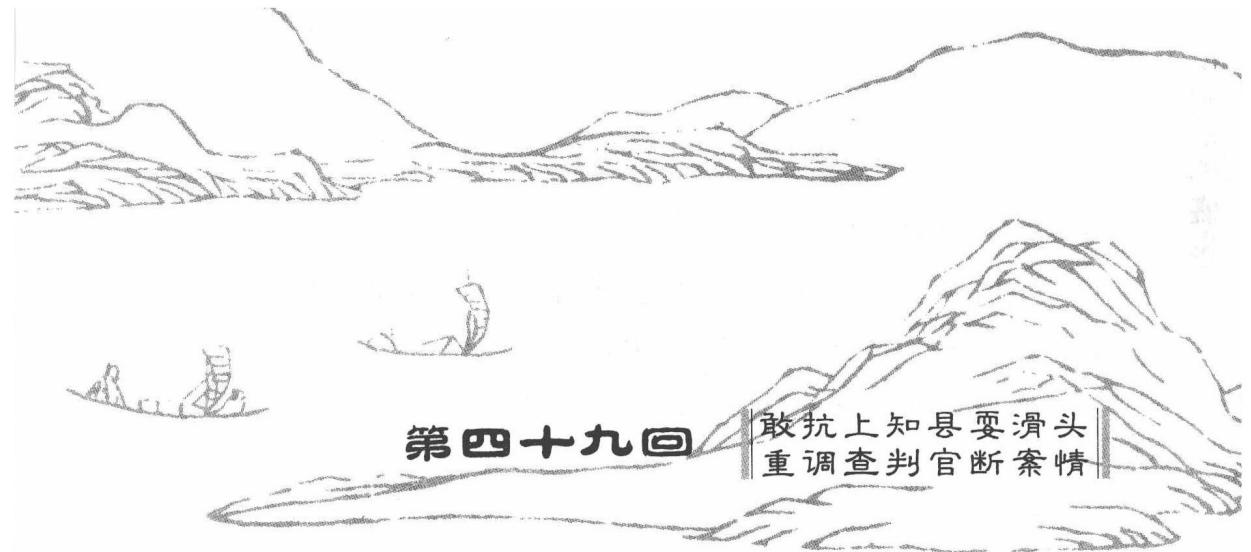
海瑞在疏文中指责皇帝，不只是上述的迷信举措，还有其他内容，比如说他“一意修真求仙，滥兴土木建筑道观，竭尽了民脂民膏”，说他“二十多年不上朝，致使法纪弛坏”，说他“不跟二王（指皇子）见面，人以为薄情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情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后宫，人以为薄情于夫妇”，以致“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请陛下认真想一想，今日的天下到底怎么样？”

疏文还指出朱厚熜的“心惑”、“情偏”、“拒谏”等行为的不当，指出他喜欢严嵩那样顺着自己的奸臣，却不喜欢梁材（曾任户部尚书，因反对朱厚熜大兴土木被革职）那样逆着自己的忠臣。致使“诸臣宁为严嵩之‘顺’，而不为梁材之‘逆’，不过是窥到陛下的缺点，暗中有所趋避罢了。这对陛下又有什么好处呢？”

然而最厉害的，怕是这一段了，疏文说：“今愚民们传说，‘嘉者，家也，靖者，尽也’，‘嘉靖’的意思就是民穷财尽，什么也不剩。”

海瑞要求皇帝“一洗数十年的积误”，指出这并不难，“只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

疏文的结尾是：“今大臣们为了保持禄位而不得不谄谀，老百姓怕受到责罚而闭口不言，臣实在是不胜愤恨，是以冒死上疏，以表区区的微忱，敬希陛下垂听。”



## 第四十九回

敢抗上知县要滑头  
重调查判官断案情

上面说到海瑞颇有点儿名气，那是由于他在浙江淳安县当知县的时候，曾发生了一件跟总督胡宗宪有关的事情。

总督是嘉靖年间新设的官职，起初是临时性的，由朝廷委派京中的大员代表朝廷到各省去视察、监督。但总督的权限很大，诸凡政务、军事、监察等部门，都得听他的，事实上他就是当地的半个“皇上”。

胡宗宪当浙江总督之后，对海瑞这样一个七品芝麻官，第一个印象是听人说海瑞拒收“常例”。海瑞认为一切薪俸之外的所得都是非法的，都是“贪污”行为。他不收“常例”，也不向上级送“常例”。他的做法在那时的地方官里是独一无二的。

胡宗宪好奇地问那向他报告的人：

“县令的薪俸有限，这个海知县不收‘常例’，他靠什么生活呢？”

“听说他在县衙后园开了一块菜圃，自己和一个老仆亲自耕作。”

“唔，”胡宗宪不以为然地说，“县令去种菜，不是把政事耽误了吗？”

“那倒不然，他种菜只利用早晚的公余时间。提起政绩来，海令在淳

安县真是有口皆碑哩！”

胡宗宪对这位海知县产生了兴趣，经常向左右询问海瑞的情况。有一次，胡宗宪像宣布一种大事似的对僚属们说：

“你们知道吗？海知县前几天给他母亲做寿，竟一下子买了二斤猪肉。”

僚属们“哈哈”大笑起来。在胡宗宪来说，他讲这种消息多少带点儿挖苦的意思，然而不久就发生了一件让他不痛快的事情了。

胡宗宪原籍绩溪（在今安徽省）。有一次，他的儿子从浙江省城杭州带三千两银子回家，走的是新安江水路。船到淳安，胡公子上岸准备换乘车马。一伙人住进淳安县驿站。吃饭的时候，驿丞带着驿卒送来了饭菜，原来是一碗糙米饭，一碗青菜，一碗豆腐。这种菜饭，别说胡公子不肯吃，就是他的下人也难以咽呢！胡公子发怒了，吩咐家丁把驿丞捆起来，倒吊在大梁上。

驿卒赶忙去报告海瑞。海瑞带着衙役赶往驿站，一看是一个公子哥儿在那里发威。海瑞明知他是胡宗宪的儿子，却假装不知道，问他：

“你是什么人？”

“哼，咱是总督胡大人的长公子。怎么？你们淳安县竟敢拿这种伙食招待咱吗？”

“胡说，胡大人何等正直廉明，他的公子肯定是斯文有礼，岂能像你这样胡作非为！看来你定是一个匪徒，假冒胡公子的名义出来招摇撞骗。衙役们，给我拿下！”

“你大胆，你……”胡公子还要咆哮，早被两个差役拧着胳膊捆上了。



胡府的管家急忙上前，说：

“大人，大人，使不得，他确实是胡总督的公子呀！”

“好，你一定是他的同党，捆起来！”

绑上了公子和管家，豪奴们争先恐后地逃去给胡宗宪报信。这边海瑞让人把驿丞放下来，又搜查了胡公子的行李，发现了三千两银子，便吩咐没收入库。跟着海瑞便回衙给胡宗宪写了一个禀帖，说捉获了一名冒充胡公子的匪人。何以知道他是冒充的呢？因为胡大人身为总督，一定教子有方，而这人横行霸道，竟将驿丞吊起凌辱，显然是假冒的了。现已将他诈骗的银子三千两没收入官，并将冒充公子的罪犯两名解往省城，请总督大人处理，以免让假冒公子的匪人坏了总督的名声。

胡宗宪在杭州，听逃回的家奴说公子被淳安县捉去，不由怒火冲天，便要派人问罪。但跟着就接到海瑞的禀帖，还有差官押送来的他的儿子和管家。胡宗宪看了海瑞禀帖里那些义正词严的话，只好吃个哑巴亏，说不得要写个复文让淳安县来的差官带回去，说：“这种假冒官亲的不法分子，实在是胆大妄为，本督定将其严惩不贷。”还要夸奖海县令“治盗有方，殊堪嘉奖”哩！

这件事传说开去，有人说这海瑞真是糊涂官儿，总督大人的公子他怎么敢惹！却又有人说海瑞这糊涂是故意装出来的，是要了个滑头。

过了几个月，海瑞又做了一件假装糊涂的事情。那时八省巡盐都御史鄢（yān 烟）懋（mào 冒）卿来浙江视察盐务，路过淳安。这鄢懋卿也是严嵩一党，他一路招摇，搜刮钱财。海瑞听人说，别的州县招待鄢懋卿，一席酒宴要耗银三百多两，席间还要献上金花银缎为鄢大人祝寿，供帐自然是无比华丽的了，连夜间使用的溺器也需要银制的。不过这鄢

懋卿却还要老虎戴念珠，假充善人。所经之处，事先都发去文告，说些各地接待规格要从简，不要奢侈浪费等的官样套话。

这一天，鄢懋卿带着妻妾、幕僚和从人，来到淳安县。海瑞为了表示恭敬，特意把鄢懋卿一家人请到县衙。这鄢懋卿以为县令是要背着众人孝敬他什么值钱的东西了。一行人高高兴兴地来到淳安县衙后堂，坐到桌前等着上席。那县令海瑞却先躬身讲话：

“下官前接鄢大人文告，内称：‘本院素性简朴，不喜承迎。凡饮食供帐俱宜简朴为尚，毋得过为华奢，靡费里甲。’鄢大人如此关心黎民，使下官十分感动，怎敢不谨遵钧谕行事，而有累大人清誉呢？为此备素席一桌，由拙荆亲自下厨，待下官去端菜来。”

说着海瑞便走了出去，鄢懋卿还在发愣，就见海瑞挽起袍袖，一手擎着一只碗，里面无非是青菜、豆腐、茄子、青椒之类，一边往上端一边嘴里嘟哝：

“这都是下官自己种的，请大人尝个新鲜……”

鄢懋卿鼻子都气歪了，站起来带着妻妾便走，也不在淳安县住，连夜上路了。

鄢懋卿觉得窝火，自己不好发作，便指挥他手下的巡盐御史袁淳给海瑞捏造个错处，参奏了他。总督胡宗宪趁机在袁淳的奏折上批上几句坏话，于是海瑞便被降调为湖广兴国州（今湖北阳新）判官。

海瑞官阶低了，又当了属官，可他根本不在乎，兴冲冲地跑到兴国州去上任。这时海瑞的正直和认真的作风已经传扬出去了，知州便派他审理案件。

有一天，一个富户来报案，说他家的一名女婢因失手打碎一只翡翠

盘，怕主人责罚，竟上吊自杀了。那时候有钱人家，常常买一些童男少女来做僮仆女婢，供他们役使。事实上这些仆婢们已经毫无人身自由，任凭主人打骂凌辱不说，还可以像牲口一样随便买卖。所以通常发生了仆人自杀这种事，主人只需到官衙申明，顶多花上几个钱，便可了事。

海瑞接案后，派仵作到富户家去验了尸体，回来报说那婢女确系上吊自杀。海瑞的认真劲儿又来了，非要亲自去查验不可。他带着仵作、衙役来到富户家中。那时那死去的婢女已被主人用薄棺殓起，放在后园。海瑞来到棺旁，命人将棺材的盖子揭开，他俯身下去看了又看，才命将棺盖盖好。转身来到富户家大厅。富户赶忙送上茶水。海瑞坐定了问：

“你家婢女是打碎了翡翠盘才畏罪自杀的吗？”

“是。”富户躬身答应。

“那碎了的翡翠盘何在？”海瑞笑着问，“想不至于扔掉吧！本官想讨取一点儿碎片，镶只戒指，不知肯不肯惠赐呀？”

“这个，”富户惊惶起来，连忙说，“那翡翠盘已被小民抛掉了。”

“咳，可惜，可惜！”海瑞叹气说，“其实翡翠盘碎了，还可以做很多首饰呢，比如做个烟袋嘴儿啦，镶到耳环上啦，都能派上用场，扔了实在可惜。不知还能找回来吗？”

“找、找不到了。”

海瑞摇摇头，又问：

“那婢女是在什么地方上吊的？”

富户东望西望，最后指着大梁，说：

“就吊在这儿。”

“她上吊的绳子呢？是丝绳，还是麻绳？”

富户预感到事情不妙，吞吞吐吐地答不上来。海瑞接着又问：

“是谁第一个发现的？”

“是家人……”

旁边站的几个男仆，你瞅我，我瞅你，谁也不做声。富户只好指一指其中一个年岁大的，说：

“是他。”

“是你吗？”海瑞问那家人。

“是小人。”

“你找根绳子，在大梁上原来拴绳子的位置拴上，就跟你刚发现的时候一样。”

那家人出去找了根绳子，搬一张椅子放在大梁下边，站到椅子上往大梁上拴绳子。但椅子矮，够不着，他又搬来一张桌子，才把绳子拴上，还结成一个环儿。

“你先别下来，”海瑞对那家人说，“你吊一下我看看，当时是怎么个情状。”

“大人……”那家人站在桌子上，哀声求告，“小人没错儿。”

“又不让你真吊上去，比量比量就行了。”

那家人双手扯住绳环，刚要往里伸脖子，海瑞却又止住了他：

“不是那样，是把后脑勺伸过去。不明白吗？我要你吊后脖颈。”

后脖颈当然吊不上，海瑞便让家人下来了，然后叫过仵作，问他：

“你在验尸单上写那婢女确系上吊自杀，是吗？”

“是！”

“衙役们，把他扯下去，打二十大板！”

“小人何罪？……”

海瑞不由他分说，挥挥袍袖让衙役们用刑。“噼噼啪啪”二十板打完了，海瑞又吩咐他：

“你再去验来！”

仵作一瘸一拐地带两个衙役朝后园走了。过了一会儿，回来禀报：

“死者脖颈前后都有勒痕，不是吊死的，而系被人勒毙。”

“那么你得了他多少银子？”

“小人该死，小人该死！”仵作跪在地上一劲儿磕头，那边“扑通”一声，富户也双膝跪下了……

海瑞在淳安和兴国任上，处理过许多类似的疑案、要案。他不畏权势，大公无私，而又注重调查，善于推理，所以每件案子都审理得比较公允。后来邻近州县发生了重大的疑难案件，上峰也常调他去参加会审，因此得了个“海青天”的称号。

过了几年，严嵩垮台了。他的同党鄢懋卿和胡宗宪也随着离任。由于海瑞曾反对过鄢、胡，因而声望愈加高了。嘉靖四十三年，新任吏部文选司郎中陆光祖推荐他做了户部主事。后来便发生了上疏斥骂皇帝的事件。

是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确实觉得海瑞在疏文里骂他，瞧瞧他说的都是什么话？“比起汉文帝来那是差远了！”“天下人不满意陛下已经很久了。”“陛下的错误太多了。”“实在是大错特错了。”还有什么“竭尽了民脂民膏”，什么“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而最使他不能忍受的是，海瑞竟敢假借“愚民”之口，咒骂他的年号“嘉靖”为“家尽”，说他的天

下是“民穷财尽，什么也不剩”。

朱厚熜看了海瑞的疏文，差一点儿气死，他把疏文朝地上一扔，对左右说：

“快把这个海瑞抓起来，别让他跑了！”

太监黄锦在旁边回答：

“这个海主事根本没想跑，听说他连棺材都准备好了，还把后事做了安排。并把他的老仆人打发回家，免得仆人受到牵连。”

朱厚熜默然了，没想到海瑞上疏是把性命舍上去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皇帝也不由得要认真想一想了。他把海瑞的疏文捡起来看了又看，觉得有些话好像有道理，就拿陶仲文来说吧，他自己不也只活了八十岁吗，又怎么能让别人长生不老呢？再想想自己，这两年常常肚子不舒服，心口疼痛，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莫不是那金丹确实无效？

他又想，这些话为什么以前没听见别人说？难道真的如海瑞所说，“群臣没有一个人肯来向陛下说真话，都是些谄谀的人”吗？

但是再看看海瑞疏文中使用的语言，朱厚熜又气愤起来，就算海瑞是忠心吧，可他对皇上也太不尊敬啦！

但朱厚熜终于把疏文留中了。“留中”的意思便是文件押在皇帝那里，既不处理，也不退回。这样过了几个月，朱厚熜还念念不忘这件事，有时自言自语：

“哼，你这个海瑞想学比干吗？难道朕就是商纣王？”

有时又气愤起来，拍着几案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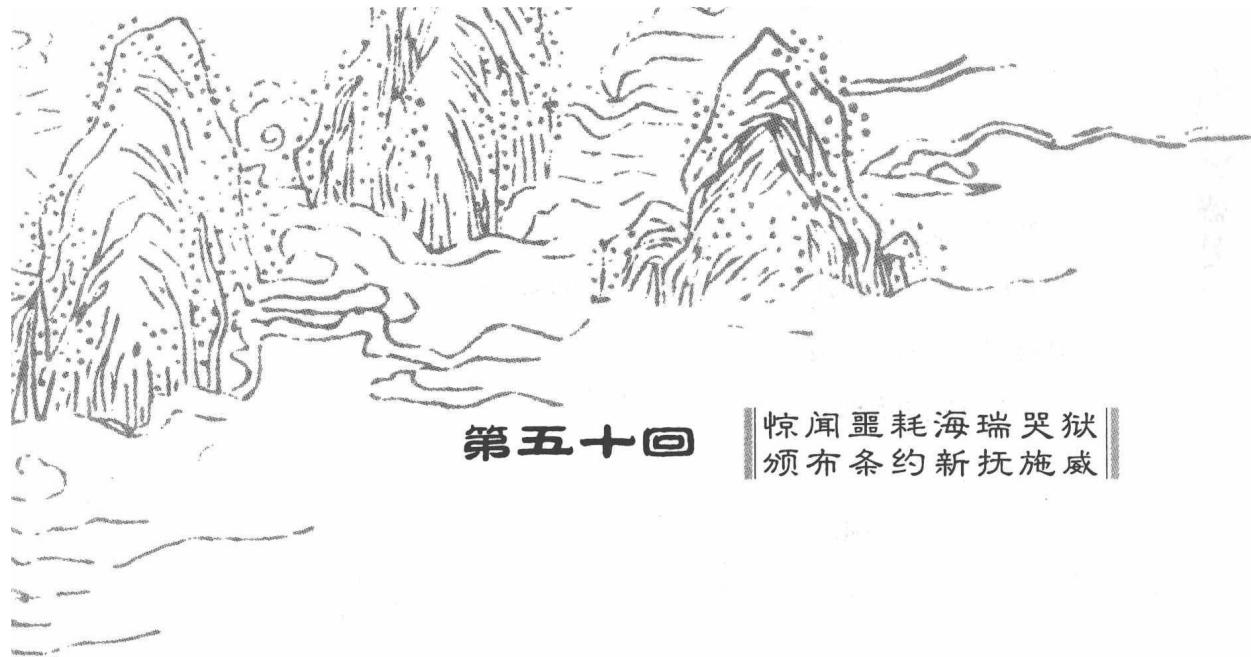
“你这个海瑞畜生，竟敢骂我！”

这时如果旁边有宫女，朱厚熜便会迁怒于她，找个碴儿责骂一顿。

无辜挨骂的宫女只好背后向同伴抱怨：

“皇上叫海瑞骂了，就找咱们出气。”

不过从朱厚熜的这些言行可以看出，皇帝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



## 第五十回

惊闻噩耗海瑞哭狱  
颁布条约新抚施威

嘉靖四十四年冬天，皇帝朱厚熜病了，他的胸腹坠闷，肠胃疼痛，终于不敢再服金丹，而请太医院的医生来诊治。然而病情却日渐沉重。转过年——嘉靖四十五年正月，朱厚熜把大学士徐阶叫到榻前，跟首辅商量。因为太子早逝，现在要确定哪一个皇子来当太子，以便继承帝位。他闭着眼，说：

“细想想，海瑞的话是不错的。可惜他讲得太晚了。”

徐阶的脸色一红，皇帝的话里有话，好像在问：“你们为什么不讲？”可是徐阶又不平地想，我们敢讲吗？谁讲了谁下狱，群臣里有几个上疏的时候预先准备了棺材的？

朱厚熜睁开眼，目光呆滞地望着窗外。昨夜又下了一场春雪，皇帝的视线里看到的，是万寿山南麓的一片苍松翠柏。如今枝叶虽然被雪压着，但显得越发鲜艳，似乎有无穷无尽的勃勃生机。皇帝叹一口气，对徐阶说：

“这事应该跟百官商量。但朕已卧床这么久，浑身无力，怎么去上朝呢？”

“陛下万福金安。臣去把百官唤到万寿宫来就是了。”

“也好。你去叫他们吧！”接着，朱厚熜就说出了几个大臣的名字。忽然想起海瑞来，便问：

“那个骂朕的海瑞怎样了？”

“正在待罪。”

“也是朕自己不谨慎，以致到了这个地步，还要挨海瑞那畜生的骂。”说着咳嗽起来，内侍赶忙给他捶背。他的脖子伸着，憋得面红耳赤，一边咳嗽一边生气地嚷：“把海瑞给我逮起来，逮起来！”

就这样，海瑞入狱了，是在他上疏五个月之后。

刑部尚书黄光昇亲自审理这件案子。但翻遍《大明律》，也找不到有“臣子骂皇帝”这条罪名，因为当初洪武朝制定法律的时候，根本就没考虑到还有敢骂皇帝的。刑部尚书把部属的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大小官员都找了来，大家商量了半天，才找出一点儿根据，乃是比照儿子辱骂父母那条律例，拟定判处海瑞绞刑。

刑部把判决书呈送给朱厚熜，请皇帝批示。朱厚熜看看判决书，又看看海瑞的疏文——他已经看过多少遍了——还是下不了处死海瑞的决心。皇帝自己也奇怪，经他朱笔画勾而被判死刑的官员还少吗，为什么偏偏对这个海瑞犹豫不决呢？

判决书终于也“留中”了。皇帝不批，海瑞就只好在狱中待着，这一待就待了十个月。

户部有个司务小官（从九品）叫何以尚，跟海瑞同在一个司里工作。他见皇帝久久不把刑部对海瑞的判决批回来，估计是皇帝不想杀他，便上了一个奏章请皇上把海瑞释放。过了两天，锦衣卫校尉来捉他了，他还

不知犯了什么罪。到了锦衣卫，不容分说，便打了他一百板子，不过打得不算重。后来狱卒告诉他，皇上看到他的奏章发火了，说什么样的鸡毛蒜皮的官儿也来管朕的事情！“其实呀，”那狱卒说，“你是赶到浪头上啦！皇上拿海大人没办法，不杀他不解恨！杀了他又怕天下人说闲话。今儿个海大人的名气大着哩！皇上可不愿意临末了弄个杀忠臣的名声。好，让你赶上了，得，正好拿你出气！”

何以尚点点头，没话说，谁让自己瞅错了风向呢！狱卒接着说：

“何官儿，赶明儿你出了咱们锦衣卫，得请咱们的李指挥，是他念你仗义执言，才让校尉们轻一点儿下板子的！”

快到年底了。有一天，刑部大狱的提牢主事突然带着狱卒来到海瑞的囚室。狱卒打开提盒，从中拿出四盘菜、一壶酒来，摆在桌上请海瑞用。

这是监狱里的老规矩了，在死刑犯人即将执行的前一天，监狱会给犯人酒菜吃，名为“送行酒”。海瑞当然懂得这个规矩。他神色自若地走到桌前坐下，搓搓手说：

“这一天终于到啦！”

狱卒给他把酒斟上。海瑞端起杯子，说声“谢谢”，便一饮而尽。他看提牢主事站在旁边望着，就笑笑说：

“可惜这种酒你不能喝，我只好喝‘孤酒’了。不过这十个月来，多蒙你照顾，我可没办法报答你了，实在是抱歉，留待来世吧！”

“哈哈哈，这叫什么话！”提牢主事笑着自己把杯子斟上，然后一口喝干，抹抹嘴说：“我为什么不能喝？这是喜酒呀！”

“喜酒？”

“你还不知道吧，”提牢主事压低声音说，“皇上殡天了，有遗诏要放你哩，所以我才给你送喜酒来，表示表示祝贺。”

“真的？”海瑞站起来，神色大变。

“喏，我抄了一份遗诏，您自己看吧！”

海瑞接过遗诏的抄件，只见上面写着：

“朕奉宗庙四十五年，享国长久，累朝无有，一念惓惓，唯敬天勤民是务。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至奸人诳惑，自今建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没者恤录，现监者即释复原职。”

提牢主事说得不错，海瑞自应属于“现监者”之列，他即将“释复原职”了，这难道还不应该算是喜事吗？

可是海瑞却恭恭敬敬地把遗诏抄件放在桌上，跪下朝它连磕了九个头，突然趴那儿放声大哭。他哭得那样伤心，后来竟呕吐起来，以至于昏迷不醒。那一晚他整整哭了一夜。

是的，六十岁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终于死了，葬于永陵，庙号“世宗”。第三皇子朱载垕（hòu 吼）继皇帝位，定明年为隆庆元年。他便是明朝的第十二位皇帝“穆宗”。

朱载垕遵照先皇的遗诏，把因谏诤皇帝而获罪的诸臣——即遗诏中所说的“建言得罪诸臣”分别做了处理。海瑞和何以尚回了户部，可是怎么安排海瑞，却让内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为了难，因为冲着海瑞眼下的声望，让他回户部去当个六品的主事，未免说不过去。而且一些年轻的下级官吏和国子监的学生们，对海瑞都佩服得不得了，给海瑞的官儿小了，这些青年人非吵吵嚷嚷提抗议不可。于是把海瑞从户部调出来，改任他为尚宝丞。

尚宝丞是尚宝司的主官。“宝”指的是皇帝的大印，一共有二十四块，要区别不同用途使用，祭天地用“皇帝奉天之宝”，这块玺印还是从唐朝传下来的哩。发布诏书用“皇帝之宝”，册封后妃功臣，用“皇帝行宝”……二十四“宝”分别用于不同的文件，是丝毫马虎不得的。遇到大的朝会，尚宝司的官员还要拿两块“宝”印放到御案上（就像一些戏剧里演出的那样），自己在殿中侍立。

按说，尚宝司的职责是够重要的了，所以尚宝丞的官阶也到了正五品。安排海瑞当尚宝丞，内阁和吏部是煞费苦心的。因为海瑞忠直的名气够高了，部院大臣们谈起来都要夸上一夸。但要是说：“他这么好，派到你部里去怎样？”尚书们便会摇手谢绝，因为海瑞是那样地正直严肃，一丝不苟，任何一点儿差错都不允许。可在那个时候，谁没有“差错”呢？因此，不让他负责具体职务，只让他盖盖印，而且又从正六品升到正五品，大概是最适合于他的安排了。

尚宝司除他之外，还有少卿一人，司丞三人，所以盖印等具体事务都用不着他。可是他却要越俎代庖，看文件里哪些地方不合理，他就不再给盖印，还要跑到有关部院去提意见。所以吏部又赶快把他调出了。这次调到大理寺，担任寺丞，仍是五品官。大理寺便是当时的最高法院，海瑞在淳安县、兴国州任上，积累了审案的经验，按说可以发挥专长了。但他的上边，有少卿、正卿，人家才是主官，有最后决定权。而海瑞的意见往往跟上官相左。于是海瑞只好又一次被调开了。

这次干脆把他闲起来，让他当南京通政使司的通政使，官阶也升为正三品。我们前边讲过，南京留都的官员都是闲职，南京通政使司的职责，只是把南方各省的奏章拆封看了之后，只要符合公文规格，便再封

好转往北京的通政使司，由北京通政使去呈交给皇帝。南京通政使就做这么一点儿事情，这下子海瑞被架空起来了。空有忠君报国的志愿，却没有英雄用武之地。

海瑞闲得难受，但他不好再向朝廷提什么要求。本来嘛，两年多的时间，从一个六品的官儿升到三品，三品官该算是“大员”了，以前还从来没人升得这么快呢！

隆庆三年，是京察的年份。那时对各级官员有定期考察的制度，地方官三年初考，六年再考，根据考察结果决定升迁、留职、调转或降革。而两京（即北京、南京）朝廷的官员称为京官，六年一察，便叫“京察”。考察时，五品以下的官员由吏部考功司负责，四品以上的则自己作鉴定，称为“自陈”，直接交给皇上批阅。

海瑞又来耍滑头了，他在“自陈”中说：自己才疏学浅，连这个只管转送文件而既无行政责任，又无须花费心思的差使也没做好，不如革职算了。

这是谦虚吗？皇帝朱载垕一眼就看出了海瑞“自陈”中的言外之意，便对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说：

“海瑞耿介清廉，还是安排他做个负责的地方官员吧。”

张居正跟吏部商量。好，既然海瑞志大才高，那就派个顶难办的差使让他碰钉子去！不久，任命便颁下了，海瑞的新职是以金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南直隶。驻节的地方是苏州。

巡抚跟总督一样，原先也是临时性的职务，后来就固定下来，事实上是所辖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这南直隶共辖十个府，包括南京所在的应天府，以及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府，都是大江两岸的富庶地区。

这种地方的特点是：一、富的特富，穷的真穷；二、富人家子弟读书的多，因而做官的也多。因此，此地历来以难治著称。当初宣德年间，况钟任苏州知府，就是让他来整顿这个地方的。但况钟去后，积习依然如故。所以张居正跟吏部商量之后，决定让海瑞来捧这个“刺猬”。

海瑞的任命一发表，便在南直隶引起轩然大波。有些府、县的官员，过去手脚不大干净，这时便纷纷提出辞职。一些宦官缙绅人家，过去为了夸耀，把大门漆得红彤彤的，这时赶忙用黑漆把朱漆掩上，以免过分显眼，引起新抚的注意。有一个在苏州采购的太监，原先十分威风，出进坐着八抬大轿，这时也赶忙换上四人抬的小轿。

海瑞还没到任，“海青天”的声威已先声夺人，使苏州各府的官员豪绅们寝食不安了。

海瑞下车伊始，首先宣布了他的《督抚条约》，作为施政纲领，在辖区各府、州、县公布。《条约》共三十六款，分成几个方面，处处体现着他的性格和作风，他规定溺婴有罪，因为过去重男轻女，有些人家生下女婴便溺死了，往后谁再这么干就是触犯刑律。关于寡妇守节，历来的地方法官都是大力提倡的，如果某个寡妇抚养的儿子做了官，还要对这寡妇进行表彰。海瑞却打破了旧礼教，他当然不能公然号召寡妇改嫁，但却规定如果寡妇自愿改嫁，任何人都不得加以干涉和拦阻。他进一步还规定男子成年以后必须结婚成家，而不许打光棍。

海瑞自己是节俭的，以至于给母亲祝寿才买二斤肉。现在他的节俭作风也体现在《条约》之中。他规定，今后所有来往公文，一律使用廉价纸张。那些生产贵重纸张的商店，今后全都转产廉价纸。一些质高价昂的纺织品、首饰等，立即停产，连有名的“苏绣”，他也认为是奢侈，

在《条约》中加以禁止；生产高级甜食，也在违禁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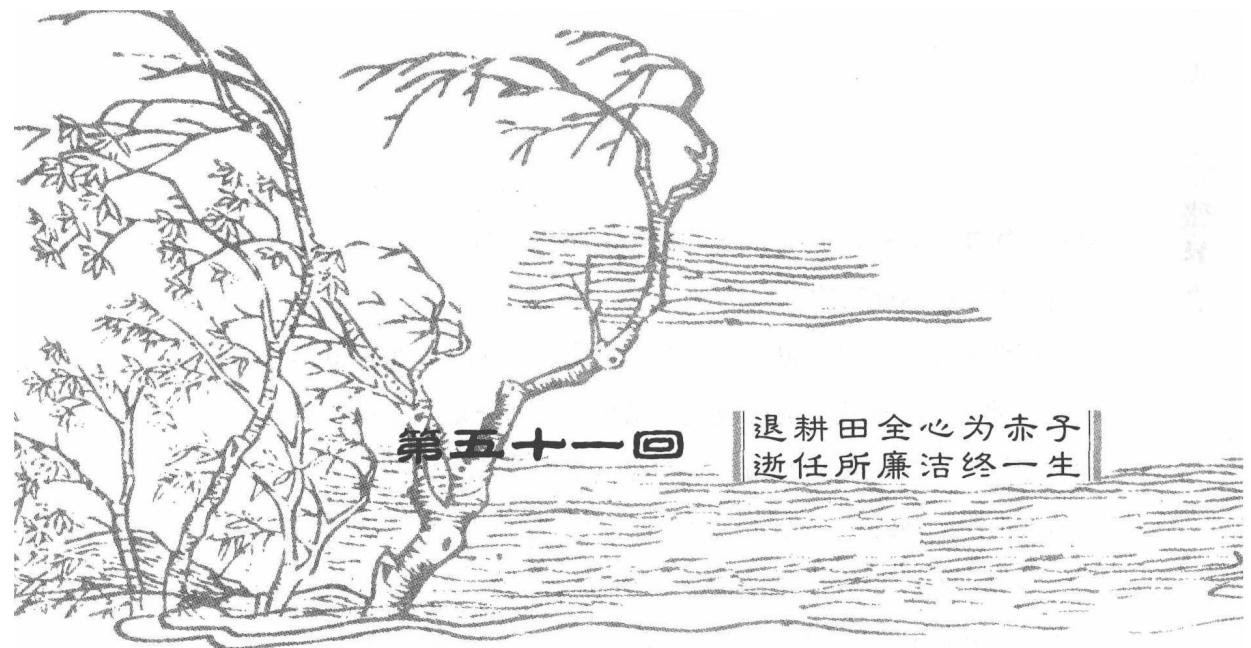
他自己当然更要身体力行了。《条约》规定，本巡抚出巡各地时，府县官不得出城迎接，在各府县逗留期间，地方供给的伙食标准为每天耗银二钱至三钱。他连伙食内容也提及了，在二至三钱银子的标准内，可以有少量的鸡、肉、鱼，但不能备酒，也不得有鹅肉。这最后一项规定，可能是海瑞不喜欢吃鹅肉，便也把它写进《条约》中了。

这些条文的规定，似乎是过于琐细，而且有些也没啥道理，有些更是行不通的，但这也恰好表现了海瑞的与众不同的性格。

不过贫苦农民对海瑞是拥护的，因为海瑞评判是非有个原则，那就是在处理疑难案件的时候，“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在发生产业纠纷时，则“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如果从法律的角度说，这样的原则有明显的不足，事实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该谁也别“屈”才对。然而在那样一个忽视法治的封建专制的社会里，海瑞肯处处佑护贫民，也是难能可贵的了。

海瑞还着眼于发展生产。虽然江南是鱼米之乡，但水利设施却年久失修，河流不畅，渠道淤塞，致使土地荒芜，高利贷盛行，饥民到处流亡。海瑞亲自踏勘，决定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兴修水利，救济灾民。短短的时间内，他先后修浚了吴淞江、白茆（máo 茅）河，并使这江河两岸的撂荒田四十多万亩恢复了耕作，同时也使大批饥民得救。

然而，当他本着“与其屈贫民，宁屈乡宦”的原则来处理土地所有权的纠纷时，却遇到了困难，因为“乡宦”一方的代表人物是已退休的内阁大学士徐阶，一个曾在嘉靖皇帝面前替海瑞说过好话的人。



## 第五十一回

退耕田全心为赤子  
逝世所廉洁终一生

南直隶地区的土地兼并，由来已久。地主豪绅兼并土地的办法多种多样，而最常用的是放高利贷。农民如果借了债，便要用仅有的几亩田地作抵押；高利贷的利率又极高，农民到期一旦还不上，土地就归放贷人所有了。这样的土地兼并，产生了一些大富豪，而广大的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外出逃亡，成了流离失所的饥民。

海瑞要纠正这种弊病，他明令以后不许放高利贷，又规定凡因高利贷而占有的田产，统统退回给农民，他这样大张旗鼓地搞退田，一些曾受过高利贷盘剥失地的农民，纷纷写禀帖求诉，有时巡抚衙门一天竟收到三千至四千件这样的禀帖。

农民控诉得最多的，是松江府华亭县的首富徐家。徐家的家长是徐阶，全家几辈子不分居，连同家丁仆役人口竟上千名，据说占有的土地达二十四万亩。徐阶做过内阁大学士，说起来官声挺好，更喜欢佑护人。海瑞上疏得罪，刑部拟处他绞刑，徐阶曾在皇帝面前为他缓颊。新皇帝朱载垕登基后，他与首辅高拱不合，请求退职，于隆庆二年回到华亭。他的弟弟徐陟做过南京刑部侍郎，也退仕在家。他家的子弟依靠父祖是

高官，家里又有钱，免不了在外边做些不法的事情。海瑞到松江查勘时，接到了大量控告徐家的诉状。

海瑞需要认真想一想了：徐阶的事情该不该办？如果不办，那么田也就不要退了，他这个巡抚也就不用当了。但要是办呢？人们会不会说他过河拆桥，忘恩负义？因为徐阶虽然没把他救出来，但总归是在皇帝面前替他讲过情的。

海瑞思虑再三，终于想出一个两全的办法，他一方面把农民控告徐府的诉状封成几个大包，派人去送给徐阶，让徐阶看看他家的民愤到何程度，让他自己有所惕厉；一面又把徐陵捉了起来，追究放纵子弟不法的罪责，平息一下百姓的愤怒。这样有软有硬，有理有节，使徐阶不得不把兼并的土地退还一部分。

可是这里牵涉的不光徐阶一个人，当地十府在朝做官的岂在少数！这些人的利益受到威胁，自己不好出头，便唆使或收买一些言官来攻击海瑞了。有的说他“志大才疏，应该调任闲曹”，有的说他“迂滞而不达政体”，有的说他“包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由于海瑞有个“与其屈贫民，宁屈乡宦”的原则，免不了个别的不良贫民乘机对士绅们进行勒索，从而给弹劾海瑞的人制造了借口，还有个给事中戴凤翔，竟诬说海瑞在一个晚上同时谋杀了一妻一妾。一时闹得应天十府满城风雨，上层社会群情汹汹。

皇帝朱载垕虽然对海瑞比较赏识，但看他这样不考虑条件，不讲究方法，一味大刀阔斧地干下去，将来不好收场，便采纳了一些人的建议，把海瑞调任南京户部的粮储总理。虽仍然驻在苏州，但除了经管粮食以外，别的什么也不用他管了。

海瑞知道，这是又把他闲起来了。一个有抱负的人，对这种待遇是无法忍受的，于是他再一次上疏求去了。这次不是要滑头，而是认真的，因为他在疏文里虽然没骂皇帝，却把大臣们统统骂了，他在疏中竟说，“举朝之士，皆妇人也！”

这样一骂，那些同情他的官员也都缄口不言了。皇帝批准了海瑞的辞呈。他在南直隶巡抚任上干了刚刚半年多一点儿，便回到了海南岛老家，在那里一待就是十五年。

海南岛粗犷的风景象跟苏州小巧的园林截然不同，那浩瀚无边的大海，那漫无边际的白沙滩，还有那高大挺拔的棕榈树，傲然地迎着海风，这些似乎都是海瑞性格的写照。然而海瑞没有看风景的闲情逸致，他愤恨人世间的种种不公平，自己却又无能为力。再加上家庭也不和睦，他那青年时便寡居的母亲，性格乖僻，老来更甚，终日跟儿媳吵吵闹闹，使海瑞不得不先后跟两个妻子离婚。他没有子息，娶了个小妾也被太夫人逼得自杀了。海瑞在南巡抚任上，明令规定不许干涉寡妇改嫁，也许就是从他家太夫人身上得到的启发。后来太夫人也逝去了，他既无亲人，朋友也很少到这“天涯海角”的琼州岛上来。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着，门可罗雀，孤灯茕（qióng 穷）然。日常除了耕种祖遗的四十亩土地外，便是整理他从政以来的文件信函，加以编印，使后人有机会了解他的为人和政治主张。

朝廷上新陈代谢，皇帝朱载垕去世了，葬于昭陵，庙号“穆宗”。他只做了六年皇帝，没有什么作为，史书上称他“宽恕有余，刚明不足”。

太子朱翊钧即位，那年才十岁。定明年为万历元年。这便是后来一直当了四十八年皇帝的“神宗”。

小皇帝不懂得政务，只好依靠先皇临死时托付的顾命大臣内阁大学士高拱和张居正。不过后来高拱被罢官，而那张居正是父皇的老师，于是张居正便做了内阁首辅，朱翊钧封他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又晋封为太傅。

海瑞在海南听说朝廷的变化，便给张居正写信，因为他知道张居正是十分尊重法纪也有志于变革的，他想出山去协助这位新宰相。不久，他就接到了张居正的回信，大意是说：

“三尺之法不行于吴地已经很久了，公那时骤然间加以绳墨，给予纠正，难怪他们不能接受，以致谣言四起，听者惶惑。而我谬居阁位，参与庙堂的末议，却不能主持公道，为朝廷奖励奉法的官员，摧扫那些谣言谬议，实在是深深地感到惭愧。”

这种表面上同情，实际上暗含责备的官样文章，正是官僚文士们的擅长，事实上这种道歉也就是对海瑞的拒绝。海瑞接书后，只好叹一口气，把那封回信一扔就算了。

万历十年，张居正在荣任太师后去世，一批年轻的官员上台。那时离海瑞退职已经十五年了。这些新官员曾久闻海老前辈的大名，他们自己也没挨过海瑞的骂，于是交章推荐。皇帝朱翊钧也听说过这个正直、廉洁的官员，便于万历十三年，召海瑞出山，任命他为南京右佥都御史，又改任为南京吏部右侍郎。那年海瑞已经七十二岁了。

官员们通常到了这个年龄，早已告老还乡了。然而这个年过古稀的海刚峰，却还要东山再起，重做冯妇。这和反常的现象恰好说明海瑞一生是不大考虑自己，而总是惦记着国事的。尽管已是垂暮之年，尽管又是南京的“清职”，但他还是要去让余热再放一点儿光辉。

他风尘仆仆地从海南来到南京，一路上的劳倦还没恢复，便立即给皇帝上了一篇疏文，大意说：

“陛下励精图治，而吏治却很不理想，原因就是对贪官的刑罚太轻了。诸臣找不到这个原因，反而说只要待官员们以‘礼’，他们自会廉直，这其实是文过饰非。这样的‘待士以礼’，老百姓又怎么办？太祖洪武主十年明订刑律，凡贪污枉法八十贯的，便处绞刑。再多的依太祖的规定是剥下皮来装上稻草，公开示众。现在也应该这么做。”

海瑞此议一出，舆论鼎沸，反对的居多数，认为这不符合本朝提倡的“仁政”。但也受到青年学子和下级官员的拥护，结果不但在朝廷上，也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大辩论。那时海瑞已改任南京都御史。他的一个部下，提学御史房寰竟破例参劾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说他到任后“无一善状”，只知道“诈伪荒诞，夸耀自己，贬低别人”。说不得又玩弄造谣诽谤的故伎，无中生有地捏造说他“以圣人自许，奚落孔孟，蔑视天子”。这种抓住片言只语便绳人以罪的手法博得一些人的喝采，但也遭到一些人的愤怒驳斥。

两京的官员为这件事纷纷扰扰争吵不休。皇帝便叫吏部考虑个妥善办法。吏部的官员们商讨之后，提出处理意见，认为海瑞那剥皮实草的主张过于偏执，“不协于公论”，建议不任命他以重要实职，但仍保留他都御史的正二品的官阶待遇。朱翊钧同意了这个意见，批示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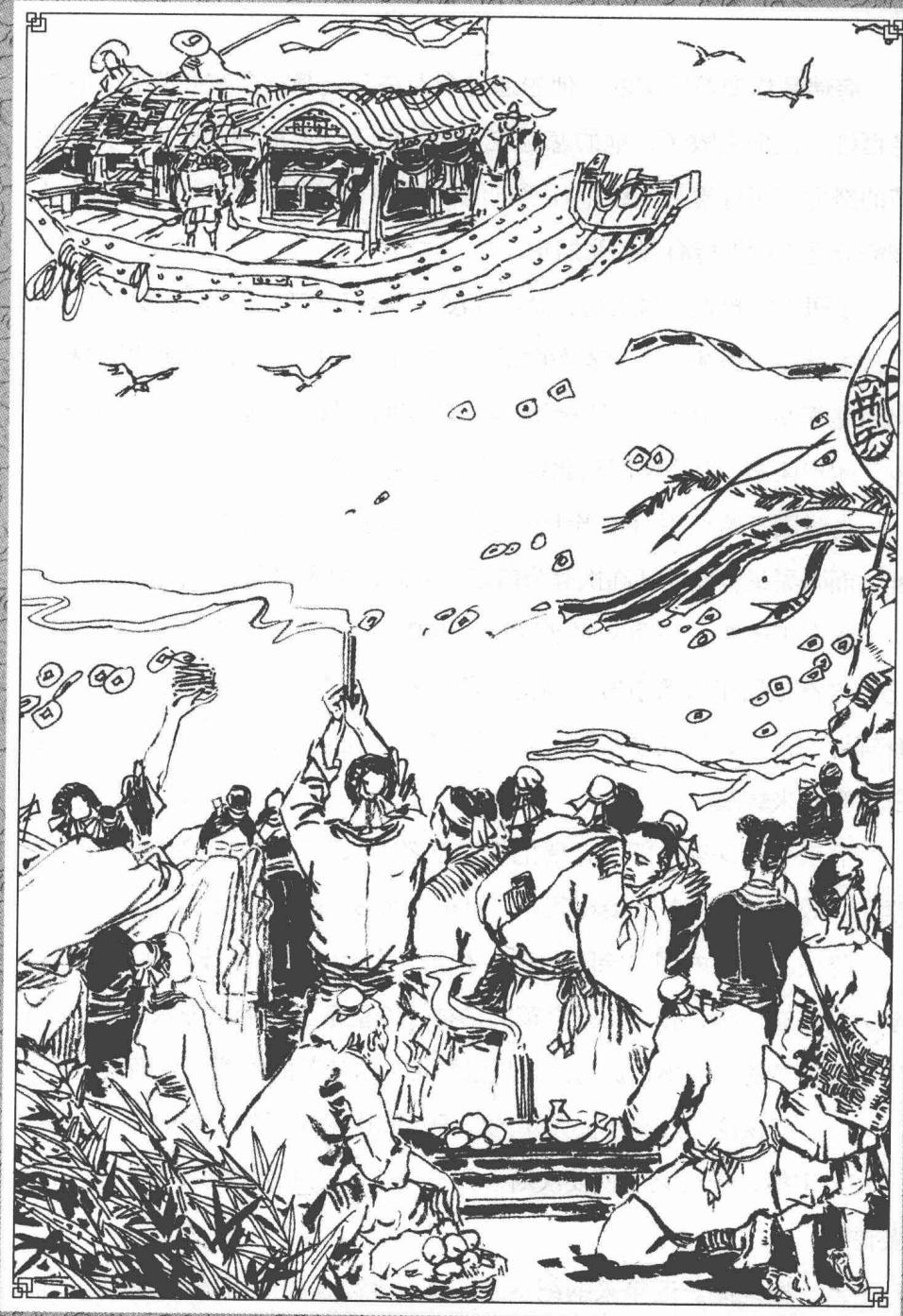
“海瑞屡经荐举，故特旨简用。近日条陈重刑的说法，有乖政体，而且指责朕躬，有些话过于迂戆。但朕并不怪罪而加以优容。不过海瑞虽然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

这份诏令由给事中六科衙门抄发公布，由各地的《邸报》传遍天下，海瑞还能有什么作为呢？连皇帝都说他“迂戆”，说他“任事非所长”，而他的“照旧供职”，也仅仅起个“镇雅俗、励颓风”的影响作用，他这个堂堂二品大员，再干下去就太没意思啦！

海瑞愤而上疏求去，竟连上了七次辞呈，但每次的御批都是照例的四个字：“所谓不准”。干，不让你干；走，还不让你走。“迂戆”的海瑞终于在抑郁愤懑中，于南京都察院任所逝世了，年七十四岁，时为万历一十五年（公元1587年）。

海瑞已没有一个亲属，他的丧事是由南京金都御史王用汲办理的。王用汲来到都御史官舍，发现这位须发全都白如霜雪的瘦老头，躺在一张旧木床上，双目不瞑。那陈旧的席子，陈旧的葛布床帷和陈旧的粗布被褥，给老人的一生廉洁清白作了有力的证明，以致王用汲感动得下泪，打开海瑞仅有的一个衣箱，里边除了旧衣外，只有纹银十两。这笔钱连买棺材都不够。王用汲只好回到南京都察院发动同僚捐助，才把海瑞棺殓起来。

朝廷得到消息，责令南京礼部将海瑞的遗体归葬故里，并在他的墓前树立碑碣。南京礼部备了官船，装上海瑞的灵柩，派南京行人司行人许子伟护丧。灵船顺大江东下，沿海路南去琼州岛，将海瑞埋葬在他故乡的滨涯山上。启灵那天，南京城为之罢市，许多百姓穿上白色的孝衣，密密麻麻地站在江岸，跟海瑞告别。应天、镇江、常州、苏州、松江等沿大江各府的父老，在江岸摆设祭桌，等灵船经过时，酌酒哭祭。这种祭桌沿江络绎不绝地摆出数百里，直到大江入海口处。充分显示了南直隶的乡亲父老，对这位曾想为他们造福的前巡抚的无限悼念。



海瑞是想变革现实的，他想通过个人奋斗去裁抑贪官和豪强，保护老百姓。但他失败了，他的悲剧在于他认识不到在那种制度下，他的变革的努力不可能奏效。跟他几乎同时，还有一个企图变革的人，这个人却恰恰是不肯支持海瑞的张居正。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江陵）人。他聪慧好学，十二岁就成为秀才，十六岁考中举人，二十三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当时是嘉靖二十六年，正是严嵩权势独擅的时候。张居正曾一度辞职还乡，闭户读书。以后又回到北京，在国子监任司业（相当于副校长）。

当时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正校长）是高拱。高拱很赏识张居正的才能，而张居正也处处把高拱尊为前辈，因此，两人的交情很深。

张居正还有个好朋友便是徐阶。嘉靖三十一年，徐阶入阁任东阁学士，推荐张居正做詹事府的谕德。詹事府是负责太子一切生活起居及教育辅导的衙门，谕德便是教师。不过当时没立太子，张居正辅导的是皇三子裕王朱载垕。

后来裕王朱载垕即位，便把他这位老师张居正封为吏部侍郎兼东阁学士，入阁参与机务。接着又晋升为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隆庆二年，内阁中徐阶和高拱不合，徐阶便告老致仕，回到松江华亭。就在这一年，张居正以变革的精神，给皇帝上了个《陈六事疏》，提出需要变革的六件事，这可以说是张居正从事变革的发端。大略是：

一、省议论。凡事不要无用的虚词，而讲求实际的功效。做一件事，开初要审慎，既行之后便要决断。用一个人，用前要慎察，既用之后便要信任。

二、振纲纪。近年来纲纪不肃，错误地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

委曲求全谓之“善处”。应该公道地进行刑赏予夺，而不曲徇私情。

三、重诏令。近来朝廷诏旨，多格废不行，有的事竟十余年犹未完成。文件积压，年月既久，失去时效，致使漏网的终于逃脱，而国法得不到伸张。这样是非怎么能明？赏罪如何得当？因此应敕下各司，办事应严立期限，违者查参。

四、核名实。器械必须试用之后才知道利钝，马匹必须乘驾之后才知道驽良。现在用人却不然，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资格太拘，毁誉失实。因此，希望皇上慎重名器，爱惜爵赏。令吏部认真考课官员，使其名实相副。

五、固邦本。现在风俗侈靡，豪强兼并，赋役不均，官吏们耍弄诡奇的花招，吃亏的还是百姓。因此，要敕令有司，尽心清理。

六、饰武备。精选将领边吏，加强军队训练，举行大阅之礼，严申军令纪律，这样注意武备，整饬戎事，国防自会巩固。

我们不惜篇幅列举了《陈六事疏》的大意，目的是想让读者了解张居正作为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是怎样开始他的变革事业的。



## 第五十二回

排异己冯太监反扑  
上讲宴张学士授经

隆庆六年六月，穆宗朱载垕临危托孤时，内阁顾命大臣是三个人，他们是首辅高拱、大学士张居正和高仪。

高仪是当年四月才入阁的，内阁里原来只有高拱和张居正。他二人本是好友，在国子监时，高拱还是张居正的上级。但高拱这个人有个缺点，高傲独断，当初徐阶就是受不了他的排挤才辞官回乡的。如今对张居正这个老部下，他自然更加不客气，什么事情都独断专行，不把张居正放在眼里。

张居正原以为新皇年幼，他可以一展抱负，推行变革，却不料高拱挡在前边。而高拱又比较保守，对张居正的变革建议不肯采纳，这使张居正十分失望。

但张居正城府很深，他从不把对高拱的不满流露出来，外表上仍然跟以前一样，对高拱十分恭敬。不久就来了机会，司礼监冯保跟高拱发生矛盾，张居正便借冯保之手，把高拱撵走了。

高拱和冯保的矛盾早在穆宗在世时便有了。隆庆五年，宫中司礼监的首监秉笔太监出缺，冯保托首辅高拱推荐他来担任，被高拱拒绝，从

此，冯保对高拱记下仇恨。新皇朱翊钧即位时，司礼监初拟穆宗遗诏草稿，内称“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这不合朝廷制度，因为国事只能委托大臣，而不应该交给太监，所以廷臣们都颇为惊骇。高拱声明说，这是司礼监对遗诏的篡改，终于在内阁正式发布遗诏时，将“司礼监”字样删去。

有一天，一个司礼监的太监到内阁传旨，高拱斜眼瞅着那个传旨的太监，说：

“这圣旨出自何人？难道十岁的孩童会下圣旨吗？”

他还对那太监威胁说：

“这都是你们这些太监们干的，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把你们都逐走！”

这个太监回去把高拱的话告诉冯保，冯保脸上立刻变了颜色。

这边高拱已经看出冯保企图擅权，便跟另两名阁臣张居正、高仪商量，准备设法把冯保除掉。但张居正却悄悄地把这事告诉了冯保。冯保先发制人，去向两宫太后哭诉。两宫太后一是仁圣皇太后，即穆宗的皇后陈氏，一是慈圣皇太后，即朱翊钧的生母李贵妃。这两人虽然已经当了“太后”，其实还都只有三十多岁，哪里有什么主见？觉得首辅连个内监都不能容，实在没有宰相肚量。而且也曾风闻高拱跋扈，在内阁唯我独尊，于是便下诏罢了他。

那天是六月十五。张居正有病请假，内阁是高拱当值。忽然宫内传旨，召集百官于会极门宣诏，还派太监把张居正也找了来。大臣齐集之后，冯保手捧圣旨出来，大家跪下听他宣读：

“仁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皇帝圣旨：告诉你等内阁、五府、六部

诸大臣，大行皇帝殡天前一日，召内阁三大臣于御榻前，与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东宫太子年幼，全赖尔等大臣辅导。但大学士高拱，揽政擅权，威福自专，全不把皇上放在眼里，使我母子昼夜不安。现命高拱回原籍闲住，即刻起程，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家厚恩，如何竟阿附权臣，蔑视幼主！从今后要洗心革面，如蹈往辙，典刑处之！”

大臣们事出意外，一个个竟呆住了，只有张居正心中有数。至于当事人高拱，原以为这次召集群臣，是采纳他的意见，驱除冯保的，没想到被驱除的倒是他自己。他跪在那里，气得哆哆嗦嗦地一时竟不能起身。经人扶起后，他踉踉跄跄地步出朝门。因圣旨说“即刻起程，不许停留”，他连家也没敢回，在街上雇了一辆牛车，奔赴河南新郑原籍。锦衣卫的校尉骑着马在后边押送。路人看了都十分惊讶。

这边张居正又出来做好人，请皇帝准予按大臣去国的规定给高拱派辆驿车，让家属也同车回去。就这样，高拱狼狈地离开了北京。不久，另一名阁臣高仪也病故了，张居正当上了首辅。他推荐一个好好先生礼部尚书吕调阳入阁作为助手，而朝政大权便操在张居正手中了——这距离穆宗去世刚刚一个月。

高拱被赶走了，但朝中官员议论纷纷，大家对张居正勾结内监啧有烦言。张居正心想，如果不能树威，便不能服众，他在想一个能把朝臣们都镇住的办法，使他们不敢再反对他。

过了年，万历元年正月的一天，皇帝朱翊钧上早朝。出了乾清宫，见一个无须的男子穿着太监的衣服，躲躲藏藏地行迹惶遽(jù剧)。左右把他拿下，经冯保讯问，那人自称叫王大臣，原系一名南兵，是从总兵戚继光那里来的。

原来早在嘉靖、隆庆年间，海上倭寇已经荡平，而北方鞑靼土蛮、董狐狸两个部族却常来骚扰。边兵无能，十七年来，北方边镇主帅竟前后更换了十个人。隆庆元年，谭纶调任蓟辽保总督，负责保卫京畿的责任。那时张居正已经入阁，谭纶便请张居正把戚继光调到北方，任命他为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等北方各镇的兵事，各镇总兵都受他节制。戚继光看边兵久缺训练，便从练兵着手整顿，从他在南方训练出来的“戚家军”中抽调一部分将士，作为练兵的骨干。这王大臣便是这批南兵中的一员军士。他到北方后，生活很不习惯，决定跑回南方。路过北京，见皇宫巍峨，一些穿太监衣服的人进进出出。他一时好奇，就偷了一套太监服穿上，混进宫去。他不识路径，东跑西逛，想出宫却又找不到道路。夜间只好找个僻静的屋子藏了一夜，冻得骨头都凉了。好不容易等到天亮，他又跑出来，却见一大群人簇拥着一个男孩走来。他藏躲不及，便被宫监捉住了。

王大臣的供词里牵涉到戚继光。冯保知道张居正跟戚继光的关系好，便去告诉了张居正。张居正沉吟半晌，对冯保说：

“戚继光现握军权，绝对不要把他牵连上。至于王大臣这个人的处理嘛——”说着，附在冯保耳边说：“可以借机除掉高氏。”

冯保明白张居正所说的“高氏”是谁。他回去后，就派一个叫辛儒的家人给王大臣换上一件蟒裤，带上两把剑柄上饰着宝石的短剑，然后押送到东厂。这东厂跟锦衣卫一样，是个特务机关。不过锦衣卫系外臣负责，而东厂则是由太监管理。东厂比起锦衣卫来更加黑暗。人们把东厂和锦衣卫合称“厂卫”。这时冯保正做东厂的主监，所以辛儒在里边可以为所欲为。王大臣进东厂后并没受刑，却由辛儒陪着他饮酒。辛儒告

诉他：

“你惊了圣驾，一定要追究主使你的人，你不讲，就要被活活打死。”

王大臣吓得哆哆嗦嗦，哀求辛儒救他。

“这样吧，你就说是高相国因为怨望，派你来行刺皇上的。”

“高相国是谁？”

“这你就不用管了，你只这么说就行。”

“可我不认得高相国。”

“你就说是高相国的仆人来找你的嘛！他的仆人叫高旭，你咬住不但自己可以无罪，还要赏你一千两银子，封你一个官职。”

王大臣是个粗人，不懂其中利害，便答应了。冯保审问时，他果然照辛儒教他的话讲。冯保立刻派人去新郑逮高拱的仆人高旭。这消息传了出去，大臣们不相信高拱会干这种事，猜是张居正和冯保搞的鬼，有些跟高拱要好的人便到张居正家求情。张居正当然矢口否认，还说为这件事他愁得要死，但事关谋逆，想援手也无能为力。不久，皇帝下令让冯保和都御史葛守礼、都督朱希孝会审此案。

案子已经公开，王大臣便由东厂移往刑部狱。朱希孝派一名精干的校尉去狱中，询问王大臣到底是什么人。校尉对王大臣说：

“你怎么敢随便说刺杀皇上，你知道犯这种罪不但自己要被凌迟处死，全家都要问斩呢！”

“是高相国指使我的。”

“高相国是谁？他住在什么地方？你见过他吗？他怎么对你说的？”

一连串的问话问得王大臣张口结舌。校尉又说：

“就算是高相国主使你来的，可你是凶手，难道你还想活吗？”

王大臣这才明白过来，茫然大哭，只好对校尉说了实话，供认自己是误入皇宫，双剑是辛儒给的，把辛儒教他的话也说出来了。

这时高拱仆人高旭已经解到。朱希孝找了一些校尉来，把高旭杂在当中，要王大臣辨认。王大臣何曾见过高旭？自然认不出来。

会审那天，按照规定，谋逆罪要先打一顿板子，然后过堂。王大臣大喊：

“许我富贵、银子，怎么又来打我？”

冯保问他：

“是谁主使你的？”

“不就是你教我的吗？怎么又来问我！”

“胡说！”冯保拍案大喝，“那你上次怎么说高相国？”

“你教你家的辛儒要我说高相国，我几曾认识什么高相国、矮相国！”

朱希孝问：

“那你这蟒裤、双剑，又是从哪里来的？”

“也是辛儒给我的。”

朱希孝便不再问，吩咐退堂。冯保一见阴谋被戳穿，派人秘密进监给王大臣饮了哑药。王大臣说不出话来，他又不会写字，案子就审不下去了。最后刑部只好以王大臣是个傻子，犯了惊驾罪而将他斩首，结束了这件案子。

高拱差一点儿被灭了九族，吓得关上大门，谁来也不接见。他的门生故吏，路过中州的时候，怕受连累，也都绕着走，不敢从新郑经过。至于朝中的大臣们，从这件事认识了张居正，以后就很少有人敢反对他了。

张居正镇住了大臣，还需要皇上相信他才行。明朝有个“经宴”的制度，“经”是由翰林学士或有学问的大臣给皇帝讲解经书；“宴”则是讲经已毕，皇帝赏参加的官员们一顿饭吃。张居正觉得利用“经宴”给皇帝讲课，正是树立威信的机会，一来可以影响皇帝，二来在听讲的大臣们面前也能自我炫耀一番。因此他决定，每十天一次的经宴，由他来主讲。

经宴规定在每月的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举行。那天，内阁、六部、五府的五品以上官员，御史、给事中等官阶六品以下的“言官”，以及有勋位的武将，都要出席听讲。讲堂设在文华殿，只有皇帝一人坐着，其余的听众和讲官全部肃立。张居正每次除讲经书外，还要讲《贞观政要》。“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之治”是历史上政治比较昌明的时期之一，李世民说起来应该算是个较为开明的皇帝，因此，张居正要让小皇帝像李世民那样开明，他这个首辅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张居正的目的达到了，朱翊钧听课很有兴趣，他觉得十天一次的“经宴”不解渴，要“张先生”——这是朱翊钧对张居王的尊称——给他“日讲”，甚至还要“午讲”。那时规定三、六、九是视朝日，皇帝要到朝堂上跟大臣们议事；二日经宴；其余的日子，皇帝天天要“日讲”。“日讲”过后，皇帝赐饭，休息一会儿再进行“午讲”。不过这样的讲课参加人员不多了，除了内阁学士外，其余的官员不用再来。而休息时间，皇上在文华殿后的暖阁里，还要跟张居正促膝谈心，一口一个“先生”地叫着，十分恭敬亲热。天热的时候，皇帝让一个内使站在张居正身后，替他打扇；天冷呢，则给他脚下铺一块毡片，免得先生的腿脚受凉。

有一次，张居正在日讲中讲宋仁宗不喜珠饰的事。朱翊钧听了之后赞同地说：

“贤臣为宝，喜好珠玉有什么益处！”

“皇上圣明，”张居正说，“明君贵的是五谷，贱的是珠玉，因为五谷能养人，而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

“不错，宫人喜欢艳妆，朕在给他们赏赐的时候，未尝不节省。”

张居正跪下叩头，说：

“皇上考虑到这一点，便是社稷生灵之福啦！”

又有一次谈到秦始皇，张居正说：

“做君主的应该布德修政，才能使天下归心。有时候患难往往发生于所防之外。秦设戍卒防寇，却偏偏亡于所设的戍卒。所以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朱翊钧点点头，说：

“是呀，人定可以胜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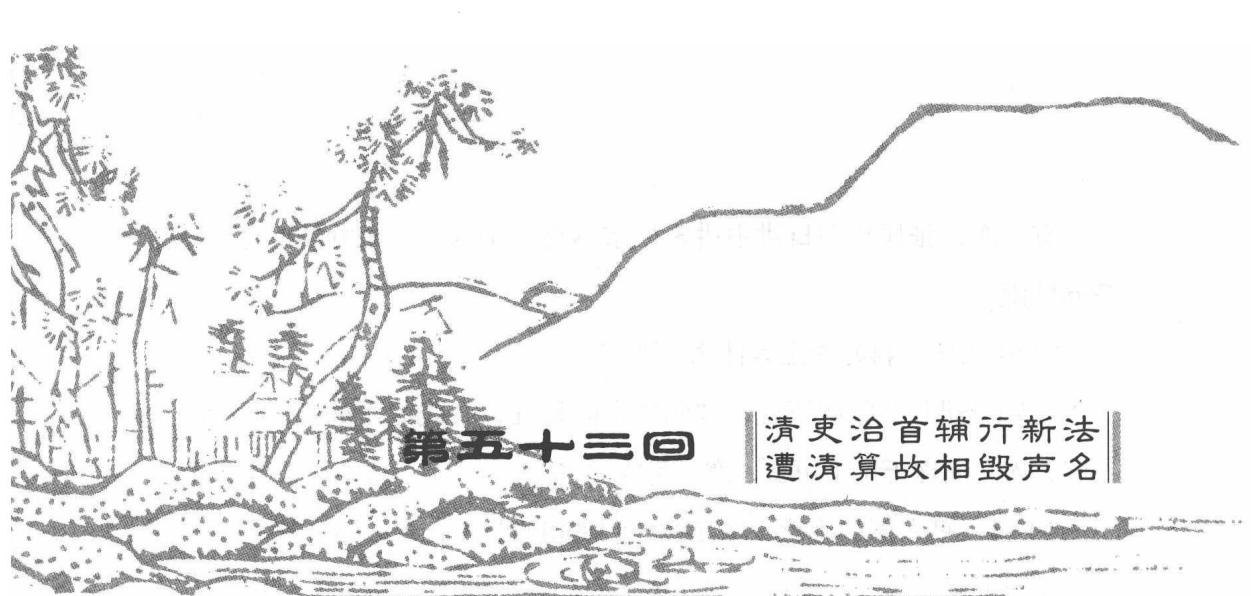
张居正还抄录了太祖朱元璋的《皇陵碑》文，给皇帝看。朱翊钧看过后，说：

“朕看了碑文，连读了几遍，忍不住感伤流泪。”

张居正详细介绍了朱元璋少年时的遭遇和创业的艰辛，以及即位后的勤俭。朱翊钧十分感动，说：

“朕自当勉法祖宗，但也靠先生的辅导。”

就这样，年轻的皇帝对张居正已绝对信任，于是，张居正便可以大展抱负，进行变革了。



## 第五十三回

清吏治首辅行新法  
遭清算故相毁声名

说起来，万历皇帝朱翊钧原是个很不错的少年。隆庆二年，他被立为皇太子，那年刚刚六岁。有一天，父皇朱载垕在宫中驰马。他便对父皇说：

“陛下是天下之主，这样疾奔，如果马蹶失足，将不堪设想。”

穆宗听了，高兴地跳下马来，把他拥在怀中。

陈皇后患病，朱翊钧每天早晨随他生母李贵妃去探望。陈皇后听到这小娃娃“踢踏踢踏”的履声，总是要勉强地爬起来。皇后拿起经书来考问他，朱翊钧也能应对如流。由于他的关系，陈皇后和李贵妃相处得十分融洽。

朱翊钧做皇帝以后，对陈皇后仍然十分尊重，待她像亲生母亲一样。现在，宫中，他听两位太后的；而国事，则全推给张居正了。

不过他对“张先生”，敬重之中却也有点儿畏惧。当然这畏惧也是从敬重之中派生出来的。在小皇帝的眼中，“张先生”是那样高明，好像总是正确的，而且具有远见。讲起话来引经据典，找出历史上的根据，使他钦服不已。比如说，中国的版图是太大了，多少个省、府、州、县，

还有六部、五府；以及什么十三边镇，等等，大大小小安排了两万名官吏，皇帝是无法统统记住的。张居正便做了一个极大的屏风，在上面按照中央和地方的系统，把各大小衙门主官的名字用一张张纸条写了粘在上面。虽然这也有几百人，但却可以一目了然。如果某个衙门的主官更换了，就把他的名条撤下来，换上新官的名字。朱翊钧没事的时候，背着手站在屏风前边一边看一边默记，使他对自己臣下有了一定的了解，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首辅考虑问题的周密全面了。

不过有时候这种敬畏也来自另一方面，比如有一次在“经宴”上，朱翊钧读《论语》，把“色勃如也”的“勃”字误读为“背”。张居正厉声说：“当读作‘勃’！”他的声音是那么响，把皇上吓了一跳；一同听讲的百官也不由得变了脸色。无论怎么说，皇帝读错一个字，也用不着用那么严厉的声音来纠正嘛！

张居正大权在握，当初他给穆宗提出的《陈六事疏》得以贯彻了。从万历初年起，张居正一步一步地实行了他的变革。

他是从整顿吏治开始的，他认为当时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主要原因就是“吏治不清”。于是他规定了严格的考察制度，裁汰贪官污吏，采取“立贤无方，唯才是用”的原则。比如说，他重用名将戚继光，使十几年来一直扰攘不宁的北部边疆安定下来，便是一例。

其次是增加财源。当时由于土地的兼并，全国应纳税的田亩数目不准。许多豪强大户把农民的土地夺去了，赋税却还要失地的农民负担，造成大批的农民逃亡。于是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税的田产，到万历八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朝廷的赋税收入也增加

了，所以史书上说：“自正（正德）嘉（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张居正又于万历九年，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折合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田亩多少缴税。实行赋税制度的大改革，不但要求负担合理，而且简便易行。同时，他在水利、边防等方面也做了一些变革和整顿。当然，张居正的变革目的也还是为了维护大明王朝的统治，然而却又不可避免地触动一些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再加张居正作为一个政治家，缺少豁达宽容的风度，自己又不甚检点，给反对他的人留下口实。以致在万历十年他病逝以后，不但所推行的变革全被推翻，他自己死后也闹得身败名裂。而导火线则起之于万历五年，张居正父亲死后的“夺情”事件。

中国历代王朝都是强调“以孝治国”的。如果官员的父母死了，他必须离职回家，按照四书所说，“守孝三年”叫做“丁忧”。不过时间可以缩短到二十七个月。但倘使军政要务紧急，离他不得，那么皇上也可以“强迫”他留在任上，不回去尽孝子之情，因此称为“夺情”。不过这夺情是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偶一为之的。

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死了。张居正照例申请丁忧，回原籍葬父守孝。但那时皇帝才十五岁，还离不开张先生，于是朱翊钧跟两宫太后商量，决定予以“夺情”，让他留在北京，继续在内阁任职。也许张居正自己也觉得他的变革正在展开，假如离职两年半，恐怕中间有变，于是在再次、三次上疏被皇帝慰留之后，也就遵旨“夺情”了。不过他身穿孝服，不宜进入殿阁，请皇帝准他平时在府中阅卷，非到必须的时候，他才忍着悲痛换上官服，到文渊阁去办公。

但是反对张居正变革的人，却认为这是一个驱走他的好时机。翰林院编修吴中行和检讨赵用贤首先上疏，不过他们说得很含蓄，意思是张居正丧父之后，一定十分悲痛，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继续工作，说不定会出现差错，贻误国事。接着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又联合上疏，这次则直接指斥张居正是贪恋禄位，置父母养育之恩于不顾，违背纲常，应该让他回家去闭门思过。

疏上之后，皇帝朱翊钧跟两太后和“大伴”冯保商量，决定对上疏这四个人，给予处分，以免得有人再来效尤。于是皇帝诏谕群臣：

“奸邪小人，藐朕冲年，忌惮元辅。借纲常之说，肆为谬论，欲使朕孤立，得以任意自恣。兹已薄处，如再有党奸怀邪，必罪不宥（yòu 又）。”

那么皇上说的“薄处”又是怎样处分的呢？前两名官员各廷杖六十，削职为民；后两位则“言辞尤为孟浪”，于是艾穆和沈思孝便各挨了八十下板子，然后发戍边省充军。

这还算是“薄处”，那么“严处”又将如何？于是“夺情”事件便告结束。张居正把绯色的锦袍换成青布袍，象牙笏板改用木质的，拿牛角做的腰带代替了玉带，仍然回到文渊阁办公，继续他的变革事业。他还请皇帝批准，停发他的官俸，以表示他还在“守孝”，并没任职。皇帝体念他的苦心，虽然允准了，却命令宫中按时把柴米油盐及其他用品送到张府。有时还要光禄寺送去酒宴，以示关怀。

第二年是张居正的父亲死去的一周年，张居正向皇帝请假，回原籍安葬父亲。朱翊钧考虑再三，给了他三个月的假期。张居正去向皇帝辞行，朱翊钧在平台接见他，慰问说：

“朕舍不得让先生走，但又怕先生过分伤感，只好忍心准了先生的请求。虽然如此，但国事至重，先生走了朕实在是为难。”

张居正很感动，跪在地下，说：

“皇上大婚之后，要注意爱惜身体，免得臣子挂怀。”说完，伏地大哭。朱翊钧也哽咽垂泪，说：

“先生虽然走了，但国家大事还要留心。”于是许张居正在家如有大事，可以密封上奏。又赐他一枚银印，上镌 (juān 捐) “帝眷 (lài 赖) 忠良”四个字。

张居正又去辞别两位太后。两宫各送了赆 (jìn 尽) 仪，并加以慰喻。

万历六年三月，张居正带着随从和护卫还乡了。他从京师出发，经过河南直达江陵。他乘坐的是三十二个轿夫抬的特制大轿，轿里隔成两间，后一间用来坐卧，前一间可以会客。沿途如有地方大员来见，那就请到轿上，边走边谈。他的卫队也很引人注目，因为这些将士除了腰里佩刀之外，背上还背着一支鸟铳。鸟铳是从旧火铳改良而来的，当时军队还很少使用。这支卫队的卫士个个衣甲鲜明，精神抖擞，原来是太子太保左都督戚继光的部下。

张居正经过的地方，官员们郊迎郊送，说不得还要送上赆仪和奠金。路经襄阳、南阳的时候，宗室襄王和唐王也打破惯例，不但迎送，还要设宴款待。

路过新郑，张居正忽然想起要去探望老上级、老朋友高拱。仪仗队在一家破落的大红门前停下。张居正从大轿里出来，跟当门迎接的高拱见礼。那高拱穿一件旧衣，须发如银，老态龙钟。再看张居正，虽然鬓边已有霜丝，但意气昂扬，风采过人。两两相比，对照鲜明，各自心中

当有不同的感慨。

张居正坐在高府简陋的旧舍里，嘻嘻哈哈，侃侃而谈，仍像当初在国子监和内阁里与高拱共事时那样亲热，仍然是一口一个“高相国”来称呼高拱。但高拱能说什么呢？只有苦笑着诺诺而已。

一向高傲自负的高拱，如今落到这般地步，而张居正却还要来个示威式的“探望”，愈加使他耿耿于怀。但当前张居正炙手可热，自己是一个无权无势的退休官员，对他是无能为力了，但高拱也是以权术闻名于朝的，他预先写了一篇文章，准备将来他死后再发表。文章的题目叫《病榻遗言》。文章主要揭露两件事：一是冯保的不法与跋扈，另一个就是“王大臣事件”，不但为自己遭受的不白之冤进行申辩，还把冯保跟张居正如何勾结、蒙蔽皇上的事实一一揭穿。这篇《遗言》的发表方式也极为奇特，既不是呈给皇帝的疏文，也不是写给谁的书信，而是印成小册子，在社会上公开流传。这就造成了更为广泛的影响——不过这是后话，而且那时张居正也已经去世了。

江陵城为张居正父亲的葬礼倾城出动。早在张居正返回之前，地方官已在张家的大府第里，前后院落搭起高大的席棚——这张府原是辽王朱宪熾的王府。万历二年，有人告辽王谋反，张居正乘辽王被废的时机，将辽王府弄到自己手中。王府自然极为壮丽，如今经地方官用蓝、白二色布匹装点，倒也另有一派庄严肃穆的气象。出殡那天，本省、府县的主官，邻近州郡的文臣武将不用说都来了，各部和其他省份也派来了代表。出殡行列的最前面，是张居正从京里带回来的卫队。这是真人真马。卫队后面又是一列卫队，却是跟真人真马同样大小的纸扎的兵马，一共一百骑，由一个“百户”装束的纸人打头，浩浩荡荡，十分壮观。再后



面是功名牌，一面面牌上刻着张居正的官衔，从“进士及第”开始，什么“翰林院学士”、“礼部尚书”、“东阁学士”、“武英殿大学士”直到首辅“文渊阁大学士”；另外还有“太子太保”、“少保”、“少傅”、“太傅”等荣誉职衔，使人们看了，知道这位死去的老太爷，有一个多么卓绝超群的儿子，从一介书生而一步步位至钧相。

在“肃静”、“回避”牌后，则是各方致送的挽幛与挽联，密密麻麻像树林一般。带头的一幅挽幛上，大书“风范长存”四个斗方字，却是皇帝的御笔，自然格外引人注目。路人议论说：

“瞧，咱万岁爷的字写得多工整有力啊！”

“是呀，皇上才十六岁，就写得这样一手好字！”

人们夸皇上字写得好，事实上也就是张府的荣耀。

后面一座座抬亭，摆着各方的奠仪。又有和尚、尼姑、道士诵经，笙箫铙钹，吹吹打打。过了一拨又一拨。然后是送葬的文武官员，穿绯色袍子的是四品以上的文官，五至七品穿着青袍。他们一个个手执燃香，迈着四方步，一摇三晃地走着。武将们则顶盔贯甲，穿着戎装。至于穿绿袍的八品以下的官吏，就只配在前后张罗了。

多少年后，江陵的父老还会告诉子孙，他们年轻时曾目睹过多么盛大的一次出丧！

当年六月，张居正回朝了。在北京城外，司礼太监何进代表皇帝，偕同百官郊迎。两宫太后也各派大太监李琦、李用来宣谕慰劳。真是恩宠有加，盛况空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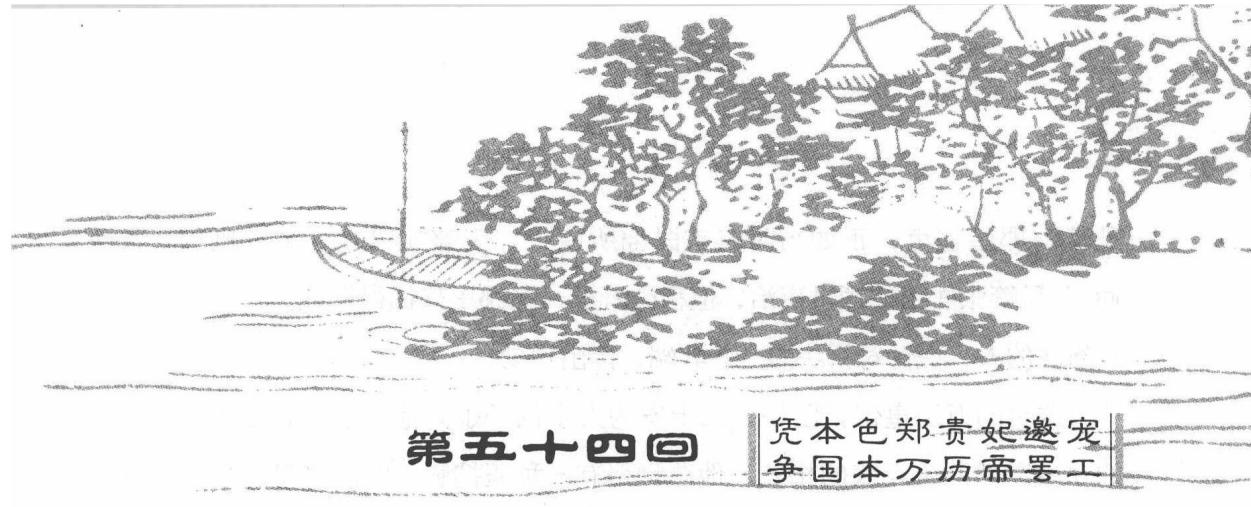
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故。被他压抑的反对派，开始反攻了。他们首先把矛头对准张居正倡行的“一条鞭法”。新法虽然是好的，但执行的还

是以前那些官吏，正如当时有首民谣所说：“吏弊如鼠穴，此塞则彼通。”尽管张居正整顿过吏治，但积弊既久，又哪里整顿得彻底。于是反对新法的人，便针对新法的一些弊端，提出弹劾。

这时的万历皇帝，已是个二十岁的大小伙子了。他当然不忘张先生的功劳，然而十年来的相处，他总觉得有一种压抑感。刚刚当皇帝的时候，偶有错处，母后便吓唬说：“告诉张先生去！”自己就吓得不得了。还有那一声大喝，“当读作‘勃’！”仿佛时时都在耳际。如今皇上应该“乾纲独断”了，于是便下令取消“一条鞭法”。虽然谕旨里没提张居正的名字，但既然否定了张居正倡行的“一条鞭法”，事实上也就暗示着对张居正的否定。于是反对派便纷纷跳了出来，对张居正群起而攻之。而高拱的《病榻遗言》也来凑热闹。这就使皇帝心中的天平，越来越偏离那个前元辅。到辽王妃王氏的奏疏上来，说张居正诬陷亲王、霸占王府、侵吞产业的时候，反张活动便达到了高潮。

张居正去世两年以后，皇帝朱翊钧终于对张居正进行清算，加给他的罪名是“诬蔑亲藩，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等，籍没了张居正的家产，把他的子弟尽数发戍到“烟瘴地面”。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因有司“追赃”拿不出，自缢而死。张居正委派的官员，包括抗倭名将戚继光在内，大多也被株连，或调或降或革。戚继光被降调为广东总兵，他愤而辞官，回原籍山东登州，逝于家中。

在朝野一片诋毁声中，只有前文提过的学者李贽出来替张居正说公道话，他称颂张居正是“宰相之杰”、“胆如天大”。对张居正的死后遭到清算，他愤愤不平，认为这种做法极不公道。



## 第五十四回

凭本色郑贵妃邀宠  
争国本万历帝罢工

在万历皇帝朱翊钧面前，放着从张居正家中查抄出来的财产清单，计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其他珍宝、古玩、字画等若干。说起来这些东西也许只值抄没的另一个首辅严嵩家产的二十分之一，但也算够可观的了。年轻皇帝不由产生了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他还记得小时候在经宴上听张先生讲课，那段“明君贵的是五谷，贱的是珠玉，因为五谷能养人，而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话，他认为这话是至理名言。可是张居正自己家里的这些“珠玉”，又是干什么用的呢？难道唯有他家的珠玉能衣、能食？

朱翊钧想想自己那时在年节给宫女们的赏赐，是那么寒碜，更增加了对张居正的反感，觉得这个老师是个言行不一的伪君子。他又进一步产生怀疑，经书上所说的那些大道理，是不是还值得相信？

他吩咐将从张居正家中没收的珠玉首饰，送到宫里来，分赏给他的后妃和宫嫔。他终于发现，这些东西佩戴到年轻女性的头上、身上之后，珠光宝气，的确别是一番风采。皇帝产生了一个想法：珠玉虽然不能衣，不能食，但却有着另外的一种更有价值的作用，那就是让他心爱的女人

高兴。后来他的横征暴敛，也许就在这时奠下了思想基础。

那些天皇帝精神恍惚，首辅申时行十分关心，他想让皇上的注意力分散一下，于是建议给皇帝修筑陵园。这下子朱翊钧又振作起来了。他也很迷信，不过跟他祖父嘉靖皇帝不同，嘉靖想长生不死，因而建醮求神，服食丹药，而他却知道死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他又相信人死之后魂灵还在，也还要跟生前一样吃喝玩乐。所以他很高兴地接纳了申时行的建议，为自己死后的享受作准备，并且亲自带领文武大臣、钦天监的官员和从民间请来的专会看风水的术士，来到天寿山，寻找“吉壤”。地点选定之后，立即开工，并起名为“定陵”。

建这座陵墓，共用了六年时间，参加营建的军匠和民工，每天有三万多人。石料都是从相距一百里外的房山县大石窝采来的。木料则是由云、贵、川等地采集的楠木和杉木。许多采石工人和伐木工人累死了，特别是南方伐木的民工，到深山老林里采树，那里野兽出没，毒瘴遍地，进山的人半数不能生还。

这座陵墓共耗银八百万两，大约相当于万历当时全国两年田赋的总和。人们不明白，原先一个很懂事理的皇帝，为什么忽然走向了截然相反的极端？他跟国库要钱，不能满足要求时便派太监去替他搜刮；他大兴皇庄，强占农民的土地；在大城市里开皇店，进行盘剥，他还把全国的矿藏全部占下，不许百姓开采，由他独自垄断；而最大的财源则是派出税使收税，在全国各处设立关卡，诸凡庐舍、舟车、粮谷、油盐，酒茶、禽畜等，无一项不征税。凤阳巡抚李三才上疏说：

“征榷之使（税使），急于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上下相争，唯利是闻。”

他警告朱翊钧：

“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鹜，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但朱翊钧已经尝到了搜刮的甜头，哪里肯听！终于在万历二十七年，山东临清爆发了反对税使马堂的斗争。接着湖广荆州地区，驱逐税使陈奉。嗣后各地反抗税使的斗争，此起彼伏。万历二十九年，苏州织工葛贤领导手工业工人暴动，聚集了几千人，打死了税使的爪牙多名。这些反抗斗争，虽然最后都被明廷镇压了，但火种却留在民间，最后导致了明末的农民起义。

一个人性格的转变，总是有许多因素。朱翊钧的生母李贵妃对他的教育是很严厉的，五岁就教他读书。六岁当了太子，便有皇帝指派的詹事府和翰林院的官员来给他当老师，教他“四书”和“五经”，以及古来的圣贤书籍。至于当了皇帝以后，“张先生”对他的学习更是抓得很紧。这些前面已经讲过了。但一个少年人，每天除了读书之外，也还要想个办法消遣消遣。然而他十岁就当了皇帝，成了万乘之尊，再去跟一般儿童那样玩些青梅竹马当然是不行了，便是平常的一举一动也要有司礼监的太监跟着，把皇帝的言行记录下来，写到“起居注”里，以垂后世。有一次朱翊钧在太监孙海的带领下，偷偷跑出紫禁城，到皇城的别墅“西内”去逛风景，并设宴饮酒。皇帝大为高兴，借着酒劲儿要两个宫女唱曲。唱曲是教坊司的事，一般宫女并不会。朱翊钧生起气来，认为宫女不唱是故意违抗圣旨，理应斩首。于是让孙海截去这两名宫女的头发，像三国时的曹操那样以发代首。宫女哭哭啼啼，小皇帝却“哈哈”大笑，觉得这种玩耍十分有趣。

然而有人报告了“大伴”冯保，冯保又去报告了慈圣太后。太后大为震惊，准备祭告太庙，废去这个“昏君”。朱翊钧只好跪下哀恳母后开恩。当然太后这只是吓唬他，并不想真正废掉皇帝，但这件事却也通知了首辅张居正，要他对皇帝加强辅导。于是孙海被发遣到边镇当戍卒了，皇帝身边的年轻太监都换成了中年人。从此，小皇帝的生活里便很少有乐趣。

十六岁皇帝大婚，朱翊钧有了妻子，即后来被谥为“孝端”的王皇后。皇后容貌端正，性情贤淑，平日仪态大方，不苟言笑。一个十五岁的少女做到这一步实在不容易，因为她的教养规定她只有这样才能“母仪天下”。年轻皇帝对这个妻子不感兴趣，因为她本人也就像那些读了一遍又一遍的经书一样，让人索然寡味。

从上述的经历来看，朱翊钧的童年、少年，以至于现在进入的青年时代，都好像生活在禁锢之中。认真地讲，他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可以与之倾心交谈的人，因而他非常孤独。还有那威严的“张先生”，总是使他感到压抑，却又不知怎样才能摆脱。十九岁那年冬天，他偶然来到母后的宫中。母后不在，只有一个宫女迎接他。他一时高兴，便跟这宫女发生了关系。后来这姓王的宫女便有了身孕，但朱翊钧却还不敢向母后讲。

转过年来，慈圣太后跟张居正商量，皇帝结婚已经三年，而皇后还没有“喜”，这可是件大事，因为这将关系到皇位的继承人。商量的结果，当年三月，一次便给皇帝娶了九个嫔妃，让她们给皇朝传宗接代。

过了些日子，王宫女肚子大起来了。慈圣太后一问，原来是跟皇帝有的，当然也还有《起居注》作证明。太后不但不怪，反而大为高兴，

立刻将这宫女封为恭妃。七月封的，八月便生下一个男孩。这便是皇长子常洛。

但是朱翊钧跟王恭妃也没有什么感情。当时发生关系，只是一时冲动。而当了母亲的王恭妃，依然跟皇后一样，是个循规蹈矩的具备妇德的典型，她照样做不了皇帝的好朋友。然而却在那同一天娶来的九嫔中，有一个十六岁的姑娘独得皇帝的青睐，她便是后来惹出许多纠纷的郑贵妃。

那年张居正去世了，朱翊钧解除了精神上的束缚，母后因为他已成年，也不再管他。他当然不会再像小时候那样，跟小太监们去胡闹，他只是在处理政事之余，看看书消遣。他让太监到书坊里买来各种各样的书籍。一向只读圣贤书的皇帝，突然看到这样一些包括诗集、药书、剧本，特别是传奇、平话之类的图书，仿佛进入了大千世界。他对唐、宋传奇和元代杂剧格外有兴趣， he 觉得他这个皇帝还不如《西厢记》里的张生有福分，宫里那么多女性，哪一个又及得上崔莺莺呢？

有一天，朱翊钧住在郑嫔宫中，无意间哼了一句《西厢记》的唱词，不料郑嫔却接上了下句。朱翊钧惊喜异常。原来郑嫔在家里时偷偷读过这本书。她这人的性格也跟其他后妃不同，处处显露出一个天真少女的本色。别人对皇帝是又敬又怕，时时以从属的关系在皇帝面前低眉顺眼，连头也不敢抬，但郑嫔却不，她把皇帝看成是自己的丈夫，如果说在名分上有群臣之别，但在感情上她跟皇帝是平等的。她敢面对面坐着跟皇帝说话，而不像别人那样说话时得站起来，不但低着头，还要把腰弯着。她敢跟皇帝搂搂抱抱，还用手掌去抚摸皇帝的脑袋，这种“大不敬”的行为，在别人又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做的。不高兴的时候，她还敢把头扎

进皇帝怀里撒娇，让皇帝来哄她。她还敢跟皇帝开玩笑，说他像个老太太……只有在这种时候，朱翊钧才觉得他从“神”的地位上降下来，也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才感到摆脱了孤独感。

于是皇帝的心事也就有了倾吐的对象，他常常把自己的一些惆怅、怀疑讲给郑嫔听。而那个女人却也敢大胆地对皇帝发表自己的见解——这在宫规里也是不允许的。不过他们总是单独在一起时悄悄商量，因而也没人察觉。

比如说建陵园的事，郑嫔就在背后出了不少主意。虽然将来能够进陵园去跟皇帝“并骨”的只有皇后一人。但朱翊钧却决定在陵墓的寝宫里留出三个人的位置，他不能把皇后抛开，因为这是办不到的。但他多留出一个位置来，是想将来让郑嫔睡在他的另一边。

还有那些从张居正家里抄没来的珠玉，朱翊钧把它们分给了后妃和宫女，总算还上了历年欠她们的“情”。郑嫔当然分得最多。这个小家碧玉出身的姑娘，戴上了碧玉簪、珍珠项链和镶着宝石的金耳环，显得竟是那么漂亮，使皇帝大为开心。郑嫔却又贪心不足，她希望皇帝给她弄来更多的珠玉，供她玩赏。她的欲望越来越大，朱翊钧只好到国库索钱派太监去采买。

皇帝要钱用，户部是不敢不给的。朱翊钧一次比一次大方，一次比一次要得多。万历十四年，郑嫔为皇帝生下了他的第三个儿子——在这之前，别的妃子生了个男孩，名叫朱常淑（xù叙），但在一岁时就夭折了——于是朱翊钧就把郑嫔册封为贵妃。贵妃的地位是仅次于皇后的。奇怪的是生了皇长子朱常洛的王恭妃，却没得到这种待遇，这自然是由于皇帝对郑贵妃的偏爱了。册封贵妃的礼仪十分隆重，似乎比册立皇后

还热闹些，国库拨出五十万两银子才勉强够开销。

人们把妻子叫“内助”，因为她能帮助丈夫。好的妻子被叫做“贤内助”。古代人们常常把一些昏庸皇帝的暴政归咎于他所宠幸的女人，这虽然不尽公平，却也不是丝毫没有道理。假如郑贵妃能够劝阻皇帝少花点儿钱，朱翊钧是会听的。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这样一来，万历初年张居正在国库里攒下来的一点儿积蓄，很快便被皇帝花光了。朱翊钧有一次派太监出去采购珠玉，一下子就用去了两千四百万两银子，等于全国六年的田赋收入。国库拿不出，皇帝便自己想办法。如前所述，他费尽心机来横征暴敛，使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郑贵妃生的皇三子名叫朱常洵。朱翊钧爱屋及乌。对这个娃娃特别钟爱，而跟皇长子朱长洛却没有感情。万历十八年，大臣们提出应该立太子了。皇后没生儿子，现在的皇子都算庶出，既然无“嫡”可立，那么就理该立“长”。可是皇帝不干，他要立朱常洵为太子。这就引出了一个历史上称之为“争国本”的事件。“国本”指的是太子，以群臣为一方，牢守着祖宗传下来的法则，主张册立长子。而皇帝自己为一方（当然也有拥护他的），坚持立他喜欢的儿子。双方争来争去，纠缠不休。如果这个皇帝像他的祖父嘉靖，为“大礼仪”的事廷杖反对他的一百多人，或是像他伯祖父正德，把一百多谏阻他南巡的官员都打了棍子，那么事情也许就好办得多。可是朱翊钧却采取了一个“拖”的办法，既然双方意见不一致，他就把册立太子的事推迟，理由是皇后还很年轻，说不定她会生个男孩，“立嫡”的原则是优先的，那时再立太子也不晚。

其实朱翊钧是要花招，他根本不到皇后宫里去住，皇后又怎么会生出男孩来呢？

朱翊钧还想了个办法，那就是像宪宗皇帝朱见深那样，把皇后废了，另立郑贵妃为皇后，那时朱常洵就会变成“嫡子”，可以名正言顺地立为太子了。但他思虑再三，一来觉得皇后虽然跟他没感情，但她循规蹈矩，又不曾像当初宪宗废的吴皇后那样打过人，找不到废她的理由；二来大臣们说不得又要反对，那麻烦也不会比立太子差，于是只好取消了废后的打算。当然，最后还有一条出路，那就是王皇后自己死去，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可惜的是皇后虽然多病，但却偏偏活着，不肯跟皇帝合作。

为立太子的事，朱翊钧大伤脑筋，也大为恼火。后来赌气采取了个跟大臣们消极对抗的办法，他从此不再上朝。皇帝竟罢了工，这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奇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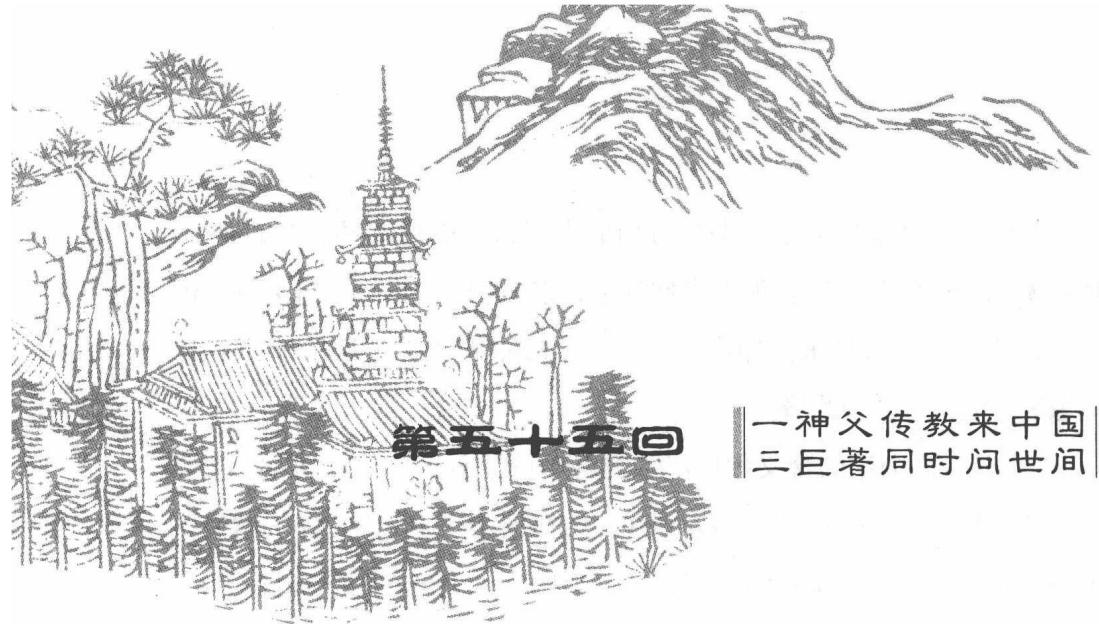
幸而朝廷多年延续下来的官僚制度还在起作用，内阁及部府仍然照常工作。有事呈奏上去，皇帝不批，那就认为是默许，于是便照章办理。当然也还有人要上本去争立太子的事，有的甚至影射到郑贵妃，问皇帝为什么生皇长子时不把王恭妃晋为贵妃，而三皇子一生下来就把郑嫔升为贵妃了呢？由此可见，皇上老早就想“废长立幼”。朱翊钧烦了，把上疏的官员降职停俸。但那时的制度，凡是国家的事情，只要颁发诏令，便须发下六科由给事中抄录，公布出去，弄得尽人皆知。皇帝渐渐明白，这些官员不过是想“讪主卖直”，是企图“沽名钓誉”。于是便给他来个“留中”——又叫“不报”，让那疏文自动作废，外间也就无法知道真相。

朱翊钧五岁读书，但皇长子朱常洛长到十四岁，皇帝还不给他指派老师，大小伙子一字不识，几乎让这位未来的皇帝成了文盲。

直到万历二十九年，皇帝将近四十岁了，再不立太子，如果他一旦

殡天，朝廷非大乱不可。于是皇帝决定册立太子了。那郑贵妃早有准备，几年以前，她曾趁皇帝喝得醉醺醺的时候，骗皇帝写了个手谕，答应将来封朱常洵为太子。郑贵妃把这张纸头珍重地装在锦匣里，放在她宫中的大梁上。现在她急忙拿下来，要皇上不食诺言。不料打开锦匣一看，手谕让衣鱼（即蠹虫）给咬吃了一部分，偏偏“常洵”两字也进了衣鱼的肚里。迷信的朱翊钧以为这是天意，终于把皇长子朱常洛封为太子。皇三子朱常洵封为福王，封国洛阳。皇五子朱常浩封瑞王，封国汉中。六子常润为惠王，封国荆州。七子常瀛为桂王，封国衡州。二、四、八子均幼年夭折，也追加了王爵封号。

至此，“国本之争”才算初步告一段落。



## 第五十五回

一神父传教来中国  
三巨著同时问世间

一次册立皇太子和册封四个亲王的典礼，耗银九百三十四万两，这还不包括皇帝赐给五个儿子的礼物。在给福王朱常洵的礼物中，有一台能够自己报告时辰的机械装置，是一个外国人去年献给皇帝的，名称叫“自鸣钟”。

这个外国人是意大利的传教士，名叫利玛窦。

利玛窦奉天主教罗马教廷的派遣，到中国来传播天主教。他于万历九年（公元 1581 年）来到广东省的澳门。澳门这个地方，原名濠镜，属香山县（今中山县）。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收买了明朝的官吏，占据了澳门，使这块中国领土成了欧洲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最早的租借地。由于澳门做了欧亚交通的窗口，许多到中国来的欧洲人多取道于此。利玛窦到澳门后，又转赴广东肇庆，在那里住了七年，学习汉文和汉话，适应汉族的风俗习惯，阅读了不少中国书籍，成了个“中国通”。

万历十九年，当他认为自己可以在汉人当中传教的时候，便在韶州（今广东韶关）建立起第一个天主教堂。以后又到了南京，和另外几个传教士一起，建立了一个规模更大的教堂，自任神父。

有一天，教堂里来了个书生打扮的青年人，面目清秀，举止儒雅。利玛窦把他请到房间里。那人自称姓徐，名光启，是一个在上海教书的先生，这次到南京是来参加乡试。他听说教堂的传教士是从外国来的，就想来了解一下外国的情况。

“外国”这个词的含义太广泛，凡是中国以外的国家，都可以称为“外国”。利玛窦请徐光启看他绘制的《万国全图》。利玛窦这张地图把世界分为五大洲，其一是亚细亚洲，凡百余国，中国就在这个洲里；其二是欧罗巴洲，有七十余国，利玛窦的故乡意大利（即意大利）是其中之一；其三利未亚洲；其四亚墨利加洲；其五墨瓦腊混洲。徐光启原先以为中国便是世界的中心，周围有一些国家也都围绕着中国，郑和下西洋便是走到世界的尽头。没想到世界原来竟有这么大。徐光启是个好学的人，他见这位黄发碧眼的高个子洋人说一口流利的汉话，懂得不少中国的知识，更谈了一些他闻所未闻的学问，不由大为佩服。利玛窦见这位中国书生谦恭好学，也很愿意和他结交，两个人一直谈了一个下午，徐光启才告辞回去。

徐光启考试完毕，在南京等着发榜。这中间，他差不多天天跑到利玛窦那儿去。两个人处得十分投机。利玛窦将西洋的科学知识讲给徐光启听，也从徐光启那里学来一些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原来徐光启从小便喜爱农业，不但读了不少前人著作，如《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等，还亲自参加劳动，在种菜、种粮中摸索改进，积累经验。

乡试发榜了，徐光启考中举人，他仍然回到上海教书。又过了几年，徐光启有了一点儿积蓄，把家安顿好了，自己上北京去参加会试。路过南京时，他又去拜访利玛窦，但利玛窦已经到北京去了。徐光启觉得这

些西洋传教士大多是一些有学问的人。为了更好地接近他们，徐光启便在南京利玛窦创建的天主教堂里受洗，成了个天主教徒。

万历三十二年，徐光启来到北京，参加会试，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不是正式官职，只能算是见习生，试用三年后再正式分配工作。徐光启孤身一人在京，又没有多少工作要做，想起在南京时听教堂神父说利玛窦到北京建立教堂，不知这教堂建在什么地方，于是天天出去寻访。北京在永乐年间建成了内城，嘉靖时又扩建了外城。偌大一个北京，徐光启像大海摸针一样，何时才能寻遍？后来他想起来，外国人进京，礼部可能知道。他跑到礼部主客司一问，果然三年多以前，有个叫利玛窦的外国传教士来向皇帝献宝，是由主客司接待转呈的。贡品中除了耶稣像、圣母像、《圣经》等宗教物品之外，还有一架稀奇的自鸣钟。主客司的官员对徐光启说：

“那自鸣钟真有意思，上了弦之后，便自己‘滴滴答答’地走起来，还会报时，两个小时顶一个时辰，走起来分毫不差，比咱们的漏壶可强多了。”

“皇上召见他了吗？”

“那可没有，东西倒是留下了，还吩咐本司安排他到馆驿居住了一段时间。”

“他建立教堂了吗？”

“他提出请求了，可是皇上不答应。这个洋人以后就离开馆驿，听说在东城朝阳门一带买了房子。以后他再没到礼部来。”

徐光启有了线索，便到朝阳门一带寻访。有一天，他走过一条清静的胡同，忽然听到有风琴声。那时这种洋乐器在中国还很少见，而教堂

布教时唱圣诗却要用它伴奏。徐光启循声一找，琴声是从一所绿荫环绕的四合院里传出的。徐光启走过去敲门。琴声停了，出来应门的正是碧眼黄发的利玛窦。

两个老朋友会面，自然十分高兴。特别是利玛窦知道徐光启已经入教，更加引为知己。原来这所小院便是利玛窦建立的秘密教堂，而且已发展了几十名教徒。当初万历皇帝朱翊钧由于不承认天主教，因此不准利玛窦建教堂。但看在那自鸣钟的分儿上，又“嘉其远来”，准予他“假馆授徒”。因此，这座教堂对外是“书馆”的名义。

徐光启无事时常常跑来，还跟利玛窦学会了意大利文和英文。后来两人又合作译书。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便是他二人合译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翻译的西方教科书。以后又陆续译了《测量法义》、《测量异同》等著作。徐光启还独立翻译了水利科学书《泰西水法》。

万历三十五年，徐光启试用期满，分派到翰林院任检讨。检讨是从七品的史官。徐光启有了正式的职务，不能随意外出，而利玛窦则因江西有几位亲王要入教，他赶去主持洗礼，离开了北京，两人的合作这才中断。三年以后，利玛窦病卒于中国。

嗣后，徐光启在明代最后的三朝里，历任御史、侍郎、尚书，并做过内阁大学士。他曾跟西洋传教士龙华民等人合作，创编了一部历法书，定名为《崇祯历》（“崇祯”是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的年号）。而他的最大贡献，却是总结了中国传统的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根据自己的实践心得，写出的一部农业科技巨著《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内容十分丰富，有关水利、农具、作物和蔬菜果树的栽培、蚕桑、棉麻、病虫害防治、牧畜等，凡是农业上需用的知识，可以

说应有尽有；就连荒年怎样救灾，也有详细的介绍。全书六十卷，五十多万字，实在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一部辉煌的巨著。

徐光启死于崇祯六年（公元 1633 年），享年七十一岁。《农政全书》在他生前没来得及出版，到崇祯十二年（公元 1639 年），才由他的学生陈子龙等人加以整理，刊印问世。

事有凑巧，几乎就在《农政全书》刊印的同时，书坊间又推出了另一部科技书，那便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农政全书》讲的是农业知识，而《天工开物》则是工业书籍，两书一农一工，并驾齐驱，同放异彩。

宋应星是江西奉新人，举人出身，曾任过教谕、推官、知府等职。《天工开物》是他早在当教谕的时候，便开始利用公余时间编写的，出版于崇祯十年。全书分十八卷，讲了衣、食、住、行以及军工、开矿等多方面的工业生产知识。此外，他还有《论气》《谈天》等有关自然科学的著作。他的卒年大约在公元 1661 年前后。

就在《天工开物》和《农政全书》先后出版的两年间，民间还流传着一部游记的手抄本。作者名叫徐宏祖，号霞客，这本书也就叫《徐霞客游记》（清兵入关时，原稿和手抄本大多散失，后经徐霞客幼子徐寄收集整理，刊刻成书）。

徐霞客是江苏江阴人，生于万历十四年（公元 1586 年），跟那位福王朱常洵同龄。徐霞客一生淡泊功名，不愿进入仕途，而酷爱旅行。他从二十二岁起，直到五十六岁逝世的时候止，三十四年时间，几乎都是在旅行中度过的。

徐霞客把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和考察所得一一记载下来，写成了

《徐霞客游记》。这本书不单纯是记叙各地风光和风土人情的普通游记作品，同时也应该列入科学考察与地理考察的科学书籍之中。比如长江的起源，历代都根据《禹贡》中“岷山导江”的记载，认为起源于岷江。徐霞客对这个说法很怀疑，他不惮跋涉，北历三秦，南抵五岭，西出石门一带，终于考察出长江的上源不是岷江，而是金沙江。

这明代末期差不多同时问世的三本科技书，再加上前期出版的《本草纲目》，被后人誉为“科技四巨著”。而四位作者——药学家李时珍、农学家徐光启、工学家宋应星、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徐霞客，则被人们尊称为“科学四巨匠”。

徐霞客不走一般读书人走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有他的原因。首先自然是他从小就喜欢游历，对书上介绍的名山大川，不胜向往，立志要去亲眼一见，这是主观原因。客观上，则是他受到一些人的影响，使他认识到朝廷的腐败，产生了不愿同流合污的念头。这些影响他的人便是“东林党”人。

原来徐霞客的母亲王氏是江阴的邻县无锡人。徐霞客常随母亲到外公家做客。外公家住无锡东门外，离外公家不远有个东林书院，徐霞客少年好学，逢到东林书院讲学时他常去旁听。东林书院原是宋朝学者杨时讲学的旧址，已经废圮，后经一个叫顾宪成的退职官员修复，而讲学也就由顾宪成和他的弟弟顾允成主持，并常邀一些知名文士来宣讲。这些人在讲学之余也议论时政，臧否人物，对明廷的黑暗政治加以抨击。由于他们大多是官场中退下来的，知道内幕，揭露起来自然令人信服。徐霞客听了之后，对仕途产生恶感。虽然由于家中强迫，他去应了一次童子试，也没考取，后来他父母知道了他的志愿，也便不再逼他去考试，



就这样，他才终身是个白衣，成就为一个旅行家、地理家和散文作家。

徐霞客长大以后，在旅行中又结识了高攀龙、缪昌期、黄道周等人。这些人也都是所谓的“东林党”人。那么，“东林党”又是个什么组织呢？这还得回过头来从“国本之争”说起。

那还是万历二十二年，顾宪成时任吏部文选郎中。他在“争国本”中是力主立长的，因而被皇帝革职回乡。顾宪成在无锡创建东林书院以后，声名大振，当时的名士学者有不少人跟他志趣相同，其中更不乏被革退或自愿告退而回归林下的官员，他们有的奔聚于东林书院，有的则遥相应和。这些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舆论方面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由于他们的活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所以朝野中便把他们叫做“东林党”。

万历皇帝知道这种情况之后，认为顾宪成之所以有那么高的声望，都是因为他曾反对过自己这个皇帝，于是得出了个“讪主卖直”的结论。从此对反对他的官员不再处分，而把疏文压下“留中”、“不报”，让那些“讪主卖直”的官员得不到“沽名钓誉”的机会，就是他们想进监狱，也不让他们达到目的。到后来，他既不上朝，也不管任免官吏的事，一切交给内阁，而他自己则只操心开矿、征税、做买卖等盘剥老百姓的事情。

前文讲过，由于政府机器有一套现成的制度，还能够沿着既定的轨道进行。比如说四川土司杨应龙叛变了，兵部就派大将刘铤（tǐng 听）等去讨平。宁夏的哱（bō 玻）拜造反，大将李如松带兵将其剿灭。这中间还经历过一次援朝抗倭的战争，皇帝也一概不管，让内阁和兵部去办。至于日常的政务，像子、午、卯、酉之年，各省照例举办乡试，考取举

人。下一年，即岁在丑、辰、未、戌，举人们再会集北京，举行会试，录取进士。但这些年却产生不了状元，因为皇帝不肯殿试。徐光启就是万历三十二年考中进士的，他在万历朝做了十六年京官，竟只见过一次皇帝。

中低级的官员好办，有内阁和吏部负责任命、考查、升迁、贬革，但高级官员出缺又怎么办呢？皇帝既然不管，只好让那个位置空着。有时又采取一种极为奇特的办法——抓阄儿，把有资格的官员名字写在阄上，装入金瓶，先唱出官员职名来，然后再抽出一张阄儿，摊上谁就是谁。这种方式也是古今中外罕见的。主管官员把抽阄结果报给皇帝，朱翊钧连看也不看，吩咐司礼监照单批准就是了。

有一些忠直的官员不愿尸位素餐，愤而提出辞呈。皇帝仍是老办法，既不批准，也不挽留，反正就是一个词儿“不管”。官员们连“退职”都退不成，有的就索性扔下职务跑回家去了。这叫“弃职私逃”，也是法纪不允许的，可也没人干涉。以致到万历后期，内阁常常只有一两名辅臣，万历四十六、四十七年，竟只剩下方从哲一个。按规定，六科给事中共五十八人，后来只剩下四个。十三道监察御史原有一百一十人，最后也只有五个人在那里工作。朝廷的钟摆，几乎要停止运行了。

朱翊钧为了立太子的事跟官员们怄气不合作，竟达到这种程度，也实在是可悲。

## 第五十六回

梃击变起贵妃赠罪  
红丸案发光宗捐生

“国本之争”虽然在万历二十九年以立太子、封亲王而告一段落，但余波荡漾，久久不息。首先是皇帝和郑贵妃把福王朱常洵留居宫中，不让他之藩就国。不久，民间便流传着一份叫《续忧危竑议》的传单，内容是一个名叫“郑福成”的人自问自答，中心意思是皇帝立朱常洛为太子是不得已，他日必然更立。还说现在的大学士叫“朱赓”，“赓”就是“更”，内含“更立”的意思。至于托名“郑福成”，则隐喻“郑”贵妃的儿子“福”王必“成”为太子云云。当时人们称这份传单为“妖书”。万历帝让锦衣卫搜捕，最后抓了一个叫皦生光的人，处以极刑，流言才告平息。万历四十一年，百户王日乾告变，说有妖人孔学等为巫蛊，将不利于皇后和太子，据说又是郑贵妃指使。大学士叶向高劝朱翊钧不要追究，赶快把福王送到洛阳就国，谣言自然熄灭。朱翊钧和郑贵妃不得已，才把已经二十八岁的儿子福王朱常洵打发到洛阳去了，赐给他田地两万顷，指定江都（今江苏扬州）至太平（今安徽当涂）这一段沿江税收，统归福王个人收取。后来把四川的井盐和茶税，也都归他。至于临走时赏赐的珍玉古玩，更是不计其数。那福王究竟不愧是万历皇帝的爱子，

他到洛阳后，“日闭阁饮醇酒，所好唯妇女倡乐”，再就是千方百计地搜刮钱财，把他父亲的那一套全都学会了。

又过了一年，便发生了“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晚，一个叫张差的男子手执木梃（枣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直至宫檐下才被捉住。那张差装疯卖傻，语无伦次，初审后便准备按痴癫来结案。但大多数官员对此有怀疑，刑部提牢主事王之采（cǎi 采）在监里跟张差谈话，发现他并不痴呆，便报告刑部主官，要求会审，这才查出张差原来是郑贵妃宫中太监庞保和刘成指使的。

朱翊钧看到刑部呈上来的疏文。想到前年关于巫蛊的告变中，好像也牵涉到庞保和刘成。于是把刑部的疏文袖了，来到郑贵妃宫中，将疏文朝她一扔，说：

“你自己看看吧，你手下人做的好事！”

郑贵妃捡起疏文一看，吓得脸色大变，颤声说：

“这事臣妾委实不知。”说罢，放声大哭。

朱翊钧看郑贵妃哭得那样悲伤，心里也不好受，想了想，说：

“外边廷议汹汹，朕也不便替你解说，你自己去求太子吧！”说完转身走了出去。

郑贵妃怔了一阵，想想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擦干眼泪，赶往慈庆宫。太子朱常洛把她迎进宫内，郑贵妃向太子声明庞保、刘成做的事她确实不知道，说着说着眼泪又流出来了，她索性跪到地上去哭。太子也赶忙跪下答礼，把她扶了起来，安慰说：

“娘娘不要担忧，我自有道理。”

朱常洛送走郑贵妃，自己去见父皇，要求对梃击一案，让法司迅速结狱，不要株连别人。

第二天，皇帝朱翊钧带着太子朱常洛和皇孙朱由校、朱由检、朱由楫，来到慈宁宫。这是朱翊钧生母慈圣太后生前居住的地方。同时命内阁学士方从哲、吴道南率领百官来此朝见。这是二十五年来，皇帝第一次召见百官。许多从来没见过皇帝的官员听到通知后老早就赶了来，在慈宁宫门前排好了队。等到太监传呼，首辅方从哲打头，带领文武群臣按品级先后鱼贯而入，先到慈圣太后的灵位前行了一拜三叩礼，然后回到院内，三拜九叩，朝见皇上。

宫廊下设了一个低座，朱翊钧坐在上面。因为太后是上一年去世的，皇帝犹在守孝，所以穿戴着白绢做的衣冠。太子也穿着素袍，站在皇帝右侧。左侧一字儿排开站着三位皇孙。百官叩头行礼之后，朱翊钧连连招手让大家往前来。百官膝行而前，几名大臣跪的地方只离皇帝的御座几步远。这时因听信晚而来迟了的官员，喘吁吁地次第赶到。朱翊钧吩咐宫门口的卫士不要阻拦，放他们进来。这些官员也顾不得分什么品级，只能跪在人群后面，把个大庭院挤得满满的。一时绯袍、青袍混杂在一起，还夹着些顶盔贯甲的戎装武将，那景象既奇特又热闹。朱翊钧睁眼看看黑压压的几百人，除了前边的大员和几个年纪比较大的老臣外，好多人他都不认得，不由得摇摇头，说不上是感慨还是觉得遗憾。

朱翊钧开始讲话了，他说：

“自去岁圣母升遐，朕哀痛不已。今春以来，足膝又有毛病，酸软无力。但每到节日或是朔望忌辰，一定要来慈宁宫在圣母座前行礼，不敢懈怠。日昨忽然有个疯子张差闯入东宫伤人，外廷就有了许多无稽的传

说议论。尔等谁无父母子女，为什么要来离间我父子呢？”

朱翊钧说到这里停了停，显得很气愤。百官在下边低头听着，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朱翊钧接着说：

“朕方才看了刑部郎中赵会祯审问时录的口供，那就将人犯张差、庞保、刘成三人处死算了，不许波及无辜，以免惊扰圣母神位。”他看群臣默默无声，便扯着太子的手，说：“我这个大儿子最孝顺，朕最爱惜他……”

他这句不由衷的话还没说完，人群后边有人打断他的话，大声叫起来：

“皇上甚慈爱！皇太子甚仁孝！”

朱翊钧皱起眉头，问：

“是谁在嚷？”

司礼太监察看了之后回答说：

“是御史刘光复。”

可这时刘光复好像也得了“疯病”，叫了一声又一声，百官都跪在那里扭回头去看。朱翊钧脸上变色，大声喝止。但刘光复跪的地方离皇帝太远，似乎没听见，仍在那儿一声接一声地大叫那两句话。朱翊钧火了，三次唤“锦衣卫何在？”可那时锦衣卫校尉因百官人多，已被挤到宫门外边，所以没人应声。朱翊钧便命跟前的太监将刘光复拿下。几个太监从跪着的百官丛中挤过去，揪起刘光复便殴打起来。朱翊钧又喝道：

“不得乱殴，押往朝堂候旨！”

太监们把刘光复交给锦衣校尉，推推拥拥地押去了。刘光复为什么要那样一喊再喊呢？别人无法知道，不过在朱翊钧听来，他那一而再、

再而三地高呼什么“慈爱”、“仁孝”，仿佛是成心来讽刺皇上似的，实在可恼！

一场小小的骚动平息了。方从哲看皇上气得红头涨脸，便连连叩头，说：

“小臣无知，皇上且息天威。”

朱翊钧这才定定神，稍敛怒容，站起来张开拇指和中指，约量着太子的身体，然后坐下，说：

“他从一个婴儿长成六尺的丈夫，现在年正鼎盛，假使朕有别意，何不在他小时更置，今天还有何疑？而且福王已经之国，离此数千里，若非宣召，他能飞来吗？”说着又让内侍把三个小皇孙引到台阶上，说：“朕的孙子都这么大了，还有什么说的呢？”又回顾太子，“你有什么话，就对众卿说吧！”

朱常洛朝前跨了一步，面对群臣，说：

“像张差这样的疯子，把他正法就是了，何必株连！我父子这般亲爱，外廷却无端生出各种议论，实无道理！你们宁为无君之臣，却让我也做不孝之子吗？”说时身体战栗，十分激动。

朱翊钧大声问：

“尔等听见皇太子的话了吗？”自己又把朱常洛方才的话大声重复了一遍。百官这才俯伏叩谢，陆续退出，一场喜剧便告结束了。

过了几天，刑部定案，将张差磔死，太监庞保、刘成在宫中杖毙。却又把那多事的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寔削职为民。还有那乱喊乱叫的御史刘光复，押在狱中，不久便也释放。

不过经此一闹，皇太子的地位倒也保住了。万历四十八年，王皇后

死了；又过了三个月，万历皇帝在五十八岁时寿终正寝，庙号“神宗”，葬于他自己修的坟墓定陵里，王皇后跟他合葬。朱翊钧临死时还留下个遗诏，要册封郑贵妃为皇后，以便郑贵妃死后，也能葬进定陵里去跟他做伴。但这个遗诏没能执行，因为大臣们认为大行皇帝（对刚死去的皇帝的称呼）的遗诏“有悖典礼”，既然皇帝已经死了，再来册立皇后，谁来主持这个皇帝的结婚仪式呢？再加上新皇帝朱常洛对郑贵妃早有芥蒂，乐得听从大臣的意见。所以当公元 1557 年定陵被发掘的时候，人们发现寝宫里给郑贵妃准备的位置上，躺的是一位被尊为“孝靖太后”的女人，她就是朱常洛的生母王恭妃。不过这不是朱常洛干的，因为他只当了二十九天皇帝便死去了，没来得及干这些事情。至于郑贵妃的死日，则又晚了十年，她死后葬于银泉山上。

在惶恐忧惧中度过半生的朱常洛，终于当上了皇帝。他知道，如果不是那些进士出身的大臣们——特别是“东林党”人来维护他，来为他这太子的“国本”地位力争，说不定他早被发遣到某一个偏乡僻壤去当藩王去了，哪里会登上九五之尊的宝座？他母亲是个失宠的妃子，幽居别宫，母子不得见面。父皇则对他冷冰冰的，从来没给过他好脸色，小时候他每次仰视父亲，看到的总是一副天神般的严峻面孔，使他望而生畏。他更没从父亲嘴里听到一句温暖的话语。他的正妃郭氏常常嘱咐他谨慎小心，警惕遭人暗害，使他日夜提心吊胆，寝食不安，他才是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就连太监们也欺负他。他是十四岁以后才经父皇批准，让翰林院讲官来给他上课的。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外边飘着鹅毛大雪，屋里竟不生火；冻得这位皇长子一劲儿发抖，而太监们却在另一间屋子里围炉谈笑。讲官郭正域不敢斥责太监，他只能大声对朱常洛说：

“天气这样寒冷，殿下应该珍重！”

太监们听郭正域这么说，才给殿下搬进来一个炭炉。

朱常洛当皇帝后，首先想的是依靠这些曾为他的利益奔走呼号的文官。那几年内阁只有一名大学士，就是那位从万历四十一年便入阁的方从哲。朱常洛于是就一下子封了九人，让那些拥护过他的大员都当了辅臣。然而遗憾的是他身体不好，而郑贵妃却一次送给他美女四人。关于美女的人数，史书上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四人，有的说是三十人，差距竟这么大——不管怎么说，朱常洛父亲刚死，他应该“席藁枕块”以守孝的时候，郑贵妃却以庶母的身份将美女多名送给他，不能不使人怀疑她的居心。

不过皇帝的身体却越来越糟了。他忽然腹泻起来，一夜竟如厕三十次，弄得筋疲力尽。这时有个叫李可灼的鸿胪寺卿，献上一粒药丸，说是祖传秘方制成。皇帝拿着这粒红色的丸药看了一阵，大胆服了下去，觉得肚里十分舒服，连叫“忠臣，忠臣！”他还要再服。李可灼又进上一粒。但这次吃了不一会儿，皇帝却呻吟起来，接着便断了气。——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红丸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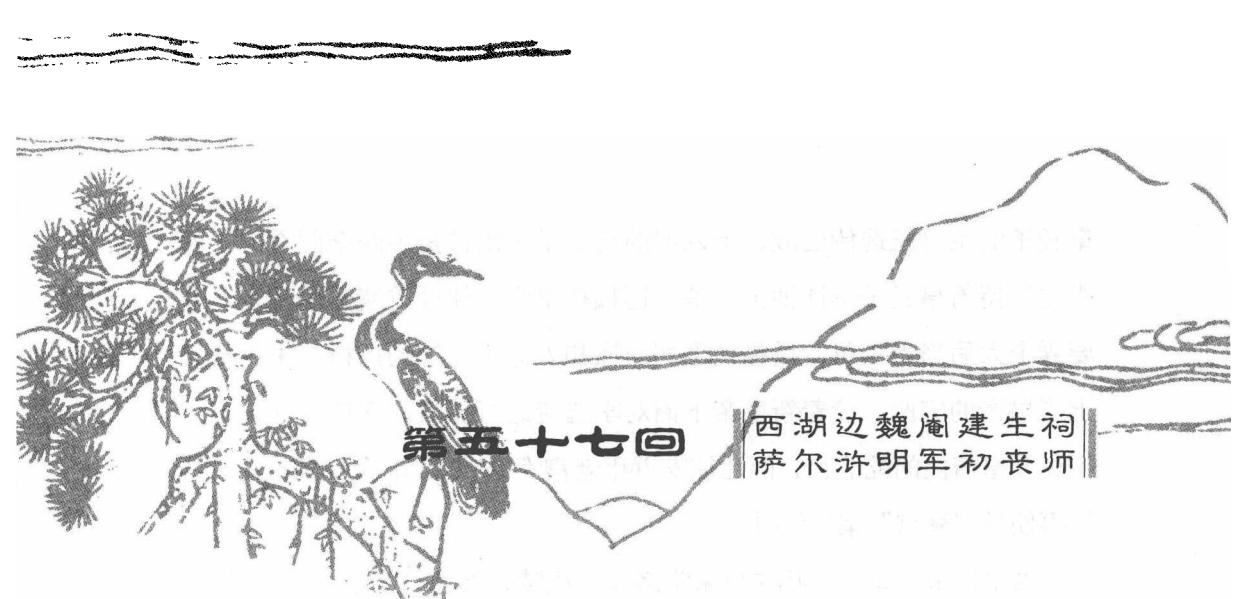
紧接着又发生了“移宫案”。原来朱常洛即位时，太子正妃郭氏已经死了，他是跟一个姓李的选侍住在乾清宫里。“选侍”不是妃嫔的正式称号，只是“选”出来侍奉太子的“侍女”。那时太子朱常洛只有正妃郭氏一人，另外有四个“选侍”，两个“淑女”，都算是他的妾媵(yìng映)。当时选侍里有两个姓李的，便按她们居住的地点，称为“西李”、“东李”。西李选侍最受朱常洛宠爱。那时郭妃已死，西李正等着朱常洛封她为皇后呢，可还没来得及举行册封的典礼皇帝便死了。由于郭妃和

皇长子的生母王选侍已故，十六岁的皇长子朱由校是由西李照看的。西李便挟持着皇长子不让他去登基，还赖在皇帝的住处乾清宫里不走，非要弄个太后当当不可。后经大臣刘一燊和太监王安等的护持，朱由校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接着新皇帝下诏对李选侍进行谴责。李选侍这才不得不离开皇帝住的乾清宫，而迁往安置年老宫女的哕（hùi）会——这件事便是“移宫”案的经过。

朱由校做了皇帝，将先皇朱常洛葬于庆陵，尊为“光宗”。光宗连个年号都没有。后来大臣们商量，就把万历四十八年改为泰昌元年，算是让他具备了一个当皇帝的各种条件——哪怕是后来追加的条件。

朱由校十六岁当了皇帝，定明年为天启元年。就是这个小皇帝，将他的祖母王恭妃追尊为孝靖太后，跟神宗皇帝、孝端太后合葬于定陵，让那个郑贵妃只好“望陵兴叹”。

“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结束了，在这“三案”中，东林党人一直站在正统的一边，维护了明朝的封建法统。但“三案”又没结束，因为后来有个叫魏忠贤的太监篡权，又把“三案”拿出来，作为打击迫害东林党人的工具，使大明王朝终于一蹶不振。



魏忠贤跟他的祖师王振、刘瑾一样，入宫前也是一个无赖。他跟一些赌徒赌钱，输急了耍赖被人窘辱，愤而自宫，后来混进皇宫做了太监。他目不识丁，但狡诈异常，比王振和刘瑾又胜一筹，因此，颇得小皇帝朱由校的欢心。

小皇帝朱由校十六岁登基时还是个文盲，原因是他自幼生长在忧苦的环境中。父亲虽然贵为太子，但常愁自身难保，又哪有心思顾得上对子女的教养！所以朱由校在他当皇帝以前，连书都没读过，如果说他父亲光宗是半个文盲，他就得说是全文盲了。光宗即位时，大学士方从哲请求为这位皇长子指定个师傅，教他读书，光宗说：“不急，等明年再谈吧！”结果没等到明年，文盲便当了皇帝。

朱由校有个乳母客氏，一直侍奉他。朱由校登基后，感念她的好处，封她为“奉圣夫人”。客氏跟魏忠贤要好，请朱由校批准二人做了“夫妻”。宫中把这种假夫妻称为“对食”。朱由校因为自己是客氏从小带大的，对她十分信任，也就连带地宠信了魏忠贤。并根据客氏的请求，任命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秉笔”是代皇上签阅文件，皇上不识字，

“秉笔”太监也不识字，可魏忠贤偏有个好记性，更会谄谀拍马。小皇帝因为小时候没读书，烦闷时学起了木工活儿作为消遣，手艺还相当不错。慢慢地上了瘾，当皇帝后瞅空儿还去推推刨刨，打上一件家具。魏忠贤偏赶皇帝扯着墨斗闭着一只眼吊线的时候，赶来禀事。朱由校总是挥挥手让他走开，随他自己去办——魏忠贤这一手也是向刘瑾学的。

魏忠贤跟客氏勾结，蒙蔽了小皇帝，操纵了权柄。他们排斥打击正人，网罗了一群无耻之徒，在朝堂上形成一党，人们称之为“阉党”，专跟那些比较正直的东林党人作对。

阉党的势力越来越大，逐渐地罢黜了原来的官员，占据了内阁、部院、“厂卫”以及各省地方的领导职位，换上了魏忠贤的心腹和爪牙，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名称，一个个都做了高官，死党遍布朝廷及全国各地。对东林党人以及不肯依附魏忠贤的人，统统罗织罪名，逐一施行残酷的打击，甚至迫害致死。并翻了“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作为迫害东林党人的借口，把“红丸案”主犯李可灼从戍所赦回来；将“移宫案”里的李选侍封为康妃。而对在“三案”中主持正义的东林党官员，一个个置于死地。

东林党其实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他们不过是由于志同道合，借讲学而互相交流思想、评议朝政的。这些人虽然比较正派，但也有傲慢褊狭的缺点，不能容人，凡是与他们意见不合的便目之为“邪党”。这样不啻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致使一些受他们排斥的官员转而投靠了魏忠贤，扩大了阉党的力量。

魏忠贤在迫害东林党人的同时，想起东林党是以讲学来联系的，便下令封闭全国所有的书院，禁止讲学。更有浙江巡抚潘汝桢，在西湖边

上书院的旧址上建立了一所魏忠贤的生祠。一般祠堂，都是人死了之后为了纪念他而建的，比如孝宗皇帝就在西湖边上为保国有功的于谦建了座“旌功祠”。可是魏忠贤还活着，那么，这座祠堂便被叫做“生祠”。里面塑上魏忠贤的雕像，照例烧香燃烛，叩拜如仪。官员们一边行礼还要一边嘴里念着“九千岁”——因为魏忠贤那时已经自封为“九千岁”了，只比皇上的“万岁”差一点儿。

杭州建起了第一座魏阉的生祠，全国那些寡廉鲜耻的地方大员们争相效尤，很短的时间里，魏太监的生祠遍及天下。致使“都城数十里间，祠宇相望”。开封的阉党为了建魏阉生祠，拆毁民房两千多间，建起了一座九楹的宫殿。官员们在迎魏忠贤塑像入祠时，要行五拜三叩首礼。

这个时期，明朝的黑暗腐朽已到极点，经济也在阉党的操纵盘剥下，趋于崩溃，致使民不聊生。不少地方的百姓忍无可忍，奋起反抗。更有那边疆的少数民族，看到这是一个征服中原的时机，虎视眈眈，趁机入侵，大明帝国终于走上灭亡的道路。

这里所说的少数民族，便是取代明朝而建立大清王朝的后金。它的第一代始祖名字叫努尔哈赤。

后金原称女真，是处于我国东北部的部落。原分野人女真、海西女真、建州女真三部。努尔哈赤便是建州女真人，生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他曾在总兵李成梁部下做过军官，被明朝封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后来逐渐扩充势力，吞并了野人女真和海西女真，把女真族统一起来，但对明朝却伪装恭顺。万历十七年，明廷封他为都督佥事，万历二十三年又封为龙虎将军。

努尔哈赤改革军制，建立了八旗军。在经济和文化上，也有所建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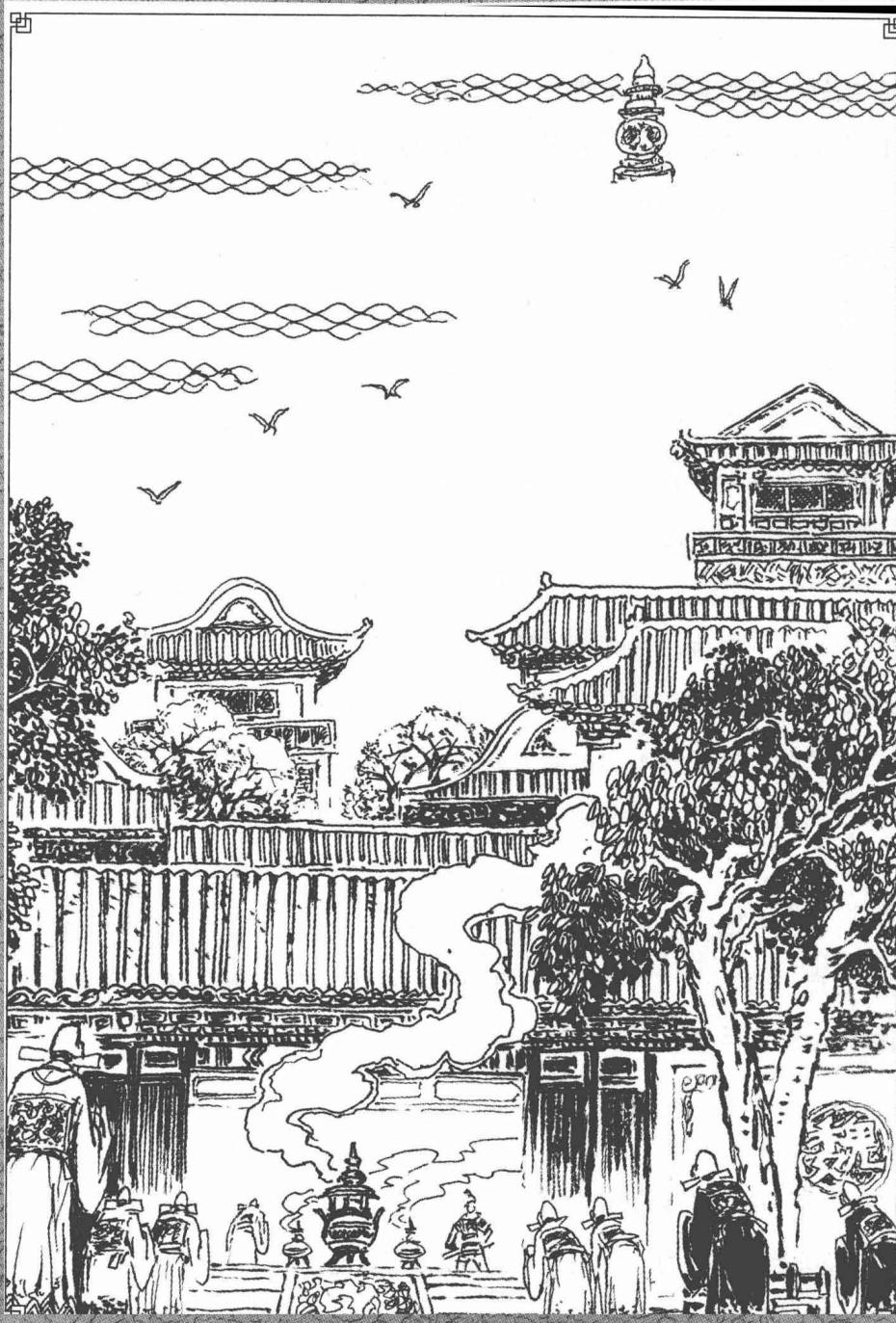
开矿冶铁，制造兵器，发展手工业，放养柞蚕，种植粮食，还创制了自己的文字，称为满文。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原是建州卫，在今辽宁新宾）建都，自称大可汗，定国号为后金，年号天命。并于万历四十六年，以“七大恨”誓师告天，兴兵向抚顺进犯。

其实十年以前，有眼光的明朝官员就察觉了建州的不稳现象。万历三十七年，御史熊廷弼巡察辽东后，便向神宗皇帝朱翊钧发出警报：“辽左危急！”可那时皇上正为了“争国本”的事而怠工，根本不理朝政。下边的大臣也得过且过，反正朝廷是你朱家的，你不管活该。这样才使努尔哈赤把势力养成，终于来争天下了。

努尔哈赤派出一部分军士化装成平民，带了土产到抚顺市场上出售，这边大军随后开拔。抚顺守将是游击李永芳，他事先一点儿迹象也没看出来。忽然城上守军来报，大批后金兵正向抚顺城杀来。李永芳慌里慌张，赶忙叫关城门。不想市场上突又杀出一伙人来，他们杀散门军，八旗军一冲而入。千总王命印等在巷战中阵亡，而李永芳一看不好，放下武器投降了。

后金兵占据了抚顺，威胁着辽东的军事中心沈阳中卫。沈阳守将赶忙向北京告急。这时那神宗皇帝朱翊钧才从宫内走出来，找首辅方从哲商量，决定派兵部右侍郎杨镐任“经略”，让他指挥辽东各地的军队与后金交战。

万历四十七年二月，明军十万人会集辽阳，听候杨镐经略的调遣。“经略”是新设的官职，主要是指挥一方的军事行动，而这位杨镐经略手里还有皇上颁给的尚方宝剑，可以斩杀总兵以下的文武官员，真是声势煊赫，威风无比。



杨镐本是个进士出身的文官，志大才疏，却又想做个诸葛亮第二。他在辽阳安下行署，关上门仔细地研究了几天兵法书，才召集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和总兵官马林、杜松、李如柏、刘铤等人，开会研究军事方案。李如柏提出，如今天气尚寒，东北地区山多林密，一遇风雪便行军困难，最好是把兵力集中起来，从沈阳出发，沿着大路进攻，先把抚顺收复，然后一鼓作气，直捣后金首府赫图阿拉。那杨镐抚着稀朗朗的胡须，眯缝着眼睛，说：

“李将军所言不妥。据说后金兵勇猛善战，我军与之正面交锋，纵使能胜，必多伤亡。我设了一个分兵合击、声东击西的方略，兵分四路。”说着摆出军事地图，指画着说：“我军兵分四路，直捣金夷巢穴建州卫。第一路由山海关总兵杜松将军指挥，从沈阳沿大路出发，直扑抚顺，然后进兵苏子河。第二路由辽东总兵李如柏将军指挥，由清河（今辽宁本溪东北）出鴟鴞关东向，直扑建州。第三路由开（开原）铁（铁岭）总兵马林将军指挥，由开原出三岔口从北边压下。第四路由辽阳总兵刘铤将军指挥，自宽奠（今辽宁宽甸）向北进攻。众位以为如何？”

看起来杨镐的战略似乎也有道理，他还进一步说明，二、三、四路各军，主要是牵制敌人，而把主力放在第一路。待敌人大军被那三路引走以后，一路军便可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捣抚顺，然后再跟三路会合，夹击建州卫敌人老巢了。杨镐说到得意处，忍不住抚须大笑。

在座的总督巡抚不懂打仗，四位总兵也多是勇猛有余、智谋不足的将领，听杨镐谈得头头是道，便也没人提出异议。计议已定，各自带兵奔向指定地点。那杨镐还在誓师的时候，请出尚方宝剑，斩了抚顺失守时临阵脱逃的指挥白云龙，以严明军纪，振奋士气。

那南路的第四军从宽奠北上，一路全是高山峻岭，又加上刚下了一场春雪，将士们在山道上蹒跚前进，十分困难。后金兵扼险据守，虽然人数不多，但占了地利，明军只能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争夺。刘铤是员猛将，在平杨应龙和援朝抗倭战争中曾多次立功，但在这样的战场上却也没有办法，事实上，这一路军白白地被敌人拖住了。

行进得最快的当然是在平地进军的第一路。那杜松也是著名的猛将，原守榆林，多次跟来犯的蒙古兵交锋，身上布满了箭疮刀痕。有一次在北京时，他脱下衣服徒步涉过潞河（在通州附近），人们看他那全身伤疤，不禁为之泪下。他却掀起虬髯大笑：

“俺老杜是个大老粗，没读过书，鸟字不识，不过就是不像文人那样惜死罢了！”

但这员猛将猛是猛了，可他鸟字不识，也就缺少点儿动脑筋的本事，一上战场就拼呀、杀呀，却不会琢磨琢磨。他率领三万大军一鼓作气赶到抚顺城下，一看城门大开，百姓出来迎接，说后金兵两天前就撤走了。杜松又掀起络腮胡子大笑：

“哈哈哈，努尔哈赤那小子，怕是不敢跟俺老杜支把了吧！”

杜松并不休息，穿过抚顺，继续东进。越五岭关，来到浑河边上的萨尔浒（在今抚顺大伙房水库一带）。这时天色已暗淡下来，杜松麾下一员裨将建议就地宿营，明天再过河。杜松看看天色，又看看浅浅的浑河水，说：

“趁天没黑透，赶快渡过去，敌人怕咱们，别叫他们跑得太远了，让另外三路抢了头功。”说完首先拍马下到河里。他的卫士追着喊他披上铁甲。杜松又大笑了，笑声震得附近松林里刚刚归巢的乌鸦又飞了起来。

“哈哈哈！披了铁甲打仗，那叫什么勇敢？俺老杜从束发时从军，现在老了，还不知道铁甲的分量哪！”

杜松过河后率前锋部队直扑界凡寨，后边大队继续过河。但只渡过一万多人马，浑河上游突然冲下滚滚激流，来不及躲的将士连人带马被激流卷走，其余的又退了回去。眼看方才刚够着马肚皮的河水，突然间暴涨成汹涌的大河，把明军分割在两边岸上。后军将领急得直跺脚，很显然，这河水是敌人预先堵截了，这时又放下来的。

后军正在犹豫，却见暮霭里征尘滚滚，杀声震天，漫山遍野的后金军杀了过来。明军主将不在，裨将们惊急中竟无人出来统一指挥，结果刚一交锋便即溃散。后金军在后追杀，两万军至少有一半伤亡，其余的逃回抚顺去了。

河这岸努尔哈赤亲自来战杜松。原来明军虚实已被努尔哈赤探明，他故意撤出抚顺，又在南北两路，只遣少数军卒，凭险抵御，却集中十万余旗军来伏击杜松。他先击溃了河这岸的明军后军，然后返渡浑河，直袭杜松后路。杜松正在界凡寨前攻打，不防探卒来报，后军覆灭。接着努尔哈赤又率军袭来。八旗军十万人，来战杜松的一万人马，杜松即使多么神勇，也难以一敌十。他率残兵奔上界凡寨旁的高山，却又遇上山林中预先埋伏好的敌兵。杜松脱下衣服，光着臂膀，挥舞大刀杀敌。他连声大喊，声震山谷，虬髯挓挲着，目眦俱裂，一连劈倒十几名后金兵。努尔哈赤本想生擒他，这时只好下令放箭。一时飞箭如雨，这位轻敌的将军终于倒下了。

那时马林的第三路军，屯在稗子石。夜间听说一路军的败绩消息，军中惊扰。马林是个庸才，临难失措，待到天明敌军来攻，竟首先逃走

了。

南路的刘铤一军，倒是不断打胜仗，已经前进了三百里，不过杀伤不大。原因是努尔哈赤只在原守军的基础上增添了五百人，目的就是要拖住他。待到杜松一军覆败，后金军从明军的尸体上剥下军衣，装扮成明军，假装前来接应。却突然间冲杀过来，山林里的伏兵也同时杀出。明军被优势的敌人分割。努尔哈赤亲自来战刘铤。刘铤脸上中了流矢，他拔出箭来再战。努尔哈赤率十员骁将把刘铤团团围住，要他投降。刘铤破口大骂，奋力死战。接着脸上、臂上接连被创。这员六十岁的老将终于力竭，挥不动大刀了。努尔哈赤要骁将们停止攻击，喝令刘铤放下武器。只见满身血迹的老将刘铤勉力地擎起大刀，却猛地朝颈下一勒，自刎身亡了。

明朝的四路大军，只有李如柏的第二路迟迟疑疑地前进不远，得到杨镐的撤军令后，又迅速奔回，才得以保全。这一役，明军损失将领三百一十余人，军士四万五千八百余人。因为战场在萨尔浒一带，历史上称之为“萨尔浒之战”。

后金兵乘战胜余威，连续攻取了开原、铁岭，威胁沈阳。而那经略杨镐垂头丧气地回到北京，到宫里去见皇上复命。他跪在下边哆嗦，朱翊钧坐在上边哆嗦。杨镐哆嗦是吓的，怕受到严厉的处分。而皇上的哆嗦则是气的，气杨镐无能吗？还是气自个儿为什么这些年不管事？但无论怎么说，生气也晚了。



## 第五十八回

|| 诛阉党朱由检用计  
害良将皇太极反间 ||

到得天启元年（公元 1621 年），后金军攻打沈阳和辽阳，两地先后失守，经略袁应泰牺牲。明廷又派熊廷弼去辽东当经略，挽救败局，可是却又派王化贞当辽东巡抚。王化贞投靠阉党，控制兵权，自带六万大军驻扎广宁（今辽宁北镇），扬言要荡平建州。而经略熊廷弼手中无兵，只能守在山海关，致使熊廷弼空有满腔抱负，浑身才智，却不得施展。待到努尔哈赤进攻广宁时，王化贞的部下未战先溃，王化贞侥幸逃得性命，广宁也失守了。

天启五年，阉党迫害东林党人，诬说熊廷弼贿赂东林党人杨涟和魏大中，并说他侵吞军款十七万两。结果将熊廷弼杀死后“传首九边”——即将人头轮流传到九个边镇示众。同时追缴“赃款”，致使熊廷弼死后还倾家荡产，连累“姻族之家俱破”。

嗣后，辽东经略两次更换，阉党兵部尚书高第亲自出马。他不去收复失地，却下令放弃山海关以东全部疆土。当时锦州、松山、杏山、大凌河、小凌河等要冲都有明军驻守。高第命令一下，守兵只好把十余万石军粮委弃，撤至山海关。而随迁的百姓大批死亡于途中，哭声震野，

人民怨恨，士气也越发不振。只有宁前道道员袁崇焕不接受这个命令，他抗言说：

“我是宁前道，守土有责，我死也要死在这里！”

宁前道设在宁远（今辽宁兴城），天启六年，努尔哈赤率兵来攻。袁崇焕早有准备，他召集全军将士，刺血为书，誓保边关。他把城外居民迁入城中，将城外房舍全部焚毁，用坚壁清野的办法来对付努尔哈赤。后金军盛气而来，不料刚一攻城，城头上摆的红衣大炮便给他来个迎头痛击，后金军伤亡很大，但仍然猛攻。连续几天，宁远城一直笼罩在战火之中，直到努尔哈赤自己也被炮弹击伤，这才下令撤退。这是几年来明军打的第一次胜仗，而攻锦州的后金军因努尔哈赤受伤也奉令撤回。于是明廷便把这一战役夸耀为“宁锦大捷”。

努尔哈赤带伤回到新都盛京（即沈阳，后金于前一年迁都于此），不久伤重死去，葬于福陵（今沈阳东陵）。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在“四大贝勒”斗争中取胜，当了大可汗。第二年改元为天聪元年。

也就这一年——天启七年，那精通木匠手艺的皇帝朱由校也死了，葬于德陵，庙号“熹宗”。他没有儿子，遗诏由他弟弟信王朱由检继位，这便是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崇祯”是他的年号。十七年以后他自杀身死，由清军将他葬于思陵，故又称他为“思宗”，清朝还给了他个谥号叫“庄烈帝”。

这些都是后话。却说信王朱由检原住在皇宫外的信王府。他深知魏忠贤和客氏的厉害，所以奉了哥哥的遗诏入宫后，自己带着干粮，因为他不知道宫中多至几万名的太监里会不会有人在他的食物里下毒。这个十七岁的末代皇帝比他哥哥强多了，他脑瓜儿好使——从入宫的警惕性

便可看出；却又不怎么好使，他自认为很聪明，却又常常办糊涂事。比如说他在对付魏忠贤的时候，表现得就很机智。他深深知道，这个狡猾的“九千岁”树大根深，党羽遍及全国，宫内就更不用说了，稍一不慎，便会遭他毒手。于是就采用麻痹战术。魏忠贤来试探，请求免去他东厂太监的职务。朱由检不批准，对他热情挽留。魏忠贤又来个第二步试探，提出停止为自己建生祠。朱由检对他说：

“各地为卿建祠，那是对你的爱戴。既然你自认为不妥，那么敕令各地不再建就是了。至于已经建成的，依旧保留，不用拆毁。”

魏忠贤放了点儿心，朱由检却又进一步麻痹他，说：

“卿辅佐朕的皇兄，劳苦功高。不过卿是内臣，无法封赏爵位。朕想封卿侄魏良卿为太师，晋宁国公，并赐铁券，作为对卿的酬劳。”

想那“太师”乃是正一品最高的官阶；“公”又是宗室以外最高的爵位；至于“铁券”，也只赏给个别有殊勋的功臣，那玩意儿是可以“与国同休”的，即便是犯了死罪，也可以保命。魏忠贤这下子放了心，认为这个小皇帝糊里糊涂地似乎跟他哥哥差不多。

然而这回老奸巨猾的魏忠贤走眼了，四个月后，他突然接到诏令，派他到凤阳的祖皇陵去当烧香太监。他被校尉押解登途，走到半路越想越窝囊，越窝囊越悔恨，终于上吊自杀。而那个“奉贤夫人”客氏，则被贬到浣衣局去洗衣服。她不服气，口出怨言，朱由检便下令将她乱棍击毙。后来二人的尸体又被从棺材里拖出来，明正典刑，千刀万剐。

至于阉党，那太师宁国公，并获铁券保险不杀的魏良卿，头一个被杀了头。跟他同死的阉党首恶六人，秋后处决的十九人，充军的十一人，徒刑三年准赎为民的一百二十九人，革职的四十四人。从对付阉党的过

程来看，朱由检不是够聪明吗？

然而他又糊涂，比如说他在选择大臣的时候，竟学万历年间的办法，也来个“金瓶抓阄”。他爷爷那时候自己不管事，大臣们没法子只好采取这不高明的一招。可是朱由检怀有宏图大略，一心要规复祖业，为什么不多征集意见，选用精明能干、正直奉公的人来做大臣，却采用这“听天由命”、充满迷信色彩的蠢办法呢？这除了说明他愚昧糊涂之外，又能说明什么？

从来越是愚昧糊涂的人，越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朱由检的悲剧也就在这里。他只看到自己聪明的一面，却看不到无知的一面。他始终认为自己做的事都是对的，因而独断专行，不肯听取大臣们的意见，连皇后意见也不听，最后竟达到蛮横暴虐的程度，终于使自己走上了末路。

他对付袁崇煥的事便是典型的例子。

袁崇煥在“宁锦大捷”之后，把高第丢失的土地一一收复，并在加强防卫的同时，大兴屯田，以保证军粮的供应。宁远、锦州一线逐渐巩固起来。努尔哈赤身死以后，他还派一个孙喇嘛去沈阳，以吊孝为名，探听后金的虚实。皇太极派人答谢，双方暂时敛兵不动。待到崇祯帝即位，授袁崇煥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衔，督理辽、蓟、登（山东蓬莱）、莱（山东掖县）及天津卫的军务，围绕渤海和黄海北部的广大地区的军队统由他负责指挥。他执行的战略是‘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策，战为奇策，和为旁策”，“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他驻节山海关，阻住了后金入侵的陆路，海路上也加强了防卫。

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公元1623年），皇太极安定了内部局势，又想兴兵入侵。他知道锦州、山海关一路有袁崇煥在，进攻不易得手，

便与蒙古部联结，绕过袁崇焕的防区，取道喜峰口入关，攻陷遵化后，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焕在山海关听到消息，大吃一惊，急忙亲率何可纲、祖大寿两镇总兵，昼夜驰驱，四天赶了七百里，来到北京。后金兵也刚刚杀到。后金屯兵南海子，袁崇焕的大营设在沙河门外。当时京师空虚，朝廷得警后虽然发檄调兵，但兵尚未到，幸亏袁崇焕主动赶回，才挽救了危局。

袁军与后金军几次交战，双方互有杀伤。这时离北京较近的宣大、保定、应天等镇驻军次第赶来增援。皇太极看突袭不成，便暗中嘱人买通阉党残余分子，制造谣言，说袁崇焕的策略里有一条叫“和为旁策”，因而早就跟后金有联络。并把袁崇焕派孙喇嘛去沈阳吊孝，说是派去讲和的使节。危城之下，这种流言飞语格外耸人听闻，而且越传越玄，竟说袁崇焕似乎已与皇太极订了城下之盟。

崇祯皇帝听到这个消息，又把“聪明”劲儿拿了出来，外表不动声色，只是委派大学士孙承宗驻扎通州，督理所有兵马，并继续檄调各地驻军迅速来京勤王。偏有两个太监在往通州传旨途中被后金军俘虏，押在军帐里，由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宪我监管。鲍、宁二人原是明军将领，是在辽东投降后金的。这三个军官好像忘记了帐中还有俘虏，竟在一边悄悄密谈起来，声音大小刚刚能让这两名太监听到。

“听说我们要退兵了。”

“瞎说！你怎么知道？”

“谁瞎说！我亲眼见大可汗单骑出营，和城里来的两骑立谈了挺长时间。”

“也说不定，兴许袁大帅跟咱们大可汗有密约了吧！”

“那就好了。说真的，我可真不愿跟老朋友在战场上打仗。”

三个人嘁嘁喳喳，两个太监留神细听。而到了晚上，帐篷里却没人看管了。两个太监试着摸出来，竟也没人发觉。他俩喘吁吁地跑回城去，把偷听到的话稟告皇上。朱由检又拿出麻痹对方的老办法，下令赏赐袁崇焕和祖大寿以玉带、彩幣，其他辽东将领也俱有封赏，并于宫中平台接见了袁崇焕和祖大寿，温语嘉勉。

过了几天，各地驻军来得更多了。袁崇焕便将防地交出，准备率兵进攻南海子。突然皇帝传诏，宣他进宫商量军务。他带几个亲兵匆匆赶回，刚进宫门便以通敌罪被捕。亲兵逃出城去报告祖大寿，祖大寿率所部哗变。

后来朱由检终于将袁崇焕处死，罪名当然是“通敌”。但当时就有人怀疑：如果袁崇焕通敌，他为什么不让出山海关大路呢？袁崇焕是主动率军回援的，城下作战他预先并没料到，又怎么去与皇太极订立密约？还有那两个太监，当了俘虏还能立这样的“大功”，也使人难以相信。可是这些并没引起朱由检的重视，一员精忠报国的优秀将领便含冤而死了。皇上却还在那儿沾沾自喜，认为由于他的英明决断，才阻止了一次叛变。直到皇太极死后，清廷为他修订《太宗实录》才把秘密公开，原来正是皇太极设下的反间计哩！

皇太极见明廷自毁干城，除掉了辽东的一个劲敌，又见各地明军源源开来，便携带所掳的子女玉帛从原路退回。以后皇太极又多次入侵，明军屡屡败绩，有一次竟侵扰到山东。督师卢像升在河北巨鹿阵亡，而明军经略洪承畴等人也先后在战败后投降。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皇太极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清，年号崇德，把女真族改为“满族”，正

式与明朝分庭抗礼，争夺天下了。

明朝连年在辽东用兵，所需军费，皇帝和王公大臣不肯掏腰包，却要百姓来负担。于是便在全国的田赋上加收一部分称为“辽饷”。这笔“辽饷”，从神宗朱翊钧末年开征，每年从民间额外刮取的粮食折合白银五百二十万两，崇祯初年又增加到六百六十万两，再加上许许多多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以及阉党、贵族、勋戚，大臣们的巧取豪夺，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除了揭竿而起以外，已没有别的路可走。

就在朱由校登上宝座的天启七年，陕西澄城县农民王二等几百人，为了抗交“辽饷”，杀死县官，首先倡难。接着陕西各地义军蜂起，便如燎原烈火，使明廷不得不惊叹：“全陕无宁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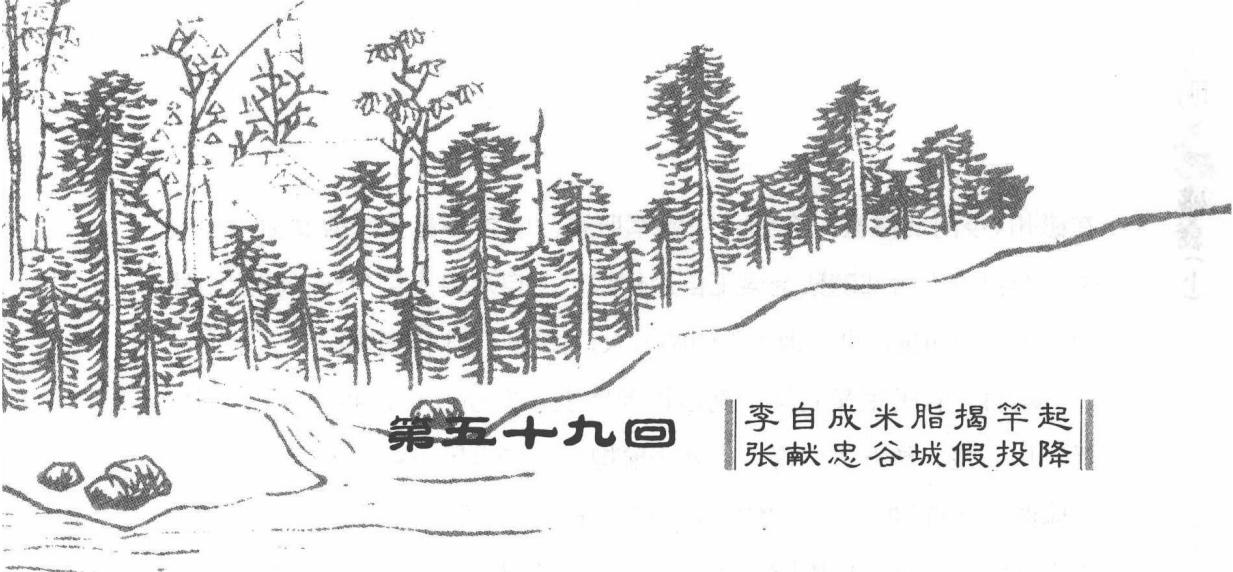
单说在众多的农民起义军中，有一家义军领袖姓李名自成，生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 1606 年），是陕西延安府米脂县农民李守忠的儿子，他家世代务农。李自成幼年时，为生活所迫曾出家当过和尚，法名黄来，在庙里有机会读经书，学会一些文字。后来又还俗给一家姬姓田主当牧羊奴。长大后生得身材高大，腰宽背圆，高凸的颧骨，深陷的双目，顾盼起来奕奕有神，而且勇武过人，武艺高强。天启六年他二十一岁时，到米脂县银川驿当了驿卒，每天骑马奔跑于崇山峻岭之间，递送公文书信。他认识文字，又会武功，更加性情豪爽，舍己为人，深得同驿驿卒们的拥戴。

天启七年，陕西各地爆发农民起义。明廷一面抵御后金的入侵，一面又要镇压起义军，闹得手忙脚乱。崇祯三年，皇帝朱由检采纳了给事中刘懋的建议，裁撤全国部分驿站，把节省下来的钱充作军费。银川驿也在裁撤之列。李自成失业后，生活艰难。他曾向同邑乡绅艾同知借过

高利贷，无力偿还。艾同知是个恶霸，派豪奴将李自成捉到城里，械系到大街上示众，用以镇吓其他欠债不还的人。

当时正是夏天，李自成戴着沉重的木械，被绑在一棵木柱上。头上是炎炎烈日，晒得他汗流浃背，昏迷不醒。有人看着不忍，端一碗水来给李自成喝，又被旁边看守的豪奴赶开。李自成奄奄待毙，忽见一群十几个人蜂拥而来，他们手执棍棒，把艾家的豪奴打跑，然后解下李自成的绑绳，击毁颈上的木枷，架起他跑出城去。这伙人便是跟李自成一同失业的银川驿卒。

李自成逃出米脂城外，想一想无别路可走，只得也造起反来。经过十几天时间，已聚起三百多人。打听得附近有一支义军，首领张存孟浑名不沾泥。李自成便去投奔他，正式参加了起义农民的行列。



## 第五十九回

李自成米脂揭竿起  
张献忠谷城假投降

不沾泥张存孟的农民军，活动于米脂、绥德、宁夏三处犬牙交错之地。李自成去投他，被委任为小头目。当时，陕西起义军共三十六营，大约二十余万人。各营人数不等，也互不统属，但共推王嘉胤为名义上的首领。

崇祯四年四月，明廷派军队进攻农民军。不沾泥部因寡不敌众，被明军打散，只剩下一百骑逃到关山岭上，而明将马科紧追不舍。这时不沾泥便提出向明军投降。不沾泥手下的两员大头目双翅虎和紫金龙不同意。不沾泥为了表示投诚的决心，竟将双翅虎杀死，捉住紫金龙，绑起来押着送往明军营中。李自成当时藏在山间的草丛中，幸免于难，但不沾泥只带走一部分人，其余不愿投降的四处跑散了。等不沾泥一伙走后，这些人又聚集起来，共推李自成为首领。李自成召集被明军打散的义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投奔闯王高迎祥。高迎祥把手下的农民军分成八个队，李自成被列为第八队的闯将。

农民军势力越来越大，转战于陕西、山西、四川等地。不久，王嘉胤战死，大家又公推紫金梁王自用为盟主，崇祯六年，三十六营农民军

在磁州(今河北磁县)会师，被明军所乘。明将左良玉和曹文诏两面夹击。李自成率所部随紫金梁王自用作战。王自用中流矢负伤，藏到山林中，不久因伤重逝世。他手下的两万人，便统归李自成指挥。

嗣后，农民军又立闯王高迎祥为盟主。崇祯七年，明廷专设了秦、晋、川、楚、豫五省总督，由陈奇瑜担任，专办围剿起义军的军务。陈奇瑜调集五省的明军，将农民军包围起来。农民军为了避开明军的围攻，进入商洛山，逃出包围圈，而奉命殿后的李自成一军三万人，则边打边走，掩护大队撤退。

六月，李自成的殿后部队误入兴安(今陕西安康)附近的车箱峡，这车箱峡位于黄洋河的上游，两岸全是悬崖峭壁，无法攀登，只有峡底沿河一条小路可以通行。农民军入峡后，才发现前路早有明军堵住，而后边的追兵又到，农民军陷入重围之中，车箱峡全长四十里，李自成将人马分成两路，在峡谷两端修筑工事，分别挡住明军的进攻，但却无法突围了。

明军攻了几次，攻不进去，便也不再攻，只是堵住谷口，想把农民军饿死、困死。偏赶上夏季连雨，农民军的粮食又尽，弓弦被雨水泡软了，箭上粘翎毛的胶脱落了，马匹也有一半饿死，农民军想吃马肉，但连一根能燃的干树枝都找不到，李自成召集手下的头领们商量，铁匠出身的刘宗敏说：

“不能困死在这儿，他娘的跟他们拼了！”

李自成的侄子李过问：

“我们的弓箭都不能用，敌人堵住峡口，拿箭射我们，又怎能冲得出

“那就白白地等死？”

首领们议论不决，只有李自成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摸着下巴沉思。刘宗敏急了，问他：

“大哥，你别光愣着不吱声，你是咱们的头儿，你得拿个主意呀！”

“好吧，”李自成站起来说，“投降。”

“什么？”十几个首领齐声惊问。

“哈哈！”李自成轻轻一笑，“别急嘛。我说的是假投降。”

李自成派李过拿了军中掳获的珠宝，出谷去见明军主帅。恰好五省总督陈奇瑜也赶来这里。原来他调集二十万木军，想将农民军一举歼灭，没想到农民军主力顺山跑了，但又听说车箱峡这儿困住了三万人。他匆匆赶来，正好李过求见。他把李过唤进帐中，问他：

“你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

“小民李过，是闯将李自成的侄儿。”

“你来做什么？是想投降吗？”

李过朝陈奇瑜映映眼。陈奇瑜笑笑，说：

“帐中都是本督的心腹，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李过先不说话，只把手中的包袱放到陈奇瑜案上，又退了下来。左右把包袱打开，陈奇瑜眼前一亮，只见包袱里全是晶莹闪耀的珍珠宝石。陈奇瑜一摆手，左右就把包袱收起来了。李过一看陈奇瑜把包袱留下，这才说明来意，要求解散归农。

陈奇瑜大喜，以为招抚了这三万人是立了一大功，当即一口应允。于是农民军交出了武器，在陈奇瑜派的“安插官”的监视下，离开了车箱峡，准备取道汉中，返回陕北家乡。

农民军赤手空拳，偃旗息鼓地走了几天，来到凤翔、宝鸡附近。夜里，他们突然拿出暗藏的匕首等短兵器，将“安插官”全部杀死，重新举起义旗，立破附近的麟游、扶风等七座县城，打开甲仗库，又武装了起来。从此，闯将李自成的威名大振。

陈奇瑜被革职了，明廷派洪承畴来代替他。洪承畴打听到农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正在河南一带，便檄令各省抚臣，划定区界，互相协防，彼此支援，摆开一个对农民军围攻的阵势。

十三家农民军在河南荥阳召开大会，商讨对策。马守印提出来，退回陕西，躲开明军进攻的锋芒。但八大王张献忠不同意，两个人争吵起来。十三家农民军的首领也意见不一，会上乱糟糟地吵得不可开交。这时，一个高个子的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将领站起来，高声说：

“各位听我一言，一个人犹可奋战，难道我们十万大军不能奋臂有为吗？”

农民军首领一看，说话的青年将领原来是高闯王麾下的闯将李自成。张献忠头一个叫起来：

“好！李兄弟这话说到了我心坎上了！他们谁怕死就走他们的，李兄弟，咱俩跟官兵干！”

“八大王少放屁！”马守印生气地说，“我是怕死吗？只为去年车箱峡亏了李闯将，咱们大军才得以保全，我是说咱别吃第二回亏。方才李闯将既那么说，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有，咱们给他来个‘分兵各向’。”李自成跟着解释，“分兵各向”便是把十三家人马分成几路，有的四下出击，有的中间策应，让各省驻军应付不暇，无法合围。



张献忠又是头一个赞成，还邀着高闯王和李自成同为一路。其余首领也都同意，大家作了分工，接着农民军纷纷行动，分兵五路，四面出击。各省抚臣自顾还来不及，洪承畴的合围计划也就成了泡影。

且说高迎祥和张献忠分的是东路，出发前，李自成建议，要破坏洪承畴的计划，最好是攻取明朝皇帝的老家凤阳，烧了他的祖坟，官军必然震动。他还建议把这一路军再分成三路，让官军察觉不到他们攻取的目标，然后再到凤阳会师。他们约定了日期，由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各带一路，分头出发了。

起义军兵分三路，弄得官军晕头转向，不知农民军想干什么，就在他们观望彷徨、不知所措的时候，张献忠已来到寿州（今安徽寿县），在当地农民向导下，乘夜间大雾，直薄凤阳城下。接着高迎祥和李自成也率军赶到。正月十五，三路军一齐攻城。凤阳留守署署正朱国相手下只有四千人，事先一点儿警报也没有，突然遭到围攻，闹得手忙脚乱，真以为是神兵天降。还没等他部署完毕，农民军已经攻进城来。朱国相率领区区四千人，哪里抵挡得住，很快就被歼灭了。

张献忠杀到府衙，听百姓说凤阳府知府颜容暄是个贪官，就让军士将他捉住，在府衙的大堂上活活杖死。李自成和张献忠又率人赶往太平乡孤庄村，攻进朱家祖皇陵的紫金城，把里边的享殿等建筑一把火烧掉，将陵墓也刨得乱七八糟。

消息传到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大为震惊，他穿上孝服跑到太庙去设祭痛哭，向祖宗赔罪，又把凤阳巡抚杨一鹏杀了出气。

这边高闯王和张献忠在凤阳休整三日，分别西撤。一路上忽然越境而过，忽然又攻取城池。即使攻下城池，也不坚守，只是焚掠府库，把

粮食放给民众，没等追兵赶到，却又离去，留一个烂摊子让官军去收拾。这种游击战术使那些官员们恨得牙根都发痒，于是便诬称农民军为“流贼”或“流寇”。

崇祯十年，皇帝下了狠心，调集重兵来围剿。闯王高迎祥在战斗中受伤被俘，押往北京后就义。闯王所部便公推李自成为领袖，从此改称“李闯王”。官军步步紧逼，不少农民军被官军击破。崇祯十一年，张献忠在谷城（今湖北谷城）看看局势不妙，只得向五省总督熊文灿谈判投降。他在谷城建了几百间房子，买地种麦，像是要当农民。而李自成却不肯这么干，他率军从四川赶回陕西，不料在潼关中了明军的埋伏，招致大败。

原来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庭接到川西地区的探报，说李自成正率军北上，他们便在潼关南原设伏，准备伏击农民军。李自成不曾防备，进入伏中。这潼关南原是一片四十里的大平原，农民军带着许多家属和伤病员，行走缓慢。而官军多是精锐的骑兵，等到农民军进入南原中部，四处理伏的官军号炮连续响起，官军骑兵从四面八方呐喊着冲杀过来。农民军仓促遇敌，阵形混乱，挡不住骑兵的冲击，被断成好几截，只能各自为战。李自成和刘宗敏、田见秀等主要首领被围在核心，他们左冲右突，终于杀了出去。但李自成回头一看，身后只剩下刘宗敏、田见秀、李过、李双喜等一十八骑。李自成长叹一声，泪如雨下。那刘宗敏愤怒咆哮着又要杀回去，被李自成拦住了。

李自成十八骑突围，进入商洛山中，收集溃散的农民军，并从事休整。逃散的农民军得到消息，渐渐赶来归队。李自成听说张献忠在谷城，虽然表面上向熊文灿投降，但部下仍有十万人，化装成农夫、小贩，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李自成便率领十几骑，跑到谷城，想跟张献忠借兵。

张献忠设宴款待李自成，但对是否借兵一事只字不提，却抚着李自成的后背，说：

“自成，你这次吃了大亏，不如跟着老哥我干吧！”

李自成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把杯子往桌上一放，瞅着张献忠“嘿嘿”冷笑。

“你笑什么？”张献忠问他。

“我笑你这里冬麦苗儿出得不错，明年定可打得不少粮食。八大王，你快当富家翁了。”

“哈哈哈！”张献忠抚须大笑，“你看我是当富翁的材料吗？”跟着正色说：“时机一到，你便看我老张的吧！怎么样，跟不跟我一块儿干？”

李自成笑着摇头，坚决地回答了一个“不”字。

“你这个倔家伙，真拿你没办法！”张献忠看李自成衣甲敝旧，骑的是一匹瘦马，便吩咐说：

“拿一套新甲来，再牵一匹骏马，送给李闯王！”

这时，张献忠的谋士见李自成不肯归附，便把张献忠叫出，撺掇他将李自成杀害，免得将来争夺天下。张献忠沉思了一会儿，说：

“我和李闯王跟高闯王一同攻打凤阳，烧了皇帝小儿的祖坟，我怎能不讲义气，反而害他呢？”张献忠终于拒绝了谋士的建议，把李自成送走了。

李自成回山之后，隐姓埋名，不打“闯王”旗号，恢复了“老八队”的名义。不久，又带领收集的几千人进入汉中，游弋于阳平关、白水江一带，几个月之内不进行大的活动。

第二年即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终于在谷城重举义旗，连累得那

熊文灿也丢官罢职。这一年，河南在连续几年旱灾之后，又遇到一个大旱之年，再加上闹了蝗虫，夏粮颗粒无收。那官府却又在“辽饷”之外，增收“剿饷”和“练饷”，农民饿死的不计其数。李自成就在这时率军进入河南。

河南杞县有个举人，名叫李信。看到河南赤地千里，写了一首《劝赈歌》劝富户们拿出粮食来赈济灾民，自己还带头捐了二百石粮食。但贪鄙吝啬的富户们不但不肯响应，反勾结官府，把李信下到狱中，说他“收买人心，图谋不轨”。饥民听说后砸开监狱，救出了李信。李信便改名李岩，和他弟弟李侔（móu 谋）一起，随饥民参加了农民军。

还有一个叫牛金星的举人，也是这时参加的。

李岩参加农民军后，协助李白成建立了斗争纲领，提的口号是“均田免征”。这个口号明确地提出土地问题，对无地农民有了更大的号召力。李岩还作了首歌谣，在饥民中传唱：

吃他娘，穿他娘，  
吃着不尽有闯王，  
不当差，不纳粮。

杀牛羊，备酒浆，  
开了城门迎闯王，  
闯王来时不纳粮。

农民军又整顿了军纪，部队自带帐篷，不住民房。行军时不踏庄稼。“不淫妇女，不杀无辜，不掠资财。”李自成以身作则，他身穿布衣，跟将士们吃一样的粗米淡菜。这样一来，饥民们纷纷来参加，李闯王这一部农民军又声势大振了。



## 第六十回

鑑煤山思宗殉故國  
離北京闯王敗垂成

崇祯十四年（公元 1641 年）正月，河南洛阳的福王府里，依然张灯结彩，庆贺新春。福王朱常洵，坐在特制的软椅里，观看府中歌妓的歌舞。他今年五十五岁了，当初没当上皇帝，他曾经失望过，但现在他不后悔，因为他觉得当皇帝并不比他现在享福，瞧瞧侄子朱由检吧，弄得焦头烂额，又是清兵，又是“流寇”，哪里有一天清闲？真是个不走运的皇帝！自己呢，啥事也不操心，有了父亲神宗皇帝和母亲郑贵妃赐给他的财富，再加上这些年的巧取豪夺，他的家底儿连自己也摸不清了。难怪人们说：“洛阳富于大内”。

歌舞正酣，门上来报，洛阳知府求见。朱常洵叫他进来，问他：

“已经来拜过年了，又来干什么？”

“回禀王爷，”知府躬身说，“流贼李自成已经进入河南，巡抚李仙凤大人告谕要各地加强防范。下官跟总兵王绍禹商议，洛阳城大，守军兵力不足，想招募一些乡勇协助守城，只是……”

“只是什么？”朱常洵转动着三百斤重的身躯不耐烦地说，“又是来要钱，对不对？上次你来要粮食赈灾，我说没有，怎么过这么几天，我

就又有了？”

“是，下官知道王爷困难……”

“谁又说我困难了？”朱常洵再次打断知府的话，“我问你，你们是管干什么的？皇家把城池交给你们，守不住小心你们的脑袋！”

知府也急了，大着胆子说：

“如果一旦守不住，下官的脑袋自然不保。可是王爷那时又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我的安全就是要你们负责！哼！给我滚出去！”

然而风声终于紧起来，城里纷纷传说李自成要来攻城，闹得一夕数惊。这位福王核计了半天，还是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不该拿出点儿银子来，所以元宵节过得也不大痛快。待到正月十八，突然听到“轰轰”的响声。太监来报说，李自成所部已经来到城下，炮击城垣了。

十九日，农民军合围，在西北两面猛攻。当夜初更，总兵王绍禹的部下向军官索要欠饷。军官拿不出，官兵便将军官打死，打开北门，迎接农民军入城。王绍禹看大势已去，只好缒城逃走，知府也逃之夭夭了。只有那福王朱常洵，这时才后悔不该不拿出钱来保命，现在想拿钱也晚了。他亡魂失魄地逃出王府，藏进迎恩寺里，被百姓发现，报告农民军。二十日，福王的“福”终于享到头了，他那三百斤重的肥肉，杀了后跟鹿肉掺到一起，做成肉糜，叫做“福禄酒”，分给了恨他人骨的老百姓。

福王府被打开了，一座座粮仓里，不少粮食已经霉烂；一座座绸库里，许多绸缎已经腐朽；至于金银珠宝，更是满箱盈椟（dú 毒），无法统计。李自成下令将粮食布帛都散给百姓。百姓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远近的农民纷纷赶来分享胜利果实，参加义军。农民军迅速发展到一百

万人。

嗣后，李自成三次攻打开封，在河南战场上纵横驰骋，消灭了来攻的几十万官军，几乎占领了河南全省。这时李自成不再游动作战，而开始在已占领的地区派遣官吏，建立政权了。

崇祯十五年底，李自成攻下湖广重镇襄阳（今湖北襄樊）。第二年，在这里建立了政权，李自成自称“新顺王”。刘宗敏、牛金星等也都安排了官职。五月，李自成召集文官武将，讨论下一步的战略进攻方向。会上，有的提出直赴河北，径攻京师。有的则主张顺流而下，先取南京，断了北京的粮道，然后北伐。李自成最后采纳了顾君恩的意见：先下关中，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然后攻取山西，再趋北京。

当年十月，农民军攻破潼关，杀死了曾在南原屠杀农民军和家属数万人的刽子手孙传庭。十一月攻破西安，并分兵占领了甘肃、宁夏等地。

崇祯十七年（公元 1644 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改西安为西京，设立各级政府官职，封赏功臣。跟着又亲率大军，东渡黄河，攻克太原。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由故关（今河北井陉西南）、真定北上，而主力则由李自成率领，经大同、宣府扑向北京，大、宣两镇，不战而降。大顺军于三月中旬拿下居庸关。三月十七日，抵达北京城下。

北京城里的崇祯皇帝，连得警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正如他叔叔福王朱常洵所说的，他确实是个不走运的皇帝，十七岁登基，从父兄手中接了件破褂子，虽然东缝西补，仍不免捉襟见肘。东边的大清国，西、南面的起义军，把他夹在当中，使他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如果他能真的像他自命的那样聪明，也许局势还有希望，比如说曾有过袁

崇煥、洪承疇那样的军事家，不能不说也是人才。然而杀的杀了，降的降了，应该说责任主要在皇帝身上，致使局面越来越糟。大顺军威胁京师，有人劝他迁都南京，有人劝他速召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回师勤王，他都迟疑不决。京里倒是还有几万军队，但是好长时间不发军饷。皇上自己没钱，内帑（tǎng 倘）和国库也都空了。欠饷不发，士兵们还肯卖命吗？朱由检没办法，只好去向勋臣国戚和大太监们借了。他派太监徐高去找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请他助饷。周奎却叹气哭穷，一毛不拔。徐高气得眼泪也流下来了，气愤地说：

“想不到国丈也是这样！好吧，国家完了，国丈有银子到何处去花？洛阳的福王又怎么样？”说完赌气走了。周奎想想福王的下场，也有点儿毛骨悚然，便进宫去见皇帝，答应拿出一万两银子来。朱由检叹口气，跟他商量：

“那你就出两万吧！”

周奎不好当面拒绝，磨磨蹭蹭地去找女儿，要周皇后替他出点儿，皇后凑上五千。周奎去户部交银子，却只交了一万三千两，他原来答应的千万又变成八千了。许多富太监听说皇上要借钱，怕募到自己头上，赶忙在各自住宅的门上贴了“此房出卖”的招贴，表示他们已经穷得没法过了。

这边皇帝要小钱，那边大顺军却已兵临城下。南迁已经来不及了，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也没赶到。兵部点集了城内的守军，一共还有五万多人。北京内城、外城一共十五万四千多个城堞，守军全部上城，一人得摊三个，这能守得过来吗？再说也不能白天晚上连轴转呀！皇上没办法，只好在十八日那天，先下个《罪己诏》，承认以前都是自己不好，请老百

姓原谅。接着又下诏停征“三饷”。跟着又下第三个诏书，乃是《亲征诏》，皇帝要御驾亲征。诏书说：

“朕今亲率六师以往，国家重务悉委太子。告尔臣民，有能奋发忠勇或助粮、器械、骡马、舟车悉诣军前听用。”还答应偿还，“绝不食言！”

当天下午，太监来报说，李启成已来到彰义门外，面对城门坐在一个马踏上。在西安和太原被俘的秦王朱存枢和晋王朱求桂分坐在他两旁的地面上，看着大顺军攻城。

当天晚上，朱由检无法入睡。他登上了皇宫后面的万岁山（即景山，又称煤山），遥望四面城外都是烛天的火光，沉闷的炮声不断冲入耳鼓。他在山顶徘徊了一阵，回到乾清宫，喝了几口酒，叹口气，说：

“只是苦我全城百姓！”

朱由检愣了一阵，吩咐太监把太子朱慈烺（lǎng 朗）和另两个儿子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炤（zhāo 昭），分送到外戚周氏和田氏家。这时周皇后走来。皇后垂泪说：

“妾事皇上一十八年，一句话也听不进，致有今日。”说完便自杀了。

十六岁的长平公主，牵着父亲的衣襟，眼泪一串串滴下。朱由检咬咬牙，叹口气，说：

“你为什么偏偏生在我家？”他把公主推开，拔出墙上的宝剑，左手用袍袖掩面，右手举剑砍去，砍下了公主的左臂。公主惨叫着摔倒了。朱由检还想再砍，但手软无力，只好作罢。这时他身边还有几十名太监，为首的是王承恩。朱由检手执三眼火铳，大家骑上马，拿着斧头，直奔东华门。守门的卫士不认识皇上，准备抵抗。一伙人只好又奔到安定门。但这座门已经封闭，无法开启。这时远处、近处传来喊杀声，太监们都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作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也有他的局限性，他这时没去认真考虑怎样巩固已取得的成绩，却首先想当皇帝。他从西长安门进入皇城，来到承天门下，弯弓搭箭，对左右说：

“我一箭射中门匾上中间的‘天’字，必当一统天下。”说毕一箭射去，却中在“天”字的下边，李自成不禁愕然。牛金星赶忙说：

“中‘天’字下，就是要有天下。”

李自成这才掷弓大笑。这时各军的将领次第入城，分别占据了各勋戚、大臣的府第，并把这些府第作为“追赃”衙门，对明朝的上层人物，拷讯追赃。

对那些勋戚大臣们“追赃”是对的，应该让他们把过去剥削百姓的财富吐出来。就拿国丈周奎来说吧，在他家里追出的白银就达五十二万两。三月下旬那几天，大顺军特制了夹棍五千副，专作追赃拷掠之用。结果只刘宗敏一处，所追缴的财物就值银一千万两。但这种追赃也有消极作用，因为对明官所追银数是事先按官阶规定的，有的人比较清廉，官阶虽高却没有钱。不缴钱便用板子打，夹棍夹，结果使大多数明官对大顺朝产生对抗情绪，新政权没能跟这些人结成统一战线。

再就是农民军入城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滋长了严重的骄傲自大、和平麻痹思想。有的人甚至腐化起来，追求享受安逸，那位刘宗敏将军竟把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据为己有。当时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已经写信给吴三桂，要他回来归顺。吴三桂同意了，回京途中接得家人报告，陈圆圆被刘宗敏抢去。吴三桂一怒之下，回到山海关，便与关外的清军联系，要与清军合作来对付大顺军。

那时清帝皇太极已于去年病亡，他的儿子福临继位，年号“顺治”。

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以摄政王的身份执政。他见吴三桂来向他请兵，自然高兴地答应。

北京城里，李自成和牛金星正在商量登基大典，却得到吴三桂跟清军勾结的消息。为了消除后患，李自成决定暂缓登基，先去讨平吴三桂。不料在山海关外的一片石一战，大顺军受吴三桂和清军的夹击，大败而回。李自成回到北京，于四月二十九日，在武英殿匆匆即皇帝位。第二天就离开北京，向陕西方面转移了。

吴三桂亲自为清军做先导，打回北京。多尔衮为了收买人心，为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发丧，葬于“思陵”，因称“思宗”，又谥为“庄烈帝”。然后打着替思宗报仇的旗号，摆出“仰承天命，吊民伐罪”的面孔，拉拢、收买了明朝的官吏，招诱汉族的地主缙绅的归附。一方面继续追击农民军，一方面于当年十月，让顺治帝福临在北京即位，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大清朝。

李自成在返回陕西的途中，与清军和吴三桂部，且战且走。这时李岩提出，他是河南人，想让李自成派他回河南去重新组织队伍，以便跟陕西互为犄角，共同对敌。牛金星向李自成进谗，说李岩兄弟是想回河南去独立。李自成不辨忠奸，便让牛金星设宴假意为李岩、李伟兄弟送行，在宴会上将李氏兄弟杀害了。刘宗敏愤而离开李自成，率所部开往河南。而牛金星自己，不久却投降了清朝。

这年十一月，张献忠在四川成都称帝，国号“大西”，年号“大顺”。

第二年的四月，大顺军经过通山县（今湖北通山）九宫山的时候，李自成带二十几名亲兵上山观察地形，突遭当地乡团武装包围，因寡不敌众，被乡勇杀死。

不久，张献忠也在与清兵战斗中，负伤阵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军的两个领袖不在了。但农民军的余部，仍在一些将领的统率下，与清兵在各地鏖战。还有南方各省的志士们，他们不肯向清朝屈服，也纷纷拥立明朝的宗室子弟，成立小朝廷，跟清兵对抗，产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

不过这些已不是本书的演讲范围，欲知详情，请看下一部——《前清盛世》。

---

附注：

关于李自成之死，史学界人士有认为他兵败后削发出家，于顺治二年春由鄂入湘，在夹山寺禅隐35年，法号奉天玉和尚，直到圆寂。1980年，湖南石门县在维修夹山寺大雄宝殿及挖掘夹山奉天玉大和尚之墓时，发现了李自成写的梅花百咏诗木刻残版及与李自成家乡米脂县葬俗相同的葬物。不久又挖掘出一个地下宫殿，出土的文物有许多皇帝所用的物品，为李自成即奉天玉和尚、并圆寂于夹山寺提供了物证。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五千年演义 大明盛衰 下

作者=吴梦起著

页数=263

出版社=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01

SS号=12831636

DX号=000007676051

url=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7676051&d=7F0C595D52A22C3C8256AC0D32B0BF0F&fenlei=0903091201&sw=%CE%E5%C7%A7%C4%EA%D1%DD%D2%E5++%B4%F3%C3%F7%CA%A2%CB%A5++%CF%C2